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海上闻人杜月笙



编辑说明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华民国史，是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周恩来、董必武多次号召编修中华民国史和重修清史。一九五六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被列入重点项目。一九八三年，邓颖超在全国第四次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研究中华民国史的重要性。

开展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胜利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权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也可以使广大群众深刻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曲折过程，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提高建设祖国、实现四化的信心和决心。本《丛书》是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对中华民国史研究活动的广泛开展起促进作用，并能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民国史知识。

本《丛书》拟通过较系统地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事件和专题，全面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它收录的范围，从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覆亡止。

本《丛书》要求史料翔实可靠，观点正确，文笔流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恰当分析和评价。

本《丛书》从一九八七年开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中华民国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7年11月

前言

杜月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带些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是当时黑社会的一个典型代表，而且就他的中、后期来说，已经难以“流氓”或“白相人”等单一的定义来概括他。他的势力渗透进了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界等各个方面。在近代中国，象杜月笙这样涉及如此众多领域的人物还不多，因此，他的一生可以视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黑暗秩序的某种缩影。解剖了他，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军阀、特务和流氓势力是如何沆瀣一气、编织成一张控制旧中国的罗网的，从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这一特殊社会形态，获得更加深刻的了解。

解放后，发表过一些关于杜月笙的文章和著作，它们对研究杜月笙其人，作出了贡献。但由于历史条件和著述角度的制约，难免还存在某种局限性：有的偏重于政治上的揭露和批判，对人物的个性和复杂性较少注意，有的以自己的见闻为主，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足。所以，对杜月笙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入。有鉴于此，我们不揣浅陋，写成了此书。就写作方法而言，我们主观上想将政治上的一般分析和揭示人物的个性结合起来，将多侧面的描绘和人物完整发展过程的叙述结合起来，力求比较真实地再现杜月笙其人。但立意容易，实现颇难。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杜月笙是一个以黑社会为依托进行活动的人物，他的许多言行，很少见之于正式记载，有些问题只能取材于传说和口碑材料，因而要准确反映他的一生，实也不易。所以，奉献给读者的此书，肯定会有不少舛错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专家和读者能给予教正。

作者

1986年4月

海上闻人杜月笙

一 黄门高足

幼年生活

一八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上海县高桥镇所谓杜家花园中一间矮小阴暗、多年失修的平房里，一个瘦骨伶仃、长着一对招风耳朵的男孩呱呱坠地了。这就是曾在黄浦滩上显赫一时，被称之为“海上闻人”的杜月笙。杜月笙出生之日为阴历七月十五日，这天俗称中元节，民间谓鬼生日，因此他的原名叫“月笙”，意为月半而生。以后发迹了，用他本人的话说是：“阴沟里的泥鳅，跳进了龙门，”乃易名为“镛”，“月笙”则改为“月笙”，被作为号。周礼大司乐疏：镛者为西方之乐，笙者为东方之乐，雅得多了。

杜月笙的父亲杜文庆，曾在茶馆当过“茶博士”，码头上干过“扦子手”（查验货物的丁役），所得甚少，难以养家活口。因此，杜月笙生母朱氏不得不时常帮人洗涮衣物，赚几枚铜板，贴补家用。杜月笙虽为杜文庆长子，但他出生时，杜文庆正为谋生计，与人合伙在上海杨树浦经营一家小米店，不在家中。

一八八九夏秋之际，上海地区阴雨连绵，加之时疫流行，病者和因病而亡者比比皆是，稻米棉花大量烂在田里，贫苦人家无不陷于饥饿威胁之中。朱氏带着杜月笙原已在穷困之中挣扎着过日子，遭此灾祸，无异雪上加霜，在高桥镇实在过不下去，只得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步行二十余里，到杨树浦投奔杜文庆。

杜文庆与人合伙开的小米店，本小利微，加之外商倾轧，本来就只能战战兢兢过日子，天灾之下，米价暴涨，无力进货，更如一叶孤舟，颠簸于风雨飘摇之中，时时有倒闭的危险。所以，朱氏到了杨树浦，并无老板娘可当，不久就带着身孕，抛下尚未断奶的杜月笙，进了纺织厂当女工。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后，便因贫病交加，操劳过度死去了。杜文庆为朱氏买了一口薄皮棺材，运回老家，浮厝于杜氏宅基附近的田塍上。他因无力抚养子女，不得不忍痛将女儿送给别人。此一送即杳无音讯，以后杜月笙虽多方设法，始终未找到这位妹妹。

杜文庆中年丧妻，兼拖幼子，不胜烦扰，不久就与比他小得多的张氏同居，杜月笙也因此有了继母。这位继母待杜月笙不错，在她的关心下，杜月笙总算农食有着。但好景不长，一八九二年冬，杜文庆病死，张氏将其棺材运回老家，与朱氏并排浮厝于田塍之上。据说，若干年后，在两口棺材中间长出一棵黄杨树。土中长树，本为常事，荒郊野坟，哪一座上面无树无草？但因长在杜某人父母亲的棺材间，便成了“奇迹”。杜月笙成为“闻人”之后，曾想拣处“好穴”，为他的父母落葬，但请了几位风水先生，都众口一词他说他父母浮厝之地，恰为一块寅葬卯发的“血地”，只能浮葬，不可入土，否则，风水将被破坏。那一棵黄杨树，在风水先生嘴里，更成了杜氏子孙世代荣枯的根源，一动也不敢动。于是乎，惯于标榜孝悌忠信的杜月笙，为保自家能一直发迹下去，只得委屈父母灵柩继续暴露于日晒雨淋之中，而不得入土为安。

浮厝了杜文庆后，张氏带着杜月笙又返杨树浦，继续靠撑持那家小米店为生。但因不善经营，不久被迫关门停业，只得再带着杜月笙回到高桥镇，替人浆洗缝补谋生。一八九三年，杜月笙六岁时，张氏将其送入一位姓翟的

老妇人开设的私塾读书，但只读了四个月，到第五个月时，张氏实在无力交付学费，杜月笙只得辍学。这是杜月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入学。以后，瞿老妇人谈起杜月笙时，总爱说：“他小时候读书，聪明是聪明格，就是相当的顽皮。”是褒是贬，不得而知。

一八九八年，上海地区大地震，接着瘟疫再度流行。就在这一年，杜月笙继母张氏突然于某日神秘地失踪了。她流落何方？结局如何？无人得知。但当地人普遍认为此事与“蚁媒党”有关。所谓“蚁媒党”，是那时活跃于浦东一带的流氓组织，专门勾引青年寡妇，凌辱之后，转卖他乡。

八岁的杜月笙成了孤儿，今天去堂兄家讨一顿，明天至娘舅处混一餐。日子长了，未免招惹白眼。杜月笙倒也识趣，尽量避免投亲求食，开始混迹于镇上一帮游手好闲的无赖少年之中，整天浪荡于茶馆赌棚，硬讨、软求、明抢、暗偷，到手什么吃什么，过着充满野性的生活。

也许是长期的耳濡目染，也许是过了今天不知明朝的无常生活，使杜月笙很早就对赌博产生极大的兴趣，长到十二三岁时，就渴望如那些壮汉一样，在赌场上大把进出，呼卢喝雉。以后，赌博更成他终身“嗜好”。为了凑赌资，他将父母遗留下来的破烂家什，甚至烧饭的锅子，都陆续拿出去变卖。赢了，由众伙伴簇拥着，神气活现地去大吃一顿；输了，则勒紧裤腰带，再寻赌本。不久，家里的东西全给卖光了，冬天连棉衣都穿不上，人们因此叫他“蜡光月生”。杜月笙成了亲友父老不屑一顾的“败家子”、无可救药的“小瘪三”，所到之处，往往众指所指，斥声迎面。

高桥镇混不下去了，杜月笙突然萌发出到上海闯世界的念头，他想把归他名下所有的半间祖屋卖掉，以为盘缠。此事被杜月笙娘舅朱扬声知晓，立时对此不肖外甥饱以老拳。他姑父同时警告他：如果再敢提一句卖祖屋的话，也要请他“吃生活”！

杜月笙忍辱含悲，带着一身伤、满脸泪，去求外婆设法。老人毕竟心软，看在早死女儿的份上，为这个不争气的外孙讨了一封荐书，介绍他去上海十六铺一家水果店学生意——当学徒。

一九二二年春，十四岁的杜月笙，穿一套粗布褂裤，背个小包袱，由外婆送出高桥镇。在八字桥（现属川沙县战斗大队）分手时，不知是因为告别唯一对他还有几分怜爱的老人而难过，还是因为高桥镇上人人看不起他而伤心，杜月笙嘶哑着喉咙哭道：“外婆，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家业，开祠堂，不然永远不再踏进这块血地！”

踏进上海滩

那时的上海，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已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沿海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景象，人称“十里洋场”。尤其十六铺一带，地处上海水陆交通要冲，中外轮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招商、宁绍等都在这里设有码头，因此更是客旅川流，熙来攘往，货物上下，纷坛沓至，周围云集着土行（贩卖鸦片的商行）、赌台、“燕子窝”（吸食鸦片的烟馆）和下等妓院，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臭肉生蛆，粪坑招蝇，这块“宝地”，麇集、滋生着大批无赖、流氓，也成为杜月笙的“发祥”之处。

杜月笙刚到十六铺时，在“鸿元盛”水果店当学徒。十六铺的水果店，

大多是中盘批发，或者直接从轮船上的客商手里、或者从大盘水果行中批发得各种新鲜果品，转手倒卖给上海各处水果店、水果摊，及肩挑摊设的水果贩，间或也向外地来沪采办的客商推销货色。在商品流转的关节处，往往有流氓插手其中，没有“孝敬”，便让你生意作不成。因此，开水果店不仅要有资金，要熟悉水果的品种、质量、价格，而且要了解并拉拢各方面的关系，否则是做不成买卖的。

杜月笙刚进店时，店里自老板以下，有店员、兜生意的跑街，还有比杜月笙先进店的“师兄”。依照旧例，杜月笙当时的工作主要是服侍师兄。店员、跑街和老板一家，每天扫地揩台，挑水做饭，乃至倒尿壶、刷马桶，起早睡晚，疲惫不堪。熬过一段时间，老板看他尚乖巧，于是派他做些跑腿差使，外出送货提货。

早已养成浪荡恶习的杜月笙，在店里望着外面的花花世界，已是心痒难熬，这时得以走出店堂，真可谓如鱼入水，似鸟归林，吃喝嫖赌，样样都想试一试。但他此时还上不得台面，难免到处受气。他想交朋友、找靠山，便经常偷店里的水果作人情。被老板发现后，往往一顿狠打，次数一多，自然危及饭碗。

就在杜月笙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他碰到了曾和他一起在“鸿元盛”水果店里当学徒的王国生。王国生当时已经满师，另开了一家“潘源盛”水果店，看在师兄弟的情份上，让杜月笙到他店里当个店员。杜月笙刚进“潘源盛”时，迫于敲掉饭碗的教训，尚能象模象样地相帮王国生作生意，因而可以按月领到一份薪水，逢年过节还有花红可分，过上了衣帽整齐、肚儿圆饱的生活。

但这种安分守己的日子，并不合杜月笙心意。不久，他忍不住了，先是去赌，从蹲在马路边的赌摊上掷骰子、押单双，到钻进赌棚里推牌九、搓麻将，无所不干，一度还迷恋于三十四门押其一的赌法。赌注也由制钱、铜板，一直押到角子、银洋。继而是嫖。当时上海的妓院，分为四等：书寓是头等，妓女必须能弹唱、善说白，方能挂出“书寓”牌子。书寓妓女称先生，有如日本之艺妓，只能侑酒，不许留宿。但这种妓院，到杜月笙时已极少见。其次是长三，妓女不会说白，但大约有六、七成能唱，这种妓院陪酒收三元，茶围也收三元，故称长三。再次为么二，茶围收一元，陪酒收二元，因此叫么二。最低级的是花烟间这里的妓女，俗称野雉，没有任何“风雅”作派，除了抽大烟，就是解衣撩带。据一九二一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统计，上海的长三有一千二百人，么二有四百九十人，野雉有二万四千八百五十八人。杜月笙是小店员，不要说书寓，连长三、么二也不敢问津，只能到花烟间乱搞。去多了，结识了一位人称“大阿姐”的花烟间老板，拜为“干娘”。这个干儿子因常代他干娘属下的妓女拉客，替狎客跑腿，而得以白嫖。花烟间的妓女当时流行结拜“十姐妹”的风气，所谓“十姐妹”并非都是女的，而是九女一男或十女一男，这个男的必是黑社会中有势力人物，妓女与其结拜，无非求其庇护而已。杜月笙浪迹于这种场所，很快与一批流氓恶棍混得烂熟，他羡慕这些人各霸一方，作威作福，更感到如果没有靠山，难以在这种蛇蝎出没的地方捞到便宜。于是拜了一个绰号“套签子福生”的陈世昌为老头子。

陈世昌是当时小东门（现中华路、东门路一带）一霸，“套签子福生”

的绰号，由他早年所搞的小规模赌博生意——套签子而来。所谓套签子，是用一铁筒，内或装制成签子状的牌九，或装染成各式的竹签，赌客与庄家各抽五支，如赌牌九，则看配出牌之大小，如赌颜色，则看某色之多少而决输赢。赌注由花生、糖果至铜板、现洋不限。陈世昌后加入清帮，成为一个小有势力的流氓，但仍靠经营赌、嫖两项行当为生。

清帮势力仅次于洪门，是旧中国第二大帮会，相沿有三百余年。据传其祖师为罗祖。罗祖收徒三人：翁、潘、钱。乾隆年间，此三人为清廷运粮，奉准钦命，准各招徒一千三百二十六名，带粮船一千九百九十只半。因名义上系襄助清廷，故称清帮。运粮之后，翁、潘、钱照军功例，得受武职。于是公开奉罗祖为祖师，立下三堂六部二十四辈，制定十大帮规，使清帮发展为严密的帮会组织。三堂是：翁佑堂、潘安堂、钱保堂。六部为：引见部、传道部、掌布部、用印部、司礼部、监察部。二十四辈按：“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学”排列，一字一辈。十大帮规则为：不准欺师灭祖，不准扰乱帮规，不准藐视前人，不准江湖乱道，不准扒灰放笼，不准引水带跳，不准奸盗邪淫，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弱。辛亥革命前，上海滩的清帮以“大”字辈当家，陈世昌是“通”字辈，杜月笙拜陈世昌为老头子，按顺序列为清帮中的“悟”字辈，是很低的辈份了。

据说杜月笙是在上海市郊一座小庙内履行加入清帮的拜师仪式。那天晚上他与十多个将入帮的“倥子”（帮会切口，指未入帮者），由引见师带领，首先在庙门上轻敲三下，然后与庙内按预定程序，作了一字不许错的答案：

“你是何人？”

“我是×××人，特来赶香堂。”

“此地抱香而上，你阿有三帮九代？”

“有格。”

“你带钱来否？”

“带格。”

“带了多少？”

“一百二十九文，内有一文小钱。”

庙门随即应声而开，杜月笙等鱼贯而入。庙内香案上供有祖师牌位，“老头子”陈世昌则坐于居中一张靠背椅上，两旁分列着传道师、执堂师、护法师、文堂师、武堂师、巡堂师、赞礼师、抱香师等前辈“爷叔”。杜月笙等进庙之后，恭敬肃立，先后履行净手斋戒的仪式。所谓净手，即打一盆清水，由陈世昌起，按辈份依次洗手。所谓斋戒，即倒一碗清水，由陈世昌起，按辈份依次嘴不碰碗地喝一口。

净手斋戒完毕，抱香师走出行列，高声唱请祖诗：“历代祖师下山来，红毡铺地步莲台；普渡弟子帮中进，万朵莲花遍地开。”然后在各祖师牌位前磕头烧香，关紧庙门，宣布：“本命师参祖”。

陈世昌随即款款而起，面对牌位，自报姓名：“我陈世昌，上海县人，报名上香。”报毕，三磕头。其后，在场愈人如法炮制。

拜完祖师爷，便举行入帮大典。引见师和传道师带领诸“倥子”拜本师及其他前辈。之后赞礼师分给各人三枝香，“倥子”们捧香下跪，恭听传道师介绍帮内历史。

介绍完毕，陈世昌俯望跪着的“倥子”，问道：“你们进帮，出于情愿，

还是人劝？”众人回答：“出于情愿。”于是陈世昌厉声教训道：“既是自愿，要听明白。安清帮不请不带，不来不怪，来者受戒。进帮容易出帮难，千金买不进，万金买不出！”“倥子”们当然诺诺连声，并将早已准备好的拜师帖和一份包在红纸里的蛰敬礼奉上。拜师帖背后按统一格式写着十六字誓言：“一祖流传，万世千秋；水往东流，永不回头。”

接受了拜师帖和蛰敬礼之后，陈世昌高喊一声：“小师傅受礼！”便将背得滚瓜烂熟的清帮帮规及帮内各种切口、暗号、手势一一传授。掌握了这些切口、暗号、手势，无论跑到什么码头，只要有清帮人在，亮出牌号，就能得到帮助。但如用错，被视为冒充，也会招来杀身之祸。

举行完这套仪式，杜月笙及其十余位“同参弟兄”便由“倥子”成为清帮正式成员。

“潘源盛”水果店老板王国生听说杜月笙拜上老头子，入了清帮，起先暗自高兴，以为有了这层关系，非但杜月笙外出提货销货，可以顺畅通行，而且水果店也可以受庇护，不受地痞流氓的欺侮。但未曾想到杜月笙没有为他招财进宝，却使他破财不少。

杜月笙加入清帮之后，自恃有了靠山，于赌、嫖两事更加肆行无忌。有时在赌棚赌红了眼，麻将连搓三日两夜还不肯停手。自家输光了，便开始挪用店里款项作赌本，结果亏空越来越大。杜月笙嫌麻将赌法输赢太少，不易翻本，铤而走险，进入花会赌场。花会不知始于何时，清稗类钞即有记载。清道光年间盛于江南，而以广东为最盛。开始赌徒多在荒郊僻壤行之。后来也设赌场。到咸丰初年，上海随着帮会势力的发展，花会也更加盛行起来。赌场多设在江湾、南市人迹罕到之处。花会赌法类似抽签，庄家列出三十六个人名，以生肖系之，称为花神，写在一公开悬挂的布幅上。然后在三十六人中，任选一人，背着赌客，将其名写于另一布幅上，并将此布幅卷为圆筒，高悬于梁上，称为彩筒。赌客可以在所列出的三十六人中，任挑一人，将其名字记于一纸条上，并写上自己所押的赌注，投入一密封柜内。接着即开彩筒和密封柜，如果纸条上所记人名与庄家在彩筒内所写人名相符，则赌客赢，庄家照赌注赔二十人倍，反之则庄家赢，押不中的赌注全归庄家。因为彩金高，不少赌徒去碰运气。杜月笙急于弥补亏空，甚至一天去两次。但庄家都是惯作手脚的，与赌场没关系的赌客极少能赢，杜月笙也输得一干二净。到此地步，“潘源盛”水果店是回不去了，因经常往来于花会赌场，与赌场老板混熟了，对赌场诱赌客上当的手段也略知一、二，干脆谋了个替赌场拉生意的差使，赌场行话称之为“航船”，取其载客入内的意思。但这条“航船”不按航道行驶，时常胡冲乱撞，不仅将赌客交付的赌注擅自代赌，甚至吞没赌客赢得的彩金。时间长了，弊端难免被揭，赌场都有流氓势力作靠山，如此大胆的诈骗行为，连他师傅陈世昌也保他不得，为了逃避赌客索债，杜月笙只得到处躲藏。因无正当经济来源，便依仗帮会势力，干些抢收“小货”、“拉船”、“拆梢”之类的勾当。所谓“小货”，是轮船水手由香港等处带来的走私货；抢收，便是与各店家争买。逢到店家派出收货的伙计，他们往往放出一副流氓泼皮的凶相，威胁道：“侬（上海方言，即你）是掙了招牌格，阿拉（上海方言，即我）是日吃太阳、夜吃露水格。识相点，放阿拉一条生路，否则要依好看！”强行包买走私货。所谓“拉船”，就是在半路拦住从浙江等地往上海运送蔬菜瓜果的农家小船，用威逼手段，以远远低于市价的价格硬买，到手之后，再转手渔利。而“押梢”，就是敲诈勒索。一九

——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民立报》有这样一则新闻：“捕房解冒探索诈之杜月笙至案情讯。人和栈伙吕和生、茶房朱彩心禀称：‘寓客带有烟具吸烟，杜月笙等二人前来，指商人栈中私售洋烟，言如能出洋五元，可免拘解公堂，否则定当重罚。商人系生意人，不欲多事，当给杜月笙五元，有账簿书明为凭’。杜供：‘小的与张阿四同去，实系张起意，现张不知匿在何处，小的分用一元，余洋均张取去是实’。”从中可见杜月笙“拆梢”活动之一斑。但此类勾当毕竟只能小弄弄，在黑社会的历练中“眼界”日高的杜月笙，不甘心总在阴沟里混，那双欲火喷闪的眼睛，无时不在捕捉着飞黄腾达的机会。

投靠黄金荣

机会来了。陈世昌的同辈弟兄、绰号“饭桶阿三”的黄振亿受黄金荣之托，要为黄公馆物色一个打杂的，他相中了杜月笙。黄金荣何许人？是当时上海法租界地面上脚一跺，地皮都要震三震的人物。他字锦镛，脸有麻点，绰号“麻皮金荣”，祖籍浙江绍兴。太平天国起义时，太平军一度攻占绍兴，黄金荣父亲辗转迁居苏州，在苏州衙门当“捕快头”，后至上海南市三牌楼开了一家小茶馆。黄金荣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生于苏州，其父至上海后，便将他带到上海。黄金荣共有兄弟姐妹五人，上有兄姐，下有弟妹，但其兄早死，他便成为长子。幼年时，其父曾送黄金荣去读书，但他自小顽不可驯，读书不成，他父亲便将他送到他姐夫在城隍庙所开的萃华堂裱画店当学徒。但黄金荣极不耐烦整日在店里干调糨糊、裁纸张的活计，时常不辞商去，与一批厮在他父亲茶馆里的“白相人”厮混。这样浪荡至二十多岁，没有学到一点正经本事，最后通过他父亲的老关系，介绍进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老上海称“包打听”，子承父业，吃起“捕快”饭来。

法国殖民主义者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继英国殖民主义者之后，闯入中国的。一八四七年一月二十日，法国政府任命了第一位所谓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这是个海盗式的人物，他曾公开扬言：“和中国人打交道，必须敢作敢为，才有力量。”他依据清政府被迫与法国签订的《中法五口通商章程》，威逼上海道台强令一部分地产所有者将上海北门外南至护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一块土地，低价转让给法国人为租界。一八四九年四月六日，上海道台为此事所出的告示宣称：法兰西人在上海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法国殖民主义者在上海的“国中之国”，由此而生。

一八六一年，法国殖民主义者要求扩展租界，在他们的威胁利诱下，上海道台对法国新任驻沪领事爱棠表示：“顾念我们的良好关系，我愿热诚设法使您满意。”结果，法租界靠近黄浦江的边界延伸了六百五十多米，租界面积扩大到七百余亩。一九〇一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又将租界擅自扩充，使其面积增至一千余亩。随着租界面积扩大，原来寥寥数名巡捕已不敷用，一

[法]梅朋、傅玄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21页。

同上，第42—43、294—295页。

同上，第42—43、294—295页。

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法租界公董局效法英租界招募印度巡捕（俗称“红头阿三”）的方法，从法国殖民地安南（今越南）调来二十九名巡捕，老上海称“安南巡捕”。但这批巡捕不懂中文，只能空摆架势，于事无济。于是，开始雇佣中国包探。黄金荣就是在这以后，进入法国巡捕房的。当时法国巡捕房的编制为：西探十三人，华探十三人，各发巡捕卡一张，黄金荣所得之卡编号为十三。有了这张卡，便可仰仗法国人势力，狐假虎威，逞凶一时。老上海因此称他们为“捏卡的人”。

黄金荣有其当过“捕快头”老子的关系网，加上长期混迹于“白相人”之中，上起富商巨贾、下至瘪三叫化，都有联系，对法租界黑社会内幕颇为熟悉，为人且心狠手辣，因此破案很有办法，进巡捕房不久，便深得法国人赏识，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逐渐升为华捕头目。随着势力的膨胀，他手下养起一批老上海称“三光码子”的人物。所谓“三光码子”，即“包打听”私人收容的助手，这批人大多是地痞无赖，名不见于巡捕房花名册之上，更谈不上支薪、领饷，他们与所从属之“包打听”的关系，类似帮会里流氓弟子拜老头子的关系，到处亮出师傅牌子，凭借权势，敲诈勒索，捞点外快谋生。“包打听”则依靠这批人当“耳报神”，搜集情报；有时也拿他们当替身，冒名顶替去了结一些必须了结但又捉不到或不便提出元凶的案件。

有了这批“三光码子”，和各种广泛的社会联系，黄金荣虽然在巡捕房身任要职，但却无须上班。他每天早晨睡到吃午饭时方起床。午饭后，便有几个长年相聚的赌友依时而来，吆五喝六，整整赌一个下午。晚上则必得去“孵混堂”——洗澡，擦背、扞脚、敲腿、捶身，全套享用。何时办案？就在这吃喝玩睡的二十四小时之中。碰到要事，不拘何时，都会有人到他身边咬耳朵，黄金荣则面授机宜，三言两语中，事情便得“摆平”。

黄金荣名为巡捕头，责在维护治安，但黄公馆却是最大的藏污纳垢之处。法租界的赌台，以黄金荣为靠山，所赢之财由黄金荣分成。黄金荣还开着几家戏馆、舞台，到法租界登台开演的女戏子，凡被相中，必得把身子交给他，不然，轻则喝倒彩，重则硝镪水淋头。禁物鸦片烟土，也由武装匪徒成麻袋成麻袋地秘密送进黄公馆，经黄金荣转手，变成大把大把的黄金、白银。

如此人物，怎么办案呢？试举一例，便可知其底蕴。

黄金荣担任巡捕头后，有一度法租界刑事案件急增，火并私斗、拦路抢劫层出不穷。寻其原因，大多出于“抢土”。原来，当时，鸦片烟土名为禁物，实际上却是明禁暗行，而且由于禁，鸦片得之不易，身价倍增，贩卖鸦片成为一本万利的生意。上海滩的地痞流氓，看着那些做鸦片生意的“土商”大把捞进金银，眼睛红得淌血，于是起而“抢土”，强行分肥。

“抢土”办法一般有三种：“挠钩”、“套箱”、“硬爬”。

“挠钩”，即水上行劫。远洋轮船将鸦片烟土带抵上海后，土商为逃避关卡查禁，采用一种秘密卸货方式：估准黄浦江涨潮时辰，将烟土一包包抛入水中，利用潮汛力量，送至江边，由预伏在那里的人员捞取。抢土者摸准消息，届时也派人去等候，烟土一到，用挠钩捞上就跑。

“套箱”则是陆上行劫办法之一。那时作烟土生意的商栈，大多秘密设于新开河民国路一带（现新开河南路人民路一带）。商栈运烟土，一般用煤油箱装，抢上者赶着马车。采取突然袭击方式，用预先准备好的木匣，套上煤油箱，搬上马车便逃。

“硬爬”，就是拦路行劫。事先派人埋伏于土商必经之途，采取暴力手

段抢土。

如此一来，流血事件不断，土商大为吃亏。但因鸦片生意是黑社会勾当，公开声张不得，土商只得行贿，买通租界法国头目，由他们吃住黄金荣破案。黄金荣本身既作鸦片生意，又干抢土勾当，在这两方面都有联系，见洋人怪罪下来，便运动各方面有力人物出面，要求众土商分出一定利润，给予靠抢土为生的地痞流氓。地痞流氓们得到一笔可观收入，也就偃旗息鼓，不再铤而走险。于是违禁买卖虽然照作，表面上法租界却平静得多了。

正是依靠这种亦官亦盗的身份、权势和手段，黄金荣成为法租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坐落于八仙桥同孚里（现金陵中路龙门路）的黄公馆，在众多“白相人”的心目中，是做梦也想攀援的所在。

杜月笙听说黄振亿要介绍他去黄公馆作事，当然喜上眉梢，再三再四地表示：“不管黄老板叫我做啥，我必定尽心尽力，把事情作好。”当下便约好时间，由黄振亿陪他去黄公馆。

其实，向黄金荣介绍杜月笙的，不只是黄振亿，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同参弟兄”、以后充当黄金荣亲信当差的“大头阿发”，包探徐阿东、陈三林等都曾在黄金荣面前提起过杜月笙。所以，黄金荣见过杜月笙之后，简单地问了几句，便同意留下他在黄公馆当差。杜月笙在黄公馆里，最初只能混在佣人之中，干些杂务，住在与灶披间相联的小房间里，进出走后门。生活虽然安定些，但却不能象以往那样随心所欲，快乐惬意了。但杜月笙进黄公馆，是存了心要以此为扶梯青云直上的，因此他按捺自己，暂时收敛那种浪荡习惯，处处谨慎，事事巴结，尤其费尽心机，揣摩黄金荣及其周围重要角色的性格脾气、生活习惯，善投其所好。杜月笙发迹之后，回忆自己在黄公馆的生活对曾说：那时他作人是“眼观四方，耳听八面”。因此，不久就博得黄公馆上下好感，都说：“杜月笙这小团（上海方言，即小孩、孩子之意）蛮灵格（上海方言，即很灵活，很不错之意）。”间或，黄金荣也开始派他做些贴身差使。有一次，黄金荣老婆林桂生得病，经久不好，于求神拜佛之外，提出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看护，据说可以取其阳气，以镇妖邪。杜月笙是被选中的一个，因此得以进出黄金荣的内室。林桂生是当年上海滩名闻遐迩的“白相人嫂嫂”，原来是黄金荣的朋友、苏州衙门一位捕快的内当家，黄金荣常去那位捕快家中玩，渐渐与她勾搭上了，不久林桂生便离开原来丈夫，转归黄金荣名下。林桂生虽长得矮小，但却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是上海滩所谓“拳头上立得起人，胳膊上跑得起马”的人物。有一度，黄金荣对她言听计从。杜月笙善于察言观色，当然深知林桂生枕头风之效验，因此照顾林桂生十二分尽力，真可谓“衣不解带，食不甘味”。别人照顾，无非是陪坐一旁，有差便应而已，他则全神贯注，殷勤备至，林桂生想到的，他想到了，林桂生没有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把林桂生服侍得心花怒放，引他为贴己心腹，连背着黄金荣在外面用“私房钱”放债等事也交给他经营。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更使林桂生和黄金荣对他另眼相看。

那是黄金荣做了一笔烟土生意，货色已到上海，不料黄公馆派去接货的人，却见财眼开，中途挟货私逃了。黄公馆闻讯大惊，但黄金荣不在，公馆内几个专搞“打砸抢”的武角色也不在，林桂生急得直跳脚。杜月笙暗自思忖：那个挟货私逃的人，慑于黄金荣在上海滩的威势，未见得敢真动刀枪，果真能追回烟土，倒是一次邀功请赏的好机会。便自告奋勇向林桂生借了一支手枪，去追货。那个动货的人是个小角色，原想弄包烟土变卖之后，回乡

当个土财主，慌乱之中，未曾逃远便被杜月笙追上，枪逼之下，乖乖将货送回黄公馆。杜月笙经此“考验”，越发变成黄公馆的红人。

借助黄金荣的势力，“杜月笙”三个字在上海滩黑社会中渐为人知。

头角崭露

杜月笙小有名声之后，便效法前辈，开起香堂来。他收的开山门徒弟叫江肇铭。江肇铭，苏州人，字小棣，因为貌似溥仪，所以绰号“宣统皇帝”。这是个典型的浪荡哥儿，嗜赌如命，自从拜了杜月笙为老头子后，走起路来一步三摇，到处都想揩点油水，扎扎台型。有一次却碰上了尅星。

英租界（即公共租界）地盘上有个大流氓叫严九龄，绰号严老九，论其在黑社会的地位，与黄金荣相埒。他在英租界开了一家以“摇摊”为主的赌场。所谓“摇摊”，就是掷骰子。摇缸内放进三颗骰子，赌客为一方，庄家为一方，赌客将赌注押在某点上，庄家摇动摇缸之后揭盖，摇出赌客所押的点，庄家赔赌客；摇不出，赌注由庄家统吃。江肇铭是“摇摊”常客，有一日他连输数场，红眼了，将所剩一、二百元均押于三点之上，谁知摇出的却是二点，江肇铭猴急之下，抓住庄家一个破绽不放。按赌场规矩，摇缸内摇出之点必须保持原状，以为证据，待赌账算清之后，才能变动。那日，庄家一时粗心，未待结赌账，便将摇缸重新摇过，放在一边，巧在恰恰摇成为三点。江肇铭见状，顿时变脸，一口咬定原先摇出的便是三点，反要庄家赔赌注。严老九闻讯而出，问明事由，盘清江肇铭是黄金荣门下杜月笙的徒弟，便冷笑一声，喝令打烊，声言赌场将不再开。这一作法自有其深意。因为江肇铭是个无名小卒，他敢到堂堂严老九所开赌场“硬吃”，即使把他严惩一番，严老九仍挽回面子，而声言关门，则是以退为进，饱含杀机的一招，实质是向杜月笙甚至黄金荣下战书：你们的徒弟把我的饭碗敲掉了，你们要出来收场。否则，没有饭碗的人，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江肇铭见严老九出此一招，知道他要大干，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回。黑社会中人都屏息静气，坐看初出茅庐的杜月笙如何平息这场风波。杜月笙虽未曾单独和黑社会中的大人物较量过，但黄公馆住久了，此类场面也见过，知道对方要掂掂他的份量，因此无论如何慌不得，否则休想在上海滩混出头。他便背着黄金荣，设法筹了一笔款子，硬着头皮，带上江肇铭至严老九处赔礼，请严老九无论如何重开赌场。严老九关门的目的在于挽回面子，如今杜月笙登门道歉，目的达到了，当然落篷收船。而杜月笙因为没有求告黄金荣，敢于单独出面与英租界大亨“扳斤斗”，在黑社会中博得了个肯担肩胛的好名声，身价倍增。

黄金荣见杜月笙一天比一天老练，加之林桂生经常在枕畔催逼，便将当时法租界的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交给杜月笙经营。

所谓经管，并非由杜月笙当老板，当时他还拿不出这个本钱，而另有腰缠万贯的阔佬充任。杜月笙的任务是凭借黑社会关系，保证赌场安全，赌场老板则定期送他巨额款项，以为报酬。这虽是件无本万利的美差，但要干好，却也不易。旧社会的赌场，盈利极厚，可谓日进斗金，所以上至租界公董局、巡捕房，下至流氓无赖，无人不垂涎三尺，个个想分润；在赌场内输红了眼

争面子，显威风。

“扳斤斗”原是讲价钱、讲条件的意思，这里是指打交道。

的赌徒，更可能铤而走险，杀人夺财。因此，负责赌场安全的大流氓，既要有管理一大批打手以维持赌场秩序的手腕，更要长袖善舞，能摆平各方面关系。

杜月笙走马上任时，公兴俱乐部正面临各赌场时常遇到的两大难题：一“剥猪猡”；二“捉大闸蟹”。

所谓“剥猪猡”，是旧上海黑社会切口，意指抢劫单身行人。当时赌场打烊，一般都要到晚上十二时以后，那些赢了钱的赌客，钱包鼓胀，往往成为“剥猪猡”的对象。这类事情几经发生，赌客自然视赌场为畏途，止步不前。长此以往，赌场势必门可罗雀，生意清淡。

杜月笙到任后，凭借黄金荣及清帮势力，一一找到了那些专干“剥猪猡”勾当的强盗头目，几经谈判，答应由赌场每月在盈利之中抽出一成，交给他们分润。强盗们因此不再抢公兴俱乐部的赌客。

所谓“捉大闸蟹”，实际是租界巡捕捉赌。巡捕房虽然按月收取赌场巨额“孝敬”，但为了敷衍社会舆论，有时也会兴师动众地捉赌。捉住赌客后，将他们用绳子连成一串游街，其状类似以绳串起的螃蟹，老上海因而戏称为“捉大闸蟹”。对赌场来说，赌客不能少，巡捕房也开罪不起，因此这是一个使赌场老板很头痛的难题，连黄金荣也感棘手。

杜月笙却生出一条妙计，叫：“只捉前和，不捉夜局。”赌场一般开日夜两场，赌场行话日场称“前和”，夜场谓“夜局”，大赌客多数参加“夜局”之赌。杜月笙托黄金荣在巡捕房打通关节，如要捉赌，“只捉前和，不捉夜局”。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捉赌，既有利于巡捕房作官样文章，又因网开一面，众赌客可以放心赶“夜局”，一举两得。同时，杜月笙还安排若干流氓弟兄在“前和”场内专充被捕角色，巡捕房要捉，只捉他们，其他赌客保证无事，“前和”场因此也可以拉到一定数量的赌客。

经此安排，公兴俱乐部碰到的两大难题均告解决，照旧车水马龙，赌客如云。黄金荣不无喜悦地夸奖杜月笙：“绝顶聪明。”

之后，杜月笙又露了一手——和“大八股党”抢烟土生意。

“大八股党”是上海滩以英租界为根据地的流氓组织，由在英租界巡捕房担任探目的沈杏山等八人为头目。他们从抢烟土开始，渐与土商达成协议，由土商给他们一笔数额巨大的“保护费”，他们则转而保护烟土安全运转。随着势力扩展，“大八股党”的触角伸进上海当时两大缉私机关：水警营与缉私营。有一度，“大八股党”的党徒甚至担任了这两个营的营长。于是官、盗合一，缉私机关变成最大的走私组织，烟土一至吴淞口外，便经过他们，一路通畅地运到英租界出卖，从而控制了上海的大部分烟土生意。这样一来，以法租界为根据地的黄金荣势力，在烟土生意方面当然相形见绌。黄金荣和林桂生为此问计于杜月笙。杜月笙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但“三国演义”之类的旧书听得不少，从中也懂得“力敌”与“智取”之分。他认为：“大八股党”下有众多喽罗，上则串通了水警营、缉私营和英捕房，有权有势有财，羽翼丰满，公开与其火，胜负难定，而以暗搞为上。如何暗搞？便是搜罗若干亡命之徒，组织一支精干队伍，神出鬼没，专门去抢由“大八股党”负责保护的土商的烟土，这叫“侬（上海方言，即你）不让我吃饭，我就不让侬撒污（上海方言，即大便）”，逼着“大八股党”正视黄金荣的势力，而将烟土生意的利润更多分成于他们。

黄金荣、林桂生首肯此计，杜月笙便开始招兵买马，组织抢土队伍。他

首先找了号称“四大金刚”的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

顾嘉棠，小名泉根，世居上海赵家桥（现在的常德路）一带，早年在北新泾当花匠，绰号“花园泉根”，懂武术，有蛮力。发迹以后，在静安寺一带广置房地产，其门徒党羽，也多分布在此，因而号称“沪西半片天”。

叶焯山，广东潮州人，自幼生活在上海，小名阿根，长大后曾在美国领事馆开过汽车，故绰号“花旗阿根”。会使斧，枪也打得很准，据说在房间内，无论由何人向天花板抛一铜板，他拔枪而出，无须仔细瞄准，便可击中未及坠地的铜板。

高鑫宝，出生于上海马立斯（今延安中路成都南路）一带，自小当球僮，在网球场上代外国人拾球，学会一些英语，后来在怡和洋行当“仆欧”，还曾在美国人开的飞星车行作过司机。他是马立斯远近闻名的“斧头党”，经常聚众斗殴，打群架，敲竹杠。流氓钱增福在马霍路（今黄陂路）设了一个赌台，不让高鑫宝分成，高鑫宝便凶狠地砍伤了钱增福赌台的一个赌客，以示给钱增福颜色看。高鑫宝发迹以后，在麦特赫司脱路（现泰兴路）开设了丽都花园舞厅（今上海市政协所在地），人称他为“丽都之狼”。

芮庆荣，世居上海漕河泾，以打铁为业，残暴异常，曾将自己的老婆用门闩活活打死。孙传芳统治时期，当过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队长。因他到了哪里，便将灾祸带到那里，人以不祥之物“火老鸦”名之。

除这四人之外，杜月笙还先后物色了杨启堂、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四人。以这八人为核心，建立了一支流氓武装，人称“小八股党”，成为杜月笙在上海滩打天下的基干队伍。

队伍组成，杜月笙便着手抢土。他率领这伙亡命之徒，或在月黑风高夜，或乘雨雪阴晦时，瞅准土商运土的空子下手，不拘多少，能抢就抢，抢了便跑。“大八股党”虽然严密防范，但因烟土运输途程绵长，加之杜月笙等耳目众多，地形熟悉，因此往往顾此失彼，防不胜防。当时报纸对杜月笙的抢土勾当有所披露，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时报》报道：“有某土贩由汉口夹带川土一万余两，分装二大皮箱及行李一件，附搭日清公司的‘岳阳丸’，轮船来沪，停泊在浦东张家浜码头，当由该处湖北人雷鸿见担任保价运送。杜月笙等得悉，向雷争夺保险未遂，即于当日二时许，纠合党徒十余人，各执斧棍，乘坐划船，在浦江守候，雷等没有预防，冒然登轮提土，一经运上划船，即被杜等拦住，所有私土，悉遭劫夺无遗。”这样一来，“大八股党”对众土商许诺的安全保证，便成牛皮，其势力范围之下的土商为求营运顺利，不得不向黄金荣、杜月笙暗送秋波，巨款“孝敬”。原属“大八股党”的一部分财源，便通过各种无形渠道，滚进黄金荣、杜月笙等辈的腰包。

杜月笙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开始盘算更富野心的计划。

“小八股党”抢土所得，秘密存放在三马路（今汉口路）潮州会馆内的空棺材里。该处当时僻处一隅，寂静冷落，会馆里停置异乡孤魂的“殡房”，更是凄凉阴森、人迹罕至，是一处理想的烟窖。烟土积存日多，杜月笙见奇货可居，主张自家开一家烟土公司，由秘密抢土，转向公开与“大八股党”争利。

黄金荣对此颇为赞同，但他身为法租界巡捕房华探头目，要将名义上违禁的事挑明了做，还有所顾忌。因此便屈身幕后，由他勾通法国驻上海总领

即仆役，低级雇佣人员，干些跑腿、打杂的事。

事及部分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如万国储蓄会大班司比门、南京路乌利文钟表行法国人勃罗姆等，以这些人为后台，杜月笙则抛头露面当董事长，拉金廷荪任总经理。金廷荪，浙江宁波人，鞋匠出身，绰号金阿三，因是号称“长江一只虎”的清帮“大”字辈流氓王德霖的“关山门徒弟”、流氓同党，包括杜月笙在内，皆以“三哥”尊称。他精干算盘，善摸行情，作生意颇有办法，杜月笙发迹后，经济上的筹划多依赖于他。后与杜月笙结为儿女亲家。这两人拣个“黄道吉日”，在法租界自来火街宝成里二号（现宁海东路九十弄）挂出一块没头没脑的招牌——“三鑫公司”，开始做起烟土生意来。“三鑫公司”以后发展为上海滩一家赫赫有名的“黑店”，老上海忘其原名，而称其为“大公司”。

最初，“三鑫公司”只能在法租界颐指气使，而当时时力最雄厚的潮州帮大烟土行，例如郭煜记、郑洽记、李伟记等都集中在英租界棋盘街（现河南中路福州路以南）、麦家圈（现福州路、山东中路）一带，属“大八股党”势力范围，他们的营业额远远超过“三鑫公司”。杜月笙等日思夜想，要把这几个“聚宝盆”挖到法租界来。终于给他们候到了机会：所谓“万国禁烟会议”，定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七日在上海英租界召开。杜月笙等估计，在此前后，英租界当局碍于国际舆论，一定会装模作样地查禁烟土，潮州帮大土行立脚不住，必得搬迁。于是，他们动用各种关系，千方百计地劝说这些大土行搬进法租界；同时由黄金荣、杜月笙、金廷荪等出面，在四马路会乐里口（今福州路726、750弄）“倚红楼”，“宴请”“大八股党”头目沈杏山，劝他让出对英租界土行的保护权。双方在讲“斤斗”时，剑拔弩张，几乎公开破裂。以至有人说黄金荣当场给了沈杏山两个耳光，沈杏山因此软了下来，同意转让保护权云云。其实，黄金荣的巴掌，未见有如此“神效”，“大八股党”后来同意转让保护权，主要是因为英租界烟土生意日见清淡，各大土行又被杜月笙等用釜底抽薪之计，拉向法租界，因此不得不在谈妥一定条件之后，做个顺水人情。其后，“小八股党”终于取代“大八股党”，执上海烟土行业之牛耳，每年所收保护费不下一百万元。

但“三鑫公司”真正飞黄腾达之时，还在杜月笙勾结张啸林，与当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等人拉上关系之后。

张啸林，浙江慈溪人，生于一八七七年六月十四日，本名小林，发迹后，改名寅，号啸林。中等身材，圆头豹眼，为人凶狠，盛气凌人，一语不合，开口便是“妈的个×”。幼时曾读过书，稍长在杭州机房学生意，因经常聚众闹事，寻衅斗殴，被老板停了生意，便专以诈赌骗钱，偷窃乡里人农产品为生。后进入浙江武备学堂混了一阵，与浙江陆军中称为武备派的军阀张载阳、周凤岐、夏超等人有同学关系，学得一口京腔和十足官派。在武备学堂中途辍学后，至杭州开了个茶馆，拜清帮“大”字辈流氓樊瑾成为老头子，于沪杭线一带收了不少徒弟，成为杭州人称为“聊鬼”的有名“白相人”。早年，他经洪门“大哥”杭辛斋介绍，到上海与黄金荣见过面，但他当时是个小角色，未能引起黄金荣重视，在上海滩没有站住脚。一九一九年八月，

上海开埠之后，鸦片烟进口之大本营即从广州转向上海，有广东潮州人郭某，擅英语，得洋人信任，遂专代洋商出售鸦片，营业日盛，乃设鸿泰栈于后马路，是为上海有“土行”之始，郭之亲戚乡人，闻他烟土营业鼎盛，皆集中上海为“贩土”业，于是上海土行以潮州帮为最，历数十年而不衰。

讲“斤斗”即讲条件，讲价钱之意。

浙江督军杨善德病亡，原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升任浙江督军，卢系将领何丰林继任淞沪护军使，江干廷任镇守使署秘书长，刘春圃任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俞叶封任缉私营统领。张啸林与这些人有间接关系，萌发了再至上海一显身手的念头。当年秋天，他重新出现在同孚里黄公馆。

杜月笙与张啸林相见之后，极力怂恿黄金荣借重张啸林。他认为：当时上海是浙江军阀的势力范围，而张啸林与浙江军阀中不少人渊源颇深，加上他一口京腔，十足官派，长于官场应酬，结交了他，利于打开上层关系。而张啸林正愁在上海人生地疏，“强龙不压地头蛇”，见黄金荣、杜月笙有心结纳，当然一拍即合，立刻合为一伙，以后还结成八拜之交，黄金荣居首，张啸林次之，杜月笙老三，成为上海滩横行一时的“三大亨”。

张啸林经杜月笙授意，拿了“三鑫公司”提供的交际费，不惜代价地在浙系军阀中活动，很快勾通了与俞叶封、何丰林等人的关系。黄金荣的小姨子认了何丰林老娘当干妈，张啸林和俞叶封则结成儿女亲家。“三鑫公司”因而成为军阀、帝国主义和流氓势力共同孕育的怪胎，它的生意当然今非昔比，迅速膨胀为拥资一千万元，年盈利最高达五千六百万元的豪富。一九二三年八月，上海《字林西报》曾披露过它的活动情况，上海“有一大私土运贩收费之机关，活动不已。其范围甚广大，闻有许多著名华吏，与租界内之一西人团体，会同经营此事。”“最近在吴淞渔船中，查出大宗私土，值一百万元，曾经扣留若干时，后即开释。”“上述之机关，据云专门收费，其中人物，闻有中国武人、警官、文官、查烟员及租界巡捕与流氓等，若辈专为保护私贩，得安然在上海登岸。”“今年正月十号，某官吏谋私运土三百箱入吴淞，即由机关中人扣留，因事前未接洽，私土即将充没，幸经某武官及侦探到场调解，卒由该官照付巨费，将土领回云。近来私运之范围渐大，每月吴淞一处上岸之上，在一千箱以上，每箱平均二千八百盎斯，每盎斯该机关收费一元，而每箱二千八百元，每月收入，有二百二十五万元，或一年三千万元之多。”“三鑫公司”象一只硕大无朋的“章鱼”，把从各处吮得的“鲜血”，源源不断地注入杜月笙之流的“血管”，使他们获得了浮沉于上海滩的活力。

伴随着这一系列活动，杜月笙头角崭露，他在黄公馆的地位直线上升，黄金荣名下，已不作第二人想。

二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老板“跌霸”

正当杜月笙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黄金荣却摔了个意想不到的跟头，黑社会人称之为“跌霸”。

事情得从黄金荣捧露兰春说起。露兰春是位女京剧演员，本江北人，原名不详，露兰春是她的艺名。她自小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位翻译张师领为养女。张师是黄金荣的徒弟，因为这层关系，露兰春小时候常到黄公馆玩。她脸儿圆圆，皮肤雪白，很讨人喜欢，黄公馆上下人戏称她为“梁毛团”。但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甜甜地叫黄金荣为“公公”的毛丫头，以后会被黄金荣弄来，取代林桂生成为黄公馆的女主人。露兰春稍长后，常到黄金荣开的几家戏院看戏，张师看她乐感甚好，便延师教她学戏。数年后，戏学成，能唱文武老生；人也长大了，亭亭玉立。顾盼生辉。黄金荣见此美人，邪念顿生，拉露兰春挂头牌，与小金铃、粉菊花搭档，在黄金荣开设于郑家木桥（今福建中路延安东路口）南堍的老共舞台唱戏。露兰春艺貌俱佳一部“宏碧缘”，开台便叫响，从此老共舞台场场满座，上海的有闲阶级简直为露兰春疯魔了，黄金荣更是心旌荡摇。为讨露兰春欢心，他在报纸上为露兰春登戏目广告，“露兰春”三个字，每个有鸭蛋般大小。露兰春去戏院，黄金荣派车子，出保镖，包接包送。此外，他每晚必去老共舞台，为露兰春捧场。上海滩的地痞流氓，知道露兰春的背景，没有一个敢去拈花惹草的。

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此人是谁？——卢筱嘉。

卢筱嘉是皖系实力派、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当时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直系军阀战胜，控制了北京政府。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与在广州的孙中山暗中联络，给成孙、段、张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居间联络的是：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再加卢筱嘉。时人称此四人为“四大公子”。

卢筱嘉风流倜傥，年少气盛，喜欢看戏。某日，慕露兰春之名，带两名马弁，微服轻车，至老共舞台欣赏露兰春演戏。那天，露兰春演出她的拿手好戏：“镇潭州”，饰岳飞，由于黄金荣逼嫁甚急，心事重重，一段戏文唱走了板，台下有不少人听出，但慑于黄金荣威势，没有敢声张的。唯独卢筱嘉作威作福惯了，无所顾忌，当下便怪声怪气喝起倒彩。露兰春从未受此羞辱，慌乱唱完，跑回后台，放声大哭。坐镇场内的黄金荣，见有人太岁头上动土，赫然震怒，一声喊打，手下数名无事尚要生非的凶神恶煞，蜂拥而上，甩手给了卢筱嘉两个干脆响亮的耳光，打得卢筱嘉头晕目黑，没等他转过神来，已被拖扯到黄金荣面前。黄金荣怒目相向，刚要骂娘，突然却象被谁捏住了嗓门，原来他认出了卢筱嘉。这一惊非同小可，黄金荣虽说霸道，但毕竟是一方毛神，卢永祥则是权倾东南的督军，双方实力之差，无异霄壤。黄金荣想要当面赔礼，又怕卢筱嘉不依不饶，使他下不了台，便装作不识，硬着头皮吆喝一声：“好，放伊走路！”卢筱嘉这时也缓过气来，咬牙切齿地说了声：“好极！”转过身，扬长而去。卢、黄争风吃醋，以至斗殴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上海滩，人们估摸卢筱嘉不会善罢甘休，都在等着看好戏。果然，过了一两天，淤沪护军使何丰林为了代卢筱嘉报仇，派了一批便衣直奔老共舞台，乘台上正在演出之时，把黄金荣揪出饱打一顿，再架上汽

车绑到龙华护军使署看守所里。杜月笙、张啸林意识到，这件事能否妥善了结，不仅关系到黄金荣的地位、声誉，而且关系到“三鑫公司”的前程，丝毫不能掉以轻心。于是，杜月笙出主意，向法租界的大土商索取巨款，由张啸林出面向何丰林、卢永祥赔礼求情。杜月笙则去请住在海格路（现华山路）的“清帮“大”字辈老头子张镜湖出面疏通，千方百计平息卢筱嘉怒气，保证今后再不无礼。几经周折，费尽口舌，毕竟钱能通神，加之卢永祥在上海滩还有用得着这几条地头蛇的地方，最后终于说了句：“不为已甚”，黄金荣才被释放出来，但已给关押了七天。

风波虽平，黄金荣却“跌霸”了，法租界众多流氓这才知道天外有天，黄老板并非法力无边，也有“吃瘪”的时候。

也许是应了“福无双临，祸不单行”之说，不久黄金荣又碰上了一件使他大煞风景的事情。

与卢筱嘉的事平息之后，黄金荣急不可耐地与林桂生离婚，强把露兰春娶回家中。露兰春此时年仅二十五岁，而且早已与当年上海著名颜料富商薛宝润的次子薛二有了恋情，如今被迫离开情投意合的恋人，嫁给凶狠丑陋、年过半百的黄金荣，心中苦楚，可想而知，虽然黄金荣明媒正娶，用龙凤花轿把露兰春抬回家中，黄公馆保险箱钥匙一概交由露兰春保管，但她内心深处被压抑的强烈不满，却不是种种仪式和金银珠宝所能消除的。黄金荣风闻露兰春与薛二的暧昧关系，即派打手把薛二绑架到郊外，痛打一顿，警告他以后不得再至老共舞台，否则前脚进打断前脚，后脚进折断后脚，然后把他丢在荒郊野外。薛二回家，有两个月不敢出门，然而他生性佻达，与露兰春已难分离，虽虎口拔牙，亦无所惧。一九二三年六月，黄金荣到山东峰县抱犊岗参与调解“临城劫车案”，露兰春即乘此机会，卷带黄金荣部分财产，偕同薛二，双双出走。

露兰春出走，卸足了黄金荣“台型”。正人君子拍手称快，说：“恶有恶报”。流氓地痞则认为黄金荣连个老婆也管不住，心目中自然把他降了一等。

经这两次打击，黄金荣颇感心灰意懒，于是声称“退归林下”，整日倦伏家中抽大烟，精神来了，便拿寡媳李志清开心，外间事务则交给杜月笙经管。在这之前，杜月笙名声虽已渐响，但仍依附于黄金荣门下，从此获得独当一面，一显身手的机会。

“化敌为友”

当年上海滩，关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曾流传着这样几句话：“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作人。”话并不尽正确，张啸林、杜月笙何曾不贪财？黄金荣、杜月笙哪个没干过打架斗殴、杀人放血的勾当？但这话确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杜月笙更懂得，也更善于笼络人心的特点。

杜月笙独当一面后，首先着力调整与各方面关系。

他一力促成黄金荣正式加入清帮。黄金荣虽是上海滩的著名恶霸，早就按清帮规矩收学生纳名帖，但他本人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正式入帮，而是一名“倥子”，因为黄金荣认为他是在外国衙门吃公事饭的，加入帮会诸多不便。对此，上海滩的清帮中人颇为恼火，但因黄金荣背靠法国人，手下又有一批亡命之徒，自成体系，清帮中人也奈何他不得。卢筱嘉事件时，杜月

笙求清帮“大”字辈老头子张镜湖出面调停，张的门下即不无要挟地提醒杜月笙：“听说黄老板是倥子啊！”为了帮助黄金荣渡过难关，杜月笙曲意逢承道：“黄老板一向敬佩张老太爷！”张镜湖方面不软不硬地回答道：“树大根小，不敢承当。”话似自谦，实际明确告知黄金荣：你既以清帮规矩收学生纳名帖，不管势力多大，必须以清帮为根。不久，黄金荣在山东参与调解“临城劫车案”，又借用了曾任通海镇守使的张镜湖及其开山门弟子吴崑山的名义。回上海后，黄金荣即收到一封匿名信，警告他以“倥子”身份，屡次冒用清帮名义，实系触犯帮会中无可宽宥的戒条。黄金荣势力与上海滩清帮势力的关系，日见紧张。杜月笙既是清帮正式成员，又是黄金荣门下，深知这两大势力如不沆瀣一气，相互提携，他将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于是极力周旋于黄金荣与张镜湖之间，经他穿针引线，黄金荣终于向张镜湖交纳两万大洋的挚敬礼，递上名帖，正式加入清帮，成为清帮中“通”字辈成员。清帮势力与黄金荣势力的进一步结合，使杜月笙在黑社会中有了更加牢固的基础。

其后，杜月笙开始将目光转向英租界的流氓势力。

法租界以黄金荣为代表的流氓势力与英租界的各股流氓势力，长期以来，明争暗斗，势如水火。英租界流氓势力帮派复杂，内争迭起，力量往往消耗于自相残杀之中，特别是大部分烟土生意被法租界黄金荣势力抢走后，更是乱了阵脚，颓势纷陈。黄金荣见机，落井下石，穷追猛打，恨不得将英租界的对头一网打尽。迫于黄金荣咄咄逼人之势，英租界大流氓沈杏山一度不得不离开上海，跑到北方避风头。黄金荣虽然暂居上风，但他一意强行，积怨甚多。英租界的诸多流氓破釜沉舟，苦苦撑持，总想寻找机会反扑。因此，黄金荣势力仍然无法打入英租界。

杜月笙对英租界流氓势力采取了攻心为上的办法。他意识到黄金荣势力主要以法租界为根据地，要想把在英租界经营多年、盘根错节的流氓势力完全压垮，是办不到的，只有软硬兼施，将英租界流氓势力的头头脑脑笼络住，才能使自己的势力扩展到英租界。

他首先在沈杏山身上下功夫。沈杏山当时已从北方返回上海，但仍深居简出，极少活动。杜月笙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想方设法说服黄金荣和他一起登门拜访沈杏山。沈杏山当时所以闭门谢客，一则因为烟土生意之争败于黄金荣、杜月笙手下，无颜见人，二则见法租界势力正在撑顺风船，自己处于劣势，稍不留神，极易招祸。在此情况下，忽得黄金荣、杜月笙来访，当然喜出望外。此辈人物，本来就无所谓气节、原则，奉行的是“有奶便是娘”主义，经杜月笙甜言蜜语，双方便握手言欢，惺惺相借了。以后，杜月笙又挽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司法科科长刘春圃为媒，使沈杏山第四个女儿与小她两岁的黄金荣的养子黄源焘婚配，于是黄、沈由冤家一变而为亲家。沈杏山手下“大八股党”等喽罗，原见沈杏山受挫，已有转换门庭之想，但一则碍于“江湖义气”，二则黄金荣面孔铁板，毫无通融之意，只好硬撑。今见沈杏山改变态度，杜月笙又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当然纷纷投奔黄门，英租界地盘便被杜月笙挖去一大块。

沈杏山之后，杜月笙又把心计用到英租界另一流氓头子严老九的身上。杜月笙曾因其徒弟江肇铭到严老九所开赌场“硬吃”，而登严老九之门，赔礼道歉。凭这一面之交，杜月笙托人带信给严老九，表示想到英租界地盘陪严老九搓搓麻将，白相相。严老九对此反应冷淡，虽满口说好，却始终不下

请帖。杜月笙左右，群情汹汹，大骂严老九不识抬举。杜月笙却怒不形于色，反而发出帖子，请严老九来他家吃饭，并邀了四位清帮“大”字辈人物作陪。但双方成见已深，非片言只语所能解开。据说这顿饭吃得无滋无味，冷冷清清。宴不及终，严老九便起身告退，杜月笙只得强作笑容，礼送出门。但他并没有放弃争取严老九的努力。不久，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孙传芳部队的一个军长谢鸿勋，是严老九的关系户，途经上海，我到严老九，希望到法租界的花花世界玩一玩。严老九未免尴尬，但不便拒绝，只好托人向杜月笙说项。杜月笙一口应允，并立即预备请帖，派专人送到严老九家，请严老九和谢鸿勋当晚到杜府赴宴。宴上，杜月笙盛情款待，殷勤备致；宴后，杜月笙让人拿出一只他由西洋购得的人工精制黄莺，这鸟只要开足发条，便会在笼内转颈扑翅，引吭高歌，其态其声足以乱真。谢鸿勋反复把玩，爱不释手。杜月笙见状，立刻悄声吩咐佣人连笼带鸟包扎齐全，先一步送上谢鸿勋的汽车。待严老九、谢鸿勋由杜府告辞，登上汽车，意想不到地发现那只小鸟已在车上。如此举动，不仅邀得谢鸿勋欢心，更因帮助严老九在朋友百前撑足面子、扎足台型，使严老九不由得戒心顿除，引杜月笙为深交知己了。

用此“化敌为友”的软功，杜月笙不仅在法租界，而且在英租界也开始兜得转，行得通了。这是黄金荣长期想作而未能作成的事，无怪乎黄金荣要对杜月笙跷起一根大拇指说，“月笙真正了不得！”

无贵不交

杜月笙在上海滩头角崭露之时，正值北洋军阀混战。直系、皖系、奉系各派军阀，今朝我联你，明天你打我，闹得不可开交，总统、内阁如走马灯般在北京城转换。上海由于在政治、经济、外交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无可避免地被置于这一巨大漩涡之中。志士仁人、政客军阀都在上海留下了他们的活动足迹。在这动荡不已的政治局面之中，杜月笙比其他流氓头子表现得更加机巧善变，既能巴绪上台的新贵，又善安抚下野的旧要。后台虽然屡换，他非但毫毛不损，反而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势力。

首先看一下杜月笙与控制上海的地方军阀的关系。

上海原是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势力范围。杜月笙通过张啸林，与卢永祥建立了关系。但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对卢永祥独占上海，早已耿耿于怀。一九二四年，随着卢永祥反对直系的态度日益露骨，终于爆发了齐卢之战。

杜月笙夹于两军对垒之中，充分施展了八面玲珑、狡兔三窟的手段。他首先力图支持卢永祥取胜，以保住上海的已成局面。齐卢之战的第一次战役发生于浏河前线，齐燮元部下团长冀汝桐，率军突破了卢军在太仓方面的防线。杜月笙动员黄金荣、张啸林等分头奔走，多方联络，集中了法租界里的大部分卡车，一字长龙般地开往龙华，供卢永祥运兵遣将，急援太仓。

但不久，另一直系军阀、福建督军孙传芳应齐燮元之请，乘机袭取浙江，卢永祥腹背受敌，力所不支，只得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一起通电下野。于是杜月笙立刻向孙传芳频送秋波，接受孙委令，担任督署咨议。与此同时，杜月笙仍然与卢永祥藕断丝连，在孙传芳抵达上海之后，悄悄将卢永祥和何丰林的儿子藏至家中避难，并不顾黄金荣和张啸林的反对，承担了对皖系人物徐树铮在上海租界的安全保卫责任。杜月笙这一交情没有白放。一九二四年底，卢永祥势力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奉军以宣抚军第一军军长

张宗昌为统兵先锋，南下江苏，赶走齐璧元和孙传芳势力，控制了上海。杜月笙春风满面，又周旋于张宗昌之侧。张宗昌，山东掖县人，字效坤，绰号狗肉将军。青年时曾为土匪，为人粗野凶狠，生平两大爱好：赌博、嫖妓。杜月笙早就摸清张宗昌的品性，为了投其所好，干脆在妓院——长三堂子举行欢迎张宗昌仪式。他请出当年张宗昌的老上司、后为上海商报老板的李征五，招来大批妓女，在富春楼老六的“闺房”里设宴为张宗昌接风。富春楼老六，苏州人，明眸皓齿，妖媚光艳，是被杜月笙捧红了的上海名妓。她受杜月笙之嘱，当然使尽浑身解数，取悦张宗昌。张宗昌早就垂涎上海山珍海错、粥粥群雌的腐化生活，如今美酒佳肴，左拥右抱，大有生平心愿俱遂之感，乐不可支。酒醉饭饱之余，张宗昌居然晕头转向地对杜月笙、张啸林等自称“小帅”。不管杜月笙有何要求，张宗昌当然一口应承。凭此手段，齐卢战争后的两年内，统治上海的军阀虽五易其人，但杜月笙却左右逢源，始终稳坐钓鱼台。

以烟土生意为例。杜月笙等人开办的“三鑫公司”，原以皖系军阀卢永祥、何丰林等人为后台。齐卢战争之后，孙传芳任命前海州镇守使白宝山为上海防守总司令，但与卢永祥、何丰林关系甚深的“三鑫公司”并未因此中断财路。早在孙传芳未曾占据上海之前，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便极力拉拢孙传芳的心腹、驻沪办事处处长宋希勤。孙传芳控制上海之后，经宋希勤说项，加之孙传芳久已有意插手上海烟土生意，以分其润，双方一拍即合。其后，由吴淞口到法租界烟土私运路线上的各道关卡，虽然都已换上直系军阀人马，但“三鑫公司”的烟土照样通行无阻。在此期间，“三鑫公司”作了一笔大生意，购得皖系军阀五百箱烟土。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贿选总统曹锟因冯玉祥倒戈而垮台，皖系军阀段祺瑞入京，就任“临时执政”。这时，各派军阀已将中国地皮刮下三尺，段祺瑞面临极端困难的财政局面。各军乘机索饷，海军尤为迫切。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穷于应付，只得辞职，至上海“养病”。段祺瑞为摆脱困境，与日本三井财阀勾结，由三井垫付资本，在海外采购鸦片烟土五百箱，欲运往上海贩卖，所得利润，充海军军饷。但这时上海已在直系军阀手中，皖系军阀插手不易，于是通过与段祺瑞关系颇为密切的海门籍议员陆冲鹏，与杜月笙搭上关系。经杜月笙一手安排，这五百箱烟土运至吴淞口外后，风不动水不响地平安送抵设于法租界维祥里的“三鑫公司”。运输这批烟土时，非但“小八股党”率领党羽严加防范，杜月笙还通过宋希勤的关系，将孙传芳最精锐的手枪旅某团调出保护。

经此交易，杜月笙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更深一层。一九二五年，陆冲鹏特由北京带来段政府财政部的两张委任状，聘请杜月笙、张啸林担任财政部参议。杜月笙的交际范围不仅在地方实力派，而且还伸展至北洋政府的最高层。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被直系军阀捧上台的黎元洪，又被直系军阀赶下了台。他捏住大小十五颗总统印信，携带姨太太黎本危，凄凄切切逃离北京。途经杨村时，被当初泪随声下，坚请黎元洪复职的王承斌武装扣押，强行取走了总统印信。黎元洪与直系反目，便想和皖、奉两系合作。因而于八月由天津抵达上海，准备依靠皖实力派卢永祥的力量，在上海组织政府。

杜月笙闻讯之后，便将他在杜美路（今东湖路）26号的花园洋房里外整修一新，配置全套高级家具，邀黎元洪及其姨太太黎本危携随从入居。并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小八股党”，每天与黎元洪、黎本危同进同出，负责保

护“大总统”的安全。

以后虽然由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及江浙士绅为维护自身利益，反对黎元洪在上海地区从事任何“足以引起军事行动”的政治活动，黎元洪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上海，但杜月笙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临走时，特给杜月笙留下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上联写战国时的春申君，其门下多养食客，以仗义疏财，交游广阔而著名；下联指唐朝京城长安南郊的杜曲地方，此地盛唐时为贵族住宅地，因簪缨世胄，门第高贵，大有去天尺五的显赫气势。以此典故暗喻杜月笙重义气、爱朋友，杜公馆门庭若市，气派非凡。这等于送杜月笙一块金字招牌。杜月笙特地请来高手，将此对联制成黑底金字，髹漆生光，赫然挂在客厅两楹，一生对此夸耀不已。

如此长袖善舞，当然是惜钱如命、作风老派的黄金荣望尘莫及的。因此，杜月笙在自立门户后不久，他的名字便不仅在上海滩，而且为全国许多政要人物所熟知了。

笼络民心

旧社会的流氓，主要靠敲榨勒索、绑架暗杀等手段称王称霸。但为了掩盖自己的豺狼面目，并防止结怨太多，有时也作些散财消灾的事情，例如逢年过节赈济乞丐，以及施粥布棺等。但如杜月笙这样善于骗取民心的流氓头子，却为数不多。总括他这方面的手法，大致有四：

（一）投合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

按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不忘乡土、尊敬父老，是正人君子之所为。因此，杜月笙小有名气之后，便很注意收买故乡人心，以改变人们在他少年时对他留下的恶感。一九一八年起，杜月笙每年夏天都要从施德之和雷允上药房购买大量“莎药水”、“行军散”，或亲自或派人送回浦东高桥故乡，按家按户免费散发，并甜言蜜语地关照乡里父老：“盛夏时令，易染疾病，要讲究卫生，防止时疫流行。”每逢寒冬腊月，则购置棉衣，分发给高桥故乡的贫民。他还出资在高桥乡间修了二十三座石桥，重建了高桥沙港的观音堂。

为了给人们留下乐善好施的印象，每逢上海及附近发生灾害，杜月笙必定出面赈济。早在一九二二年浙江杭县、嵊县、金华三县发生水灾时，杜月笙便利用他在黑社会的势力，出面发起组织京剧名伶的“九班合串”，“筹款救灾”。齐卢战争期间，又与黄金荣、张啸林联合发起“江浙善后义赈会”，事务所便设在八仙桥钧福里杜月笙家中。一九二六年还创办“上海乞丐收容所”。一九三一年，长江中游汉口江堤溃决，受灾地区蔓延十六省，灾民多达五千万，上海成立了以杜月笙为首的水灾救济委员会，募捐救灾。在这一系列赈济活动中所募的一部分财物，落入了杜月笙等人的腰包。但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大批灾民，不明真根且嗷嗷待哺，虽得杯水之惠，也感恩不尽。杜月笙的“善名”，由此而传。

（二）重视舆论的作用。

舆论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民意。杜月笙几乎没有喝过墨水，谈不上任何学历，对此却是深知的。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六日，上海发生一件群情激愤的惨案。法商电车司机吴同根，在深夜十一时收班驾车回厂。空车开至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

萨坡赛路（今淡水路）路口时，碰见五个酩酊大醉的法国水兵，他们拦住空车，强行登上，威逼吴同根驾车兜风。因已至收车回厂时间，吴同根怕违犯厂规，敲掉饭碗，苦苦哀求法国水兵下车，让他回厂。但法国水兵却横蛮无理，坚不放行，双方因此发生纠纷。路上行人见状，纷纷围上，不少人仗义执言，指责法国水兵的野蛮行径。法国水兵恼羞成怒，其中一人，抽出一把弹簧刀，于众目睽睽之下，对准吴同根左眼猛然刺去，这一刀由眼而入，洞穿大脑，吴同根惨叫一声，倒入血泊之中，顿时死去。五名法国水兵视若无睹，扬长而去。第二天，上海的中文报纸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广大群众无比愤怒，纷纷起而声讨帝国主义分子的血腥罪行，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工人们更是愤激异常，组织后援队，准备罢工。

杜月笙眼见群情汹汹，而自己身在法租界，与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关系更是人所尽知。此时此刻，如无表示，必然声名狼藉，手段玩得漂亮，则可乘机猎名。于是杜月笙带上翻译，去找法国驻沪领事、老关系范尔迪。他不无体贴地劝告范尔迪翻翻最近的中国报纸，派人到街上听听中国人对此案的反应，不要省了小麻烦，反而添了大问题。范尔迪也知道工人在准备罢工，正担心事情闹大，无法收拾，一见杜月笙愿意帮忙，当然高兴，于是答应赔一千元钱给吴同根遗下的一妻九子。一千元钱了此血案，杜月笙当然知道通不过，但他不敢在法国人面前过为已甚，便拍胸脯说由他加一千五。范尔迪则答应令法商电车公司再出一千。三千五百元送到吴同根遗属手中后，吴同根妻子经杜月笙的喽罗软硬兼施，第二天便在报上登出大幅启事，感谢杜月笙“仗义勇为，解囊相救”。之后，被迫离开上海。

由于死者家属被软化，并离开了上海，一场正酝酿着的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大罢工，因而流产。杜月笙既讨好了法国帝国主义者，又以区区一千五百元换得了被害者家属用登报方式表示的感谢，这使他在舆论上由一个依仗帝国主义势力发家的流氓，变成了维护中国人权益的“英雄”。

其实，如果仔细翻翻当时报纸，便可看到杜月笙所导演的这类把戏并不少见。某地发生灾害，杜月笙发起赈济，报纸上会登出募捐启事，其后必定署上“发起人杜月笙等谨启”；某处工人罢工，杜月笙送几个钱去，报上必会出现几名自称工人者刊出的鸣谢启事。通过这些舆论，杜月笙确在一段时期，骗得了一些善良人们的信任。

（三）不公开与大众唱对台戏。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现上棉二厂布机间）的日本资本家残酷镇压要求发放工资的工人群众，年仅二十岁的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杀害。日本帝国主义者野蛮行径，激起了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怒。具有光荣反帝传统的上海学生，首先起来援助工人，参加追悼顾正红大会，揭露顾正红事件的真相，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学生的正义行动，引起帝国主义的极端仇视，英租界当局逮捕了数名参加追悼顾正红大会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月卅日，工人、学生组织的演讲队三千多人，在南京路一带演讲示威，愤怒控诉帝国主义暴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帝国主义者出动大批武装巡捕，进行镇压。南京路老闸捕房附近的学生首先遭逮捕。愤怒的群众闻讯之后，纷纷集中到老闸捕房门前抗议。英帝国主义者竟疯狂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十三人，打伤数十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者血腥屠杀，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反帝怒潮。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上海成立了“工商学联合会”，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纷纷采取行动支援上海人民。

如何对待“五卅惨案”？成了放在杜月笙等人面前的难题。他们生长在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卵翼之下，“三鑫公司”经营的烟土生意，货源大多来自英国殖民地。因此，张啸林认为：英国巡捕打死人，自有官府办交涉。杜月笙和他住在租界之内，和外国人的关系是费尽心机、花了大量钱财才建立起来的，不必为毫不相干的事，得罪外国朋友。但杜月笙知道，“五卅惨案”激起的反帝怒潮，已成铺天盖地之势，在此当口，谁敢反对，势必被吞卷而去，只有顺势而动，见机行事，方是上策。于是他不顾张啸林等人反对，参加工商学联合会组织的某些活动，捐出一些款项；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中的释放被捕人员、抚恤、道歉、取消印刷附律、取消码头捐、收回会审公廨等六项表示支持，但对“惩凶、交出主使开枪和开枪凶手论抵”、“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陆海军”等重要款项却不敢言及，实际上站在对“五卅”运动抱消极态度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一边，“以风潮不再扩大，交涉早日结束为宗旨”。虽然如此，杜月笙毕竟未曾公开站到“五卅”运动的对立面去，这除了表明他的狡猾，懂得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能公开与大众作对外，在民族观念方面，与后来沦为汉奸的张啸林等人相比，确也有所不同。

（四）极力争取能左右局势的群众。

汹涌澎湃的“五卅”运动，令杜月笙心悸，也使他看到上海滩上多达八十万左右的工人群众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巨大力量，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必须在工人中扩大影响。于是他费尽心机，力图争取工人对他的好感。除了用威胁利诱的办法，拉一些工人当他的徒弟外，他采用的办法有三：

其一，在工人运动中安插钉子。例如陆京士便是当年杜月笙操纵工人运动的一个有力助手。陆京士是江苏太仓人，曾就读于上海法学院，一九二四年考进上海邮务管理局当邮务生，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此人权欲极重，为了在上海滩争得一席之地，在“邮务生协会”中混过一阵子。四一二事变后，陆京士在国民党支持下，排斥邮务工会的进步力量，篡夺了邮务工会领导权。杜月笙对陆京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谋手段颇为赞赏，时常对他的亲信说：“邮政局那一帮青年朋友真了不起！”并派人搜集了陆京士的有关资料，研究之后，决心网罗。杜月笙利用他手下与陆京士有关系的人物，给陆京士传话：“杜先生想见见京士兄！”陆京士闻讯，喜出望外，因为他知道杜月笙在上海滩相当兜得转，工人中迫于流氓势力的威胁，拜杜月笙为老头子的也为数不少。结交了杜月笙，无论对他向上爬，还是欺骗工人、打击进步势力，都大有好处。陆京士便拣了一个时间，只身往杜公馆拜访杜月笙。据说杜月笙为了表示求贤若渴，亲自去门前迎接，大有“倒屣相迎”之态。两人基于欺骗和利用工人群众的共同需要，一见如故，相谈之间，更是互相吹捧，抒不尽的衷肠热心。不久，陆京士便与杨克天、赵书声、张一道、于松乔、刘心权、杨德林、水祥云等十一人一起给杜月笙递了门生帖子，成为杜门之徒。这十一人被称之为“十一股党”。以后，又增加了三十九人，扩大组成为“五十股党精诚团”。新增加的三十九人，分别拜杜月笙手下的几个大流氓如金廷荪、顾嘉棠、马祥生、谢葆生等人为老头子。

此外，如英美烟公司工会的主要负责人李长贵、顾若峰等，与杜月笙也都有很深的关系。当时控制和破坏工人运动的某些国民党机关中，也多有杜

月笙的人。如吴醒亚任上海社会局长期间，社会局的四个科长中有三个是杜的门生。其中最早拜杜为师的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民运指导委员会主任陈君毅，其后则有民运指导科主任许也夫、训练科主任汪曼云。许也夫以后经杜月笙介绍任社会局专管“劳资纠纷”的第三科科长时，其下的调解股主任是杜月笙的门徒王先青。通过这些人的关系，杜月笙增加了对工人群众的欺骗性，陆京士便曾在《立报》上吹捧杜月笙是“全国工运萌芽的保姆”。

其二，是将自己伪装成工人利益的维护者。

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法商电水公司工人举行罢工。起因是法国资本家凭借在上海的特权残酷压榨中国工人，当时在电水公司的法籍员工，月薪起码为二百多两银子，而华工月薪平均只有十二元。法国资本家曾数次答应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但从不兑现。工人因此被迫罢工，提出每人每月增加工资八元、废除罚款制度作为复工条件。法国资本家非但拒不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反而宣布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一律开除，另外招雇一批白俄和新工人进公司工作。

杜月笙在公开场合伪装同情工人，送了一笔钱表示支援，并答应代为调解。暗中却接受了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电水公司买办沈叔眉要他设法制止工人罢工的请求，指使门徒李麟书在车务部发起成立“车务部同人俱乐部”，利用乡土观念，在工人中制造纠纷，企图破坏工人团结。并派出打手以暗杀威胁工会负责人。但这些阴谋未能动摇工人的罢工决心。法帝国主义恼羞成怒，妄图以血腥镇压慑服罢工工人。七月二十一日，法国巡捕枪击在水电工会俱乐部开会的工人，当场死伤二十余人。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工人的愤怒，其他行业的工人纷纷起来支援。

蒋介石唯恐工人坚持罢工会影响国民党政府与法国帝国主义的关系，除令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市长张群和警备司令熊式辉贴出布告，严禁工人擅自罢工，不准其他行业的工人支援水电公司外，还派出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到上海进行所谓调解。李石曾到上海后，首先找到杜月笙，杜月笙立刻答应替蒋介石分忧。他对罢工工人进一步施展了明为支持，暗行分化的办法。

罢工坚持到八月中旬，由于法租界水电供应日趋恐慌，连电车行驶也告断绝，法国资本家被迫答应给工人每月增加工资二元四角，但坚持要开除领导罢工的四十名工人。这与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相去甚远。

但杜月笙和李石曾却极力宣传这是了不起的胜利，并以此为理由，坚持要工人复工。为了软化工人，杜月笙还答应将被法国资本家开除的四十名工人安排到工会工作，工资归他支付。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和流氓势力的联合逼迫下，工人勉强同意复工。

在签定复工协议时，工人要求在复工前释放先后被捕的几十名罢工工人，法国资本家则坚持要复工后看情况再定。杜月笙担心法国资本家的无理要挟激起工人愤怒，导致罢工继续并扩大，赶紧出面打圆场，由他签字将被捕的罢工工人保释出来。对法国资本家要开除的四十名领导罢工的工人，杜月笙垫发了两个月工资就把他们打发走了，既达到了法国资本家将他们开除出公司的目的，又博得了部分工人的好感。

通过插手处理法商电水公司工人罢工事件，杜月笙保护了法国资本家的利益，为蒋介石解除了忧虑，同时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也对他表示感激，一举而三得。

在处理一些民族资本家所属企业的罢工事件时，杜月笙更会作态。他往

往将双方代表召到他的公馆，既表示体谅资方困难，又表示“同情”工人的处境，在将双方要求逐步压到可行程度时，资本家如仍不同意工人要求，杜月笙还会唱一出“慷慨解囊”的好戏。如某工厂停工，工人要一个月遣散费，资本家想压低至半个月，杜月笙听后说：“厂方的困难是实情，工人的困难也是实情，工人失业后，生活当然大成问题，依我看一个月工资实在太少，至少应给一个半月才可勉强敷衍。”话说到此，工人代表感到意外，资方代表则内心惴惴，不知杜月笙葫芦里卖什么药，正欲发言诉“苦”，杜月笙立刻又道：“工厂要关门，当然无力负担这许多遣散费。厂方本来愿出半个月，现在仍出半个月，相差的一个月，则由本人负担。”其实，连杜月笙的门徒也坦白承认，邀他出面调停的资本家，哪一个敢要这“大亨”为其破费，事后对杜月笙掏出的钱当然照补不误。就这样，杜月笙扩大了在部分工人中的影响。经此惨淡经营，上海滩原来以黄金荣为首的“黄、杜、张”流氓势力，中心实际已转移到杜月笙，只是照顾到黄金荣的“资历”，在姓名排列上，杜月笙才屈居第二。这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附庸风雅

杜月笙深知，他虽然继承了黄金荣的势力，并作了发展，但其影响主要在黑社会中。社会名流、知识阶层与他们虽有往来，内心深处对“白相人”却不无鄙夷，对他们大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因此，要想在上海滩真正作番“事业”，光有打手不成，还必须接近士人，拉拢、利用，乃至控制一批知识分子。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杜月笙开始附庸风雅。他首先将服饰作了变换，力图改变人们对他的观感。

旧上海的流氓，包括黄金荣这样的大头子在内，传统打扮是黑拷绸短打，对襟中分，单排密扣，卷着袖，敞开怀，露出臂膀上的“刺青”和胸前悬挂的金怀表链，表链越粗，身价越高。手指上则大多戴一只耀眼的金刚钻戒指。跷着大拇指，凶相毕露地招摇过市。一般市民见到这等打扮，便知遇到了流氓，避之唯恐不及。

杜月笙继黄金荣而起之后，命令手下各大徒弟一律去掉短打装扮，盛夏季节也不准赤膊露体。他本人则一年四季身着长衫。晚年时，杜月笙曾向人透露他爱穿长衫的秘密。原来杜月笙年轻时手臂上刺有花纹，长衫袖子长，掬下来，便可将“刺青”遮盖无遗，一副流氓无赖相，顿时化作文人雅士貌。著名记者徐铸成当年曾见过这位“闻人”，原先他认为此等人物纵使不是红盾毛、绿眼睛，总该是一起起武夫，但见面之后，却发现只是一个修长身材，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言谈中也很少带“白相人”常说的粗话，一副文质彬彬的作派。仅此一点，便可看出杜月笙的功夫已非同一般。

杜月笙正是以这种新的作派，开始周旋于原来陌生的阶层，着力拉拢知识分子。

当年上海滩有位“名律师”秦联奎，刚执业时，听说杜公馆多设赌局，场面豪华，年少好奇，托人带去玩。去后，秦联奎小小押了见注，结果连输四千大洋。四千大洋，对刚执业的秦联奎来说，并非小数，心中不免懊丧，悻悻然付了赌账，起座离去。杜月笙见状，便问带秦联奎来的人：此人是何

许人？那人介绍了秦的身份，杜月笙当即拿出四千大洋，托那人带还秦联奎，并不无“体贴”地说：“当律师的靠摇笔杆、费口舌为生，没有多少钱好赚，我不能赢他的钱。”那人将钱和杜月笙的话带给秦联奎后，秦大为感激，以后常去杜家，乐于效力，成为杜月笙的义务法律顾问。

章太炎是著名的朴学大师，学界泰斗，杜月笙早想结识，只恨无缘。一次，居住在法租界的章太炎的侄儿，与一位颇有背景的人物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章太炎风闻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便给他去了一封信，请求帮助。杜月笙见信后，

不但即刻为章太炎的侄儿排难解纷，而且借此机会，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太炎。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票压于茶杯底下。回上海后，又每月派人送钱接济当时境况并不太好的章太炎。因此与章太炎建立了所谓“平生凤义兼师友”的交情。以后，章太炎曾以一代朴学大师的身份，为杜月笙修定家谱。

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清末名士，曾任清政府宪政编查馆提调。袁世凯称帝时，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组织筹安会，为恢复帝制策划。袁世凯失败，有人曾掇联一副，嘲骂筹安会六人：“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黎元洪并发表文告通缉杨度等人。沉痛的教训，使杨度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过去，在共产党人帮助下，脱胎换骨，转向革命，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一度杨度曾在上海居住，杜月笙不知杨度是共产党员，但对他的名士牌号颇感兴趣，专门请当时担任杜月笙法律顾问的章士钊去向居住在白利南路（现长宁路）兆丰别墅的杨度致意，希望杨度能帮杜月笙做些事情。杨度考虑到杜和国民党上层及特务都有联系，和他来往，有利于了解反动集团的内幕情况，也有利于掩护革命活动，因而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毅然随同章士钊去杜公馆拜会了杜月笙。杜为了表示自己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特意送了一幢位于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洋房给杨度居住，并按杨度在袁世凯时代担任参政时月薪五百元的标准，每月奉送杨度“月敬”五百元。杨度是抱负远大的共产党人，杜月笙这点小恩小惠绝对动摇不了他忠诚革命的信念。但由此可见，杜月笙拉拢知识分子确是颇费心机的。

此外，如当年上海滩的“才子律师”江一平；留学法国、获博士学位，后担任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的郑毓秀；乃至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经杜月笙巧为拉拢，都先后出入杜门，成为杜月笙的座上客。曾任吴佩孚的秘书长、人称“江东才子”的杨云史，当过国民党监察委员、号称“诗人”的杨千里，也被杜月笙罗致为私人秘书。

为了便利知识分子投入杜门，杜月笙不借改变原来沿用的清帮收门徒仪式，将开香堂改为点香烛，磕头改为三鞠躬，徒弟改称“学生子”，杜月笙本人则由“老头子”改称“老夫子”或“先生”，写有三代简历的拜师帖改为门生帖，拜师帖上“一祖流传，万世千秋，水往东流，永不回头”的套语，简化为“永遵训诲”。

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由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十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

为了左右舆论，杜月笙极力拉拢新闻界的知识分子。《新闻报》编辑唐世昌，成为他在新闻界所收的第一个徒弟。以后，如汪松年、赵君豪、姚苏凤、余哲文、李超凡等著名报人，也都或明或暗地成为杜月笙的门生。经过

这些人，杜月笙控制了新闻界一大批从业人员。新闻界凡依附杜月笙者，不但职业有保障，而且按月有津贴。据说津贴数额相当可观，按当时币值，如被津贴者将所得津贴存入银行，一年可买一辆轿车。然而如对杜月笙不买帐，不但饭碗会敲掉，甚至会有性命之虞。经此软硬兼施，杜月笙俨然成为新闻界的幕后操纵者，许多重要新闻，甚至是排好了版的头条新闻，只要杜月笙“闲话一句”，往往会忽然不见。靠此力量，杜月笙帮助不少达官贵人抽掉了不宜外扬的桃色丑闻。受惠者因而感激涕零，以后遇到与杜月笙有关的事，当然设法帮忙，以为报答。

经此一系列活动，杜月笙不仅在黑社会，而且在知识界也有了自己的影响。当年上海滩的“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分别被称为“黄老板”、“张大帅”，唯独杜月笙却得了个文雅称呼——“杜先生”。

但是，杜月笙发迹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和蒋介石国民党搭上了关系。

三 四一二事变的帮凶

国民党方面也押一宝

杜月笙与国民党的关系，可以上溯至辛亥革命时期。当时国民党虽未成立，但其前身中国同盟会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曾在上海法租界居住或活动过。例如一九〇八年，陈其美自日本东斌学校毕业后，回到上海，便在不平路（今济南路）德福里1号设机关，联络党人。张静江由法国归来后，在福建路408号开设通济公司，以作古董买卖为掩护，进行反清活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孙中山曾分别居住在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上）、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上），领导革命运动。陈其美在蒲石路新民里13号（今长乐路50弄内）住过，贝勒路369号（今黄陂南路上）曾经是蒋介石的住所。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则是二次讨袁时，陈其美的讨袁军司令部。

同盟会人士为了活动便利，免不了向在法租界巡捕房操实权的黄金荣作些工作。清王朝已腐朽不堪，这在当时是略有政治眼光的人都能看出的，黄金荣当然知道，乐得与同盟会方面拉拉关系。孙中山为了团聚反清力量，与天地会、哥老会、小刀会等秘密会社都有联系。陈其美便是洪门在江浙一带的“大哥”。洪门，又称洪帮或红帮，是天地会的代称。天地会相传产生于一六七四年，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名天地会，又称三点会、三合会。该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所以会内自称洪门，以后洪门演变为天地会的代称。支派有哥老会、小刀会、红线会等。黄金荣是黑社会中人，与陈其美关系相当密切。辛亥革命前，一度紧随陈其美的蒋介石，据说给黄金荣递过门生帖。

因此渊源，当时尚在黄公馆的杜月笙与陈其美及一些后来成为国民党重要干部的人物有所接触。杜月笙一方面出于年轻好奇，另一方面见时值乱世、英雄纷起，鹿死谁手，尚未得知，想多牵几条线，于巴结军阀的同时，在国民党方面也押上一宝。因此，对同盟会与国民党，他多少尽了点力。

辛亥年间，湖北的一批革命党人欲秘密经沪返鄂，进行反清活动。他们抵达上海后，盘缠用尽，陷于困境，几经周折，找到杜月笙。杜月笙感到这是他在革命党人面前露一手的好机会，一口答应帮助解决。但要自家挖出，未免肉痛，想了一个敲竹杠的办法。他当时已由黄金荣分派负责保护一只赌台，主意便打在这上面。他事先将办法告诉了几位革命党人，那几位革命党人便在“夜局”时进了赌场，各人拿着一个香烟罐分站到数张赌桌前面。赌场老板见状，心知有异，示意杜月笙去了解情况。杜月笙装模作样地至各赌桌前转了一圈，面带惊恐之色地回到老板面前，说：“来者是革命党，他们手里的香烟罐是炸弹。”由于当时清朝统治者把革命党人说成是洪水猛兽、嗜血魔王，因此赌场老板闻讯之后，如雷轰顶，惘然不知所措，好一阵才缓过神来，急问：“他们准备干什么？”杜月笙继续吓唬说：“借路费，如果不借，就要炸赌场。”赌场老板忙要杜月笙去和他们“讲斤斗”。杜月笙又去转了一圈，回来告诉赌场老板：“对方要价很高，付价还价后，压低为八百元。”以区区八百元，换取赌场安全，老板当然同意。杜月笙拿了钱之后，便给革命党人买了轮船票，将他们送出上海。

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时，国民党人刺杀驻于镇江、扬州一带的军阀徐宝山，杜月笙曾插手其事。徐宝山，字怀礼，江苏镇江人，绰号徐老虎，早年

在镇江城里开设竹厂和竹器店谋生，后成为一伙私盐贩子的头领，为与官兵捕快抗衡，加入了洪门。由于他心狠手辣，党羽众多，加上枪法高明，能在黑暗中以手枪击灭点着的线香火头，因而进洪门不久，便被允准“开山”。“开山”是洪门中最隆重的仪式，必须得到洪门中各前辈同意，举行仪式时要有他们参加。开过山的人，洪门中称为“山主”，“山主开山立堂，扯旗挂帅”，可正式收受徒子徒孙。借此，徐宝山的势力更为膨胀。辛亥革命前，清廷虽屡屡围剿，却始终未能消灭以徐宝山为头领的这股私盐贩子。无奈之下，清廷弃剿改抚，诱徐宝山以高官厚禄。徐宝山当“盐梟”时，多踞小船为家，踪迹飘忽，生活极不安定，他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这样说：“当帮首时，从没有按时吃过三餐饭，有时连一餐饭也不得到口，更是没有睡过一夜安身觉，有时睡在土地庙里，有时睡在麦田或芦苇里，不管睡在哪里，手上总要缠一支线香，到了香燃到手指时，就要赶快起来换个地方，以防被捕。甚至睡到死人棺材里，这样可以多睡一会，但很麻烦，要先把棺盖撬开，进去后还要弄一块大砖头把棺盖垫起来，才不会闷气。”因而清廷诱以高官厚禄后，徐宝山立刻接受了“招安”，担任两淮盐务缉私统领，利用他熟悉绿林情况的有利条件，大批捕杀私盐贩子和洪门弟兄。洪门因此恨徐宝山入骨，将他与其军师任春山革出会门，并定下“提春字挖眼睛，提宝字割舌头”的规矩，谁敢再拿徐宝山和任春山的名字做招牌，便处以挖眼、割舌之刑。

辛亥革命时，徐宝山见清廷大势已去，通电反正，宣告独立，乘机将其原来统领的飞虎营扩充为镇军第二师，之后又建立镇军第二军，并在扬州设军政分府，成为扬州、镇江一带的土皇帝。民国成立后，徐宝山与袁世凯拉上了关系，徐宝山次子徐浩然在袁世凯总统府担任侍卫武官。二次革命时，孙中山以江苏、江西、安徽、广东等地为依托，发动讨袁战争。但徐宝山称霸镇江、扬州地区，扼长江咽喉，控京沪要道，给国民党方面带来了很大不便，国民党由上海运往安徽、江西的军火，许多被徐宝山中途劫去。陈其美是江浙一带的洪门大哥，与徐宝山本有宿怨，加之徐宝山成了讨袁战争的障碍，因而决意除去此人。陈其美将此事委之世居扬州、当时在自己部下任军官的王柏龄承办。王柏龄几经设法，但因徐宝山自知得罪了革命党和洪门，冤家甚多，防范严密，所以均未得手。王柏龄于束手无策之中，与时常陪伴在侧的杜月笙商议。杜月笙建议用炸弹暗杀。一语提醒了王柏龄，使他想起了徐宝山有一嗜好，即赏玩古董字画。上海滩的古董字画商，遇有珍品，每每向徐宝山兜售。王柏龄将这一情况告诉杜月笙，杜答应为王柏龄设法。经过几天摸索，被杜月笙找到了一位经常给徐宝山搜寻古董字画的艾姓古董商人。那人经杜月笙殷勤款待，酒醉饭饱之余，便将如何为徐宝山购买古董字画的情况和盘托出。原来艾姓古董商也见不到徐宝山，他跟徐宝山作买卖，都是将货色交给卫兵，告知价钱，由卫兵将货转交徐宝山，如看中，再通知古董字画商到徐宝山衙门账房取钱。

王柏龄了解这一情况后，便找到曾经和汪精卫一起在北京谋刺清摄政王载沣的黄复生，由他制成了一颗特殊炸弹。不久，一名古董字画商带着一只装满精美的铁箱，到了徐宝山公馆，并送上一信，讲明箱内是一只宋瓷钧窑硃砂红花瓶，信内装有开铁箱的钥匙。这件“古董”被送到徐宝山之手后，徐宝山很高兴，急于赏玩，拿出钥匙插进锁孔，刚一开启，箱口便冒出缕缕

黑烟，徐宝山见状，情知不妙，急忙丢箱，箱子离手，尚未落地，便轰然炸响，徐宝山当场被炸身亡。原来这只铁箱就是黄复生制成的特殊炸弹，里面装满炸药，引线安在箱盖上，开箱便炸。

由于插手上述种种活动，杜月笙对国民党来说并不是陌生人。尤其曾混迹于上海滩的蒋介石，更懂得这些“白相人”头子的特殊作用，当他追随孙中山左右时，丝毫没有疏远与流氓弟兄们的关系，在他现出本相，发动四一二事变时，昔日的狐群狗党，便成为他的打手。

眼睁睁见工人起义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九日，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十万人，正式誓师北伐。

凶残、腐朽的北洋军阀势力在人民群众中早已声名狼藉。北伐军在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精神的激励下，在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支持下，势如破竹。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的军阀部队节节败退。革命风暴席卷了半个中国。

杜月笙料定国民党控制上海后，仍然离不开他。因此，他有恃无恐，直到一九二七年初，还和北洋军阀在上海的负责人毕庶澄打得火热。

毕庶澄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本为皖系，后来倒向奉系，在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后，他跟随张宗昌南下救援，任直鲁联军第五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这年二月十四日带二万奉军代替孙传芳部队控制了上海。毕庶澄貌似奶油小生，自认是“周公瑾复生”，虽为杀人如麻的魔王，却时常顾影自怜，是个见了漂亮女子，便迈不动步子的角色。早在一九二五年，他跟随张宗昌到上海时，就眼红杜月笙招待张宗昌的豪华场面，对千娇百媚的上海名妓富春楼老六更是忘情不了。如今他独当一面，当然不肯舍此一乐。毕庶澄到上海后，便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其部下更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为。

杜月笙等人不顾上海人的哀痛怒骂，百般巴结毕庶澄。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他们借富春楼老六的居所，以招待张宗昌的场面给毕庶澄接风。毕庶澄如醉如痴，忘乎所以，当晚便在富春楼老六家留连忘返。得此好处，毕庶澄当然不会忘记杜月笙等。

当杜月笙等人正与北洋军阀花天酒地之时，在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人指挥下，发动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年三月二十一日，八十万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立即转为武装起义。正午十二时之后，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火车息气，自来水断流。下午，广大工人群众在武装纠察队的带领下，向盘踞在上海的军阀武装发动猛烈进攻。按照预定计划，作战区域划分为七处：虹口、南市、浦东、吴淞、沪东、沪西与闸北。

杜月笙等人闻讯之后，气急败坏。在他们看来，上海可以任军阀蹂躏，也可以由蒋介石统治，唯独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虽然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尚未破裂，杜月笙还不了解国民党新右派的真意，未便公开起来反对共产党，但他对工人起义的不合作态度却是明显可见的。

虹口是工人起义最先发动的地区。该区三面与租界联接，一面近市郊，区内没有军阀驻兵，只有警察署。虹口电气厂、丝厂和金属业的工人起义之后，一举攻占警察署，夺取了大部分枪支弹药。虹口地区有个流氓头子叫孙

介福，绰号铁胳膊，在清帮属“悟”字辈，是杜月笙的同参弟兄，两人关系密切。孙介福平日仗着杜月笙的势力，再加上有几分蛮力，为非作歹，横行于虹口，虹口警察署里不少警察也是他的徒弟。他见虹口警察署被工人占领，昔日宝地，将成为他人天下，心急如焚，破口大骂，纠集一批乌合之众，气势汹汹地涌向虹口警察署，扬言要替警察报仇。严阵以待的工人，岂是几条地头蛇能吓倒的，当然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虹口警察署门前顿时枪声响成一片，蜂拥而上的流氓，被打得鬼哭狼嚎，抱头鼠窜。孙介福为扎台型，还在色厉内荏地叫嚷重新组织进攻。这时居于幕后的杜月笙，与国民党江苏党务委员会取得了联系，摸清他们此时还想利用工人力量；同时见孙介福败局已定，如硬撑下去，老本会全部输光，“好汉不吃眼前亏”。才出面将孙介福劝回。

浦东是杜月笙老家所在地。在这里，杜月笙对起义工人也作了不少手脚。市区举行起义后，浦东所有工厂的工人立刻群起响应，无数工人排成绵延数里、不见头尾的队伍，浩浩荡荡扑向烂泥渡路（现仍称烂泥渡）第三区警察署。署内的一百五十名警察，平时穷凶极恶，横行乡里，如今见到潮水般涌来的群众，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双腿发软，不要说抵抗，连抬手的力气也没有了，一百五十多条枪很快转到工人手中。工人们得到武器后，疾风扫落叶般将孙传芳时期设在各处游荡杀人的巡查队一一消灭，乘势又攻占了三区警察署一分所及二分所。这时，适遇被北伐军打败的一部分直鲁溃军包围并准备抢掠浦东商人保卫团。该商人保卫团的背景是杜月笙。起义工人猛冲而上，很快消灭了溃军。但商人保卫团非但不感谢救命之恩，反要与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的工人抢夺胜利果实，不准工人进入他们控制的地区。最后，在工人武装的压力下，经杜月笙点头，浦东商人保卫团才树起了白旗。其后，商人保卫团利用起义工人同意由工人纠察队与商人保卫团共同管理浦东全区的机会，极力插手接收工作。因而，国民党曾有人为杜月笙表功说：“在四一二清党前，浦东是唯一没有被共产党全面控制的地方。”

尽管杜月笙等人的行为给工人起义带来了某些困难，但这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潮，却不是他们所能阻挡的。三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胜利。杜月笙等人预感到，上海如果为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所控制，他们的金钱、势力、一呼百诺的排场将荡然无存。他们急不可耐地期望着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朋友，能为他们保住一切。

杜月笙等人的期望，也是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期望。他们产生这样的期望，并非没有根据，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正在迅速膨胀，各种迹象表明，他们将有所行动。

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时结识了陈其美，并经陈的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蒋介石回到上海，投奔时已任上海都督的陈其美，谋了个团长的差使。辛亥革命以后的十年间，蒋介石大部分时间浪荡于上海滩。就在这段时间中，蒋介石和虞洽卿、黄金荣等人相识，为他以后与江浙财阀及上海流氓势力的勾结，奠定了人事基础。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的第四天晚上，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并已决心反共的蒋介石到了上海，住进枫林桥原淞沪交涉使署。三月二十八日，经蒋介石授意，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芳等人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吴稚晖在会上诬称“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议对共产党进行弹劾。这一反共提案获得了通过，并决定由吴稚晖拟具草案，交监察委员

会全体会议“公决”。吴稚晖、李石曾两人把他们伙同蒋介石将要掀起的清党反共恶浪，定名为“护党救国运动”。四月二日，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八人，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吴稚晖向会议提出的“请查办共产党”呈文，作为蒋介石发动反共事变的法律根据和舆论准备。接着，蒋介石在上海召集张静江、吴稚晖等连续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反共清党的具体部署。

蒋介石深知，要把上海的革命力量镇压下去，特别是动手解决以八十万工人为后盾的五千工人武装纠察队，并非易事，于是他决定借助上海的流氓势力，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在这幕即将上演的丑剧中，扮演一种不可缺少的角色。

恨切切筹定杀人计

一九二七年春的一个晚上，杜月笙、张啸林等正在杜家吃卢喝雉，狂赌不休，黄金荣突然打来电话，要他们立刻到他家去。杜月笙、张啸林心知有异，跳上汽车，直驰钧培里黄宅。在那里，他们见到了身着便装的杨虎和陈群。

杨虎，字啸天，安徽宁国人。早年毕业于南京将弁学堂。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后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和护法战争。一九二二年后曾任孙中山总统府参军、大元帅府海军处长。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

陈群，字人鹤，福建闽侯人，一八九一年生。因在结拜兄弟中排行第八，人称陈老八。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明治大学。一九二一年任广东军政府秘书。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任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杨虎、陈群这次化装进入租界，是受蒋介石派遣，来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取得秘密联络的。他们向杜月笙等人透露了蒋介石将镇压共产党及工农革命力量的意图，要求杜月笙等协助，并答应给予五万元的经费。黄金荣对蒋介石决心反共心里虽然高兴，但一开始还拿不定主意，因为他看到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和主张，得到很多人的拥护，担心国民党对付不了共产党，想看看胜负再说，示意杜月笙不要急于表态。但杜月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如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胜利，对他们决不会有好处。只有全力参加反共，才能与蒋介石建立密切的关系，获得新的政治靠山，现在杨虎、陈群找上门来，机不可失。经杜月笙说服，黄金荣下了帮助蒋介石反共的决心。

第二天，在杜公馆专为接待贵宾而设的古董间里，杜月笙、张啸林又与杨虎、陈群秘密商议两个多小时，决定在蒋介石公开动手之前，他们先在三个方面积极进行准备：一、尽可能拉拢各种可以拉拢的人物，以扩大势力；二、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欺骗宣传，以削弱上海总工会的力量；三、建立一支流氓武装，配合蒋介石发动政变。

议决之后，杜月笙等人便开始了紧张的活动。他们让杨虎、陈群通过黄

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共有二十人，八人不足半数。

范绍曾口述、沈醉整理：《关于杜月笙》，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

金荣的引见，拜上海清帮“大”字辈张镜湖为老头子。张镜湖在接受杨虎、陈群为徒弟时，为了表示客气，也为了保密，开的是小香堂，仪式简单。杨虎、陈群磕头之后，便成为清帮“通”字辈成员，从而加强了对清帮势力的影响和利用。同时，杜月笙委托几个专做军火生意的买办，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大量购买枪支弹药，前后共搞到一万二千多支枪和大量子弹。“小八股党”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叶焯山等一个个进入“临战状态”，除了外出招兵买马、收罗党羽，便日以继夜地守候在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家原有枪支五、六十杆，从可以藏在掌心的勃朗宁，二十响驳壳枪，到轻重机关枪，式式俱全，其中有的是杜月笙买来供保镖使用的，有的则是军阀、政客的赠物。杜月笙怕阴谋败露，遭工人反击，便将这些枪支全数拿出，杜门上下几乎人手一支，原即诡橘莫测的杜公馆，更变得阴森恐怖。第一批军火购进后，杜月笙命令叶焯山选择秘密地点，训练流氓学习射击，积极准备兴风作浪。

为了便于纠集徒众，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还共谋组成所谓“中华共进会”。杨虎、陈群原想以杜月笙为会长，奸滑如油的杜月笙虽已决心跟着蒋介石反共，但未到最后时刻却不愿抛头露面，便推给黄金荣挂名。老于世故的黄金荣当然知道杜月笙“抬举”他的奥妙，借口他们都是清帮中人，为争取洪门出力，共进会会长最好请位洪门头领担任。洪门活动范围主要在内地。上海是水陆码头，清帮势力比洪门强得多。因此，黄金荣虽然愿请，但洪门中人却无人愿任此需担风险、却无实权的会长。最后，杜月笙提出由浦锦荣充任。浦锦荣，上海人，绰号“阿水徒”。拜清帮“大”字辈王德龄为老头子，本人为清帮“通”字辈，是金廷苏、高鑫宝的同参弟兄。练过武功，有蛮力，视打架斗殴为家常便饭。在法租界混过几十年，手下酒肉朋友、徒子徒孙不少，在黑社会有一定号召力。此人长期接受“三鑫公司”津贴。他儿子捕贤元又是杜月笙徒弟，所以对杜月笙来说，这是个既能冲冲杀杀、又便于控制的角色。杜月笙的提议得到黄金荣、张啸林赞同。于是，杜月笙派金廷苏去劝浦锦荣出任。浦锦荣一口答应，并提议将共进会设在他家里，即法租界格洛克路紫阳里7号（今柳林路140弄内）。之后，浦锦荣又以“中华共进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大登通告，欺世盗名地把这个反动组织说成是辛亥革命时期曾存在过的共进会的继续，号召各种恶势力“投袂奋起，……甘作前驱，共扫凶残之孽”；并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声称他们“未受何方分文津贴”，叫嚷进步舆论对他们的抨击是“误会太甚”，“太乏常识”，甚至穷凶极恶地威胁：倘再有人“破坏他们的名誉，即视为公敌”。

正当杜月笙等人为参与反革命政变积极准备时，王柏龄也来到上海，秘密找到黄金荣、杜月笙。王柏龄，字茂如，江苏扬州人，曾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黄埔军校成立后，担任过教育长和教授部主任，北伐战争时，在蒋介石担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任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辛亥革命时，王柏龄曾在陈英士手下任事，因而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相识。王柏龄见到杜月笙，口口声声表示：“强龙不压地头蛇”，愿意做杜月笙“私人顾问”。实际上，他到上海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替杜月笙等人参与反共事变作军事策划。

为了加紧勾结，也为了壮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王柏龄、杨虎、

陈群等六人，演了一出歃血为盟的闹剧。那天晚上，杜公馆灯火辉煌，客厅正中，高悬一幅“刘关张桃园结义”的绣象图，图下是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上陈列着龇牙咧嘴的猪牛羊等三牲之头，两旁点燃一对胳膊粗的巨大蜡烛。黄金荣、张啸林、王柏龄、杨虎、杜月笙、陈群，按年龄长幼，依次排列，先祭天地，后喝血酒，山盟海誓，交换兰谱，结成所谓异姓兄弟，实际是形成了一个流氓、政要、军人、党棍齐集的阴谋集团。这个阴谋集团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筹定杀人计，设下陷人坑，准备置上海于血泊之中。

豺狼出洞上海遭殃

四月九日，蒋介石宣布上海戒严，委派白崇禧、周凤歧为戒严正副司令，同时通电攻击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援引私人，把持总政治部，淆惑军心，背叛主义等等，命令各军注意邓派分子混入。四月十一日，密令各省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镇压。

杜月笙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

四月九日，杜月笙派心腹管家万墨林给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送去一份请帖，假称有机密公事商议，请汪寿华于四月十一日晚至杜公馆赴宴。由于杜月笙善于伪装，且广收门徒，在部分工人中有一定欺骗性，为了团结更多的工人，同时也为了减少革命的阻力，汪寿华曾作过杜月笙一些工作，因而与杜月笙有来往。当时正值局势动荡，流言纷传，听说杜月笙有要事商议，汪寿华便不顾个人安危，答应准时前往。

四月十一日下午，上海的气氛开始显得异样，大批受蒋介石指挥的反革命军队，由龙华开往南市、闸北，到处巡逻、布岗；各租界巡捕房及帝国主义派驻上海的侵略军也都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他们的屠刀准备出鞘了。

当天晚上，杜月笙首先在他位于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家里，摆开了杀场。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高鑫宝，以及马祥生、谢葆生等人预伏在大门内；大门外则停放着两部汽车，一部在华格臬路通往李梅路（今望亭路）的转角，内有司机和两名武装流氓，另一部在靠近大门处，内无一人，但放着麻袋、绳索、铁锹等杀人凶器。七点三刻时，顾嘉棠里外检查一遍，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便将情况向坐在客厅里的杜月笙作了汇报，杜月笙点点头，起身避去楼上。

八点差二分时，汪寿华带了一名保卫人员，由一名司机驾车来到杜公馆。杜家的门卫，笑容可掬地将汪寿华迎入大门。那扇沉重的铁门刚一合拢，停在华格臬路李梅路转角处的汽车便悄无声息地驰向汪寿华的汽车，车内的打手在汪寿华的保卫人员和司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将他们绑架至秘密地点杀害了。

汪寿华进入杜公馆后，快步走向客厅，躲藏在门边的叶焯山乘汪寿华抬脚跨过门槛时，用右肩猛然撞击汪寿华左胸，接着顾嘉棠、芮庆荣等一拥而上，穷凶极恶地反剪汪寿华双手，捂住汪寿华口鼻。杜月笙闻声下楼，他担心将汪寿华杀死在他家中，豪华的杜公馆将成为一所“凶宅”，为避免这种“不吉利”的事情出现，杜月笙关照凶手们：“不要做在家里。”于是顾嘉棠等人便将汪寿华架上预先停在门口的汽车，由高鑫宝开车，直向沪西驶去。不屈的汪寿华在车上极力挣扎，与众匪徒拼死争斗。匪徒们作贼心虚，唯恐碰上工人纠察队，提前在汽车里下了毒手，叶焯山双手扼住汪寿华喉咙，将

他掐死过去。汽车开到沪西一处僻静地方后，匪徒们跳下汽车，将汪寿华塞进一个麻袋，然后七手八脚地挖起泥坑来，谁知挖到一半，汪寿华在麻袋里苏醒过来。匪徒们吓得毛骨悚然，呆了半天，才意识到方才在汽车里只将汪寿华掐昏，并未掐死，立刻手脚忙乱地将汪寿华拖入泥坑，活活掩埋了。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工人领袖汪寿华，就这样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夕被杜月笙及其党羽杀害了。

汪寿华被架出杜公馆后，一、二百个流氓，佩挂长短武器，陆续集中到杜家。原来，杜月笙等人以共进会名义纠集了一万五千多乌合之众，将于第二天早晨配合蒋介石反动军队对工人发起进攻，当天晚上来杜家的这一、二百人，便是这支流氓队伍的大小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在杜家客厅里准备了大肉面、蟹壳黄、各式西点和白酒，给这些流氓头目充饥；三人还轮流讲话，又是威逼利诱，又是捧场打气，要这些流氓头目们为蒋介石和他们去火中取栗。这样，又吃又喝，又叫又嚷，足足闹了几个时辰。十二日凌晨二时半，这批人离开杜家，象龇着牙的豺狼，涌出洞口，分赴法租界各个预定的集合地点。

在那里，流氓头目们将已等候着的党羽分组编队，每小队十八至二十人，由各队长发放枪支，副队长则替他们系上臂章。臂章是一块白布，上用墨笔写了一个“工”字，盗用工人名义，对工人下毒手。

一万五千流氓恶棍，按预定计划，从南北两路，夹击工人纠察队。北面一路有三支队伍，一支袭击设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内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一支攻打总工会所在地闸北湖州会馆，一支扑向驻有一百多名工人纠察队的商务印刷厂。南面一路则进攻工人纠察队的重要据点华商电车公司。这时，法租界的绝大部分机动车辆，已由杜月笙等人控制，距离进攻地点远的流氓打手，由这些种类不一的车辆载去。

流氓武装向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之后，工人纠察队起而自卫。

攻打华商电车公司的流氓武装，事先不知工人纠察队手中有机枪，他们虽然依仗人多，强行攻至公司附近，但却被机枪压得抬不起头来，处于进退不得的困境。杜月笙知道后，亲自出面向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借来四挺马克沁机枪，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流氓武装才摆脱困境，冲进了公司。

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高鑫宝等带队攻打住于宝山路上的东方图书馆，工人纠察队顽强抵抗。顾嘉棠等人只得向杜月笙告急。杜月笙非但亲去督战，并设法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费信悫借了二十门小钢炮，穷凶极恶地轰击东方图书馆。借助炮火威力，众流氓攻入楼内，惨无人道地杀害工人纠察队员。

蒋介石按用预谋，颠倒黑白地将流氓武装对工人纠察队的袭击说成是“工人内讧”，派出军队，以“调解”为名，或者骗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或者直接与流氓武装配合，屠杀工人。事后，据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上海《新闻报》透露，仅商务俱乐部及南市电车公司两处工人纠察队“因抵抗而死者百余人，工友群众死者数百人。”

上海人民眼看打着“革命”旗号的蒋介石军队，突然掉转枪口屠杀工人，无不愤怒异常。当天，各区举行了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的抗议集合，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枝，惩办流氓，肃清反动分子。南市区五十万群众集合后，

另有一说，汪寿华是被杜月笙抓起来，加以秘密关押后，活活饿死的。

向龙华司令部进发。闸北五万多工人、学生和居民举行示威游行，从反动军队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宣布继续办公，并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全市总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十三日，上海丝厂、烟厂、电车、海员和店员工人等二十多万人，不顾白色恐怖，实行罢工。同日上午十时，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群众大会，虽然反动派沿途堵截，使沪东、沪西、南市的工人不能前来，但到会者仍有六万余人。大会一致决议，要求收国被缴去的工人武装。下午一时，群众冒雨列队游行，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等口号。

杜月笙为了破坏这次群众抗议活动，与黄金荣、张啸林联名印发“警告男女工人书”十万份，到处散发，攻击共产党不是“共产”而是要工人“共死”；并企图欺骗工人停止革命活动，说什么“如若各处工厂店家弄得没有生意，只好停办起来，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到哪里去寻生活”，说什么“现在生活程度增高，你们的工资自然要加的，享有资本的人，亦要放出良心来，自动的加你们的工资，劳资两得其益。”此外，杜月笙还将安插在各处的耳目搜集到的情报，预先通知了蒋介石反动军队，帮助他们准确地掌握了工人的活动情况。

因此，当群众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便碰上了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反动军队，他们以密集的火力向游行队伍发起突然攻击。顿时，宝山路上血流成河，被打死的有一百多人，受伤者不计其数。

当天下午二时，陈群便代表国民党右派势力给杜月笙打电话，表示感谢，说：这次能迅速“平定暴乱”，全靠杜月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继宝山路大屠杀之后，蒋介石公然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并在上海成立了“清党委员会”，由陈群等人担任清党委员。为了便于密谋策划，陈群、杨虎在嵩山路18号设立了一个所谓俱乐部，里面鸦片、赌具、酒菜、女招待，一应俱全。杜月笙每天不管多忙，必定要到这里转一趟，或向杨虎、陈群提供情报，或帮助他们出谋划策。杜月笙还应陈群之请，派芮庆荣担任“行动大队”大队长，利用熟悉上海情况的条件，帮助搜捕转入地下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四月十四日，“行动大队”分头出发，搜查了“上海特别市政府”、“特别市党部”、“学生联合会”、“平民日报社”、“中国济难会”等进步机关，一天之内便捕捉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一千多人。上海成了恐怖世界，到处是戒严、搜查，殴打、逮捕、公开的和秘密的屠杀。有些与革命根本无关的人也遭到迫害，例如曾携露兰春私奔的薛二，便被“行动大队”戴上一顶“红帽子”，送进了龙华司令部，准备当共产党员枪毙。后来由他父亲薛宝润拿出二十万大洋，交给杨虎、陈群等人，方才放他一条生路。

杜月笙帮助蒋介石把上海浸入血泊之中，但杀意仍然未尽。四月下旬，他包下“天安”号轮船，带着芮庆荣，率领“行动大队”，跟随杨虎、陈群，专程去宁波协助蒋鼎文“清党”。在那里，杜月笙住进金廷荪的老屋，勾结当地的流氓恶棍，配合国民党军警部队，由解散宁波总工会开始，大肆搜杀三天，残害了许多共产党员、革命者和进步群众。回上海后，杜月笙又派高鑫宝率领党羽，到青浦、松江一带，帮助国民党军警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杜月笙不但直接帮助蒋介石杀人，还在舆论上拼命为蒋介石涂脂抹粉。四月十四日，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三人在上海各报联名发表所谓“真电”，长舌翻卷，信口雌黄，污蔑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是“贪苏俄赤化之金钱，贿买无知识无教育之青年工人，捣乱地方”；将革命中被打倒的土豪劣绅美化为“地方公正人士”；将他们镇压革命的罪恶活动说成是“揭竿为旗，斩木为兵”，无耻地为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事变张目。

四一二事变，是蒋介石篡夺革命胜利果实，建立反动政权的重要步骤，也是杜月笙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跳板。因此，蒋介石念念不忘四一二，一九二九年，正式将这个血腥日子定为“全国清党纪念日”。杜月笙也念念不忘四一二，每逢这个血腥的日子，都不忘重温或吹捧一番自己的“功劳”。一九三二年，所谓“清党五周年纪念”时，杜月笙参加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的“纪念大会”，当天晚上，又在家里大摆筵席，宴请杨虎、陈群和黄金荣、张啸林等，“以作纪念。”一九三七年，“清党十周年纪念”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天后宫桥（今河南路桥）上海市商会大礼堂举行纪念大会，杜月笙洋洋自得地发表“演说”：“十年前，上海陷于赤色恐怖局面之下，本人追随杨司令（杨虎）及诸位先进之后，参加清党运动。当时本人曾于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当局，在事先请其予以方便，外人问余以若干时间可告成功，且谓欧美各国均有共党，其人数虽不多，其声势则甚大，对余此举，似认为狂举，余答以24小时可解决，渠更认余作吃语，但终告成功。”杨虎立即起而作证：“当时在上海方面清党的成功，……在各界领袖中要算黄金荣、虞洽卿、杜月笙、张啸林诸先生出力最大。”

通过参与四一二事变，杜月笙攀附上了取代旧军阀的新贵，这个靠流氓起家的人，再不是一条只能在阴沟里混的“泥鳅”，他处心积虑地要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建立自己的权势。

“真”为11日的代日韵目。

1932年4月13日《申报》。

1937年4月13日《新闻报》。

四 攀龙附凤

蒋介石的高参

四一二事变前，杨虎、陈群根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的表现，给他们各自作过评语，以杜月笙最佳。这个评语曾汇报于蒋介石，内容如下：“黄金荣忠党爱国，老成持重，惟以法租界巡捕房职司关系，不便对外公开露面，渠声势虽大，仅可暗中加以助力。张啸林辄喜结交军阀，崇慕权势，虽亦能深明大义，復以性情刚烈，易于树敌。杜月笙则出身寒微，时刻不忘奋发向上，谦冲自抑。且时值年富力强，颇具国家民族思想。”

四一二事变后，上海三“闻人”，更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红人。事变后不久，陈群去南京向蒋介石报告“清党”情况。回上海后，与当时已官升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在嵩山路18号约见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黄等到后，陈群从皮包中取出三个牛皮纸大信封，双手捧放桌上，装模作样地对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说：他这次进京谒见蒋总司令，总司令专门提起在上海“清共之役”中，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出力甚大。今后上海在继续“清党”和“维持治安”等方面还要借重他们。为示嘉奖，决定委任他们三人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十月十日还要颁发勋章。

陈群一番话，令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他们以为这下算是跃过“龙门”，从此可以飞黄腾达，直上青云。一直标榜不愿为官的杜月笙，立刻派人去定做了“少将”军装，穿戴齐全，站在摄影机前，睁目敛笑，左一张右一张，拍下不少标准照、全身照，以资纪念。接着，又在杜公馆设宴请客，庆贺荣升。山珍海味，美女娇娃，昏天黑地，大闹数天。

狂热劲过去后，杜月笙想到蒋介石如此宠信，他们也应该有所表示，便与黄金荣、张啸林商议上南京“谢委”。正在此时，蒋介石通过陈群带来口信，于三“闻人”中。单独召见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心中虽不无酸感，但杜月笙势力实际已超过他们，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虚表祝贺。

杜月笙得此召见，自感荣耀非凡，立刻收拾行装，准备动身。他手下的党羽喽罗都不肯放过这个能够直接讨好于蒋介石的机会，人人争当随员。杜月笙费尽心机，平息争当随员的纠纷，带上万墨林等人，急如星火般奔往南京。到南京后，杜月笙被安排住于中央饭店。为讨蒋介石欢心，他事先反复演习被召见时的礼仪，再三再四地关照他手下那班流里流气的随从，不许做这，不许做那。好容易盼到蒋介石召见的那天，杜月笙满脸谄笑地聆听比他大两岁的蒋总司令的“教诲”。从此，他建立了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陷于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新老军阀争斗之中。南京蒋介石集团和武汉汪精卫集团是两大主要对立集团，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河北和山东。阎锡山控制着山西。冯玉祥驻军洛阳。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和蒋介石虚情周旋。李济深、黄绍竑则盘踞广州。激烈的明争暗斗，使蒋介石陷于内外交困之中，为了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缓和国民党营垒的矛盾，也为了欺骗“舆论”、掩盖野心，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突然宣布“下野”，声明辞去北伐军总司令职，权欲极重的

蒋介石，当然不会交出权柄，经蒋介石授意，他的嫡系、亲信在他“下野”不久，便到处制造舆论，请求蒋介石“复职”。八月十四日，上海的华文报纸就登满各“团体”请求蒋介石复职的电文。十七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属各区分部的代表约二百余人，举行集会，电请蒋介石放弃“辞职”之意。

杜月笙眼见刚攀上的高枝要断，心急如焚，卖力地奔走于支持蒋介石的活动之中。八月十五日，蒋介石乘轮船由南京返回奉化老家，途经上海时，杜月笙登轮谒见，力表忠心，并派出手下众多喽罗，密布码头周围，为蒋介石保驾。蒋介石“下野”，虽说出于“以退为进”的计谋，但环顾四方，反蒋声浪不断，却也不无凄凉惶然之感。此时此地，见到杜月笙如此表示效忠，心中不无慰藉，蒋、杜关系也由此更见深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事变，扣留了正在当地逼迫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壮举，轰动世界，凡爱国之人，无不拍手称快。杜月笙却惶惶不可终日，联络当时上海工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王晓籁、钱新之，以“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的名义，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愿赴陕北以身为质”，利用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在上海保护过张学良安全的关系，要挟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及各派支持抗战力量的努力下，获得和平解决后，杜月笙又和王晓籁、钱新之、张啸林专程“入京晋谒”，向蒋介石表示“慰问祝贺”，蒋也赏脸，让他们和自己及其他“西安蒙难要人”摄影留念。

正因蒋、杜关系如此投契，所以蒋介石有许多不便出面的事情，便委杜月笙代劳。

以贩毒销毒为例。蒋介石统治时期，对鸦片烟土采取了比北洋军阀更为罪恶的政策，名之曰：“寓禁于征”，把征收鸦片特税，作为重要财源，到处设置的禁烟处和禁烟局，实际上成为贩毒销毒的黑窝。杜月笙的许多亲朋友好及党羽，经杜的活动，先后变成了蒋介石设在各地的禁烟局官员。特别是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局长曾镛，字孟鸣，他的儿子曾宪琼拜杜月笙为干爹，是杜月笙的干亲家；金廷苏、苏嘉善则为财务处正副处长。苏嘉善，浙江嘉善人，早年与杜月笙一起贩卖鸦片起家，以后成为杜月笙财政方面的主要助手。顾嘉棠为运输处长，马祥生为查缉处长，芮庆荣为护缉队长。江苏省各县“禁烟分局”也遍布杜月笙的爪牙，谢葆生是上海县禁烟分局的副局长，金山县禁烟分局归高鑫宝负责。

上海由这些人禁烟，其结果可想而知。原来在华界尚躲躲闪闪的烟馆老板，这时也如法租界一样，公开营业。一时间，南市、闸北等区烟馆林立，“福寿宫”、“凌烟阁”等招牌遍布街头里弄，有的还装起霓虹灯招牌，招徕顾客。乌黑的烟土，变成耀眼的白银，杜月笙等人的腰包飞速膨胀。但与蒋介石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一九三一年，蒋介石调动三十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在江西主持“剿共”时，把“禁烟事宜”，划归其“行营”直接办理。之后，蒋干脆亲自兼任禁烟总监，将大批以“禁”为名，“充公”而来的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交给杜月笙包销。有一次，蒋介石来上海，

1936年12月18日《新闻报》。

1937年1月1日《申报》。

杜月笙在家里设下丰盛宴席款待。蒋介石偕同宋美龄，带着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等数人赴宴。席间，蒋介石询问鸦片生意情况，杜月笙进策说：“经销鸦片比不上卖吗啡获利大，如果设立工厂，将鸦片加工成吗啡，所得可翻几个跟头。”一番话把蒋介石的眼睛都说红了，他立刻命令吴铁城与杜月笙妥为商议，迅速办工厂。蒋介石离开上海后，经杜月笙与吴铁城策划，在南市保安队某中队部内秘密办起了一个吗啡制造厂，由杜月笙请出闻名上海滩的吗啡大王陈坤元任经理，雇佣员工三百多人，并与日本特务及国际贩毒组织建立联系，生意做出了国界。该厂的一切重要事宜，由杜月笙向宋美龄、孔祥熙汇报后决定。吗啡厂创办不久，便成为蒋介石的一个重要聚宝盆。

蓝衣社见吗啡生意赚头很好，起而效尤，在浏河也办起一家吗啡厂。这家吗啡厂后被上海市保安队侦知，将它抄了。经有关方面打招呼后，吴铁城命令保安队将抄去的东西大部发还。但蓝衣社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不明设在南市保安队某中队部内吗啡厂的背景，为报复保安队，派人冲进该厂，把毒品和机器抢走不少。事情闹大了，南京政府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派人来上海检查。但设在南市保安队某中队部内的吗啡厂却不买帐，在厂门口布置了卫兵，扬言该厂是蒋介石的秘密机关。南京政府派来检查的人员不敢贸然进入，只得打电报到南昌行营蒋介石处询问，蒋介石碍于舆论，不敢公开承认，装腔作势地要求严为查办。南京政府因此派人到厂里抓了四十三个人，还要抓陈坤元。陈坤元如被抓，内幕可能尽泄，杜月笙急忙出面找到法租界巡捕房，与他们串通好，让另一个吗啡大王罗春发自首投案，法租界巡捕房将他关了一天，搪塞一下舆论，第二天就把他放了。陈坤元则由杜月笙安排跑到大连去避风头。被抓走的四十三人，由南京政府作作官样文章，分别判处半年、三月、一月不等的徒刑，但实际都未关足一个月就放了出来。事情过后，陈坤元告知杜月笙，该厂经此折腾，损失六十万大洋。杜月笙报告了宋美龄，宋为安抚他们，说：“由我赔出好了。”此一风波才告一段落。风波过后，贩毒销毒生意当然照作不误。

杜月笙的行径表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几乎成了蒋介石少不了的人。他没有辜负那张“少将参议”的委任状，堪称蒋介石的高参。

豪门密友

除蒋介石外，凡国民党的“党国要人”，只要有可能会攀附上的，杜月笙莫不曲意奉承，极力巴结。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赴美，向美国垄断资本家乞求贷款。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之时，国内一些爱国人士呼吁加强国防力量。飞机在当时是先进军事装备，不少人谈而生畏，因此航空救国之说应运而生。宋子文在美国摸准这一情况，提出发行“航空奖券”，想利用人们的爱国热忱，发笔洋财。但此举由官方出面，颇多不便，因此宋子文致电与他关系颇为密切的杨志雄，请他找一个适当的代理人。杨志雄，别名杨寅，早年留学德国，后任上海西门子洋行买办、吴淞商船学校校长、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德国系主任。杨志雄知道这是一项油水颇丰的差使，谁都想染指，必须找个有势力的人物，才能摆平各方面。他首先想到了杜月笙，立即电复宋子文。其实，宋子文也早有此念，三天后便给杨志雄回电：“照办”。

杜月笙得此美差后，喜不自禁。他与杨志雄商量，专门为出售奖券成立了一个“大运公司”，由金廷荪担任经理。为欺骗舆论，“大运公司”每当开奖时，都邀当时的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张寿镛“监督”摇彩。经办数月，“大运公司”赚钱无数，除交纳宋子文外，金廷荪还用赚得的钱给杜月笙在杜美路（今东湖路）26号“三鑫公司”仓库旧址处造了一幢美仑美奂的住宅。解放前夕，杜月笙逃往香港，将此宅卖得四十八万美金。金廷荪本人也用赚得的钱从黄金荣手里盘下黄金大戏院。

宋子文如此关照，杜月笙当然感恩不尽。当年八月，宋子文由美国归来，途经上海。杜月笙闻讯，立刻运动总商会等各方面发起召开上海市民大会，欢迎宋子文，由他担任大会主席，并拟亲自致欢迎词。杜月笙虽说老于世故，计谋多端，但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着吃洋面包长大的宋子文，说些既能使他入耳，又可登大雅之堂的话，却自感惴惴。因此，特将杨志雄请来商议。杨志雄建议他事先请人写好演讲稿，读熟之后，上台背诵。杜月笙便请了多人帮他拟稿，但拟好之后，不是嫌文章太深，就是感词不达意，最后还是由既熟悉官样文章，又摸透杜月笙脾气的陈群代他写成。其时，陈群因国民党内部倾轧，已卸任下台，闲居在杜月笙家。杜月笙得了这份讲演稿后，由杨志雄陪着，一连练了十天，自觉满意之后，方才作罢。

宋子文到达上海的那天，停靠轮船的大达码头，早由杜月笙安排喽罗，整修一新，并别出心裁地在四周围上铁栅栏，使整个码头充溢一种恭敬肃然之感。宋子文上岸后，又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杜月笙兴师动众的拍马之举，使宋子文乐不可支。

一九三四年宋子文之弟宋子良，玩厌了上海：“维也纳”舞厅的一个舞女，准备甩掉她，但那个舞女已有身孕，提出要宋给她一笔钱，否则将声扬出去。宋子良一毛不拔，委托杜月笙帮他彻底解决。杜得此报效宋家兄弟的机会，怎肯放过。他令人带信给这个舞女，要她到老北门大街（今河南南路）中汇银行大楼见他。那个舞女迫于杜月笙的威势，不敢不去。当她一进中汇银行大楼，就被杜月笙预先安排在那里的四个流氓打手蒙眼捂嘴，捆成长条，用汽车送到吴淞口外，丢入大海。歹徒们把用这种残酷手法杀人，称之为“种荷花”。一九三六年初，法租界巡捕房副总监饶伯泽风闻此事，曾作过调查，但事涉杜月笙及宋子文乃弟，当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国民党政府另一个“财神爷”孔祥熙，与杜月笙的关系更为密切。

一九三七年，上海棉纱交易市场在孔祥熙家族操纵下，棉纱行情一反常态，猛涨不停，抛空者倾家荡财，买进者大把盈利。亏者未免气愤，加上棉纱看涨，刺激面粉、杂粮价格上升，因而舆论沸腾。政学系和CC系过去曾在公债和黄金买卖上吃过孔祥熙的亏，早想报复，见此机会，便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面孔，在《大公报》上连续发文，猛烈抨击。因国民党政府法律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兼作市场交易，蒋介石不得不令实业部长吴鼎昌到上海“彻查”。吴鼎昌深知蒋介石此举不过是官样文章，决不是真地要他去“彻查”孔祥熙，于是他便想通过整一下直接操纵市场的孔的两个亲信吴启鼎与盛开颐，以平息舆论。岂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在副院长孔祥熙的操纵下，连这两人也不许碰，不久便令吴鼎昌停止“彻查”，把案子移交法院。其时，杜月笙早已为孔祥熙作好安排。当案子移到法院，便由杜预先打过招呼的几家私

人商号出页，声称在这场棉纱交易中买进的是他们。法院见有人出面来顶缸，当然乐得不再追查，一场轩然大波，就此平息。孔祥熙毫毛无损，对杜月笙的帮忙自是心中有数。

抗战中期，国民党政府在四川没收一批已征过税的鸦片烟土，因为已征过税又被没收，若在内地销售，被烟贩子知道，未免不服。孔祥熙便想通过杜月笙将它制成麻醉品，远销外洋。这事不便形诸书信，孔特地派人去香港，将时在香港寓居的杜月笙请至重庆面谈。杜月笙返回香港之后，便在香港设立“港记公司”，以顾嘉棠为经理。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仪常驻香港，专理土款。军统局戴笠则派郑子嘉负责联络，用军统局的汽车将烟土冒充军用品，源源运往粤北韶关。杜月笙的党羽在韶关接货后，再用赈济委员会的汽车，将烟土以救济品的名义运至香港，然后经过各种渠道运去上海等地加工出售。这票生意，使孔祥熙、戴笠、杜月笙等获得巨额收入，顾嘉棠也分肥不少。为了报恩，顾嘉棠拿出大笔金钱，在重庆汪山公路附近，炸开山石，大兴土木，造了一幢富丽堂皇的石屋，供杜月笙“养身”。

抗日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募捐。他们先找上海市长吴国桢商量，吴表示没有办法，于是他们便转而去杜月笙。杜见这是个猎名的机会，便扮出一副知恩必报的面孔，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随即命令手下诸人四出募捐，不久便聚拢了一大笔钱。但杜月笙并不把这笔钱直接交给向传义等人，而是兜了一个圈子，把好人让给孔祥熙做。他向孔祥熙说明四川来上海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又说他愿代办，但需请孔出面。做这等既能猎名又无需出力的事，孔祥熙当然乐意应承，于是按杜月笙的安排，出面请吴国桢、向传义、何北衡等人赴家宴。席间，孔祥熙义形于色地表示：“四川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四川有难，一定要尽力相助。”之后，又煞有介事地指着杜月笙说：“这事我已关照月笙马上去进行，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月笙立刻站起身来，恭而敬之地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杜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去办，也希望大家协助我。”在场几个知道内幕的人，见杜月笙拍马功夫如此娴熟，逗得孔祥熙眉开眼笑，却又不露肉麻痕迹，无不在背后半妒半羨地说：“月笙不愧是个大好佬！”

杜月笙极力讨好孔祥熙，孔祥熙也十分照顾杜月笙，共同利益，相互利用，使他们结成了通家之好。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认杜月笙的姨太太姚玉兰为干女儿。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仪经常出入杜家，为了给杜月笙治气喘病，她特从美国买药赠送。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则买了一辆当时最新式的小轿车赠给杜月笙代步。一九四七年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维新两人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结婚，孔祥熙亲当证婚人，并当着一千多宾客夸奖杜是“中国少有的事业家，有远大的见识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态度。”孔祥熙如此关照，杜月笙自是感恩戴德。他长子杜维藩经常对人说：“家父一再告诫我们：‘孔祥熙先生对于我的恩德，你们永远不可忘记。’”

上海是杜月笙的老窝。因而他对国民党政府派来的历任市长。都千方百计地加以笼络，每月必送上“私敬”五万元。吴铁城任上海市长时，因与杜月笙搞得过于热络，曾招致舆论的公开抨击。吴铁城却大言不惭地说：“政

时杜月笙任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第九次赈济区事务所主任，分管广东、广西、福建赈济事务。

通首重人和。杜月笙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说他是上海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士，总该不错吧！我既奉命担任上海市长，就要跟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士保持友谊。”

所谓“友谊”，说穿了是相互勾结，合伙分赃。三十年代初，原法国驻沪领事范尔迪回国，由甘格林补缺。葛格林见杜月笙等人在法租界的烟赌生意甚为火红，赚钱无数，对他们按惯例送他“月敬”三十万元不满足，提出增加到五十万元。杜月笙等人却只肯增加到四十万元，双方谈不拢。葛格林为给杜月笙等人施加压力，贴出布告下令禁售、禁买、禁吸鸦片，并扬言要禁赌。此招一出，福煦路（今金陵西路）181号大赌场来客稀少，门可罗雀；法租界的烟土商更大为惶恐。吴铁城早就眼红法租界兴隆的烟土生意，国民党政府当时又正对鸦片改行所谓“寓禁于征”的政策，他便暗示杜月笙告知烟土商，把烟馆搬到华界的南市、闸北等地开设。烟馆搬到华界后，原来孝敬法国人的银洋，当然滚进吴铁城等人的腰包。吴铁城给杜月笙等解了难，也给自己进了财。正因为如此，吴铁城对杜月笙保护唯恐不周。当时北平《世界日报》与天津《益世报》曾各自登出一篇通讯，揭露上海烟毒蔓延的情形。吴铁城看后，大为不满，当即把两报驻沪记者召去“劝告”一番，说：“你们这样做，对我是没有关系，但杜先生知道了要不开心的。你们都还年青，何必得罪杜先生呢？”以后，再没有新闻记者敢写这方面的报道了。

除市长外，杜月笙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负责人，也是极力拉拢。例如吴开先。此人是江苏松江人，上海法科大学经济科第一期毕业生，第一次大革命时参加过共青团，后投靠陈果夫、陈立夫，是cc系的骨干。一九二九年起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有上海“党皇帝”之称。吴开先上台不久，杜月笙即授意其在市党部工作的门徒陈君毅，劝说吴与他见面。陈君毅对吴开先说：“杜先生最爱朋友，和他结交，决不会有坏处。”并代吴开先约定了见杜月笙的时间。开始，吴开先还有点自抬身价，约了两次，婉谢没有去，杜月笙却极有耐心，又约了第三次。这次吴开先独自一人驱车前往华格臬路杜公馆赴约。一进大门，只见杜月笙的心腹管家万墨林已站在那里迎接。再进一道门，当年上海滩的“名律师”秦联奎已拿着原听头的高级香烟在恭候。走进客厅，杜月笙立即置许多客人于不顾，满面春风地站起来相迎。坐定之后，杜月笙脸带微笑，说不尽久闻大名、相见恨晚之类的客套话。吴开先早闻杜公馆派头十足，目睹之下，果不虚传，原有的几分矜持，顿时冰消，也作出一副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姿态。双方一拍即合，此后在控制上海工人运动，破坏工人罢工等方面，共同作了许多坏事。

杜月笙善于攀援，在上海滩可说是“路路通”。有些国民党官员，起先不懂他的厉害，在碰了钉子之后，才改变了对杜月笙的态度。有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名叫蔡劲军，曾任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公安局长，他自持与蒋介石有师生之谊，不把杜月笙放在眼里，上任之始便免去了公安局中一些由杜介绍来的人员的职务。杜月笙暗自恼怒，决定给蔡劲军一点颜色看。某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到上海，蔡劲军派公安局的军乐队去迎接。军乐队经过法租界时，全部被法捕房拘留，理由是军乐队中有人携带武器，违反法租界惯例。蔡劲军当然知道是杜月笙作梗，这时才知此人不好惹，以后对杜月笙只好另眼相看。

经此软硬兼施的巧妙活动，杜月笙几乎与国民党政府、特别是上海市各重要部门的官员都建立了联系，依靠这张无孔不入的关系网，杜月笙的权势

迅速膨胀起来。

坐上法租界华董交椅

杜月笙拚命与国民党当局拉拢关系，对外国权贵同样不曾怠慢。他是以上海法租界为依托而发迹的，因而特别注意取悦于法国人。

范尔迪刚到上海时，担任法国驻沪领事馆书记，在社交场上邂逅一位女子，其名樊菊丽，是长江轮船买办的女儿，毕业于两江女子专科学校，貌美而懂法文。两人一见钟情，难舍难分。不久，便正式结婚。婚后，两人同至太湖游玩，流连于湖光山色之间，忘情于卿卿我我之中，好不惬意。但藏于太湖深处的土匪，却早已盯上了这对中西合璧的“鸳鸯”，找个机会把他们绑架而去。范尔迪、樊菊丽满腔的柔情密意，顷刻间化作胆战心寒，他们浑身颤抖着，按照土匪的要求，写了一封呼救函，寄到法国驻沪领事馆。养尊处优，惯于在风月场上逞英雄的法国绅士，未曾想到土匪会把主意打到他们头上，他们没有胆量去和土匪打交道，惊慌失措地找到了黄金荣。结果，此事被早存巴结之心的杜月笙揽去。杜月笙派高鑫宝去太湖要人。高鑫宝与太湖土匪头子吴世魁早有往来，交情不错，他找到吴世魁后，奉上厚礼，说明来意。吴世魁自忖在太湖为匪，很多地方用得着上海黑道中人，落得作个人情，因此不但将范尔迪、樊菊丽毫毛无损地奉还，而且设宴饯行。

范尔迪携带樊菊丽安然归来后，为了报答杜月笙，一下给他签发了二十多张特别通行证，持有这种通行证，便可在法租界免予检查，畅通无阻。以后，范尔迪升任法国驻沪领事，杜月笙每月从“三鑫公司”的收入中拨出三十万元，作为给范尔迪的“私人津帖”。

范尔迪之外，对其他法国驻沪领事，杜月笙同样优礼有加。一九二八年一月，法国驻沪领事那齐亚奉调回国。杜月笙别出心裁地以中国历史上百姓送别“清官”调任的仪式相送，准备了大银盾两方、万民伞两顶、执事牌八方。杜月笙、张啸林率领队伍，由华格臬路杜家出发，敲敲打打，一直跑到外滩法国总领事署。在领事署门口，杜月笙等奴颜婢膝地向那齐亚“告以市民景仰之德意”。那齐亚被捧得眉飞色舞，以为他真是受中国民众喜爱的使者，志得意满地表示：“中法邦交可由民众表现出来。”

四一二事变后，杜月笙成了国民党的红人，身价非昔日可比，法帝国主义者按质论价，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任命杜月笙为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一九二九年七月四日，法租界纳税华人会又正式推举杜月笙为公董局华董，使他坐上了中国人在法租界可能坐上的最高位置。

本已与法帝国主义者打得一片火热的杜月笙，受此重委，当然更竭尽心力为法租界当局效劳。当时法租界外侨一万多人，中国居民则有四十余万，公董局华董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法租界当局统治这四十多万中国居民。

一九二七年，法租界当局为了加重对租界华人的剥削，决定在征收房租外，举办房屋临时增捐。一九二八年开征房租时，便要居民随房租缴付，广大居民愤起抗捐，法租界当局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杜月笙闻讯，立即出面“调解”，胁迫居民“在未解决前，仍照旧额付款”。一九二九年，法租界当局又巧立名目，在决定增设卫生营业捐的同时，增办所谓“学校捐”。广

大居民群起抗议，激烈反对。法租界当局见惹犯众怒，难以收场，再次请出杜月笙，为他们“竭力斡旋”。

一九三三年四月，法租界巡捕房安南巡捕在新桥街（今浙江南路），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二人，打伤数人的血案。上海人民“愤激万分”，组成法租界惨案后援会，提出“抚恤尸属，赔偿伤害，惩凶道歉”等条件，与法租界当局交涉。杜月笙从中作梗，想方设法“劝告”死者家属先行领去“抚恤金”。以几个臭钱，了此血案，使“惩凶道歉”的正义要求落空，死者冤沉不雪，凶手弹冠相庆。

杜月笙是法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人民的帮凶，同时又是法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当局勾结的秘密渠道。三十年代时，国民党政府迫于人民群众要求维护国家利益的压力，决定将邮政总办一职，由法国人手中收回，改由中国人担任。此事被法国驻华使馆知悉后，图谋阻止，便通过法租界巡捕房总巡费沃里，要求杜月笙秘密设法。杜月笙千方百计走通了当时交通部长王伯群的门路。当王伯群因事途经上海时，杜月笙设宴招待。席间，杜月笙故作忧郁之状，王伯群问其原故，杜摇头不语，而由杜邀来作陪的一位头面人物，找个机会向王伯群婉转说明了杜月笙的要求。王伯群当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改变原来决定。商议再三，王伯群答应将撤换法国人所任邮政总办的决定扣压三个月后执行。费沃里因此可以向法国驻华使馆交差。杜月笙也以牺牲中国人民权益的行为，在法租界当局眼里益发成为神通广大不可或缺的人物。

费沃里在吮足中国人民血汗，告老回乡时，曾宣称他在中国交到的最好朋友是杜月笙，甚至劝杜月笙和他一起去法国，找个风景优美之处，买幢洋房住下，享享清福。其实，将杜月笙视为最好朋友的何止费沃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杜月笙一度辞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职务，原因是法国驻沪领事认为仅靠租界的法国军队，不足以确保租界安全，要杜月笙等组织流氓队伍协助。杜月笙曾就此事向报界发表谈话，宣称：“近日法租界内居民，陡增一百余万，治安秩序，尤关重要，法捕房已日夜加紧梭巡，以资防备，鄙人等亦派有特务员千余人帮助维持，自信法租界内，不至发生何种影响。”此举引起法国驻军不满，认为有损法军荣誉。为了敷衍法国驻军，杜月笙在法国驻沪领事授意下，演了一幕辞职戏。法国驻沪领事代表公董局董事会临时委员会复信杜月笙，不无深情地回顾了他们的“友谊”，夸赞了杜月笙为法帝国主义者建立的“功绩”。原信如下：

杜月笙先生：

径启者，接诵二月十五日大札，借悉台端决意不再参与本局董事会公务，深为惋惜。爱以个人名义，并代表委员会全体委员，谨向先生三年以来忠勤合作之高谊，表示热烈谢忱。且查先生每为法租界公安与秩序之利益计，每次排难解纷，辄获美满效果，此尤为本局董事会所不敢或忘者也。

此请勋安！

法国总领事葛格林 1932年2月29日

依仗法帝国主义者的宠爱，杜月笙在法租界更加为非作歹，将他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业大为扩展。以赌为例，除了原来的赌台，杜月笙又与张啸林合

1932年2月19日《申报》。

《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公报》第159期。

伙，增开了旧上海规模最大的赌台，对外称“富生公司”。“富生公司”设在福煦路181号。该处原是一位席姓富商的产业，由杜月笙等人以每月四千两银子的租金租来。这是一幢占地六十余亩的英国式建筑，双扇铁门，两排修剪得象绿墙样齐整的冬青，拱卫着柏油铺成的宽阔车道。车道尽头，是一个绿柳飘拂，鲜花送香的大花园。园内铺着绿天鹅绒似的草坪，点缀着四季盛开的奇花异卉。花园后面，便是巍峨富丽的三层洋楼。洋楼的一层、二层为赌场，仅三十六门的轮盘赌台，就设有八张。此外，数不清的大小赌室中，牌九麻将、沙哈摇缸，凡叫得出名的赌博方法，可说应有尽有，色色俱备。为了诱人来赌，洋楼的第三层僻为“休息室”，各房间内设有烟榻，预备上等烟泡，听凭瘾君子吞云吐雾，每天鸦片烟泡要烧去一千五百只似上。此外，中西大菜、苏扬细点、洋酒咖啡、香烟水果，川流不息，日夜供应，赌客取用，分文不收。招待员大都是荳蔻年华的美貌女子，这些女子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强颜欢笑，尽力取悦于赌客。为了吸引妇女去赌，“福生公司”还别出心裁地备下巴黎香水作为赠品。凡乘汽车前往的，司机每人给饭资五元，有保镖者加给五元。

“福生公司”的经理是杜公馆的账房钱曾宝。杜月笙的开山门徒弟江肇铭是“福生公司”的“挡手”。所谓“挡手”是流氓切口，意指赌场里主持赌博之人。另外，使用了大批喽罗，充当台脚、望清（即看场）和招待等。以转台一只计算，有吃陪二人、管筹码二人，转盘一人，望清一人，招待二人、管伙食二人、茶房二人，共十二人。该赌场全部人员约一、二百人之多。为了防止赌场附近的白相人、瘪三敲来客的竹杠，影响赌场生意，赌场每月给这些人一笔开销。

“福生公司”开张后，成了旧中国数一数二的销金窟。达官贵人、豪商巨富，无不如蝇逐臭，如鸦逐尸，纷纷赶来，福煦路上顿时车水马龙。晚清邮传部尚书、官僚买办盛宣怀的儿子、女儿，大资本家朱如山，国民党中委叶楚傖等都是“福生公司”的常客。这些人挥金如土，一夕胜负动辄法币十万八万，按当时金价计算，约合黄金八百至一千两左右。杜月笙等人每月从赌台所得“抽头”之巨，可想而知。

烟赌之外，杜月笙还与许多骇人听闻的生意有关。如贩卖人口，这是一项在旧上海获利颇丰的罪恶买卖。专贩男孩的，黑话叫“搬石头”，专贩女孩的，黑话叫“摘桑叶”。法租界人口贩子的总头目是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楨，此人是杜月笙的徒弟，手下有党羽一千多人。他们拐骗到手的女孩子大多卖给位于爱来格路（今柳林路）褚家桥一带，以及东新桥宝裕里、宝兴里等处的数十家二等妓院，俗称“么二堂子”。也有的卖给位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朱葆三路（今溪口路）到郑家木桥（今福建南路）一带的下等妓院，充当“咸水妹”，专供外国水手蹂躏。有一个叫陈鹤明的，温州人，也是杜月笙的徒弟。他倚仗杜月笙的势力，在国内勾结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以及法国、意大利邮船公司买办，在国外则串通葡萄牙、法国贩运人口的流氓及国民党政府驻葡、法公使馆人员，专门在浙江温州、青田一带，拐骗青年男女，用“贩黄鱼”的办法，即塞进邮船火轮里，运送出国。这些被拐骗的青年男女，男的大多擅长石刻，女的则缠小脚。这些人被贩至葡萄牙、法国之后，男的被逼用青田石代人刻图章或人像。女的更惨，被迫接受各种黄色动作训练后，到舞台上上去扭“小脚舞”。当时有些在法国的日本记者，专门出资拍摄中国小脚妇女在舞台上跳舞的照片，刊登杂志上，

以侮辱中国。

杜月笙等人通过经营上述罪恶买卖，大发横财。他们当然不会忘记“后台老板”的关照，除每月孝敬法国驻沪领事三十万元外，对领事馆及巡捕房的其他法国人也按月塞上几千元至十万元不等。法租界实际成了帝国主义与杜月笙等人联合安置在中国的抽血机，中国人民的血汗化作的金钱，经过这里，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的腰包。

衣锦还乡

杜月笙不文不武，非官非民，但他工于心计，善于钻营，多结交，广声气，上起“国府”总统，下至绿林强盗，他都有联系，有交情。凭借这张唯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才能编结起的关系网，杜月笙成为旧中国一个权势倾一时的人物。当时上海滩流传这样的说法：“杜先生闲话一句”，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事，只要杜月笙答应，总能办到。

“富贵而不归乡，犹如锦衣夜行。”这是旧中国发迹的达官贵人们几千年来奉行的信条。无论是当上皇帝的无赖，还是考中状元的举人，没有能免俗的。杜月笙也不例外。他十四岁那年狼狈离开老家高桥时，曾对他的外婆哭着说：“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家业，开祠堂，不然永远不再踏进这块血地！”现在他发迹了，成了名闻遐迩的闻人，当然要回乡炫耀一番，让父老兄弟看看，当年他这个被贱视的小瘪三，现在是何等气派！一九三一年，杜月笙在祖宅杜家花园附近，买了五十亩地，到各地聘请著名匠人，大兴土木，兴造起杜家祠堂来。同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询本支，并请人编修族谱。一九三一年初夏，杜氏祠堂竣工。杜月笙亲返乡，于六月八日至十日，举行所谓家祠落成典礼及栗主奉安之礼。这幕闹剧，集中反映了杜月笙在旧中国的特殊地位及显赫权势。

为了演好这出闹剧，杜月笙模仿北洋时代军阀元帅府下设八大处的组织形式，设了一个包括八大处的办事机构。该机构由虞洽卿、黄金荣、王晓籁任总理，张啸林、金廷荪、郭祖绳、蔡琴荪、胡詠莱、俞叶封、李应生任协理。

五月，杜公馆就开始出现络绎不绝的送礼人群，金银珠宝、古董玉玩、旗伞花篮、礼券现金，琳琅满目，不胜枚举。送礼者，或为示恩宠，或为巴结，或惧于权势，无所不有。达官贵人、社会名流赠送的匾、联、屏、幅更是摆满客厅，词典上的溢美之词，几乎被他们搜罗一空。

杜月笙出身寒微，祖上没有传下什么家谱，三代履历无从稽考，祠堂内无法一一设立牌位，只得做一道总神主，在六月九日由华格臬路杜公馆送往浦东高桥杜氏祠堂，称为奉主入祠。那天一大早，从华格臬路到李梅路恺自迳路，排满了达官贵人、社会名流赠送的锦旗、伞盖、匾额。九时整，奉主入祠的队伍起行。

前导队伍共分六截。第一截，由一排骑着高头大马的英国巡捕开路。其后，是一面青天白日旗。紧跟青天白日旗的是四、五十杆写有斗大“杜”字的旌旗。这些旌旗太大，每一面都要七、八人服侍，三、五人举着旗杆，二、三人拉住旗角，另有一个在旁高喊口令，以使举旗人步伐整齐，排列一致。

再后，是法租界巡捕房里的近百名安南（今越南）巡捕，各推一辆在当时还颇为稀罕的自行车护送。安南巡捕之后，是戴钢盔、穿长靴的中国巡捕矫揉造作地走着正步。黄金荣办的金荣小学的学生，则穿着童子军制服，举着军棍，敲打洋鼓，护送上海钱业公会送的旗伞牌亭。蒋介石所送“孝思不匮”匾额和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军法总监何键所送匾额，各由八人杠抬，前由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乐队和一排荷枪实弹的步兵开道，后由国民党陆军第五师军乐队和一连全副武装的步兵押阵，趾高气扬地招摇过市。第二截，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军乐队为前行，后由保安队员及铁华学校的童子军护送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张春甫、上海市市长张群、及外交部长王正廷所送匾额，和新江、天新、宁绍等轮船公司所送的伞亭。等三截，由国民党吴淞要塞司令部的军队、静安小学童子军护送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院长王宠惠所送匾额。第四截，由国民党陆军第五师军乐队、闸北和南市保卫团、宁波旅沪小学童子军护送原北洋军阀各派系重要头子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张宗昌等人所送的匾额。这些曾象乌眼鸡般你争我夺的“英雄好汉”，在为杜月笙捧场的行列中，却排列得井然有序，相安无事。第五截，以江湾救济会的西乐队为前导，护送国民党中央各院部头脑、各省主席及法国官员所送匾额。第六截，由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军乐队开道，护送各团体及私人所送旗伞花篮。

六截队伍之后，便是护卫所谓神主轿亭的仪仗队。轿亭前是一块巨大匾额，上书蒋介石所颁祝辞：

诗咏祀事，典备蒸尝，水源木本，礼意綦祥。
敬宗收族，德在不忘，激彼衿秉，俗兹彝常。
元凯之家，清芬世守，孝孙有庆，服先食旧。
任侠好义，声驰遐迩，济众博施，号为杜母。
肯堂肯构，实大其宗，爰建新祠，轮奂有容。
簋簠既饬，锵济攸从，式瞻枚实，介福弥隆。

仪仗队成员金甲金盔，手执刀矛，一式古装打扮。杜月笙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率领几个儿子，在古装武士的簇拥之下，手扶轿杠，左顾右盼，缓步而行。

最后，是大批伴送的亲朋好友。全部队伍约有五千人之数，形成一股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人流，绵延数十里，在震耳的鼓乐声中，向金利源码头滚动而去。

金利源码头早已由杜月笙的徒子徒孙们搭好儿座迎宾牌楼，彩旗飞舞，锣鼓喧天。码头外排列着一百多艘渡船，桅顶上一律插有一面红底白字的“杜”字旗。奉主入祠队伍抵达后，依次登上渡船，成一字长蛇阵，缓缓驶向高桥。船上的中西乐队，或击洋鼓，或吹锁呐，咚锵叭嚓、呜哩哇啦，吸引了大批居民涌来观望。

杜月笙的娘舅朱扬声率杜家亲属在高桥码头列队相迎。奉主入祠队伍登岸后，杜月笙与长子杜维藩捧着神主牌位，钻进汽车，先行驰向杜氏家祠，其余队伍，仍旧摆开架势，百般招摇地向杜氏家祠步行而去。

为了接送去杜氏家祠的宾客，杜月笙在高桥码头备下十五辆奥司汀汽车和一百五十辆黄包车，但仍远远不够用。不少太太、小姐只得雇当地农民的独轮小车，推送而去。一时间里，由高桥码头到杜氏家祠的八里路上，小汽车、黄包车、独轮小车，你追我赶，川流不息。汽车喇叭的刺耳鸣声，黄包

车夫沉重的脚步声，独轮小车吱吱扭扭的转动声，使安静的乡间陷入一片喧嚣之中，仅六月九日一天，到高桥镇的宾客便达数万人。

六月十日，在杜氏家祠举行所谓栗主奉安典礼。杜氏家祠占地五十亩，祠堂为五开间门面，前后三进；第一进为桥马厅，二进是大厅，三进就是栗主奉安之所，亦称殓堂。那天清晨五时一刻，鞭炮齐鸣，锣鼓震响，杜月笙在万众注目之下，诚惶诚恐地捧着用栗木做的神主牌位，安置进神龛。牌位为何要用栗木作？

《公羊传》有说：“虞主用桑，练主用栗。”虞主，即人死落葬，在家里或祠堂中设祭所用牌位。此牌位用桑木作，因为“桑”之谐意为“丧”。练主，即丧期过后，经常奉祀所用牌位。此牌位用栗木作，因为“栗”宁可解释为战栗，表示后辈对祖先的恭敬态度。杜月笙胸无点墨，但附庸风雅，却不遗余力。

神主放进神龛之后，杜月笙率妻儿老小，跪拜磕头，进行家祭。接着，国民党中央委员、政府参军杨虎，受蒋介石委托，向杜月笙表示“庆贺之忱”。其后，便由执事人员宣读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的贺电。再后，到场的亲友好，依次向杜氏祖宗牌位行礼。其中有吴铁城、宋子良等人。至此，栗主奉安典礼宣告结束。

栗主奉安典礼之后，高桥镇上接连唱了几天戏。当时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名角，不分生、旦、净、丑，几乎被悉数请到。高桥镇临时搭起的剧场，因此出现人满之患。上海《新闻报》曾以《人气白热》为标题，报道其拥挤状况：“剧场广可容数千人，但观者近万，几无插足地，加以天热场低，四周密不通风，观众挥扇观剧，莫不汗流浹背，至场内空气，异常混浊，‘人气白热化’五字形容，最为恰当。台上由张啸林、王晓籁两君维持秩序，率亦无法驱散台上观众。入晚，客复陆续而来，跋涉十余里，畏难而退者，日必数千人。贵宾席中占有位置者虽极视听之乐，但兀坐通宵，呼吸急促，一身不能转侧，大有欲罢不能之势，诚有说不出之痛苦也。”

如此喧闹数天，连修建祠堂在内，杜月笙耗资百万元，但他收到的礼金数额也令人咋舌。杜月笙用穷苦百姓的血汗，扎足台型，撑足了面子。

五 跻身金融工商界

中汇银行开张

杜月笙在上海滩混得越来越红，但就象孙猴子极尽七十二变，总有尾巴一样，人们始终未忘记杜月笙是“白相人”出身。他的生财之道，如贩烟土、设赌局，都是上不得台面的黑道勾当。因此，杜月笙一方面以能与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交往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也不无烦恼。他曾私下对一些心腹说：“伊拉（上海方言，指他们。这里指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们）拿我当夜壶，用好就赶快塞到床底下。”意思说那些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与他交往，仅仅是为了利用他，实际上并不把他视为上流社会中人。因此，杜月笙极力想开辟“正当”的经济来源，并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就在这时，钱新之建议他开银行。钱新之，字永铭，浙江吴兴人。张謇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曾担任过交通银行总经理。蒋介石政权建立后，曾出任过财政部次长，浙江省财政厅长。因留学法国，与法国上层人物有联系，被蒋介石任命为驻法公使，但没有到任。当时，钱新之正担任北四行——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储蓄会经理，及四行准备库主任，是上海金融巨头之一，也是南北金融势力沟通者。钱新之劝告杜月笙，经营烟、赌生意，获利虽厚，但毕竟不是正路，要作长期打算，就应向金融工商界投资。此话正中杜月笙下怀。

杜月笙把苏嘉善、田鸿年找来商议。苏嘉善算盘极精，善于经营，是杜月笙得力的经济顾问。田鸿年，是杜月笙的跑街先生，杜与各银行的业务往来，头寸调转，由他负责。两人听杜月笙说明心意后，极力主张开一家银行。田鸿年认为：开银行，吸收客户存款，非但可为杜月笙调转头寸提供方便，而且还可以将存款转放出去，获取利息，或利用存款做生意，赚得利润。据他估计，如果开一家资本定额为五十万元的银行，收足二十五万元，银行便可开张。苏嘉善则为杜月笙分析了银行开张后的存户情况，他认为有两笔款项是有把握吸收进来的，一笔是“堆花”。所谓“堆花”即当时上海银行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逢到新开张的银行，原有各银行要在其开业的那天存一笔钱进去，这笔钱便叫“堆花”。就杜月笙的势力言，各银行不敢不来“堆花”，而且“堆花”数额不会少。另一笔是做烟、赌生意者的存款。上海滩上，凡开烟土行、赌场的，大多仰承杜月笙鼻息，杜开银行，他们必要来捧场。除了苏嘉善算的这笔账外，杜月笙心中还有一本账，他知道上海的不少金融巨头、富商大贾，都以他为高级“保镖”，逢到桃色纠纷、家族内江或流氓敲诈，往往要请他排难解纷。例如大英银行买办徐懋棠，其父徐庆云死后，留下二千数百万元的遗产，徐庆云的小老婆要求与徐懋棠分割财产，结果由杜月笙等出面，以调解为名，对徐庆云的小老婆连威胁带劝诱，仅分给她五十万元便算了事。这些人欠了杜月笙的“人情”债，当然非还不可。因此，对银行的资本来源，杜月笙自感不愁。当下，杜月笙便与苏嘉善、田鸿年商定筹办一家银行，起名“中汇”，由杜自任董事长，田鸿年当经理，定于一九二九年正式开张。

果不出杜月笙等人所料，听说杜创办中汇银行，上海滩两名豪富，一个是徐懋棠，另一个时任通江信托银行经理的朱如山，便应杜月笙之请，向中汇银行投资，成为中汇银行股东。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葛格林，也将他在上海

多年搜刮得的中国人民的膏血，作为存款，送入中汇银行。再加上赌台的大量游资可以用作周转；杜月笙又敢作其他银行不敢作的鸦片押款；而且凭着杜月笙的“通天”关系，中汇银行一经成立，即可向国民党中央银行领用钞票，当时凡能向国民党中央银行领用钞票的银行，都可有一笔补贴。所以，中汇银行成立不久，在当时的金融行业中便小有名气。一九三三年银行业的《中国征信报告书》记载对中汇银行的调查结论，说：该行“营业虽不甚发达，民国二十年更被田经理舞弊，亏空甚巨，但去年除官利外，尚获纯利十九万余元”。一九三四年，中汇银行还投资一百五十六万元，兴建了规模宏伟的银行大厦。

通过开办中汇银行，杜月笙终于在金融业插进一脚。但其志不仅在此。当时，上海的金融业呈现一种畸形繁荣。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开办的银行有英国的汇丰、渣打，美国的花旗，法国的汇理，日本的正金等。官僚资本控制的所谓国家银行，则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还有号称“北四行”的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号称“小四行”的国货、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号称“南三行”的浙江实业、上海商业、浙江兴业等银行。此外，尚有数百家民族资本经营的小银行。杜月笙的目标是扩张势力，寻找机会打入并控制上海市银行公会，以在金融界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他着力拉拢若干实力比较雄厚的金融界人士，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量。

笼络金融界人士

徐新六是当时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曾留学英美，专攻经济，获得过博士学位。由于他精明能干，善于经营，浙江兴业银行在他的手中得到很大发展。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法币政策”，乘机以官股打入并控制各重要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却挺住了，未让官股取得控制地位，成为当时寥寥无几的以商股为主的银行之一。金融界人士因此对徐新六更加另眼相看。为了扩大在金融界的影响，杜月笙处心积虑地接近徐新六。经过一段时期的了解，他掌握了徐新六私生活的秘密，决定以此诱徐新六就范。原来徐新六颇重名誉，讲究“绅士风度”，极力给人一种洁身自好、彬彬有礼的印象，在上海滩素以私生活严谨而著名，金融界因此称其为“圣人”。但孰知“圣人”仅在外表，骨子里同样风流，徐新六早已秘密有了偏房，且生有两男一女。这件事，徐新六掩藏得很严实，专门为他的偏房在外修造了房子，家中太太及周围的亲友好，一无所知。可是看着偏房所生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徐新六的烦恼也与日俱增，他担心自己一旦去世，偏房和在秘密状态下生的孩子得不到社会承认，无法分享他的财产。因此想找一位有势力的人物，在他死后，能出面为他的偏房及孩子作证，从而使她们能取得他的一部分财产。

杜月笙是无孔不入的，徐新六的心思当然瞒不过他。有一年夏天，徐新六上莫干山避暑，杜月笙也寻踪而去。当晨风习习之时，或晚霞烂漫之际，杜月笙总陪着徐新六散步，幽幽空谷、飒飒林涛，更唤起徐新六百般柔肠，千种情思。杜月笙的娓娓劝慰和慷慨承诺，使徐新六感觉碰到了肝胆相照之人，便把自以为掩藏得严实的秘密对杜月笙倾吐了，并就此事写下一封亲笔函件，交杜月笙保存。杜月笙花这么多时间去陪伴徐新六，想掏出的正是这段话，当下便信誓旦旦地表示：徐新六健在，他为徐新六保密；徐新六万一

遇上不测，他一定出面为其偏房及她所生的孩子作证。徐新六一方面感恩不尽，同时也明白他的把柄落入了杜月笙之手。以后，杜月笙在金融界有所要求，徐新六当然只能尽力相助。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是杜月笙有意笼络的又一金融界之士。

一九三一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碰到一次严重的挤兑风潮。这次挤兑风潮的起因，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所做一票食盐生意亏本一、二百万元，外间纷传损失好几千万元。存户闻讯，担心银行倒闭，纷纷前去挤兑，仅三天，便提去存款额的一半，而前来挤兑的人群却有增无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急得直冒冷汗。这时，有人劝他去找杜月笙想想办法。陈光甫便请同乡杨管北与杜月笙联系。杨管北祖上为镇江豪富，他本人是大生纱厂一厂董事，三厂常董，在大达轮船公司和南通地产都有股份，是杜月笙的重要经济顾问。杨管北受托找到杜月笙。对陈光甫在经济上面临麻烦的事，杜月笙早有风闻，他看准了这又是他在金融界扩张势力、一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一口答应帮助陈光甫摆脱困境。

杜月笙首先命总管万墨林将上海滩与他关系最密切的生意人，即烟馆、赌场的老板，一一请到杜公馆，要求他们帮忙。这些靠贩毒、赌博抽头养得脑满肠肥的人物，很快凑足二百万元现款，答应第二天早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开门，便存放进去。之后，杜月笙又让中汇银行凑齐一百万元现款，准备第二天早晨由他亲自带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他的户名存放进去。

如此安排，杜月笙犹嫌不足，又要万墨林通知与他素有来往的工商界人士，第二天早晨八时半到杜公馆来。届时，杜月笙一副仗义执言的面孔，劝告那些恭恭敬敬坐在客厅里的工商界人士不要听信谣言，应该给陈光甫捧捧场。捧场办法有二：一是停止挤兑；二是向商业储蓄银行存款。并郑重宣布，他即刻就去商业储蓄银行存款一百万元。那些工商界人士不管心里如何想，嘴里都诺诺连声。他们为何对杜月笙如此服帖呢？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之一，就是怕流氓捣乱。当时上海流行绑票，报纸上三天两头介绍绑票案件，尤其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撕票”情况。从事绑票的流氓、土匪，大多与杜月笙有直接、间接联系。富人们要保无虞，必须给杜月笙烧香，当然更不敢得罪他了。

安排停当之后，杜月笙带着随从，跳上豪华汽车，风风火火地驶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银行门口，大批存户正排成一字长蛇阵等候取款。杜月笙故意让汽车开至这支队伍前面停下，然后带领几个手提钱包的随从，大摇大摆地沿着队伍缓缓走过。队伍中不少人是认识杜月笙的，见他一早到来，均感好奇，伸长脖颈注视着他进入银行。不一会儿，银行职员喜形于色奔出大门，告知等候提款的客户：“杜先生存进一百万元。”上海滩的人谁不知道杜月笙“门槛”极精，他是决不会作蚀本生意的，如今见他将一百万元存入商业储蓄银行，可见该行是不会倒闭的。于是，那些等候提款的人，不一会儿便散去一大半。即便有少数人还想提款，

因惧怕杜月笙手下的流氓寻衅，也被迫离开。

陈光甫燃眉之急得解，对杜月笙当然感恩不尽。以后，中汇银行新建大厦落成，营业规模扩大，陈光甫立刻以“堆花”方式，将五十万两白银存入中汇银行，让杜月笙白用一年，利息分文不取。

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也在杜月笙的笼络之列。

国华银行是唐寿民私人所办的一家银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抗战时，上

海及全国的爱国民众同心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不少小学生省下点心钱，一些年逾古稀的老人把棺材本也献了出来，十九路军因此收到大批捐款。以后由于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被迫转移，临行时，将用余的捐款存入了国华银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被蒋介石调至福建进攻中央苏区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表示愿意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反蒋。蒋介石闻知此事。暴跳如雷，一方面调兵遣将前去镇压，同时授意党羽，在上海等地召开所谓“民众集会”，“声讨”十九路军。

唐寿民是宋子文系统的人，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早有人对他依仗宋子文权势大肆渔利不满，这时便准备利用国华银行有十九路军存款之事，在“民众集会”上提出没收国华银行股本，勒令国华银行停业的议案，以整唐寿民一下。

唐寿民闻讯后，六神无主，找时任交通银行常务董事的钱新之设法。钱新之知道当时的上海滩搞所谓“民众集会”，是少不了杜月笙这条地头蛇的，便代唐寿民请杜月笙通融。杜月笙与杨管北商议，杨认为杜自己正在办金融事业，而唐寿民、钱新之是宋子文手下的干将，又是金融界的“大亨”，与他们建立密切联系，对杜有利，主张帮其忙。

主意拿定之后，杜月笙便请来了与此事有关的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新闻报》编辑唐世昌及陆京士。前者与杜月笙交往密切，后两人则是杜月笙的门生。三人到后，杜月笙将用意说明，吴醒亚立刻一拍大腿说：“晚了！”因为那个“民众集会”，由社会局官员操纵，已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开过，并通过十条议案，其中即包括没收国华银行股本、勒令国华银行停业的一条。唐世昌、陆京士也认为此事无法挽回，主张让唐寿民自己去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求情。杜月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十条议案可以变成九条。如何变？在新闻报道上做文章。因为“民众集会”虽已开过，但各报社和通讯社尚未发新闻，只要在发新闻时，统一口径，将针对国华银行的那条议案删去，唐寿民便可保无事。

那些想借机整唐寿民的人，见杜月笙态度明朗，他们又不愿公开和以宋子文为后台的唐寿民作对，只能同意按杜月笙的方法行事。于是，由这批人操纵“民众集会”制造出来的十条议案，又由这批人命令各报在发新闻时删去一条，而改为九条。唐寿民因此免去不少麻烦，同时也领教了杜月笙操纵“民意”和“舆论”的手段，以后对杜月笙当然格外陪着小心。

仗官欺商

三十年代时，以孔祥熙为后台的“七星公司”，曾在上海大作投机生意。因其情报准确、资金雄厚，在上海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很捞到一点好处。对这种利用特权获取暴利的作法，屁族资本极为反感，市面上一时沸沸扬扬，颇多非难。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上海一部分商人达成默契，共同对付“七星公司”。

“七星公司”自恃财力雄厚，有一次企图造成黄金价格看跌的趋势，逼上海黄金持有者大量抛出黄金，然后由他们吃进。为此，他们在金交易所不停地抛空，黄金价格每日看跌。但上海经营黄金生意的商人，却串通一气，看着黄金价格惨跌，就是不肯抛售手中黄金，遇上适宜的机会，还吃进一些

“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七星公司”未料他们影响市场行情的法宝，此次竟不能奏效，但空头已做太多，老本大蚀，结果轮到上海商人向他们讨债。孔祥熙虽为“七星公司”后台，但投机生意失败，由他出面公开赖帐，却也不便，于是授意杜月笙干预。

杜月笙出面，将这次黄金交易中成为债主的诸多商人找了去，不无威胁地说：“这次生意，朋友走油跑马，我不会看冷铺，账不管有多少，统统送过来，我准备倾家荡产代赔。”那些久在上海滩浮沉的商人们，当然懂得杜月笙这番话包含的真实意思，只得强作笑颜说道：“笑话，别人掉了枪花，倒要叫杜先生倾家荡产赔出来，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照杜先生牌头，账一笔勾销。”

到手的钱被硬挖了去，未免肉疼。更令这些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们心悸的是，这次黄金交易所的抛空风潮，虽然以他们险胜而平安渡过，但“七星公司”如卷土重来，做更大的投机买卖，

他们将很难抵御。出于这种顾虑，他们想了一个所谓妙计，即推举杜月笙担任金业交易所理事长，以为看他的面子，孔氏家族会略作收敛，其实，这只是一种幻想而已。但这种想法正合杜月笙心意。杜月笙插手这次风潮，就是为了向当事者双方显示他的实力，一方面抬高自己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炫耀与四大家族的特殊关系，以吓唬上海滩的商人。此举果然奏效，“杜月笙”三个字前面，从此增加了“金业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

金业交易所之外。杜月笙还通过帮助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等控制中国通商银行后，谋取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职位。

中国通商银行由盛宣怀创办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它所登的广告中必定有这样一句话：“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死后，该行由以后投降日本侵略者、曾任伪上海市长的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宋子文、孔祥熙早想染指该行，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为他们提供了良机。

“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一九三六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正流通市面的纸币，逐渐以这四行发行的钞票换回，停止使用。为了防止各银行滥印钞票调换“法币”，在“法币政策”公布前，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十二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其中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额为三千四百三十万元。掌握了这种情况后，中央、中国、交通行秘密集中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突然前去该行兑现。因事出意外，加上傅筱庵见上海地价暴涨，正在河南路（今河南中路）耗资一千万元建一座“中国通商大厦”，头寸吃紧，未免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兑现要求。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合规定”，以维持金融为名，提出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想全面控制中国通

黑话，意指失财。

黑话，意指不会袖手旁观。

意指耍花招。

意指面子。

商银行。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国民党政府抓住他与北洋军阀有过来往的辫子，加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傅筱庵惶恐之下，只身逃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大连躲藏。

傅筱庵一走，中国通商银行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它若破产倒闭，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宋子文、孔祥熙意在控制该行，并不想让它倒闭。但傅筱庵被官方整怕，况国民党政府已公开发出通缉令，不便出面请傅筱庵回沪，此事便交给杜月笙办。

杜月笙乐得作好人，当即托人带信给傅筱庵，要他回沪把中国通商银行的帐目算清，声称天塌下来，有杜某人顶着。傅筱庵仓惶出逃，本是权宜之计，见杜月笙出面作保，决定顺水推舟，返回上海。他对带信人说：“杜先生铁肩担道义，真非常人也。我决定回上海，刀山鼎镬，在所不辞。”一方面表示自己是为顾全杜月笙的面子才回沪的；另一方面借着吹捧杜月笙，强调杜必须对他的身家性命负责。词美意深，可谓老奸巨滑。

傅筱庵回沪后，七拼八凑，又将投资千万、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作价三百多万元拍卖，才勉强还清债务。遭此打击，

中国通商银行气息奄奄，欲振乏力。孔祥熙、宋子文等感到火候已到，便授意杜月笙出面代中国通商银行要求中央银行支持。之后，中央银行使以“救济”为名，把大量“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并将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顾治谷调去中国通商银行任总经理。为了掩盖官僚资本在金融界扩张势力的真相，杜月笙被指定为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和官方代表。杜月笙担任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在金融界的地位当然更非昔日可比。

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殊关系，杜月笙还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的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虽然银行公会理事长的头衔未归于他，但他在金融界终于也成为能兴风作浪的人物了。

打入面粉业

如果说杜月笙插手金融业，是以建立中汇银行为开端；那么，盘得华丰面粉厂，则是他跻身工商界的标志。

华丰面粉厂设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上，老板为卢少棠。三十年代时，卢少棠因在赌场上惨败，背上数十万元的债务，无奈之下，产生了卖掉华丰面粉厂的念头，开设面粉厂在当时是很赚钱的，杜月笙得知卢少棠的想法后，立刻叫他的重要经济顾问杨管北设法将华丰面粉厂搞到手。杨管北找到华丰面粉厂一位与他熟悉的陈经理，证实卢少棠确有卖厂之意，同时了解到已有人抢先一步在接洽买厂事宜。杨管北闻讯，心急如火，要求这位陈经理设法将这桩生意让给杜月笙，经他软硬兼施的努力，卢少棠被迫答应以一百零九万元的低价，将华丰面粉厂卖给杜月笙。

价格谈妥后，杨管北按杜月笙授意去找傅筱庵。傅筱庵当时刚从大连避难回来，为处理中国通商银行的债务及与孔祥熙等人的矛盾，正有求于杜月笙。杨管北见到傅筱庵后，告诉他：“卢少棠准备卖出华丰面粉厂，因债务所迫，价格定得相当低，只需一百零九万大洋。”虚情假意地劝傅筱庵买下。其实，卢少棠要卖出、杜月笙想盘进华丰面粉厂的消息，在当时已非新闻，以傅筱庵的地位和关系不可能不知此事，他见杨管北突出此语，当然能听出其弦外之音，连忙摇动双手说：“不，不，我不买，应帮杜先生买下来。”

杨管北闻言，心中暗自高兴，嘴巴上却仍然甜丝丝他说：“还是傅先生买下来妥当。”傅筱庵干脆进一步点明：“不、不，还是由杜先生买下来，交给你来管理。这样最好不过了。”话说到这一地步，杨管北开始收了，他面露难色地将话锋一转：“不过……”傅筱庵不得不接过话头，连忙说：“钱没有问题，中国通商银行可以借给低息贷款。”杨管北东拉西扯，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得到了他想得到的这句话。就这样，杜月笙不用拔一根汗毛，华丰面粉厂便稳稳当当落入他的手中。

华丰面粉厂到手不久，杜月笙那干瘪但却包藏着无穷欲望的肚腹，又开始了新的算计。他的双眼盯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位置。因为取得这个位置，可以左右上海，乃至江南、江北数省的面粉生意。当时执上海面粉业牛耳的是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著名实业家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荣家兄弟是无锡人，早年在上海当学徒，积攒一定资金后，开设了广生钱庄。还在光绪年间，荣家兄弟便投资面粉业，在上海开设“茂新”面粉厂，创出了深受欢迎的“兵船牌”面粉。以后又接连开设了茂新二厂、三厂，直至十厂。“茂新”之外，又设“福新”厂号，也是一厂、二厂，直至十厂。杜月笙以区区一厂之力，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当然不可能胜过荣家兄弟。但他有国民党权贵撑腰，有黑社会捧场，有玩弄阴谋权术的超人本领，凭借这些，杜月笙刚刚打入面粉业，便急不可耐地要与荣家兄弟一决雌雄。

杜月笙首先出高价将王禹卿及“兵船牌”商标从荣家兄弟手中挖来。王禹卿绰号“面粉二王”，多年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十家面粉厂，在面粉行业中，素以精明干练、经营有方著称。此外，杜还聘来了大同面粉厂总经理卞筱卿，让这两人与杨管北同任华丰面粉厂常务董事，负责全厂业务，以加强华丰面粉厂的竞争能力。

同时，杜月笙想方设法拉拢面粉行业中与荣家兄弟有矛盾的商人，以孤立荣家，扩大自己的力量。当年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活动的生意人，分属于两个面粉业公会：“上海面粉业公会”、

“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荣家兄弟的影响主要在“上海面粉业公会”，而杨管北因祖上在扬州、高邮等处开有面粉厂，因而与“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关系密切。这两个公会所代表的势力，围绕价格及市场分配等问题，长期以来明争暗斗，角逐激烈。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实行“裁厘加税”政策后，这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厘即厘金，是旧中国政府在交通要道设关卡，对运销商品征收的一种捐税，一八五三年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由帮办扬州军务雷以诚首先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对苏浙皖地区的面粉业商人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用于加工面粉的小麦，基本在当地采购，不需长途贩运，很少厘金负担，只有把面粉运到上海的途中才需交纳厘金。所以，“裁厘”未使他们减轻多少负担，“加税”却使他们增加很大支出。而上海的面粉业商人要到外地采购小麦，途长路遥，支付的厘金数额大大超过苏浙皖三省面粉商人，因此，“裁厘”使他们得益不少。苏浙皖等地的面粉商人，本来就因运费等问题，在竞争上处于劣势，“裁厘加税”政策实行后，他们的境况更糟。杜月笙看准这是笼络人心的好机会，亲自跑到“苏浙皖三省面粉同业公会”去活动，促三省面粉业商人写了一个“呈文”，一方面表示拥护“裁厘加税”，同时要求考虑三省面粉业商人的损失，所征税收应比上海面粉业商人少百分之五十。这一“呈文”经国民党政府江苏省财政厅送到了行政院财政部和实业部，后经宋子文、孔祥熙批准，

江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四十，江北面粉商人上交之税减少百分之五十。杜月笙因此获得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商人的好感。经杜月笙授意，这部分商人和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一些上海面粉商人暗中收购上海面粉交易所股票，在取得拥有发言权的数额后，立刻要求召开上海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担任上海面粉交易所常务理事的荣宗敬和与他关系密切的理事长王一亭，对杜月笙秘密进行的拉票活动，一无所知，在股东大会上受到猛烈抨击，被迫同意改选理事。选举结果，杜月笙名列榜首，志得意满地取王一亭而代之，坐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交椅，杨管北则随之成为常务理事，在面粉业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接收大达轮船公司

在打入面粉业的同一时期，杜月笙的手还伸向了航运业。

张謇曾是清末状元，又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大达轮船公司是他创办的一家著名民营轮船公司。一九〇四年六月，张謇在上海高桥租下南市十六铺一带大量沿岸土地，建设仓库、码头，成立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八月，又在南通天生港设置码头和仓库，成立天生港轮步公司。之后，又自国外买进两艘客货两用轮船，合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及天生港轮步公司为大达轮船公司。该公司的轮船班次，当时被称为沪扬班，专跑上海经南通天生港至扬州霍家桥一线，曾独占此航线二十四年。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张謇病逝。不久，大达轮船公司经理鲍心斋也辞世而去。创始人的相继故去，给该公司经营上带来一定混乱。不巧的是，以后又连逢两场灾难，其一是大达轮船公司存有巨款的德记钱庄破产，大达轮船公司因此损失好几十万。其二是大达轮船公司所属“大生”、“大吉”号轮船先后失火烧毁，船上旅客死伤众多，货物损失严重，都要大达轮船公司负责赔偿。这两场灾难使大达轮船公司负债累累。这时，原由大达轮船公司独占的航线之上，又出现了竞争对手——大通轮船公司。该公司以上海滩的洪门大哥杨在田为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陆费伯鸿为总经理，靠山不弱，实力颇强。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大达轮船公司，受此劲敌逼迫，更是步履维艰，濒临倒闭。

这为杜月笙提供了可乘之机。大达轮船公司的主要债权人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务部经理赵汉生是大达轮船公司的常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为解除发生于本行的一次挤兑风潮，曾求助于杜月笙。杜月笙通过这两人在大达轮船公司董事会内活动，扬言要挽救大达轮船公司，非请杜月笙出任董事长，杨管北出任经理不可。这一说法受到张謇当年主要助手吴寄尘抵制，他以杨管北年纪太轻、少不更事为理由，反对杨管北出任经理。吴寄尘的主张虽未明确反对杜月笙出任董事长，但对杜月笙控制大达轮船公司的企图，实际是一种打击。因杜月笙本人并不懂航运业务，且和大达轮船公司及与大达轮船公司休戚相关的南通实业界素无渊源，而杨管北祖上为镇江豪富，在南通实业界投资颇多，大达轮船公司也有他的股份，且精明强干、擅长管理，杜月笙拉杨出任大达轮船公司经理，目的正在于利用他的关系、财力和能力控制大达轮船公司。

为劝吴寄尘改变态度，杜月笙找来杨志雄商议。杨志雄曾是张謇创办的吴淞商船学校学生，后又任该校校长，与张謇及其周围的人物关系密切。杨志雄认为可以通过两条渠道作吴寄尘工作，一条是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当时

正在汉口任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另一条是吴寄尘的侄子吴蕴斋，是金城银行经理。经杜月笙同意后，杨志雄便四出活动，利用吴寄尘不愿看到大达轮船公司垮台的心理，通过有关渠道，再三再四地向吴寄尘表明，杜月笙主张以杨管北为大达轮船公司经理，目的完全在于挽救该公司。不知是此话打动了吴寄尘，还是吴寄尘惧怕杜月笙手下那些凶神恶煞的流氓，他终于作了让步，在其侄子吴蕴斋的陪同下，亲赴杨志雄任职的西门子洋行，表示同意杨管北出任大达轮船公司副经理，而以张孝若为经理。

杨管北上任后，除将许多亲朋友好在大达轮船公司的股份搜罗到手，又替杜月笙以最低价格买进大量股票，还将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杨志雄和胡筠庵拉进董事会任常务董事，从而掌握了大达轮船公司的主要股票权。杨管北名为副经理，但在杜月笙等人支持下，实际上行使经理职权。大达轮船公司终于落入杜月笙等人之手。

杜月笙等人乘大达轮船公司之危，控制了该公司，若不使该公司摆脱困境，未免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增强大达轮船公司的竞争能力。

杜月笙等人首先着手疏通与苏北盗匪的关系，让他们对大达轮船公司的轮船手下留情，网开一面，以扩大大达轮船公司的生意之途。当时的苏北，由于军阀征调，地主盘剥，加之淮河经常闹灾，人民无以为生，不少人被迫为匪。这些土匪大多属于清帮系统。据说当年陈调元被任命为淮海镇守使，因惧盗匪势大，居然不敢单独去苏北，特地至上海邀一位清帮“大”字辈的人物，护送上任。

杜月笙加入清帮时，虽然仅属“悟”字辈。但当时上海滩黑社会的重心，已从过去清帮、洪门等旧式帮会组织的老头子身上，转移到杜月笙这样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权贵为靠山的新式流氓身上，因此清帮内辈份比杜月笙高的人转而向杜月笙递门生帖子的，屡见不鲜。杜月笙知道当时蛰居上海的清帮“大”字辈、人称高老太爷的高士奎，与苏北盗匪过往甚密。便托人约他至杜公馆议事。高士奎非但准时而至，且在清帮内高出杜月笙两辈的身份，口口声声称杜月笙为杜先生。杜月笙略为寒暄之后转入正题，说要奉送高士奎“路费”三千元，请高士奎到洪泽湖跑一趟。原来这洪泽湖位于苏皖边境，地处要冲，湖内芦苇丛生，烟波浩森，是苏北一带重要的上匪巢穴。高士奎老家便在洪泽湖附近的杨庄。洪泽湖深处有个上匪头子吴老么，在清帮内属“悟”字辈，素奉高士奎为老头子。杜月笙要高士奎去洪泽湖跑一趟，就是要他去找吴老么打声招呼，让吴老么命手下喽罗不许拦抢大达轮船公司的船。高士奎在苏北土匪中虽有很大影响，但年近老迈、已不能过飘泊无踪的游码头生活。他要到上海长期安居，就不能不买杜月笙的帐。因此，高士奎不久便回到杨庄老家，在那里召来吴老么，向他转达了杜月笙的要求。碍着高士奎的面子，加之苏北土匪销赃、贩毒、买武器，乃至花天酒地的享乐，都离不开上海，当然不敢拂逆杜月笙之意。吴老么胸脯一拍，回复高士奎说：“大达公司的船只管来，他们船上要是少了一颗麦，统统由我负责。”

高士奎回到上海，将此情况告知杜月笙。于是杨管北便着手筹备大达轮船公司的分支机构：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达通小火轮公司，专在皖北、苏北一带，从事货运。吴老么保证大达轮船公司轮船的安全，当然不会不得好处，杨管北在皖北、苏北各地所设与航运有关的办事机构，大多聘用清帮中人担任经理，这些人不懂航运、不干实事，挂名而已，每月坐拿大洋二百元。

依靠这些人的保护，险象环生的苏北航线，对大达轮船公司却成为一条通行无阻的水道。

此外，杜月笙利用他在金融界取得的地位和建立的关系，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交通银行筹得资金三千万元，专做苏北货物押汇。同时创设大兴贸易公司，代苏北地区的商人在上海采买货物。为了招徕顾客，他们规定委托该公司采买货物的商人，只要预付百分之三十的货款，另外百分之七十的货款，可由大兴公司垫付。货物办妥之后，交大达轮船公司运输，取到提单，即去当地银行，连运输费一齐做押汇。这样，大达轮船公司一共可赚得运费、代办费、利息差额三种好处。

经此苦心经营，大达轮船公司的赢利扶摇直上。相比之下，大通轮船公司日见逊色，虽然几次将运费跌价，拚力相争，但终因大达轮船公司财路广开，资金雄厚，加之有土匪暗中相助，而败下阵来。无奈之下，大通轮船公司派出代表找杜月笙谈判，要求停止跌价竞争，寻找双方能够接受的利润分配方法。杜月笙长袖一拂说：“大达的事情是杨管北在管，请去和他商量。”大通公司的代表只得去找杨管北。杨管北早已和杜月笙商订方案，便道：“大通公司既然不愿竞争，我们何不联营！”大通公司的代表未料杨管北提此方案，不知其葫芦中卖的什么药，只得硬着头皮问：“如果联营，双方各占怎样的比例？”杨管北成竹在胸他说：“找个会计师，查清大达、大通过去三年的账，以两家公司各自的总营业额为准，决定比例。”大通公司找不出摆脱困境的更好办法，只好同意杨管北的方案。后经会计师查账，双方多次讨价还价，终于将大达轮船公司与大通轮船公司的航运业务和赢利比例定为十一比九，大通轮船公司被迫居于劣势。

制眼了大通轮船公司后，大达轮船公司的赢利更逐日递增。一九三三年，又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贷得白银六十万两，造成一艘可载旅客二千余人的“大达”轮船，生意极为兴隆，加强了杜月笙在航运业的地位。不久，当虞洽卿因连任二届上海船联会理事长而必须改选时，杜月笙便以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如愿以偿地获取了这一工商界的重要头衔。

争纱布交易

上海的棉纱交易市场，也是杜月笙想加以控制的行业。早在一九二八年，杜月笙已开始做棉纱生意。随着他在工商金融界势力的膨胀，这票生意越作越大。但他不满足，希望能坐上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的交椅，那时他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大作投机买卖。他等待着，终于找到了机会。

一次，他和张啸林在纱布交易所大作空头，但交易所的股票行情却一反常态，在一个多星期内不断看涨。如此下去，作空头者必亏损无数，作多头者将大发其财。当时在上海经营棉纱生意的，多数是江苏南通、海门一带人，棉纱行业中称为通海帮。有一个叫顾永园的，是通海帮中人，他也在作空头，因蚀得厉害，千方百计打听到了这次纱布交易由交易所中某几个理事操纵，方才出现了不断看涨的反常情况。便通过陆冲鹏将这一情况告知杜月笙、张啸林。张啸林正在为蚀本烦恼，得知此情，大发雷霆。叫嚷要发三、五十杆手枪出去，砸烂纱布交易所。杜月笙却计不出此，他要借此机会狠狠教训一下纱布交易所那帮人，同时乘机将这个交易所抓到自己手中。

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第二天纱布交易所内便上演了一出无赖闹堂的丑

剧。那天上午，在位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北的上海纱布交易所门口，出现了几十个凶相毕露的人，身穿短打，歪戴鸭舌帽，腰间令人注目地鼓起一块。交易所门一开，早已等候在外的顾永园，在上述人物的簇拥之下，怒气冲冲地闯了进去。当交易所伙计准备宣布开拍时，站在人丛中的顾永园突然发难，他捶胸顿足，声嘶力竭地指责纱布交易所理事们营私舞弊，造成涨风不断，要求暂时停拍，由全体经纪人推派代表进行调查。这番话无异在油锅里撒了一把盐，拥挤不堪的生意人，即刻分成两派，赚了钱的，拚命反对；亏了的，极力赞成。吵闹者有之，骂娘者有之，手打脚踢者有之，乱成一团。纱布交易所几个理事亦非良善君子，哪里能容忍这样明目张胆的捣乱，立时派出几名伙计，左冲右突地向顾永园挤去，扬言要把他送进巡捕房。但这些伙计不管怎样用劲，也无法靠近顾永园。这时，他们才发现围在顾永园身边的并非经常出入交易所的经纪人，而是一些横眉怒目的陌生面孔。有一个伙计无意中撩开了其中一人的衣襟，发现该人腰间竟插着乌黑闪亮的手枪，他一吓之下，不禁失口叫道：“伊拉有手枪！”这声喊，就象炸雷，把交易所的几个理事和众多伙计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知道事情不好，碰上有背景的预谋行动了。其中一位理事还算灵活，心急慌忙地跑到办公室给公共租界巡捕房打电话。岂知杜月笙早已通过沈杏山给该巡捕房值班人员打过招呼，因此，尽管那位理事接连不断地摇通了电话，但巡捕房值班人员却拿起、挂断，再拿起、再接断，直把那位理事急得浑身发抖、七窍生烟。如此折腾许久，巡捕房值班人员才接话，答应派几名巡捕来看看。又过了很久时间，交易所门口方出现四名懒洋洋的巡捕，但他们并不理睬交易所理事的申诉，反而很感兴趣地听着顾永园叫嚷。纱布交易所理事无奈，只好把情况报告交易所主要负责人袁履登和闻兰亭。这两人得知寻衅者来势如此之凶，巡捕态度又如此暧昧，大致估摸到背景是杜月笙。解铃还需系铃人，两人只得前往杜月笙家恳情。但到了杜公馆门前，却被门卫挡驾，说杜月笙尚未起床。袁、闻两人再三请求通报，门卫却毫无通融余地地说：“杜先生关照过要多睡一会，我们当下人的，谁敢去喊！”闻兰亭和袁履登见状，知道是杜月笙存心给他们吃闭门羹，只好去清出阿德哥虞洽卿，在虞洽卿陪同下再访杜公馆，杜月笙方才开门纳客。

面对哭丧着脸的袁履登和闻兰亭，杜月笙装作对纱布交易所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答应前去解劝。他和虞洽卿、袁履登、闻兰亭一起到纱布交易所。进门一看，顾永园已站到交易所台上，还在慷慨激昂地演说。四周围聚着许多与这次交易有利害关系或是看热闹的人。他们见杜月笙一行四人来到，自动闪出一条空道，杜装模作样地走上前去，仰脸对顾永园说：“这位先生是否认识鄙人？”顾永园连忙拱子为礼，毕恭毕敬地答道：“久闻杜先生大名，只恨无缘，始终未能拜见。”杜月笙故作谦虚地抱拳还礼：“哪里，哪里。”接着又道：“先生既然看得起我杜某人，我想请先生和交易所的朋友一起到舍下谈谈。不知肯赏光吗？”顾永园立刻答复：“杜先生的话，兄弟唯命是从。”

有关人员一起到了杜公馆后，杜月笙便以调停人的面孔，询问事情原委。顾永园有恃无恐，把他所掌握的纱布交易所舞弊情况合盘托出，扬言对方如不给予补偿，定当上诉法院。纱布交易所几名理事心里清楚，上海滩所有交易所、包括杜月笙把持的几家，没有不舞弊的。他们这次所以倒霉，是因为舞弊舞到了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头上。因此，如不吐出舞弊所得，决不会有

好果子吃。于是，被迫承认了操纵市场，促使棉纱股票暴涨，利于作多头，打击空头的实情。逼出这番话后，杜月笙立即收起满脸笑容，板着面孔说：“事情弄清爽了，很容易解决。今天下午交易所一开拍，行情就要跌，让它跌停板。然后一连跌它几个礼拜，跌到两不吃亏的原价，让作空头的朋友补回损失。”纱布交易所的几位理事眼看哗哗淌进的银元，顷刻间化为乌有，肉疼至极。但事已至此，为保身家安全，只得同意照办。

凭此无赖手段，杜月笙不但扳回了他做纱布投机的损失，而且让纱布交易所那班人领教了他的威势，明白如不请出这座“尊神”，纱布交易所是无法大赚昧心钱的。不久，纱布交易所便将理事长的头衔捧送给了杜月笙。

问鼎市商会

经过激烈角逐，杜月笙在金融工商界的势力得到长足发展。他开始觊觎在金融工商界具有重要地位的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

杜月笙明白，要达到这一目的，不象获取某个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那么容易，他在金融工商界虽有一定影响，但毕竟是半路出家，又是“白相人”出身，多数巨商豪富与他仅是泛泛之交，不少人还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上海市商会历任的几任会长都是有些来历的人物，第一任是晚清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第二任是早期官僚买办盛宣怀的主要助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当时正在台上的是虞洽卿。虞洽卿也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权贵面前都兜得转的人物，而他在金融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则超过当时的杜月笙。杜月笙自感要取虞洽卿而代之，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便将心计用到了虞洽卿的左右手、时任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身上。

王晓籁，浙江嵊县人，曾为晚清秀才，早年到上海经商，开有几家钱庄。为人不拘小节，机巧灵活，擅长应酬，在金融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关系颇多，被虞洽卿引为心腹。杜月笙认为，如果将王晓籁笼络到手，非但可以削弱虞洽卿，而且还可以利用王晓籁的关系，扩大在市商会的影响。于是，他对王晓籁施展了先打后拉的手段。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实业部与上海市政府预备在上海合资筹办一个鱼市场。经营鱼市场，是一个肥缺，不少人为之垂涎。王晓籁经虞洽卿推荐，被任命为成立鱼市场的筹备主任，鱼市场成立后便成为当然总经理。王晓籁踌躇满志，走马上任。但不久却发现这个总经理不好当。鱼市场建在复兴岛，配备有冷藏库等各种设备，条件可谓好矣。令王晓籁跳脚的是：渔民不肯将鱼虾卖给鱼市场。原来，杜月笙与河海鱼鲜等行业早有关系，一九二五年他就曾与渔商一起组织过敦和公所，后改为水鲜鱼行业公会，杜月笙任该会主任委员。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组织江浙鱼行业公会，也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因此，当时上海及江浙各码头的鱼行经纪人中，给杜月笙递过门生帖子的为数不少。国民党政府办鱼市场的目的是想将鱼虾生意垄断起来，这必然影响那些鱼行经纪人的财路，毫无疑问会遭到他们反对。杜月笙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矛盾，他立刻运用他的影响，在渔民和鱼行经纪人中鼓动起一般反对王晓籁的情绪。结果，使王晓籁只能守着空空的鱼市场，徒唤奈何。王晓籁不是阿木林，他当然知道给他制造麻烦的是谁，尽管他在金融工商界

上层有靠山、有朋友，但说到运用社会下层势力斗法，他远不是杜月笙的对手。因此，仅当了几天没有闻到鱼腥味的鱼市场总经理，王晓籁便不得不去向虞洽卿请求辞职。虞洽卿请王晓籁推荐一个继任者，王晓籁不无愤恨他说：“杜月笙！”虞洽卿也明白，要垄断鱼虾市场，没有杜月笙的配合，是很困难的。不久，国民党实业部长吴鼎昌便托人带信给杜月笙，希里他出任鱼市场总经理。

杜月笙眼见“打”已奏效，王晓籁尝到了他的厉害，转而在“拉”字上下功夫。他对吴鼎昌派来的代表说，只要答应他两个条件，他一定对鱼市场采取合作态度。其一：王晓籁留任总经理；其二：允许他和一些原来做鱼生意的经纪人，在鱼市场中加入一定股份。吴鼎昌答应了这两项条件。王晓籁闻讯后，喜出望外，以后便渐与虞洽卿疏远，而一天天向杜月笙靠拢。杜月笙由于在渔市场有了股份，被推选为董事长。之后，杜月笙又将他门徒唐承宗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介绍进渔市场，担任常务董事。负责渔市场的全部业务。渔市场的另一副经理朱开观，任职不久，也向杜月笙递了门生帖子。这样，王晓籁名义上是鱼市场的总经理，实权却牢牢掌握在杜月笙手中。

掌握住王晓籁的同时，杜月笙着力拉拢市商会的一些关键人物。例如派陆京士劝说骆清华向杜月笙递门生帖子。骆清华，浙江绍兴人，时任市商会总干事。因点子多，工于算计，人称“绍兴师爷”。骆清华与王延松等人成立了一个名为“商社”的组织。王延松公开身份是市商会常务董事，实际上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派驻市商会的代表。因此，“商社”对当时的市商会具有重要影响。骆清华拜到杜月笙门下后，杜月笙的话对市商会来说，虽非一言九鼎，却也不可等闲视之了。

虞洽卿眼见其视为心腹的王晓籁离心倾向日益明显，市商会内骆清华等人又滑得抓不住，未免有力不从心之感，渐生引退之意。杜月笙得此消息后，主张推选王晓籁继任市商会会长。其实，杜月笙本人何尝不想坐这把交椅。不过他知道虞洽卿虽然不当市商会会长了，但他在金融工商界的势力仍不能低估，如果做得太露骨，反会弄巧成拙。而将王晓籁推上去，一则可以避免与虞洽卿直接对立，二则可以进一步将王晓籁从虞洽卿集团拉过来；三则可以利用王晓籁与金融工商界上层人士的关系，扩大自己的实力。经杜月笙活动，王晓籁果真被捧为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得此恩惠，对杜月笙当然更加言听计从。这样，市商会会长名义虽然未归杜月笙，但实权终于落到了杜月笙手里。此后，杜月笙在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地位当然更加令人注目。

六 一二八前后

禁止日货

正当杜月笙在上海滩飞黄腾达、节节高升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沟的一段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对此，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东北当局：“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这种不抵抗政策，束缚了东北军队的手脚，东北锦绣河山很快陷入日军铁蹄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上海人民奋勇投入这个爱国运动。九月二十四日，上海三万五千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十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九月二十六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要求对口宣战、武装民众和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十月初，上海各业八十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开始表示了抗日要求。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便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股洪流将杜月笙也卷入其内。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首肯，以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光等人为常务委员，组成了“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后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任秘书长。杜月笙等人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夺上海抗日运动的领导权，并协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将上海市人民的抗日活动限制在国民党政府允许的范围内。但既称之为抗日组织，就必须得做一、两件抗日的的事情，以装潢门面，否则是无其立足之地的。而且虞洽卿、王晓籁，包括杜月笙在内，与民族资本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民族资本受外资压迫，要求在抗日运动中实行抵制日货，这种要求影响了杜月笙等人，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抵制日货的行动。杜月笙的一些门徒，因此参加了当时查禁日货的检查所，象模象样地查禁起日货来，其中一个叫于松乔的还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于松乔当时在天后宫检查所负责查禁日货。他带一些人在“合昌祥”绸布庄抄出两大箱日本棉布。“合昌祥”的老板是当时的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陈松源闻讯后，立刻带了两名保镖赶至天后宫检查所，声称：抄去他的棉布纯系误会，要求归还。于松乔不买账，慷慨激昂地表示：“国难当头，贩卖东洋货便是帮助日本人，因此东洋货一律没收。”陈松源情急之下，指令保镖动手抢回。不料于松乔先一步扭住陈松源，死命将他拖进一间小房内。保镖想开枪，怕伤了陈松源；想动手，检查所内许多人已闻声而出，寡不敌众，只好拔脚开溜。于松乔将陈松源拖进小房后，将门从外面锁上，自己坐在门口看守。

陈松源被扣，消息很快传遍上海。经陈松源家属四出活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吴开先、抗日救国会秘书长陶百川先后去天后宫检查所要于松乔放人。但于松乔坐在门口纹丝不动，并说：“陈松源带保镖到检查所抢东西，我一定要夫他。如果有人拉开我，我立刻撞墙头自杀！”虞洽卿、王晓籁等

人也相继来劝，于松乔仍毫不为动。这时有人想乘混乱之机，拉开于松乔，放出陈松源。于松乔见状，一低头，猛地朝旁边的墙壁撞去，顿时撞得头破血流。想拉他的人，个个吓得缩手顿足，再不敢向前。于松乔带着满头满脸的血，又坐回原来的地方，照样看牢陈松源。

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方有人想起于松乔是杜月笙的徒弟。已匆忙赶来的陆京士跑上前去问道：“松乔，你要哪位先生出场说话，才肯放陈松源？”于松乔有气无力地回答：“杜先生。”于是陆京士立刻去给杜月笙打电话，然后回转来对于松乔讲：“杜先生要我转告你，犯不着为这件事去死，他马上派车子来接你去治伤。”于松乔这才离开小房间门口，听任陈松源家属将陈接回去。

配合吴铁城与日本妥协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和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以利于日本军队迅速侵占东北，日本反动统治集团决定在上海制造新的事变。

一九三一年底，日本派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接到了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给他的密电，内容为：“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并为此拨给田中一笔数目颇大的活动经费。

田中隆吉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虚伪、奸佞、阴险、狡猾、邪恶、奸黠、狡猾、阴谋、谋略……辞典中所有这类形容品质恶劣的词汇加起来就等于他的形象。”“他穿着军装，佩刀持枪，并依仗背后的权力为所欲为。”他接受此秘密使命后，我来与他关系暧昧的川岛芳子商议。川岛芳子是清末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又名金璧辉，幼年为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所收养。日本侵华期间，川岛芳子在东北、华北、上海等地进行特务活动，是一个名噪一时的日本女间谍。田中和川岛这两个被称为“怪物”与“女妖”的侵略分子商定制造一起中国人杀害日本人的事件，以为日本军队扩大侵略提供借口。他们选定的栽赃目标是三友实业社，阴谋“巧妙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

三友实业社创办于一九一二年，引翔港总厂坐落在黄兴路上，靠近杨树浦，离虹口也不远，经营毛巾织物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市场倾销产品，三友实业社深感受外资压抑之苦，极力设法与日商竞争。九一八事变后，三友实业社更是积极响应抵制日货运动，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因而成为它寻衅闹事的对象。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五名日本日莲宗和尚敲着榜鼓游荡到三友实业社门口，有意寻衅，引起厂内职工的愤怒，双方发生冲突，结果其中一名和尚被打死，两名被打伤。二十日，日本侵略者以此为借口，由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还捣毁北四川路中国商店。第二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反而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日]榎木舍三：《川岛芳子其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52页。

牒，要求立刻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否则日本海军将开始“自由行动”。

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吓破胆的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命令吴铁城妥协，全盘接受日方条件。吴铁城接受这一命令后，颇费踌躇。上海人民的抗日运动方兴未艾，日本浪人袭击并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事件，犹如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上海人民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慨，上海各民众团体为此组织了后援会，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向日本侵略者提出严重抗议，并索取赔偿。此时此地，吴铁城担心若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他们自己就会被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席卷而去。为了对日妥协顺利进行，吴铁城除动用军警特宪全套专政工具外，还利用了与各阶层都有联系的杜月笙。

吴铁城亲自给杜月笙打电话，说：“情况紧急。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已开进黄浦江，为了避免战祸，政府决定同意日方所提条件，”并要求杜月笙给以协助。

日本侵略者所提条件，通过当时报载刊揭，上海几乎无人不知，杜月笙心中当然有数。他也感到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是极为棘手的事情，但已把自己的命运与蒋介石政权紧密联结的杜月笙，自然不会因此拒绝吴铁城的要求，他立刻答应解散他为发起人之一的抗日救国会。对制止抗日运动之事，杜月笙虽不敢拍胸脯，却表示尽力而为。放下电话后，杜月笙邀张啸林密议，然后令手下人四出活动，散布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鼓吹依靠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在阻滞上海抗日运动的发展上，起了国民党政府无法起到的作用。

一九五二年，吴铁城在《纪念杜月笙先生》一文中，还难以忘怀地提到他与杜月笙的这一段“合作”：“民国廿一年，余长沪市之初，即遇一二八之变，当时日牒之答复，后方之应付，以及停战之协定，地方与政府意见一致，合作无间，因应适宜，实出先生之助。”

杜月笙配合默契，使吴铁城更放心大胆地实行对日妥协。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午十二时，吴铁城按照日本侵略者最后通牒所限定的时间，准时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开始谈判，全面满足了日本侵略者的要求。还在谈判席上，吴铁城便下令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长：“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诸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切切此令。”村井仓松如愿以偿地离开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下午一时四十五分，由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携带吴铁城亲自根据对日妥协各项内容起草的“答覆日本总领事抗议书”，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卑躬屈膝地交与村井仓松。

吴铁城以为如此一来，日本的侵略阴谋便可消弭。因此，当他一身轻松地回到海格路（今华山路）公馆，碰到恭候多时、专为采访谈判结果而来的《时报》记者时，便以大功告成的口气宣称：“对日谈判顺利取得协议，战祸可望避免。”当天下午，《时报》专门发布号外，宣传：中日问题和平解决。这种一厢情愿的美梦，不过做了几个小时，就被一二八事变的枪声击破。

为对日谈判穿针引线

国民党政府一再妥协，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一月二十八日深夜十一时二十三分，日本外遣舰队司令盐泽突然“勒令”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将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及防守设施全部撤退。十一时四十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共约三千余人，兵分三路，由租界向驻守在闸北的十九路军发动猛烈攻击。日军的猖狂进攻，激怒了十九路军官兵，他们奋起抵抗。宝山路至宝兴路一带弹雨纷飞，烈焰腾空，战火烧红了半边天。一月二十九日，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全国，慷慨陈词，表示了誓死抗战的决心。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奋勇抗敌的十九路军，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据目击者说：一月三十日早晨六时起，进攻闸北的日军先后动用大卡车七辆，满载死伤兵士八百余人，经北四川路绕道至汇山码头装入军舰，运回本国。当时，聚集在上海周围的日本军队数量并不太多，日本指挥官野村中将担心继续蛮干下去，兵力不继，想行缓兵之计，要求中国方面停战谈判，以利用此空隙请国内派兵增援；但又唯恐这一要求被中国方面拒绝，有失“体面”，因而在与国民党政府正式接触前，想先作非官方的试探。通过什么渠道呢？他们想到了杜月笙。

原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长期以来派出大量间谍到中国活动。中国的一切情况，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思想、人事关系、秘密结社、流氓势力、风俗习惯等等都在了解之列。

杜月笙早已引起他们注目，日方详细收集了与他有关的各种资料。四一二事变以后，还通过一些原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力图接近与拉拢杜月笙。九一八事变前后，这种活动更加频繁，当时在杜公馆，经常会出现一些手头阔绰的神秘人物，李择一便是其中之一。此人一九二一年，曾担任北洋政府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最高顾问周自齐的随员，会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关系密切，在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特务及金融工商界的日侨中，有不少“朋友”，是一个背景复杂的人物。他是杜月笙家赌桌上的常客，经常一输十万、八万，却毫无吝啬。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关心的是另一种赌博。日本野村中将正是通过他，与杜月笙建立起联系。

李择一告诉杜月笙，日本军方认为中日间的问题，应该面对面谈判解决。如果杜愿意参预其事，他可以设法约野村中将的高级幕僚与杜谈谈，以寻求解决方案。杜月笙了解李择一的背景，当然知道这番话必定反映日本当局的意图。一方面，他以自己能插手此类秘密外交而沾沾自喜；另一方面，毕竟事关重大，不敢贸然答应。于是表示考虑一下，再作答复。李择一欲擒故纵，随口说道：“当然可以，杜先生什么时候考虑好了，什么时候给我电话好了！”

送走李择一后，杜月笙立刻将他手下的一些军师角色请来商量。议论之下，这些人都认为此事有利于提高杜的地位，应该插手。于是，杜月笙便将事情原委告知了国民党当局。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当局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妥协机会的，但为了防止事情办糟，被国人谴责，便给了杜月笙一个貌似模棱两可，实则倾向很明显的指示：“是否要和日本军方人员会晤，应由杜月笙自己决定。”杜月笙当然了解这一指示的本意，便着手准备与日本军方会晤之事。

杜月笙首先找到法国总领事葛格林，希望将与日本军方会晤地点安排在法国驻沪领事馆。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扩大其在华利益，正密切注视着中日战事的发展，葛格林当然愿意了解杜月笙与日本军方秘密会晤的内容，因而同意了他的要求。杜月笙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动了一番脑

筋的，他知道上海和全国各地人民对日本侵略者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人们强烈要求抗战，反对妥协，凡有通日嫌疑的人，无不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且他不知道日本军方在与他的会晤中将拿出什么方案，更不知日本军方会不会将这次会晤作为公开宣传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以私人身份与日本军方秘密会晤搞得不好，很容易弄顶汉奸帽子戴戴，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杜月笙才想出将会晤地点放在法国领事馆的办法。这样他便可以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的身份，以保护法租界安全的名义，与日本军方会晤，而避免那种可能危及他声誉与地位的会晤方式。

得到葛格林同意后，杜月笙便将同意会晤及有关会晤方式的决定通知了李择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是为了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矛盾。因此，日本军方并不愿意美、英、法等国插手他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全部外交活动。李择一是了解这一点的。他企图劝说杜月笙改变主意，因而明知故问道：“杜先生能否见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杜月笙在事关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历来是精明的，当然不会让步，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道理很简单，我有我的立场，我的名誉地位必须有所保障。”李择一知道在这类问题上与老于世故的杜月笙争论是无益的，便将杜的决定转告了野村中将。日本军方急于休战，同意按杜月笙选择的方式会晤。

届时，杜月笙身穿狐皮长袍，带着私人秘书、自备日文翻译和若干名保镖，分乘两辆轿车，驰向法国驻沪总领事馆。葛格林已在等候。不久，李择一陪同几个穿西装的日本军官接踵而至。双方在葛格林办公室开始秘密会晤。杜月笙表示，他愿意了解日方停战条件，然后通过私人关系，转告国民党当局。日方代表情词汹汹地声称：“十九路军必须撤出所驻守的防线。”并扬言：“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闸北地区，事先曾获得上海租界各国防军谅解，是完全合法的。”杜月笙就此事询问葛格林，葛格林表示否定。

会晤结束后，杜月笙返回家中，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两名代表耿嘉基、王长春已等在客厅，杜月笙将会晤内容一一告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代表认为抓住了日本人一条小辫子。当天下午，在英国领事馆召开的所谓调停中日战事的会议上，便对日本领事提出质问：“日本进攻闸北，是否获得上海租界各国防军委员会谅解？”其实，侵略者要发动战争总是可以制造借口的，这一借口不行，可以换一个。日本领事当即回答：“日军进入华界，并非防军委员会原议，而是日方为保护侨民安全采取的行动。”并肆无忌惮地声称：“日方对其行动完全负责。”这种强盗逻辑却没有受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代表的驳斥。

一月三十一日傍晚，经请示已逃至洛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上海市长吴铁城邀同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至英国驻沪领事馆，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海军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少将，就中日停战问题进行谈判。参加会议的还有英美两国驻沪总领事、上海租界英、美、法防军司令、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总董。中方代表首先提出：“如欲避免战祸，日军应先撤至租界线内，并将侵占之区域完全让出。”日方代表蛮横拒绝。英、美等国驻沪总领事随后提出一个所谓折衷方案，即“日军应退入公共租界，将所让出之越界筑路线及附近地区，交由英、美军队代为维持秩序，以待解决，”

并主张：“中国军队亦应往后稍有移动，以免冲突。”对这样一个偏袒日本侵略者，并乘机扩大英、美在华势力的方案，吴铁城没有表示反对。村井仓松则借口此事须请示日本政府方能决定，建议以三日为期，双方暂缓进攻。会议因此决定双方停战至二月三日。这就是此次谈判的唯一结果。日本侵略者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时间。

二月二日下午一时二十分，获得补给增援的日本侵略者，毁弃停战协定，在北四川路一带，突然以猛烈的炮火向十九路军发动进攻，战事重开。

事实表明，杜月笙参与的并不是一次光彩的外交谈判。

控制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

一九五二年，钱新之在其所作《杜月笙》传中称：“九一八、一二八之变迭起，先生以上海全国经济重镇，交通总枢，国家存亡所系，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接应军需，安定金融，扶伤济难，募款征物，无不悉如所期，飞挽无缺。”这番话意在吹捧，当然不无过誉之处。例如把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及其进行抗日活动的功劳主要归之于杜月笙，就不正确。事实上，当时起主要作用的是史量才和黄炎培。

史量才原籍南京，寄居松江泗泾镇，是晚清秀才，文笔口才都很好，以后，放弃科举，研究新学。二十岁时到沪，最初在南洋中学任教，之后创办了一所女子蚕业学校。辛亥革命时，史量才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密切联系。他在上海的主要事业是接办《申报》。《申报》是上海最早的一份报纸，由英商美查集资一千六百两创办于一八七二年，以后美查回国，《申报》便由席子佩接办。辛亥革命后，上海已有大型报纸五、六家。《申报》创立虽早，但业务并无进展。席子佩因而萌生转让之念。史量才当时正得一笔巨款，便盘进《申报》。以后，又买进《新闻报》半数以上的股份，担任中南银行握有实权的董事长，在造纸、纺织、机器制造业等方面也有巨额投资，成为在新闻和工商金融界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深重，史量才摒弃《申报》原来的保守作风，聘请李公朴等进步人士参加工作，《申报》及其副刊《自由谈》经常登载主张抗日的文章，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曾有人在史量才面前吹嘘蒋介石拥百万之兵，足以安内攘外。史量才不无嘲讽地说道：“我只能在报言报，约略估计，有数千万读者拥护。”以后，史量才参加了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二八事变后，杨杏佛陪宋庆龄去见史量才，希望他能为十九路军捐助军饷，史量才捐出了巨款。

黄炎培是上海浦东人，一八九七年生，上海南洋大学毕业后，曾赴日本留学，专攻教育学，并曾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辛亥革命时期，任江苏都督府教育科长。北洋政府曾任命他为教育总长，未到任。后至上海担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社长，是一位著名的进步人士。史量才接办《申报》后，他受聘担任《申报》设计部部长，一九二二年，《申报》为纪念创刊五十周年而出版的《最近五十年》，就由他设计和主持编辑。他是史量才的挚友，一向被史量才倚为《申报》的高级顾问。一九三二年，蒋介石禁止《申报》邮递，史量才托《申报》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秦墨晒通过

蒋介石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要求蒋介石开禁，蒋提出的条件之一便是要《申报》辞退黄炎培。史量才则以黄炎培是自己的老朋友，由于生计困难，按月送一点津贴，实际既不到报馆办事，也不负任何设计责任为理由，不同意辞退黄炎培。

史量才、黄炎培与杜月笙都有往来。黄炎培更利用他与杜月笙的同乡关系，对杜月笙做过不少工作。由于他们的影响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址设在位于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和福煦路之间已停业的 181 号赌场内。其问世之初，曾在《申报》上宣布该会的成立目的是“当事变初生，组织本会从事于维持地方诸务，念前方将士舍身杀敌，设慰劳组聊献壶浆箪食之诚，念劫余民众之载道流离，设救济组借供衣食医药之用。”也就是说，其主要任务是从事与抗战有关的慰劳与救济工作。该会开始时以史量才为会长，王晓籁为副会长，杜月笙和虞洽卿、秦润卿、林康侯、张啸林，钱新之、朱吟刚、刘鸿生、徐新六等为理事。一九三二年四月广州《银晶日报》出版的“十九路军特刊”，因此载“杜月笙小史”，称扬杜月笙“能率其徒侣共赴国难”。

上海人民为了援助十九路军抗日，愿意罄其所有。无论是医药、被服、食物、交通器材，还是沙包麻袋、砖瓦木石，只要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说一声“抗战需要”，立刻就会有大量所需物资象小山般堆积在该会门前，以至于报纸电台当时经常代该会发表如下声明：“昨天本报（或本台）说十九路军需要××物品，现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该会亦无地方代为保管，请大家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

十九路军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从一二八到二月底，侵沪日军陆续增至十万人，而十九路军连同后来参战的一部分第五军官兵，总共不足四万人，武器装备亦不如敌人，但却坚持抗战一个多月，杀伤侵略者一万多人，打得日军三易主帅而不能有所推进。战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但前线将士的流血和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并没有感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对日“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外交方针指导下，国民党政府一再命令十九路军撤退，甚至对群众的捐款，都从中截留。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干预和参加下，三月二十四日，中日双方再次开始进行停战谈判。五月五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苏州河以北，沿安亭镇东侧，北至望仙桥、沙头、浒浦口一线以东，中国军队不得进驻，而日军则“可暂时驻扎”。国民党政府还答应浦东不驻兵，苏州河以南不增兵，且不得有军事行动。五月三日，协定正式公布前，上海群众曾痛殴国民党谈判代表郭泰祺，表示强烈抗议。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出卖，十九路军被迫退出上海，上海抗战失败。一九三二年六月七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史量才仍为会长，杜月笙与王晓籁同被推为副会长。史量才早就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时更允许《申报》及副刊《自由谈》登载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冷嘲热讽地抨击国民党政权，甚至发表《剿匪评论》，公开反对蒋介石军队围剿红军。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为此造访史量才，史辛辣地回答：“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

作不自由谈吧。”蒋介石为此怀恨在心。一九三一年底，蒋介石命令他的侍卫长王世和将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宋庆龄得知此事，就用“民权保障同盟会”名义起草一份英文宣言，谴责蒋介石的罪恶。该宣言由“民权保障同盟会”秘书长杨杏佛翻译成中文，于一九三二年派人秘密送交史量才，请他设法发表。《申报》虽然未敢刊登，但通过史量才的关系，却在某通讯社发表了。蒋介石极为恼火，继一九三三年暗杀杨杏佛后，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密令特务将史量才枪杀于沪杭公路上。

史量才死后，杜月笙成为“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并接管了《申报》，成立所谓“申新时商四社联营处”，“申”即《申报》，

“新”系《新闻报》，“时”指《时事新报》，“商”是《商报》，由杜月笙任总经理，将黄炎培等进步人士由《申报》排挤出去。史量才的事业几乎都成为杜月笙的囊中之物。

这时的“上海市地方协会”，再不是以支援抗战为目的的组织，其主要成员是上海的工商金融界上层人士，人数不多，开始时八十人，至一九三七年五月发展至二百四十一人，但影响却不小，杜月笙曾说：“本会性质，本来属地方范围，但上海是中外交通中心、全国经济的中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本会工作，不能用地域来分，也不能以性质来分。我们大家认为必要的，比如工潮问题、金融问题、国际问题等等……希望本会诸公共同负责共同努力。”在杜月笙主持下，该会转而为国民党政府效劳。一九三二年八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进一步严密控制和监视人民，加强镇压革命运动，曾颁布《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在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建立保甲组织。一九三四年又把这一制度推向全国。当年二月，“上海市地方协会”曾设立以杜月笙为理事长的“高桥农村改进会”组织，声称“保甲制度，为地方自治之兆端，自各省推行以来，成效大著，本市居全国经济文化之中心，对于地方自治及组织民众之设施，尤感重要……恳求钧府核准将高桥区试办保甲，并于短期内指令当地公安机关主持其事，敝会亦当出以全力协助，俾得早观厥成，倘以公安机关政务繁剧，指令敝会主持时，亦愿注其全力为吾政府与地方服务也。”极力在其家乡推行保甲制度。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爆发，上海学生除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外，还准备去南京请愿，被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阻止。爱国人士对吴铁城这一行为无不同声指责。杜月笙却在第二天以“地方协会”会长身份，应邀赴吴铁城举办的招待会。会后，各报登载：“吴铁城于席间将前日劝阻学生经过略为报告后，到会诸君，咸以市府之一切处置为适当，并表示愿意竭力协助，维持地方安宁秩序。”显然，杜月笙参加了为国民党政府捧场、对进步学生施压的行列。

通过控制“上海市地方协会”，杜月笙的身价更高，俨然为“地方领袖”。

组织恒社

通过一二八时期的活动，杜月笙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由于他所具

《上海市地方协会》季报第12号。

1936年12月2日《新闻报》。

1935年12月26日《申报》。

有的特殊地位，不仅黑社会的大小流氓，连知识界、文化艺术界、金融工商界，甚至国民党政府一些具有相当地位的官员为了寻找靠山，或更攀高枝，都纷纷投向杜门。

这种情况，使杜月笙及其周围一些摇鹅毛扇的人物感到旧式的流氓组织已不适应形势需要，要谋取更大发展必须建立一个具有近代社团性质的公开组织，于是恒社应运而生。

“恒社”这一名称，是当时正替杜月笙办正始中学的陈群起的，取“如月之恒”的典故，暗含杜月笙名字中的“月”字。英文叫做“Constantclub”，可译为“永久俱乐部”，包含有“恒”的意思。

恒社正式发起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八仙桥青年会的一次集会上。当时推定轮船招商局船务科长洪雁宾、律师周孝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候补委员陆京士、大英银行华经理徐懋棠、长丰地产公司买办蔡福棠、东新进出口公司经理黄振东、杜月笙开山门徒弟、大世界总经理江肇铭、四明银行协理孙祥篔等九人为常务理事，《申报》编辑唐世昌、上海吴淞商团团长商会负责人唐承宗为候补常务理事，负责恒社成立工作。确定会址设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息庐”，后迁吕宋路（今连云路）。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恒社举行隆重开幕典礼，宣告正式成立。恒社成立，不仅由国民党社会部核准，并在法租界注册登记。因此，举行开幕典礼时，法租界当局特派总监到会祝贺。

恒社宗旨，使用了冠冕堂皇的二十个字：“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但若揭去幕障，实际却不堪入目。仅以其所谓社内活动为例，初期经常有春秋两季社员大会，此外还有彩排、聚餐，每年七月十五日为杜月笙祝寿等等。凡遇此类集会，社内常设大小赌局，来者呼朋唤友，吆五喝六，狂赌不休。逢年过节，杜月笙的总管万墨林更利用恒社大赌特赌，乘机抽头，捞足油水。有的社员还携妓女前来，浪声秽语，充斥社内，放浪形骸，无以复加。因为恒社是以杜月笙为“老板”的，所以法租界的任何治安机构都不会来此“维持秩序”。外间不少赌徒视此地为安全赌窟，托社员带进来过瘾、取利市者大有人在。恒社领导机构，按其社章规定，为理事会。由社员大会选举理事十九人，候补理事十一人组成。杜月笙为名誉理事长。恒社内部组织最初是在理事会下设三科十二组，到一九三四年后，增至十八组。计有总务、秘书、会计、庶务、设计、娱乐、京剧、宴会、经济、旅行、交际、教育、法律、体育、卫生、摄影、出版、职业介绍等等。表面上理事会是恒社“最高执行机关”，但实际上所有重大问题都由杜月笙及其在恒社内最亲信的弟子陆京士等人决定。如理事会的产生按社章规定需经过社员大会选举，但人选一向由杜月笙事前指定，然后在社员大会上宣读名单，社员们照例举手通过而已。恒社的社徽，很能反映出杜月笙在恒社内的君临关系。社徽为圆形，中间是一大笙，旁有斜月，寓“月笙”之名；周围则以十九颗星组成花边，“十九”代表理事人数，象征众理事与杜月笙间为群星拱月的关系。为突出杜月笙在恒社内的特殊地位，凡加入恒社者，都要举行一次隆重的拜师仪式。届时，息庐内燃起胳膊粗的红烛，点燃寿字浸香。座凳之上，一式的绣花招沿、缎子椅垫，地上铺设鲜红毡毯，俨如经堂佛殿，堂皇富丽之中，隐隐透露肃穆之气。恒社理事全部先行到场恭候，然后派一理事去请杜月笙。杜月笙来后，坐到预先置于上首的檀木椅上。众理事和参加仪式的老社员分列两旁。新申请入社者，需要预先用红帖子开

明自己的祖宗三代，并写上愿拜门下，听从教诲等语，由介绍人和本人具名，备齐礼物，来参加仪式。在仪式上，他们只能侍立在下，司仪将他们的红帖子递上之后，便按次点名，被点到名者，即上前跪下，一般一跪即由杜月笙扶起，对有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杜月笙还说句：“不敢当”。以后入社的人增加。改跪为集体鞠躬。向杜月笙行礼之后，新旧社员再互相行礼，最后由杜月笙向全体训词。这种拜师仪式，充分说明恒社名为社团，实际仍不脱帮会开香堂习气。

恒社第一届理事为陆京士、唐世昌、徐懋棠、洪雁宾、唐承宗、周孝伯、江肇铭、黄振东、蔡福棠、孔祥篪、张颂椒、王先青、许也夫、张秉辉、车云龙等人。一九三四年，恒社举行大规模的秋季联欢大会，并进行了理事改选。第二届理事为陆京士、徐懋棠、蔡福棠、三星棉铁厂经理张子廉、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张石川、邮务工会张克昌、律师鄂森等人。与第一届理事相比，第二届理事大都是新当选的，杜月笙早期门徒中的唯一理事江肇铭落选。这反映杜月笙的社会基础及其兴趣发生了明显变化。如果说过去“白相人”是杜月笙的唯一身份，那么现在的杜月笙则是集“白相人”、“工商业者”、“政客”等多种身份而成的人物了。他的兴趣除表现为在工商金融界的竞争外，更多地转向了政治。张颂椒（美国联邦保险公司华经理）在《恒社联欢大会特刊》上发表文章说：“恒社之为团体，骤视之，不过供同人公余之暇消闲之地而已。其实不然，世间政治上事业上之大计划、大作为，盖莫不多成于茶余酒后，从容谈笑之际”，可谓道出了杜月笙组织恒社的真正目的。

正因如此，恒社成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有所谓“重质不重量”之说。如按社章规定，愿加入恒社者，只“须经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审查通过”，便可“填发社证”。但实际上其内部掌握条件为：一、文职需科长级以上；二、武职需少校以上；三、工商界需主任级以上；四、年龄需三十岁以上。不合以上条件的，则让他们加入杜月笙徒弟所领导的组织，如毅社、靖社、励社等。从而在各界收罗了一批杜月笙认为可以加以利用的人物。恒社成立初期，参加恒社的有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职者，如陈君毅、汪曼云、林美衍、黄香谷、黄造雄等；有在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任职者，如张秉辉、许也夫、王刚等；有在新闻界任职者，如唐世昌、赵君豪、严服周等；有在邮务工会任职者，如陆京士、傅德卫、张克昌等；有在电影界任职者，如张石川、任矜苹等；有在渔市场任职者，如唐承宗、朱东山等；有在法商电车公司任职者，如邵子英等；有在交通业任职者，如周祥生等；还有在京剧界任职者，如赵培鑫、孙兰亭、汪其俊等。此外，还有些已投杜门，但为了活动方便而不加公开的，如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简贯三以及孔祥熙公馆中的一些人。恒社成员中军界的人极少，唯一的一名将级军官为王兆槐，是奉戴笠的命令拜到杜月笙门下的。这是因为杜月笙很了解蒋介石的脾气，蒋介石靠军队作为其独裁统治的主要支柱，因而很忌讳别人插手军界。杜月笙要维持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当然不敢问津这一“禁区”。

恒社成立初期，社员总数为一百三十余人，到七七事变前，已达五百二十余人。恒社的具体事务由陆京士和万墨林负责。因此，谈及恒社时，杜月笙经常颇为自得地说，“学生子实在太多了，我也认不清楚，反正只要京士和墨林认得就是了。”

建立恒社后，杜月笙的羽翼更丰了。

七 抗战之初

插手筹备中日贸易协会

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侵略中国的步伐。继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日本出现持续性的萧条。到一九三六年，旧的萧条尚未结束，新的经济危机又开始到来。经济危机激化了政治危机，国内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在国际上，日本同美国、英国、法国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美、英、法、日、意在伦敦开会，为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大吵大闹，日本以退出会议与美、英相对抗。

为了摆脱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极力从扩大对华侵略中找出路。一九三六年一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所谓“对华三原则”：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承认“满洲国”，建立日、“满”、华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其目的在于：以反共投蒋介石政府之所好，拉拢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它一起镇压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抗日力量；确保伪“满洲国”，将东北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通过所谓“经济合作”，加强对华北等地的渗透，在攫取大量战略物资的同时，扩大其侵略势力。

一九三六年十月，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桑岛来华，协助其驻华大使川越，与国民党政府就上述问题进行谈判。同时日本政府又派出大批特务至中国活动。当时上海的一名日本特务在递送本国的情报中曾这样说：“桑岛此次所携新训令，比较上或为缓和办法……”，“上海情形可望和缓”，“本日午某又与山本、楠本两人晤谈，据伊等表示，亦侧重于北方之交涉，并向（钱）新之、（王）晓籟、（杜）月笙等约定，共同维持上海金融及治安，勿使人心浮动等语。”可见，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与杜月笙等人有过接触，并得到他们某种程度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日本新任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叫嚣：日本对华政策仍坚守广田三原则，决不放弃既得利益。两天后，日本政府便派出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社长藤山爱一郎等为团员的大规模“经济考察团”，到中国商谈“经济合作”问题。所谓“经济合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种特殊侵略方式。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内阁在其制定的《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中，已将这种“经济合作”的目的表露无遗：“进行经济合作，以中国民众为对象，在实际上实现日华共存共荣，力求形成一种日华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因中国政局的动向而受到影响。”实际上就是要使中国的经济变成日本经济的附庸。

国民党政府不但接待了这个居心叵测的“经济考察团”，而且同意了日本侵略者的要求，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基础，加上几名中国的金融工商界人士，一起组成所谓“中日贸易协会”，具体实施日中“经济合作”。担任“中日贸易协会”筹备主任的是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和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北平银行同业工会主席、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周作民早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系，与日本朝野不少人士有来往。一九一七年金城银行创立后，他便担任总经理。周作民为人机巧灵活，善于运用各种社会

关系，在不同时期寻找不同靠山。例如北洋军阀时期，安福系当权，周作民依靠的是金城几个安福系的大股东如倪嗣冲，王郅隆等，并竭力拉拢徐树铮。安福系失败后，周作民又拉上交通系的头子梁士诒，并推梁为金城的代理总董。一九二八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周作民很快在庐山会见了蒋介石，还上了“金融改革”的条陈，又拉上了国民党的关系，并与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他的留日同学张群结为知交，张群的不少私人存款都用他老婆的化名如“山记”、“德记”、“中记”、“厚记”等等，由周作民经手存放。但周作民的影响主要限于北方的金融工商界。为了拉拢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人士，日本方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希望杜月笙也能参加“中日贸易协会”。

日本方面提名杜月笙参加中日贸易协会，并非贸然之举。在这以前，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从日内瓦返回日本途经上海时，曾带着翻译官，由日本驻沪总领事陪同，专程去拜访过杜月笙。永野修身恭维杜月笙为金融工商界的“长才”，鼓励他放开手做“大买卖”。杜月笙被捧得心花怒放，故作谦虚说：“做大买卖需大本钱，我没有这个能力。”永野修身闻言，立刻向杜月笙建议：由日方投资三千万日元，和杜月笙合作开设一家“中日建设银公司”，与宋子文主持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一见高低。杜月笙知道这是一项赚大钱的买卖，未免怦然心动。但他更清楚地看到，在中国人民抗日要求与日俱增的形势下，公开和日本人合作，不会有好下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在戒备森严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尚且差一点被人击毙，杜月笙就更不用说了。而且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国民党内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分化和对立也日益明显。杜月笙要依靠日本人支持，和宋子文抢生意，不能不顾忌在国民党内占优势的英美派的报复。所以，沉吟良久之后，杜月笙苦笑着摇摇头说：“我是一个中国老百姓，去跟外国的政府机关合资开办公司，恐怕有点不合体制吧。”永野修身似乎明白杜月笙的苦衷，退而求其次，对杜月笙表示：“建设银公司”可以不挂“中日合作”的招牌，由杜月笙单独出面，所需资金日方照样供给。这一方案显然比前一方案更加诱人，杜月笙实在不忍拒绝，于是对永野修身说：“请给我一段时间，容我详加考虑”。经过反复权衡，老于世故的杜月笙毕竟懂得世间无不透风的墙，干这样大的事情，要想掩尽天下人耳目是不可能的，只得忍痛割爱，派人去见日本海军驻沪武官，请他转告永野修身：“前此所谈，极感盛意，惟碍于国家民族之义，未敢从命，歉疚之处，伏祈鉴谅。”这番话确是经过字斟句酌，既让日本人明了杜月笙迫于情势，不便与日本人公开合作；又让日本人领会到杜月笙没有也不会将与日本人的感情和关系彻底拉断。正是这种态度，使日本方面感到，只要国民党政府同意，拉杜月笙参加中日贸易协会是不成问题的。果然不出所料，杜月笙答应担任该协会的常委。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儿玉谦次率领日本“经济考察团”到达上海。杜月笙和周作民在上海给予“盛大地欢迎”。十五日，杜月笙和周作民又陪同日本“经济考察团”去南京，参加蒋介石专门为儿玉谦次等人举行的“招待茶会”。之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长张群又先后会见了日本“经济考察团”团员藤山爱一郎，双方进行了秘密谈话。不久，日本“经济考察团”再返上海，在金融工商界进行了频繁活动。由于中国人民抗日要求的强大压力，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也侵犯了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日本“经济考察团”及由此派生的中日贸易协会虽然使尽浑身解数，并未能达到它想达到的目的。但杜月笙厕

身其间，却为其历史增加了无法抹去的一笔。

组织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十时许，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遭到中国驻军的拒绝。日军立即向宛平县城射击，并用重炮猛轰卢沟桥，悍然挑起侵略战争。在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

上海人民奋勇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运动。群众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鉴于杜月笙在社会上的影响，黄炎培曾去争取他站在抗日的一边，对他说：“现在全面抗战已起，前方将士很多地方需要上海人民支援，应该组织一个抗敌后援会。”杜月笙问：“怎样组织法呢？”黄炎培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抗战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党派可以单独应付的，抗敌后援会要扩大影响，发挥力量，一定要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参加”。显然，黄炎培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是一致的。但杜月笙却不愿轻易表态，他需要摸清国民党政府的意图，于是不置可否地回答道：“卢沟桥刚刚开火，还不晓得会不会又要讲和，这件事非同小可，过两天看看风色再谈吧！”

上海人民救亡运动的发展，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来说是一个颇感头痛的难题，他们既不敢公开反对，又担心发展下去会危及蒋介石政权的统治，因而想把上海人民的救亡运动限制在国民党许可的范围内。为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吴开先，专程去杜公馆拜访杜月笙。

吴开先对杜月笙诉说了一番苦衷，两人经过一番商议，决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出面，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力图将上海各抗日民众团体，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杜月笙拍着胸脯对吴开先说：“全上海只许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的组织，市党部只管积极领导进行，我一定尽力协助。”两人当场拟定了一张他们认为可以信任者的名单，写成请帖，上面由杜月笙、吴开先联合具名，即刻命人分头投送，通知这些人第二天上午在位于爱多亚路上的中汇银行，讨论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的事。

第二天，那些收到请帖的人准时聚拢在中汇银行会议室内。几经争议，推选出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庠等人组成主席团，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

“筹备会”主席团组成人员中，杜月笙、虞洽卿、钱新之的情况不再赘言，其他主要成员情况如下：潘公展，曾任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农工商局局长、社会局长、教育局长；徐寄庠，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当时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银行监事，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垦业银行、通易信托公司董事，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与四大家族关系密切。由这些人物组织成“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目的是要使即将成立的“上海市抗敌后援会”贯彻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

由于这个“筹备会”没有吸收一些理应包括在内的左派进步人士，黄炎培和沈钧儒曾专门去找杜月笙交涉。

沈钧儒是晚清进士，后留学日本，专攻法政。辛亥革命时期担任浙江教育司长、众议院议员兼秘书长等职。后在上海任法利大学教务长、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

成立，要求民主和抗战，力求“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沈钧儒、史良、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等十四人被推选为“救国会”常务委员。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与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提出抗日救国“必须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主张全国各党派“结成救亡统一战线”，要求蒋介石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并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对沈钧儒等人的进步活动，蒋介石恨之入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将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邹韬奋等七人逮捕入狱，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蒋介石政权的卑劣行为，激怒了要求抗日的人民大众，全国各界掀起援救运动。中国共产党一再向国民党提出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宋庆龄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对爱国志士的无理压迫，并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与其他进步人士一起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严正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继续监禁沈钧儒等七人，他们将一起入狱，陪同坐牢。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各界响应，最后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了沈钧儒等七人。经此斗争，“七君子”成为当时抗日民主运动中一面很有号召力的旗帜。按理说，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机构应该由这些站在抗日民主运动前列的进步人士组成，至少应该将他们包括在内。但杜月笙却秉承国民党政府的意图，不顾黄炎培和沈钧儒的一再忠告，声称：“国民党领导抗战，就该国民党领导抗敌后援会不管你们怎样说，这桩事体已经决定了。”结果使左派进步人士除少数人以外，大多仍被排斥在外。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告成立，委员一百二十人，常委三十五人。主席团成员共九人，为杜月笙、王晓籁、钱新之、黄炎培、张寿镛、潘公展、童行白、柯干臣、金润庠；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陶百川任秘书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兼训练科长汪曼云任常委兼主席团秘书。

杜月笙除任主席团成员外，还兼任筹募委员会主任。杜月笙的筹募委员会主任是他“毛遂自荐”得来的。抗敌后援会下设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后，常委实行“分工”，众人皆知上海人民为了援助抗日，不借贡献自己的一切，毁家纾难者大有人在。而那些甘于将良心放在一边，乘机发国难财者，却往往因此腰缠万贯。那些常委们大多深谙此道，眼睛无不盯着筹募主任这个位置，嘴里不说，心里则痒痒地期待着别人提名于他。但不防杜月笙突然站起身来，冠冕堂皇地声称：

“抗敌后援会的事体要自告奋勇，让我杜某人先来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面，最难做的大概是筹募委员会了，这一个由我来。杜月笙既开“金口”，当然不会有人斗胆和他相争。这位筹募委员会主任到底经手了多少钱财，不得而知，他的门徒说：从抗敌后援会成立，直到上海沦陷，抗敌后援会结束，筹募委员会“征募的物质和款项，究竟有多少，既没有过统计，更无征信的材料可以稽核。”事后，蒋介石却说杜月笙在抗敌后援会中曾有“赔垫”，特拨现款十万元以为“补偿”。

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决定发行五亿元“救国公债”，代替原来征募的“救国捐”。国民党政府以发行“公债”为名，行搜括之实，对中国人民来说，已不是什么秘密。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借口解救金融恐慌，发行了一亿元“金融公债”。结果以其中三千万

元加强中央银行，使其资本达到一亿元；以一千五百万元作“官股”加入中国银行，又以一千万作“官股”加入交通银行，从而占有了中国、交通银行，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金融寡头。

国民党这次发行“公债”，因信用低落、数额庞大，虽打着“救国”招牌，也觉不易凑齐，便极力动员它所控制的一些带民间色彩的组织，千方百计帮助推销。为此，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专程去上海拜访杜月笙。杜为宋子文出主意说：“募公债，当然是越多越好。这一次最好方面广点，工商界的朋友，希望他们尽量认购。上海市民，也要他们普遍购买”。此言正中宋子文下怀，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许。杜月笙见状，更加来劲，又主张在上海成立两个劝募队，推销公债。一个叫上海市民劝募总队，由他担任总队长；另一个叫上海商界劝募总队，由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担任总队长，后来王晓籁说他一个人“扛不住”（指承担不了），杜月笙又兼了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以后，杜月笙得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组成一个所谓“劝募委员会”，准备将办公地点设在上海，立刻将金廷荪以经办“航空奖券”所得为他在杜美路建造的豪华住宅借给该劝募委员会使用。经过杜月笙等人竭力奔走，五亿元“救国公债”，上海认购了七千五百余万元，将近六分之一，折合当时的美元达二千三百余万元。

劳军活动

“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野心进一步暴露。上海是四大家族的经济中心，又与英、美在华利益密切相关，加上中国人民抗日要求的逼迫，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矛头指向上海后，也不得不下决心在这里抵抗。

一九三七年春，蒋介石命令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卸去军校教育长职务，专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负责防卫上海。

由于国民党政府在一二八战役后的中日停战协定中，把安亭经太仓到太仓西北长江沿岸一带划为停战线，并秘密承认在停战线以东，不再进驻陆军部队，淞沪一带不得有防御设施，吴松口炮台被破坏后也不得重修。因此，当时的中国军队，要在上海设防，非常困难。

七七事变后，张治中去见蒋介石，说明上述情况，要求抽调陆军部队伪装成上海保安队进驻上海，以增强兵力。蒋介石同意了，派第二军一个步兵旅换上上海保安队服装，由徐海地区空运到上海虹桥飞机场。

日本侵略者得知这一消息，于八月九日派一名军曹驾驶摩托车企图闯进虹桥机场侦察，被守卫虹桥机场的中国士兵击毙。中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行使自卫权利，合理合法，无可非议。国民党当局却惊恐万分，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和国民党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出谋，将一名死囚穿上保安队服装，打死在虹桥机场大门外，说是日本军曹打死的，以备和日本人交涉。但事出匆忙，打死那名死囚时，未用日本军曹的手枪。双方交涉时，日方坚持要将两具尸体交租界检验，国民党政府则力主请上海的中国法医检验，相持不下。

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以此为借口，在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八一三抗战开始。当时，蒋介石划定京沪杭地区为第三战区，由他自兼第三战区司令官，下辖第八、第九两个集团军，苏州河

以北河口沿黄浦江至江口以西，由第九集团军守卫，以张治中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苏州河以南及浦东，由第八集团军守卫，以张发奎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以后又陆续调白崇禧、胡宗南、陈诚等属下部队至上海参战。

国民党军队内的爱国官兵对于日本侵略者的猖狂和蒋介石的妥协，早已满腹怒气。八一三抗战开始，他们得到了打击侵略者的机会，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黄浦江畔杀声震天，战斗进行得比较激烈。上海人民竭尽全力援助抗战。

杜月笙此时此刻也显得格外忙碌。每逢有国民党部队开到，他必定要带上大批上海人民捐献的慰劳品，前去劳军。通过这条渠道，在前线浴血奋战的爱国官兵得到了一定的物资援助。同时，杜月笙很注意利用这个机会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拉关系。

一次，他去张治中的部队慰劳，临走时殷勤询问张治中需要什么，张治中坦率地告诉他：“现在军中最需要的是通讯器材，例如电话机、机器脚踏车等”。杜月笙本意是想对张治中个人有所表示，不料张治中提出的却是军务所需。但张治中已经开口，杜月笙不便回绝，只得应承下来。当时，电话机是非常紧缺的东西，杜月笙几经设法都未搞到，担心在国民党高级将领面前砸掉自己那块“闲话一句”的招牌，急得坐立不安。最后，通过曾任西门子洋行总顾问的杨志雄，才算搞到一台，送给了张治中。

之后，杜月笙又派人去慰问张发奎部队，并照例询问张发奎：“有何所需？”张发奎回答说：“我的部队，一切军需齐备，并不需要后方任何供应，只要多来几位朋友，给弟兄们打打气就好！”

杜月笙闻讯后，颇为纳闷：“张发奎到底想要什么呢？”为此，他特将吴开先找来商量。杜月笙对吴开先说：“张总司令豪爽坦白，真正令人钦佩。他说他们不要物品供应，只是欢迎我们多去几个人打打气。不过，跑去几个人，空口说白话，什么慰劳品也不带，似乎太不隆重。我想总归还是要送点东西过去。可是，张总司令不开口，我不晓得送什么东西好。”吴开先略为寻思后对他说：“上海市民送到后援会的毛巾、香烟、罐头、食品堆积如山，我们多运一点去，让张总司令部下一人分到一件，杜先生你看如何？”杜月笙沉吟一下说：“好是好，不过光送这些，仿佛还是不够庄重。张总司令是国家堂堂的大将，他的安全非常要紧，我想买一部装甲保险汽车送给他。”至此，吴开先领悟了杜月笙利用“劳军”机会结交张发奎的本意。于是热烈表示赞同。但又提醒杜月笙说：“后援会存的捐款虽多，但装甲保险汽车却是市面缺货，买一部要一万多元，花这么多钱买部车子送给张总司令私人，就怕引起物议，反而不美。”杜月笙随口表示，由他私人出钱买。杜月笙私人之钱何处来？前面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数日之后，一辆崭新的装甲保险汽车买来，杜月笙邀同钱新之、吴开先、潘公展、陆京士和陈小蝶等人，一起由外滩摆渡，专程将汽车送到浦东张发奎的总部。

这部车子张发奎一直用到抗战末期，六年以后，他还念念不忘地对吴开先提起此事。他与杜月笙的交情，当然由此加深。

也就在此期间，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曾致函杜月笙，告知他：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希望杜月笙给以协助。杜月笙接信后，在杜公馆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几经讨论，最后同意将一千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赠给八路军使用。这些面具价值约一万六千元，款项从抗敌后援会募集的北上慰劳金里支付。为

此，抗敌后援会复函潘汉年：“兹由本会勉力购赠荷兰新到防毒面具一千只，请即枉(劳)驾慰劳委员会接洽运输手续，以便早日送达贵军前方将士备用。”这是杜月笙在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做的一件好事。

拼凑苏浙别动队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天晚上，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负责人戴笠来到杜公馆。

杜月笙与戴笠早有交往。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途经上海时，杜月笙带着门徒为蒋保驾，戴笠则带着他所收集到的情报向蒋告密。此时两人同为蒋介石效力，彼此大有同舟共济、惺惺相惜之感。以后，杜月笙与戴笠和杨虎同一堂帖，拜作兄弟。戴笠时常关照他的部下说：“要尊重杜先生。”杜月笙则一再向戴笠表示：“你是我兄弟，我的学生也是你的学生，随便你指挥使用，毫无问题。”杜、戴两人串通一气，他们的许多部下也就成了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如王兆槐、水祥云、于松乔、陈默、潘兆岱、王云荪、邵子英、李兆麟等，都既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又是戴笠的特务骨干。

正因为如此，杜月笙在上海的活动一直得到戴笠的暗中保护。杜月笙和顾嘉棠在南市太平里有一个制造红丸、吗啡的黑据点，因为生意做得太大，被人揭发，国民党政府碍于舆论，不得不装腔作势派人调查。结果戴笠插手，把沾了边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温建刚捉去枪毙，杜月笙却安然无事。又如上海棉纱商人徐懋棠与杜月笙勾结，在一次棉纱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上赚了几十万银元，使得几十家棉纱经纪人因此破产，不少人上吊、跳海，舆论为之哗然，强烈要求查办。又是戴笠从中斡旋，叫徐懋棠拿出一元钱向国民党捐献几架飞机了事。同样，杜月笙对戴笠在上海的活动，也是鼎力支持。一九三二年，宋子文伙同蒋介石逼迫坚持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其后，十九路军的若干基层干部，由李楷、刘刚、刘文成、萧佩伟等为首，扮作接客之人，预伏在上海北站，准备刺杀乘专车到上海的宋子文。那天，宋子文与其秘书唐腹庐同时下车，身后跟着两名执冲锋枪的卫士。宋与唐年龄、身材相仿，又穿一样颜色的西装。李楷等误将唐腹庐当成宋子文，当场将他击毙。宋子文见状不妙，立刻跳下月台，躲于月台基石之后，在卫士的掩护下，得以幸免。事发之后，杜月笙立刻调集所有党羽，全力协助戴笠缉拿刺客。最后，终于将李楷等人捉获，交由国民党当局判处死刑。

这次杜月笙听说戴笠来访，知其必有要事，连声地说：“戴先生请进，请进！”

戴笠坐定之后，堆出满脸的微笑，对杜月笙说：他想以“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建立一支武装，要请杜月笙帮忙。原来，戴笠见各界群众激于民族危机的深重，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想乘此机会，扩大军统控制的武装力量。他曾命军统天津站长以“抗日”为名组织“便衣队”，结果拉起一支二千多人的队伍。这使戴笠大为兴奋，准备在上海等地如法炮制。七七事变后，上海的青红帮头目，曾由向海潜（又名松坡）领衔，通电“请缨”，自称有群众数十万人，愿意听候点编指挥。戴笠感到可加利用，便向

邢建榕：《潘汉年与杜月笙的一段交往》，载《档案与历史》1985年第1期。

1937年7月24日《申报》。

蒋介石建议，设立“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将青红帮控制的一批人编制为“别动队”。蒋介石批准后，戴笠便来到上海着手拼凑“别动队”。不料那些自称拥众数十万的青红帮头目，只替戴笠寻得数百人，而且其中多半是一批因长期吸食鸦片烟和海洛因而骨瘦如柴的“老枪”。这使戴笠大失所望，因此来找杜月笙设法。

杜月笙对戴笠来找他颇为自得。他问道：“戴先生建立别动队，大致需要多少人？”戴笠回答：“至少要一万人。”杜月笙听罢，故意沉吟不语。戴笠见状，忙摊出底牌：“这件事，我离开南京以前，已经向委员长请示过。委员长认为事在必行，他并且答应，所有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听得此言，杜月笙拿准这是件有名有利，又可以借机扩大自己势力的事情，内心决定插手，但脸上却不露一丝兴奋之色，反而故作慎重地说：“既然是一件大事，那就得多找几位朋友，分头设法，大家帮忙。”

当下，杜月笙便与戴笠拟定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名单，委员除了戴笠、杜月笙外，还包括国民党上海市长俞鸿钧，国民党上海军警两界负责人吉章简、蔡劲军，工商金融界的贝祖贻、钱新之，以及杜月笙的把兄弟、下野军阀刘志陆。筹委会地点设在位于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军统局三极无线电学校。

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以戴笠和杜月笙为主，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别动队”预定编制为五个支队、一个特务大队，一万人左右。为了凑齐这个数目，戴笠将军统在南京、上海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大小特务，集中起来，编成一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又强迫正在接受军训的二、三千名高中以上的学生编为一个支队。杜月笙则通过他在上海各区担任保卫团负责人的门徒，如闸北保卫团团团长洪雁宾、吴淞保卫团团团长唐承宗等人动员了一部分保卫团成员；又通过陆京士等人，利用部分工厂在八一三战争期间停工，拉了一些邮政工人、海员工人和码头工人；另外还动员了一些工商界从业人员参加“别动队”，凑成几个支队。

拼凑了上述力量之后，一九三七年九月上旬，蒋介石先后两次发来电令，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

“苏浙行动委员会”，设委员十五人：杜月笙、戴笠、刘志陆、宋子文、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钱新之、虞洽卿、吉章简、蔡劲军、张啸林，以及时任京沪警备司令官的张治中等人。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委。刘志陆，广东梅县人，早年当过潮梅镇守使，后在陈炯明部下担任第一军军长。陈炯明失败后，投奔张宗昌，任直鲁联军第三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张宗昌垮台后，他曾代理山东督办，后被刘珍年击败，携带多年搜括而来的财富，跑到上海作寓公。与杜月笙有八拜之交。

“别动队”编为五个支队，每支队辖三个大队，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区队下设三个分队。刘志陆任“别动队”总指挥。总参谋长杨仲华是杜月笙的门徒。杜月笙的另一门徒、国民党上海市第六区党部执行委员冯一先和杜月笙的私人秘书丘方伯分别担任行动委员会和总指挥部的秘书。“别动队”的五个支队中，第一支队司令何衡，字行健，别号无风，是杜月笙的门生，又是军统特务及清帮中人。第二支队司令和第三支队司令也是杜月笙的学生。上述三个支队中，有不少因“师生”、“兄弟”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工人。第四支队司令张业，是军统特务，其支队成员基本是戴笠原在南京、上海一带的部下。第五支队司令陶一珊，原是戴笠旧部，其所

率支队主要由高中以上学生军训总队的人员组成。

“别动队”成立后，戴笠在青浦建立技术训练班，在余山组织教导团，又在松江设立特训班，分期分批对一万多“别动队”成员进行短期军事训练，有的还进行了侦探、破坏、突击和暗杀等特种科目训练。

“别动队”的装备，蒋介石原来答应由国民党政府供给，但实际上，被服装具由“别动队”成员自备，因系自备，来源就复杂了。武器弹药除由当地国民党驻军供给部分外，另外的便由杜月笙等人设法，或搜罗散失在民间的武器，或让金融工商界捐钱购买，或叫各区保卫团捐献。

“别动队”成立不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侵略者在金山卫登陆。当时国民党主力部队集中在罗店、嘉定和黄浦江蕙藻派一带堵截日军，地处苏浙两省交界的金山卫防务空虚，日军得以乘虚而入，从南面包抄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后路。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的陈诚仓惶命令全军后撤。这时的“别动队”，除第三支队因主要成份是工人，抗日决心较大，拉到青浦与日军进行过一次战斗外，其余的未经一战，便溃散了。根据戴笠的命令，一部分撤向法租界。为使这部分“别动队”能进入法租界，杜月笙亲自出面与租界当局联系，法国总领事说：“杜先生的意思我们可以照办，不过，退下来的军队，按照惯例，必须全部解除武装。”杜月笙一口答应：“那当然。”结果，这部分人是缴了枪以后，躲入法租界的。其中，有的人重返原来工作岗位，有的参加了军统特务，如原二支队副官于松乔等，成为“军统上海区行动二队”成员，专门从事暗杀活动。另一部分逃到了江苏、安徽交界的屯溪、歙县等处。一九三八年，戴笠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将这一部分加以改编，又吸收了一些散布在浦东及太湖地区的土匪武装，如马伯生、丁锡山、张阿六所部，合并组成“忠义救国军”，以俞作柏为总指挥，何行健为副总指挥。这支以“救国”为招牌的特务武装，在抗日期间，不打日寇，却起劲地反对新四军和欺压百姓，从事绑架勒索、抢劫敲诈、强奸妇女等罪怒活动。有的甚至醜颜事故，为虎作伥。如杨仲华，担任了汪伪和平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冯一先担任了汪伪社会部的文教组长；丘方伯则成为汪伪所得税局局长，何行健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在苏南地区率领丁锡山等部五万余人投降敌伪，并收编了蒋介石留下的杂牌部队，出任汪伪“肃清委员会”副总指挥。这些汉奸武装，在日寇投降后，大多又被蒋介石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调去东北参加“剿共”，有的则在上海露面，充任接收人员。

三十六计走为上

八一三战争后，日本侵略者急于考虑在上海建立傀儡政权的问题。由于杜月笙在上海的特殊地位，日本人将杜月笙作为一个重要拉拢对象。

当时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以及日本陆军部、海军部驻上海的特务机关，每月要列出经费预算，专供做杜月笙工作使用，并派人对杜跟踪调查，将杜的交往情形、生活状况，列成专案，进行分析研究，不断向有关方面报告，以为拉拢杜月笙提供参考资料。

为了贯彻“以华制华”方针，日本内阁在一九三八年夏曾决定由陆军、海军、外务省三方面派出代表，组织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为作“负责

以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说得明白些，这是一个在中国负责寻找汉奸和制造傀儡政权的机关。该委员会尚未正式成立前，后成为其主要成员的两人，即坂西利八郎和土肥原贤二，在八一三战争后，便秘密来到上海，对杜月笙进行策反。

坂西利八郎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通，曾任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顾问多年，是日本预备役中将。土肥原贤二是日本高级特务，陆军中将，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后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一度出任奉天（沈阳）市长。后主谋把清朝下台皇帝溥仪诱到长春，建立伪满洲国，并参与策划对我国华北实行侵略的一系列事变，他曾洋洋得意地向日本参谋本部报告：中国“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但他脸上始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容，据见过这种笑容的人说：它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坂西利八郎首先进入杜公馆，向杜月笙许愿：如果杜在日军占领上海后，留在上海与日军合作，日本将在政治和经济上给杜许多好处。

眼见日本军队步步进逼，杜月笙早在考虑去留问题。上海是杜月笙的“发祥地”，他的党羽、则产和煞费苦心营筑起来的“安乐窝”，主要集中在上海；离开上海，迁往他处，未免有“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之虞。但若留下来，则必须和日本人合作。当时全国抗战情绪高涨，汉奸卖国贼在中国成了人人争欲食其肉寝其皮的对象。国民党内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由于自身利益受到日本侵略的损害，也被迫参加抗战，因而对未经他们同意擅自与日本勾结者开始采取暗杀等手段进行打击。这使杜月笙感到去留皆难，陷于首鼠两端的犹豫之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杜月笙多次和他手下的徒众议论。徒众中经营金融工商业的，认为日本人来了，照样可以做生意，因而大多主张他留下来；而搞特务和政治活动的，一则担心丧失自己已有地位，二则怕日本人报复，多数鼓动他出走。

就在这时，土肥原贤二继坂西利八郎之后，又来到杜公馆。五十岁出头的土肥原，鼻子底下留着一撮小胡子，眼睛附近的肌肉已经明显松弛，这使他更容易在脸上堆满笑容。根据日本有关方面的分析，杜月笙的老窝在上海，离开了上海的特殊条件，就不会有杜月笙其人。所以，他们认为杜月笙不会轻易做出离开上海的决定。因此，土肥原笑嘻嘻地对杜月笙说：“杜先生，你已失去离开上海的一切希望，你应该彻底而充分地与我合作。如果杜先生不肯为我效力，我们要列举你对我的故意行为，然后加以惩罚。”杜月笙久闻土肥原是个笑里藏刀的人，此时亲耳听见这番充满杀机的话从两片温柔嘻笑的嘴唇之中吐出，更使他感觉毛骨悚然。

在国民党内部派系中，杜月笙与英美派的关系超过与亲日派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又多多少少参加过一些抗日活动。因此，杜月笙一直担心上海沦陷后，日本人会对他进行报复。杜月笙原本有神经衰弱的毛病，夜里一个人睡不着觉，没有女人陪同，也得有个男伴，否则一有风吹草动，便疑神疑鬼，辗转反侧，吓得不能入睡。而且夜夜要有人为他捶背捶腿，一直捶到他闭眼睡熟，方才可以歇手退出。土肥原来后，杜月笙已处于紧张状态的神经，

更加重了负担，忧心忡忡，简直有点六神无主，为了稳定一下情绪，杜月笙离开华格臬路他常住的公馆，搬到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 553 弄）的姨太太姚玉兰处暂住。一天，杜月笙正和徒弟徐懋棠促膝密谈，忽然天空中传来一阵刺耳的怪叫声，杜月笙反射地跳起来，冲到天井里，以手遮日，抬脸仰望，只见一架机翼上漆着红色膏药的日本飞机正呼啸着从他住处上空掠过，飞去不远，又转来原处，周而复始地在附近作低空盘旋。杜月笙望着那黑沉沉地俯冲下来的日本飞机，感到似乎是对着他来的，脸上骤然失色，恐惧万分地跑回客厅，跌坐在沙发里，两眼直勾勾地发愣。徐懋棠见状，连忙对他说：“先生，最近我在蒲石路（现长乐路）买了一幢十八层楼的公寓，房子很讲究，请先生和娘娘搬到那里去住，一来避人耳目，二来日本飞机来了也不怕。”杜月笙闻言，连声说好，便带着姚玉兰搬到了蒲石路住进了十八层楼公寓里。以后杜月笙离开上海，姚玉兰仍住此地，因此有人称姚玉兰为“十八层楼太太”。

经此一吓，杜月笙去意渐定。同时，他也知道蒋介石集团不愿他们这些人留在沦陷后的上海。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劝告上海一些头面人物离开上海，例如虞洽卿便曾接到国民党政府宁波专员公署转来的蒋介石两个电报，一个劝他到内地从事工商业，另一个问他何日启程。因此，杜月笙把陆京士、杨志雄、钱新之等人找来，做了进一步讨论，最后认为：“香港是中立地区，可以静观待变，进退皆宜”，三十六计走为上，决定离沪去港。

不久，杜月笙得知与他在华格臬路比邻而居的把兄弟张啸林已与日本人拉上关系，决定留在上海；同时又听说日本人专门作了布置，以防止当时留在上海的宋子文、俞鸿钧、杜月笙等人离开，他感到如再不走，将更难脱身，便与国民党有关方面商定了离沪时间和方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晚上，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杜月笙将家属统统抛下，只带一名随身差役，乘着夜色浓重。由华格臬路登车出门。在附近监视的日本特务以为杜月笙仍象往常一样去蒲石路十八层楼公寓过夜，未加提防。杜月笙的汽车开到途中，却改换方向，悄然驶向位于法租界的一个轮船码头，在那里登上了法国客轮“阿拉密司”号，和宋子文、俞鸿钧等人同船投奔香港而去。

八 港居生活

重整旗鼓

杜月笙到香港后，力图重建昔日在上海的威势。

当时的香港是英国人的天下，香港黑社会有其自成系统的势力。杜月笙虽说名声不小，但香港对他来说毕竟是生疏之地。帮会中有句行话叫“唯有行客拜坐客”，此时的杜月笙是“行客”，当然不能也不敢象在上海时那样颐指气使。非但如此，有时还要受气。例如香港的生活习惯与上海多有不同，加上杜月笙在上海私家住宅散漫惯了。刚到香港时，住在九龙饭店，很多地方不适应，未免在饮食起居和待人接物上出些差次。这本是常事，但香港人欺生。经九龙饭店茶房添油加醋地向外一传，顿时茶楼酒肆都以此作为笑料。作威作福惯了的杜月笙哪里受得了这个气？这个久在江湖混的人物，居然也生出“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的感慨，急不可待地要改变这种状况。

经杜月笙催促，“小八股党”头脑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和杜公馆秘书翁左青、胡叙五先后抵港。

芮庆荣认识香港黑社会的一个小头目李裁法。这个李裁法当年是上海新光戏院一个售票的，曾拜清帮“通”字辈王妙纪为老头子，又经新光戏院老板夏连良介绍，结识了芮庆荣。后因在上海犯案，逃至香港，混了几年，成为香港黑社会一个略有声名的角色。芮庆荣到香港不久，李裁法重新和芮庆荣联系上了。李裁法势力膨胀起来后，曾被香港黑社会称之为“夜总会皇帝”、“香港杜月笙”。但那是后话，当时的李裁法还不是大角色。搜罗了他，对杜月笙来说，充其量多一个打手而已，要帮助杜月笙和香港黑社会大头目搭上关系，在香港打开局面，李裁法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能量。因此，杜月笙又把张子廉叫到了香港。

张子廉是杜月笙的“学生”，在上海办过三星棉织厂等，在工商界有一定影响。他在香港也没有什么势力。但洪门当时在香港黑社会中却很有力量。张子廉是洪门中人。一九二三年，张子廉与国民党中一些与洪门有联系的人如朱卓文、梅光培、明德、向海潜（即向松坡）结拜，在香港共开一座五圣山。按洪门规矩，开山还得立堂，五人分别立了堂，堂名用“仁义礼智信”五字，再加各人姓名中一字而成。朱卓文为“仁文堂”主、梅光培为“义培堂”主、明德为“礼德堂”主、向松坡为“智松堂”主、张子廉为“信廉堂”主。五人还划分了活动地区。朱卓文曾任孙中山卫队营营长，梅光培为孙中山外甥，民国初年担任过粤军南路司令。两人在广东、香港发展；张子廉是浙江人，向松坡是湖北人，两人在上海发展；明德是河南人，向西北发展。朱卓文在一九三六年被陈济棠枪决，梅光培在抗战前后已疾病缠身，抗战期间病死。但朱卓文、尤其梅光培旅港多年，在香港警察、海员、渔民中有不少“弟兄”，建立了一定的势力。张子廉到香港后，便利用他过去与朱卓文、梅光培的老关系，和香港帮会势力建立起联系。

香港帮会中的一些人也想借助杜月笙的“声名”，扩大影响。当年洪门中有一位风头人物杨庆山，因独开两山，被称为“双山头大爷”。他的左右手刘联珂，那时正在香港，写了一本书，名为《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特请

杜月笙题字。舞文弄墨之事，杜月笙不敢逞能，于是转请曾任复旦公学教员和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秘书的杨千里代笔题字。为了加强笼络，杜月笙又掏出五千元港币，替刘联珂将《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印刷十万册，广为发行。

经过这些活动，杜月笙这个“行客”与香港的“坐客”开始慰洽平生，互通声息了，这为他在香港的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

不久，杜月笙的姨太太姚玉兰及长子杜维藩、长女杜美如和杜月笙的一些“学生”如沈楚宝、林啸谷、郭兰馨等先后来港，还有个叫吴家元的，经杜月笙召唤，也抵达香港。

这吴家元既非杜月笙亲属，又非杜月笙“学生”，为何要把他叫来香港呢？其中自有原因。

吴家元是个小白脸，讲究仪表，善于词令，早年曾作清客，混迹于北洋军阀门下。有一度经常陪张宗昌打麻将。吴家元赌博时善于作弊，赌桌之上，偷牌、换牌，无所不有，而且不露痕迹。打麻将时，吴家元与张宗昌配对，张宗昌所需的牌，要啥有啥，场场全赢，这使张宗昌大为高兴，就在赌桌上赏了吴家元一个青岛盐务局长的美差。吴家元干了几家，大大捞进一票之后，想到上海来见见世面。到上海后，他经常进出泰昌公司、宁商总会和公记中华票房等赌场。这些地方正好也是杜月笙常去之处。有一次吴家元在赌场上碰到了杜月笙，而且同桌共赌，赌的是挖花牌。挖花牌类似打麻将，四人一组，共一百二十八张牌，先各取牌二十张，可吃可碰，但是要凑满九对，才能和下牌来。最后一只算麻将，是单的。麻将头以四六幺三为最尊。这种赌法比较刻板，难以作弊。连赌一、二个月，吴家元每局必赢，场场得利，杜月笙竟输掉了十万大洋。靠烟赌起家的杜月笙，想不到在阴沟里翻了船，心里极为恼怒，他知道吴家元一定在作弊，但以他这样的老手，在牌桌上却也看不出吴家元的破绽。这事被杜月笙在公共租界的朋友严老九知道，决意为杜月笙提“老千”。他拿了张报纸，坐在吴家元、杜月笙等人的牌桌旁，假意看报纸，实际却透过事先在报纸上戳的一个小洞，目不转睛地盯着吴家元。吴家元只顾防前，未及瞻后，几局打下来，被严老九看出破绽。赌完之后，严老九上前拍拍吴家元的肩膀，不露声色地说：“老兄，阿好等等？有桩事体想要请教。”吴家元一听，情知不妙，脸色顿变，只好随严老九走进另一间房间。严老九关上门，对吴家元一阵冷笑：“老兄手段高明，佩服，佩服！”吴家元毛骨悚然，连忙试探道：“老兄的意思，阿是跟我劈壩？”严老九面孔一板，厉声讯问吴家元：“依阿曾算过，我们月笙哥自从和你同桌以来，一共输了多少钱？”吴家元这才明白严老九是在代杜月笙索财，立刻打躬作揖说：“严老板，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请你放我一码杜先生那边我明天一定有所交代。”第二天，吴家元果然拿了一张名片到华格桌路杜公馆求见。门房引见后，他涕泪交流地跪在杜月笙面前求饶：“杜先生，求你高抬贵手。”杜月笙笑嘻嘻一笑，问吴家元：“你现在预备怎么办？”吴家元连忙回答：“明天请杜先生照旧再去泰昌公司，我和杜先生合伙，杜先生不用拿一文赌资，你输过多少，我负责替你赢回来。”从此以后，吴家元成为杜月笙在赌场上的一个重要助手，有吴家元“保驾”，杜月笙在赌场上当然再也不会翻船。

杜月笙叫吴家元到香港，除了因为在赌场上少不了吴家元外，还有更重

要的一层原因，就是吴家元和日本人有关系。杜月笙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日本人并未放弃争取杜月笙，杜也不愿完全断绝与日本人的往来。杜月笙的元配沈月英，陈姓姨太太，还有他的庞大家财都留在上海，日本人丝毫未加触动，内中原因，双方心照不宣。日本侵略者当时在华有三大特务机关，分别以“松、竹、梅”为代称。“松”机关的主持人为和知鹰二，他手下有两名重要特务何益三、李择一。这两人是吴家元的好友和赌伴，凭着这些关系，吴家元可以自由进出于已被日军控制的华北地区。吴家元到香港后，杜月笙经常让他到沦陷区去完成一些秘而不宣的任务。

由于来人增多，杜月笙搬出了九龙酒店，在九龙柯士甸道上，向澳门烟赌大亨高可宁赁得一幢双开间门面三层楼住宅，将妻小党徒安置在内。于是香港也有了“杜公馆”。吴家元、顾嘉棠、芮庆荣等起先和杜月笙住在一起，后因家眷陆续抵港，便在柯士甸道附近的德承街上租了一些公寓房子，搬出另住。叶焯山等则一直与杜月笙住在一起。在外另住的党徒，每天中午以前，都到杜公馆报到，听候差遣。为了招待这伙人。杜公馆中午总要开出一桌酒席，美酒佳肴，极其丰盛。而且常有用轮船、飞机从上海带来的江南特产，以慰众党徒对上海奢侈生活的思念。

香港杜公馆虽比不上当年上海杜公馆那样冠盖如云，但随着杜月笙周围各式人物的增加，也开始车水马龙，日益热闹起来。

“赈济事务”

杜月笙到香港时，正值南京沦陷不久，国民党政府的重心迁移到武汉。

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受到中国人民坚决抵抗，这使他们感到单纯使用军事手段无法征服中国，因而抓紧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企图通过扶植傀儡政权，达到统治中国的目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表示：“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旦发展，而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为了建立傀儡政权，日本侵略者四出活动，到处拉人。

这种作法，引起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的焦虑，他们担心因此将增加亲日派的力量，损害他们的利益，便想方设法阻止一些受到日本帝国主义青睐的人物公开投奔“膏药旗下”。蒋介石认为杜月笙亦官亦民，又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便于作这项工作。但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为使社会秩序保持相对的稳定，英国殖民当局对黑社会的活动也给以一定约束。杜月笙到香港后，英国殖民当局对他一直有所防范，为了给杜月笙提供活动便利，蒋介石决定给他一个头衔。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因中日开成，降旗归国，特地绕道香港，向杜月笙转达了国民党政府的意见。他对杜月笙说：“大战一起，赈济工作千头万绪。希里杜先生能参与赈济委员会的工作。”杜月笙正因在香港没有公开身份，时常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查询而恼火，即刻点头应允。许世英回汉口后，向蒋介石禀报了杜月笙的态度。不久，蒋介石便下令扩大中央赈济委员会，委派杜月笙为常务委员，分管第九救济区的事务。第九救济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杜月笙受委之后，在香港成立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自任主任。同时，又亮出了他原有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招牌。因为会长王正廷当时正在驻美大使任上，所

以杜月笙把“红十字会总办事处”也设到了香港。有了这两块招牌，杜月笙在香港活动大为便利。

当时，南洋群岛、印度、泰国、缅甸等地的爱国侨胞，为了救济国内无数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难民，曾向赈济委员会捐献大笔款项。但这些款项给难民带来的好处，不过是一些“仁丹”和“万金油”，大部分落入那些高官大亨的私囊，其中一部分则被杜月笙用来“扶植义民，吸引忠义”。这些所谓“义民”，说穿了便是日本人可能或正想加以利用的失意政客、落魄名士。

还在九一人事变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对下台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等人作了大量策反工作。当时，段祺瑞蛰居大连观望形势，图谋东山再起。日本特务土肥原通过曾任清末总督岑春煊幕僚的周善培对段祺瑞说：“宣统皇帝是一块大招牌，合肥如能与他合作，号召力比单干大得多。”段祺瑞闻言心动，专程到天津和溥仪会晤。可是溥仪不愿屈驾段祺瑞住所，段亦不肯枉顾溥仪宅第。于是，两人相约至载洋家中会面。段祺瑞曾任清末湖广总督，溥仪在他面前大摆皇帝架子，开口便是：“鄙人不才，忝为国家元首。”但后来窃居过民国执政的段祺瑞，却已不愿服小，对溥仪妄自尊大的态度极为恼火，两人因此谈崩。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直接与段祺瑞见面，表示将由日本大仓洋行垫款五百万日元作为段祺瑞的活动经费，支持段祺瑞出山组织所谓政府。段祺瑞因而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说：“事已至此，只好想办法收拾残局。我认为盗已入室，但亦未必即据为己有，只有给他些东西，让我们自己收回来再说。”半隐半露地表明了他准备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态度。

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利用段祺瑞想念时在上海女儿的心情，让钱新之设法说服段祺瑞南下。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日，段祺瑞所乘火车路过南京，蒋介石亲自到下关迎接，以手搀扶，口口声声称段为老师。但段祺瑞到上海后，便被国民党有关方面控制起来。以后，国民党政府任段祺瑞为“国府委员”，段未就职。不久，段移居庐山，七七事变前病死。

段祺瑞虽然病死，但他手下的不少人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反对象。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由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操纵，在南京成立了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这个梁鸿志便曾经担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秘书长。“维新政府”的内政部长则是杜月笙的把兄弟陈群。

为了防止其他一些人继续背着蒋介石擅自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杜月笙利用侨胞捐款，先后将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时的交通总长曾毓雋、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汤漪等人接到了香港。这些人到香港后，开始大多住在杜月笙家里，以至有人说：“香港杜公馆开出十桌饭，俨然是段祺瑞内阁复活了。”

除了段祺瑞系统的人，国民党政府通过杜月笙的“赈济事务所”，还动员了其他一些当时有一定影响的人物迁居香港。

这些人的到港，迅速扩大了杜月笙的影响，他得意洋洋地在门前挂上了一副楹联：“老夫生平好奇古，使君意气凌青霄”，这是受他“赈济”的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借杜甫两句诗写来赠他的。

庆祝杜月笙先生六秩寿辰筹备委员会编：《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

段祺瑞为安徽合肥人。

在香港世面越作越大，公馆设在九龙，来往过海，未免诸多不便，杜月笙便在香港告罗士打饭店，租下了705号房间，由秘书翁左青、胡叙五常驻该处，他则每天午睡后，来这里晤客会友。其座上常客有国民党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等人。因为来找杜月笙的人多，705号房间容纳不下，告罗士打饭店八楼咖啡座实际上变成了他的大会客厅。在这里，杜月笙通过各种关系，又编织起了一张无形的网。这张网成为国民党政府与上海等沦陷区联系的重要渠道之一。当时有些报纸因此吹捧杜月笙说：“身在江湖，心存干济，海中此岛，蔚为置邮传命之枢，天外一身，隐负乾坤旋转之重。”

组织“统一委员会”

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间，广州、武汉相继沦入日军铁蹄之下，早就抱民族投降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在此前后加紧了与日本侵略者的勾结。

这年十一月中旬，汪精卫派高宗武与梅思平到上海，在虹口东体育会路7号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秘密谈判。因为东体育会路7号后为土肥原的公馆，名为重光堂，所以日方称这次秘密谈判为“重光堂会谈”。通过这次秘密谈判，汪精卫代表与日方代表签订了反共卖国的《日华协定》，并制定了汪精卫逃离重庆的行动计划。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潜离重庆，经昆明，于十九日逃至河内。二十二日，近卫文麿发表声明，鼓吹“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叫嚷“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要求中国“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之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二十九日，汪精卫发表《艳电》，表示愿意以近卫的声明为基础，与日本进行“和平之谈判”。次年五月六日，汪精卫及其随从在活动中心。

汪精卫抵达上海后，原属蒋介石集团的国民党留沪人员大批叛变，公开投靠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集团。曾任国民党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的丁默邨首先当了日本特务。“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等也先后投敌。其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留沪常委蔡洪田、汪曼云更率同大批职员携卷带印，集体作了汉奸。汪曼云投降日本前，杜月笙曾写信给他，要他派人“打入汪伪组织”。其时，汪曼云已和汪伪发生关系，为使自己的投敌得到杜月笙赞同，他曾复信杜月笙说：“所有的人大多已暗中投汪伪，除自己去参加外，实已无人可派。”所以，汪曼云的投敌，杜月笙事先是知道的。这么多重要干部投敌，使国民党政府留在上海的班底几乎全部动摇，舆论为之大哗。

蒋介石为了摆脱舆论压力，同时也不甘心上海的地盘完全被汪精卫抓去，便把CC头子陈立夫找来训斥一通，命令他重建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陈立夫当场请准给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以国民党“中央代表”名义，派他秘密潜赴上海，收拾残局。

吴开先去上海前，先由重庆经昆明、河内，抵达香港，专程拜访杜月笙。

杜月笙虽身居香港，对上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他在香港与上海间设有专用电台。此外，杜月笙与当时已投降日本，并为日本在上海从事情报活动

的李士群等人也有联系。李士群，浙江遂昌人，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生。二十年代初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此时，由于受大革命高潮的影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去苏联留学。后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上海逮捕，很快自首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一九三八年，李士群从汉口到上海，投靠日本侵略者，以大西路67号（现延安西路665号）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这时的李士群尚势单力孤，他知道杜月笙人虽去了香港，但在上海仍有很大势力，为了扩大自己的队伍，也为了在降日问题上取得杜月笙“谅解”，以增加身家性命的安全系数，他千方百计与杜月笙拉关系。有一次，日本驻沪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交给李士群一份题为《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的材料。这份材料出自法租界的纳税华人会秘书张师石之手。张师石是杜月笙一手扶植起来的，因此对杜月笙的情况颇为熟悉。他在这份材料中详细介绍了杜月笙的出身、经历，杜月笙与法租界的烟赌业、上海市地方协会，以及与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钱新之、杨虎、陈群等人的关系。还介绍了杜月笙手下“小八股党”、得意门生、贴身亲信等一批人的情况。详细叙述了杜月笙与戴笠的特殊关系。李士群拿到这份材料后，立刻打电话将杜月笙的“学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留沪常委汪曼云找去，将材料交给他看，并作出副愤愤不平的腔调对汪曼云说：“我觉得张师石太没有良心，杜老待他不错，他却把杜老出卖了。你看，这份东西就是他写给日本人的。”汪曼云看后，提出要亲自带去香港交给杜月笙看，李士群满口应承。汪曼云拿了材料，即刻动身去香港，将它交给了杜月笙。杜月笙看后，很重视，让秘书整整抄了三天。当汪曼云准备离港返沪时，杜月笙对他说：“我们也对李士群表示一下好感，你回去时买些东西送给他。”汪曼云遵嘱照办，在香港买了一只金表和两套西装衣料带回上海，送给了李士群。

正由于有这一类关系，所以杜月笙得知吴开先去上海的目的后，立刻满包满揽地说：“你所携带的文件和密码，统统交给我，由我指派受人代你秘密运进上海。另外，我再写信给黄（金荣）老板和金廷荪，你到上海后，请他们两位出面，把你所需要探望的人，全部请到金廷荪的公馆，一顿饭吃下来，事体也谈成功了。”之后，又代吴开先安排好了去上海的路线。当吴开先乘坐的外国客轮驰抵黄浦江时，一艘汽艇趁着浓黑夜色的掩护，悄悄靠了上来，原来万墨林早已接到杜月笙的通知，带着若干保镖来接吴开先了。

万墨林将吴开先接到预先给他安排好的住处。并给他提供了自备汽车。吴开先在上海住了半年后，深感工作开展不易，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原来在上海的一批重要骨干，逃走的逃走，投敌的投敌，整个组织基本垮台了。而其他系统的人员，如军统特务和帮会势力对他又不买账。为此，吴开先不得不暂回重庆设法。回重庆途中，吴又至香港拜访杜月笙，将上述苦恼对杜说了。杜月笙早想将上海的各种势力统一于自己名下，因此乘机对吴开先说：“上海这个地方相当重要，所以中央各部院开会，经常都有人派去上海，但各有各的任务，各做各的事情，见面可能都不认识。这种做法，用人多、用钱多、用气力多，却收不到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的效果。开兄回重庆，可以建议中央，设一个总的机构，全盘负责上海的工作。人员不妨大家都派，有了事情大家一道做。”

吴开先返回重庆后，将杜月笙这一意见向蒋介石、陈立夫做了汇报，经他们同意，决定设立一个“上海统一委员会”。为此，陈立夫、吴开先分别征求了吴铁城及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等人的意见，提出了“上

海统一委员会”成员的初步名单。名单包括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时任国民党财政部次长的俞鸿钧，军统局头子戴笠，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经常充当蒋介石军事代表的蒋伯诚，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朱家骅系统的三青团骨干吴绍澍，以及吴开先、杜月笙。对这一初步名单，吴开先不甚满意，担心俞鸿钧被指定为主任委员，将给他带来诸多不便。因此，主张沦陷区地下组织与公开组织性质不同，人数宜少不宜多；而俞鸿钧、王晓籁又不能离开重庆，以不参加为宜。所以到最后决定时，去掉了俞鸿钧、王晓籁两人，剩下五人。五人中，杜月笙在香港，戴笠在重庆，吴绍澍则在上海秘密筹组三青团，吴开先来往于重庆上海之间。蒋伯诚原在重庆，有一娇妻留在上海，便乘吴开先告假回渝之际，请命去沪。因此，吴开先在重庆期间，蒋伯诚便动身去沪，他也取道香港，住在圣斯酒店。杜月笙投其所好，命长子杜维藩、徒弟郭兰馨等人陪同他吃大菜、跑舞厅，整日里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杜月笙而外的几个委员，与杜月笙都有些特殊关系。戴笠是杜月笙的拜把兄弟，蒋伯诚是杜月笙的玩场知己，吴绍澍是杜月笙的“学生”。吴开先考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上海工商界的影响比不上杜月笙。他的个人信用，也远不及杜月笙，就是在国民党内各派系间他也不如杜月笙兜得转。同时，他明了杜月笙是个领袖欲很强的人，不甘居人之下。因此，力主五人中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这一意见得到戴笠支持，陈立夫也表同意，最后经蒋介石批准，决定派杜月笙担任这个由国民党、三青团、中统、军统、帮会势力凑合而成的“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为此，吴开先专程去香港，向杜月笙传达了蒋介石的口信：“上海的阵地是不能丢失的，以后请月笙先生多偏劳了。”杜月笙听到要他担任主任委员的决定后，曾问蒋伯诚：“主任委员是什么级的官？”蒋答：“要论级么，见官高一级，因为主任委员是委员的头子。要问有多大么，比上海市长还大，因为市长管不了当地的党和团。要讲阔么，比行政院各部部长还阔，因为部长最怕的是特工，而你则在特工首脑之上。”杜月笙听后颇为得意，哈哈大笑。

从这以后，杜月笙才向吴开先介绍了他安插在上海的主要人物。一个是徐采丞，此人是杜月笙对外联系的负责人。所谓对外联系，主要是与日本方面联系。徐采丞原来跟随史量才，史被刺身亡后，便周旋于杜月笙与钱新之间。他开办的民生纱厂，一度濒于倒闭，后求助于杜月笙，结果非但未倒闭，反而又赚了不少钱。因此，对杜月笙感恩戴德，甘心为其所用。上海沦陷后，上海地方协会主要人物大多离开上海，徐采丞以会员身份接任总干事职务，留在上海，并设法和日本“兴亚院”拉上了关系。“兴亚院”是日本新设的机构，任务是“加强管理中国事务”，下设政治、经济、联络等部，分支机构遍布当时的北平、青岛、上海、汉口、厦门、广州等沦陷区。所有中国的汉奸组织，都要接受“兴亚院”和日本军部的双层监督。当时日本海军、陆军、外务省等部门在具体的对华政策上，看法并不一致，矛盾重重，因此往往各自通过自己的途径与国民党政府发生接触，以达到诱蒋投降的目的。他们认为徐采丞有杜月笙为背景，是与国民党政府联系的重要桥梁，对他兴趣颇大。所以经“兴亚院”介绍，徐采丞又结识了日本海军、陆军、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如川本等。正由于这些关系，徐采丞才能安然留在上海，并成为杜月笙对外联系的负责人。杜月笙对内联系的负责人是万

墨林，他是杜的表弟、总管家。所谓对内联系是指与军统特务、各游杂部队驻沪人员、杜门中人及租界探警等的联系。

向吴开先介绍了这两人及两人所掌握的关系后，杜月笙还派人去上海关照徐采丞、万墨林两人以后要对吴开先的工作采取合作态度。并通知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张季先为吴开先的工作提供便利。张季先曾是杜公馆的清客，与法国驻沪总领事交情甚好。

经过这番安排，吴开先和当时逗留在香港的蒋伯诚一起到了上海。他们向在沪的吴绍澍、徐采丞、万墨林等传达了“上海统一委员会”的组织经过，并指定万墨林任总交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冯有真、中统驻沪代表陆鸿勋、吴开先的表兄龚仰之为专员。数天后，徐采丞出页在杜月笙之妾姚玉兰所住十八层楼公寓为吴开先、蒋伯诚洗尘，邀请一些头面人物作陪，其中有世界书局经理、出版界及大学联谊会负责人之一陆高谊，交通大学校长何炳松，公共租界华董、会计师奚玉书，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姚惠泉，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张季先等人。吴绍澍、万墨林、冯有真也在座。宴会上，徐采丞首先发言，他告诉大家：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统一领导机构，负责上海的“反汪抗日”工作，并强调“该机构由杜先生负责，因为杜先生在香港，所以由我代表他邀请诸位来开碰头会”，接着将“上海统一委员会”三位在沪委员逐一介绍。蒋伯诚、吴开先也讲了话，他们声称：“上海是国际观瞻所系，抗日工作开展得如何，可以影响国际舆情，决定国际支援的多少。因此，委员长特别请杜先生来领导，还要我们来上海和大家共同工作。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在蒋委员长的统一指挥下从事一切工作。”这番话表明“上海统一委员会”完全是一个贯彻蒋介石旨意的机构。从此以后，这个机构算是正式开张。

“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与汪伪争夺上海金融工商界的一些巨头，例如虞洽卿。上海沦陷初期，虞洽卿未走，将他属下三北公司的三艘轮船改挂挪威旗帜，行驶于南洋、香港间。

一次他随轮船去港，碰上正与杜月笙一起办“赈济事务”的许世英，许对他说：“阿德哥，上海救济事业政出多门，希望你回沪与工部局西董协商，成立一个华洋合作的统一救济机构。”虞洽卿返沪后，正遇上战区难民大批涌入租界，栖止无所，工部局认为有碍“市容”，大伤脑筋。虞洽卿乘机提议组织华洋合作的救济机构，租界当局表示同意。很快便在广东路90号三北公司三楼成立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以虞洽卿为会长，英商太古洋行大班为副会长。担任难民救济协会会长后，虞洽卿突然发起组织“平糶会”，他说得冠冕堂皇：“中日战事正在扩大，上海储粮至多供应两个月之用，升斗小户，两日余米为炊，一旦缺米，问题十分严重。未雨绸缪，必须早为之备。因此希望大家筹垫款项，向西贡定购洋米，开办平糶，以维持市民口粮。”实际上，组织“平糶会”的真正原因是：一、用救济协会的名义购买平糶米，容易获得进口照会。二、以赈济难民为名，海关则只能收码头捐，不收进口税。三、虞洽卿本人可以浑水摸鱼地搭运西贡米。正由于有这许多好处，所以虞洽卿不但在上海组织。“平糶会”，以后又举办“宁波平糶会”、“镇海平糶会”、“三北平糶会”等，从西贡不断运米进口，油水捞足。时人因此称其“米蛀虫大王”。虽然虞洽卿极力否认他经办平糶会发财，但就在这一时期，人们看见虞洽卿用一百万元买进了南京西路、成都路盛宣怀家祠地皮；用五十一万元买进了“大上海戏院”；用七十万元买进了神州旅馆门面；

用六十万元买进了泥城桥鸿福里、重华新村。虞洽卿在上海大发国难财，乐极忘离。日本侵略者因为他是上海头面人物，极力想诱他投降。为此，曾特地从日本搬来一个与虞洽卿有旧交的八十余岁老翁，劝说虞洽卿与日汪合作。虞洽卿因惧怕“汉奸”这顶帽子，未敢答应，但他与日汪却没有断绝来往。周佛海在上海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不堪回首话当年》，以此拉拢动摇分子下水。虞洽卿看后，赞叹周佛海“会写文章”，还和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丁默邨等人见面。

这些情况被吴开先等人得知后，十分恼火。虞洽卿是工商界有相当影响的人物，与蒋介石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他公开投靠日本侵略者，将使蒋介石集团在全国人民的舆论中处于更为尴尬的境地。因此吴开先等人极力想赶在日汪前面，将虞洽卿拉离上海。虞洽卿与杜月笙为了争夺上海地盘，长期来明争暗斗。虞洽卿出道早，杜月笙后来居上，两人互不相让，表面上一团和气，内心里却刀矛相向。因此，杜月笙的心腹万墨林听说虞洽卿与日汪有来往的情况，立刻主张采用断然手段处置。他对吴开先、蒋伯诚说：“这还不好办吗！虞洽卿现在还没有被日本兵保护起来，只要你们讲一句话，我马上告诉戴老板手下的人，很容易动手！”但虞洽卿毕竟不是小人物，可以随便处死，蒋伯诚摇手说：“这可要慎重，没有委员长的命令是不能动的。”最后，吴开先出了一个主意：“不妨以吴铁城的名义代拟一个电报，告诉他要立即离沪去渝，否则性命有危险。再派几个彪形大汉去吓唬他一下，我想他就不敢再呆下去了。”众人表示赞同，于是依计而行。虞洽

卿经他们连骗带吓，才下了离沪的决心，他将在沪事宜留交他的长子虞顺恩处理，自己则去了香港。在那里，俞鸿钧和杜月笙以“上海统一委员会”的名义设宴为他“压惊”。以后，虞洽卿由香港转道去了重庆。

事后，吴开先曾吹嘘：“统一工作委员会在沪正式成立后，

第一项工作即尽力劝导工商银钱界及知识分子离沪赴港，转入大后方”，“终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银钱业较知名之士，无一敢冒不韪而参加敌伪之金融组织者。此事第一由于孔庸之部长之运用得力；第二应归功于杜月笙先生之鼓励成功。”

助高宗武、陶希圣出逃

一九三九年五月底，汪精卫带了周佛海、高宗武等人去日本，与取代近卫内阁的平沼内阁谈判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的问题。这年十一月，日方代表与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再次举行秘密谈判，于十二月三十日签订了名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密约。这一密约包括承认伪满洲国具有合法地位，保证“对日亲善”，规定了联合“防共”，以及日本对中国各种权益的要求，是一个空前的卖国密约，不久，日汪密约的摄影件即为蒋介石集团所掌握，并在香港公之于众。是谁泄露的？不是别人，就是积极参与其事的高宗武、陶希圣，而杜月笙则是重要的居间人。

高宗武，浙江永嘉人，早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因发表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被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所赏识，并为蒋介石所器重，抗战初期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希圣，湖北黄冈人，

北伐战争时任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宁汉分裂后到上海任《新生命月刊》总编辑，后去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初期，高、陶两人都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追随汪精卫、周佛海叛国投敌。但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滋味并不象他们原来想象的那样好受。一方面，大小汉奸不断被刺，他们闻讯未免心惊肉跳；另方面，日本人颐指气使，也使他们难以忍耐。同时，在汪伪酝酿组织伪政府过程中，由于内部的倾轧，他们在权位的分配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加上他们在参加日汪密约谈判过程中，对汪精卫、周佛海接受日本方面提出的过高要求也有所不满。上述种种原因，促使高宗武、陶希圣两人产生另找出路的想法。

他们想以盗窃并披露日汪密约为代价，重新回到蒋介石集团。高宗武为此找他的同乡黄群设法。黄群，字溯初，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民国初年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参加过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织的进步党，在国会内与国民党对抗。袁世凯称帝时，追随梁启超参加过讨袁活动。后至上海担任通易信托公司经理。经商失败，去日本从事日语源研究。黄群受高宗武之托后，因自己过去与国民党对立过，便转而找了徐寄庠。徐寄庠闻讯，立刻写了张条子：“高决反正，速向渝洽”。交给徐采丞。徐为此专程由上海赶去香港，向杜月笙报告。

杜月笙与高宗武有过交往。抗战初期，高宗武来往于香港、上海间，进行投降活动，事被香港《华侨日报》察知，曾登出消息揭露。高宗武扬言要告《华侨日报》，杜月笙出面“调解”，色厉内荏的高宗武立刻就坡下驴，表示：“看杜先生面子，打消原意。”杜月笙因此称赞高宗武：“这位朋友很落槩（明事理、讲交情的意思）。”

杜月笙闻讯之后，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于是关照徐采丞在香港暂住两天，自己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急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

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投降日本，同时带走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这使国民党政府的威信骤跌。日本方面预先拟定参加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还有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及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等军政界要人；一向被视为汪精卫派的彭学沛、谷正纲、甘乃光、王世杰等人当然更在汪伪争取之列。如果这些人继汪精卫之后有所行动的话，将进一步削弱国民党政府力量。因此，蒋介石一直想寻找机会给汪精卫集团予以打击，以稳住己方阵脚。所以，在张群陪同杜月笙向蒋介石报告了高宗武希望重新回到蒋介石集团的消息后，大为高兴，立刻指示杜月笙约黄群面谈。

杜月笙回香港后，对正在等候的徐采丞说：“你即刻回上海，让黄溯初火速来香港，和我当面接洽。”不到十天，黄群应邀抵达香港，向杜月笙详细介绍了高宗武及陶希圣的情况，为了备忘，还亲笔给杜月笙写了一份报告要略。

杜月笙与黄群晤谈的第二天，带着黄给他写的报告要略，再次飞抵重庆，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听后，写了一封给高宗武的亲笔信，称高为“浙中健者”，要杜月笙设法转交。杜月笙回香港后，即密令万墨林做好护送两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的准备。

这时日汪密约已进入即将签字阶段。日本和汪精卫方面担心机密泄露，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规定日方由矢荻，汪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不管怎样小的纸片，都不准带出会场。高宗武等便将每次参加谈判的结果牢牢记住，离开会场后逐条整理出来，并由高宗武内弟沈惟泰翻拍成胶卷，冲洗

两份，准备带走。

陶希圣由于和汪精卫集团产生裂隙，感到住在愚园路 1136 弄内和汪精卫等在一起不自由，同时也为了掩盖去意，已派他的学生鞠清远到香港把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接来上海，便另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居住，当时正称病在家。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高宗武来到陶希圣住处，两人秘密商订了出走时间和计划。其后，由万墨林购买了两张一月四日由上海驶往香港的美国“胡佛号”轮船票，按照杜月笙指定的方式，交给了高宗武、陶希圣。一月四日这天，陶希圣在家里坐汽车驶往国泰饭店，让汽车停在门外，他则由前门穿到后门，再在那里雇了出租汽车到轮船码头，和高宗武先后搭上“胡佛号”轮，离沪去港。

高宗武、陶希圣的出走，使汪伪集团大为恐慌，他们立刻派人控制了陶希圣的住宅和家属。陶希圣的妻子为此去愚园路 1136 弄，找到陈壁君说：“我们家眷从香港搬至上海，只有两星期，若是陶希圣有走的打算，他不会接家眷来上海。我决定自己到香港去，连劝带拉，要他回上海。”但陈壁君不允。恰在这时，汪精卫收到陶希圣由香港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说：如果汪不保障其家属安全，他将走极端。陶希圣参与过汪精卫集团的许多机密要事，汪很清楚所谓“走极端”，便是全盘公布他们的卖国丑行，这不能不令汪精卫心悸。于是答应陶希圣妻子留下三个大孩子，带两个小的去香港劝陶希圣返回上海。陶希圣妻子赴港后，给陈壁君拍了封电报，称：“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精卫、陈壁君因此稍稍心定，与周佛海等人离沪去青岛，在日本侵略者主持下，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伪“南京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谈判伪南京政府的组织问题。

乘此空隙，陶希圣与杜月笙筹划，派曾资生到上海与万墨林取得联系，设法营救陶希圣留在上海的三个孩子。在万墨林的心安排下，一月二十日陶希圣的三个孩子抵达香港。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即公布了“日汪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大公报》又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在这封信中，高宗武、陶希圣承认“日汪密约”“为苛刻”，“为夷我国于附属，制我国于死命”，但同时仍然散布“日本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有结束之途径”。为了替他们过去的投降活动辩解，鼓吹“曲达直达，不妨殊途同归”。

一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就“日汪密约”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说：“日汪密约”表明日本欲“以中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等，统由日本统治，俾其他各国之一切活动，均受日本国策之打击，且以此‘中日新关系调整纲领’之日汪协定，而根本取消各国在东亚之地位矣”，强调“日汪密约”将损害英、美、法等国在华利益。英、美、法等国当然明白蒋介石说这番话的意思，二月十三日、三月七日，美国政府先后两次决定贷给国民党政府美元四千万。

《新华日报》同一天发表社论，严正声明：“我们向全世界人士宣布，汪精卫汉奸及其他投降分子，自其发表《艳电》之日起，即已成为中国抗战和中华民族的叛徒和罪人，这些民族叛徒没有权利和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我们坚决不承认汪逆以及其他投降分子与日寇所订的任何条约，我们誓死反对任何卖国条约和任何方式的向敌投降”，并号召全国人民“大大地展开反对汉奸汪精卫及其他投降分子的投降妥协的斗争”！

“日汪密约”公布后，蒋介石拨款二十万元给杜月笙，以为酬劳。汪精

卫却不无埋怨地说：“我跟他有什么难过，他竟这样来对付我！”

高宗武、陶希圣折伙而去，并公布了“日汪密约”，给汪精卫沉重的一击，为蒋介石立了一功。不久，高宗武领了国民党政府赏给的一笔美元外汇，到美国去。陶希圣则在香港被日军占领后，辗转回到重庆，并经陈布雷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当了蒋介石的笔杆子。

九 地下工作种种

刀砍傅筱庵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日，汪精卫集团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欲取蒋介石集团地位而代之。这对重庆国民党政府构成了严重威胁。蒋介石为了打击汪精卫集团，命令军统特务对投敌的汉奸予以制裁，于是上海接连不断地发生暗杀恐怖事件。这些事件有不少和杜月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上海沦陷后，傅筱庵继苏锡文之后，担任了伪上海特别市市长。他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上海总商会会长，是一个长袖善舞的政商两界活跃分子，在上海金融工商界有较大的影响。他的投敌，给蒋介石争取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带来一定的麻烦。

同时，傅筱庵还做了一件使蒋介石很为恼火的事。汪精卫投敌后，戴笠曾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派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去河内刺汪，结果错杀了曾仲鸣。戴笠只得另外寻机刺汪，但汪防范严密，很难下手。戴笠后来发现军统局书记长吴贻恕的父亲有位朋友叫许天民，当时担任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办事处经理，许天民和傅筱庵私交很深，经常出入傅筱庵家中。戴笠决定通过吴贻恕作许天民的工作，要许天民动员傅筱庵协助暗杀汪精卫。如果傅筱庵同意，便准备在汪精卫到上海时，由傅以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的身份设宴招待汪，席间由军统特务寻机将汪击毙。许天民答应试探一下，把这一计划对傅筱庵说了。傅当面称好，暗中却向汪精卫告密。汪伪特工总部因此逮捕了许天民。原任蒋介石第四战区高参，后接受蒋介石秘密使命佯投汪伪的戴星炳，也因参与此事，暴露身份，被汪伪特工抓获后杀死。蒋介石闻讯之后，大动肝火。命令军统不惜一切代价除掉傅筱庵。

杜月笙在上海的关系，因此行动起来，协助军统特务执行这一任务。

杜月笙有一姓张的保镖，山东人，身体结实，头脑活络。杜去香港后，这保镖由万墨林指挥，留在上海继续为杜卖命。有一次，他突然找到万墨林，问道：“万先生，有一桩生意，要不要接过来做？”万问：“什么生意？”那保镖悄声答道：“傅筱庵”。接着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万墨林一一作了介绍。

傅筱庵家有个老佣人叫朱升源，幼时家境贫寒，靠父亲给地主打长工度日。十岁左右，父亲病故。他流落上海，在日商纱厂当童工，受日本资本家虐待。贫困之下，患了一场大病，被一脚踢出厂门。病好之后，经同乡介绍，到傅筱庵家当佣人，专门服侍傅筱庵的父亲。朱升源为人诚恳，手脚勤快，很得傅筱庵父亲信任。傅筱庵那时尚年轻，还在读书。傅筱庵父亲临终时，嘱咐朱升源好好照顾傅筱庵。朱升源发誓不负所托，一直跟随傅筱庵达三十多年。傅筱庵当了汉奸后，自知难容于国人，担心被暗杀，整天疑神疑鬼，连自己的小老婆都不敢相信，唯有对朱升源信任如故，每顿饭都要朱做。朱升源为人爽直而有烈性，过去当童工时饱受日本资本家虐待，对日本人很反感，曾私下劝傅筱庵辞去伪市长职务，不要再当汉奸，免得遭人暗算。傅筱庵却听不进。朱升源因而对傅筱庵日渐不满。

万墨林得知这一情况后，大为兴奋。他知道傅筱庵家住虹口，戒备森严，五步一哨、十步一岗，一般人不要说靠近傅筱庵，连接近他的住宅都不可能。傅筱庵在告发了许天民等人后，更是戒心重重，草木皆兵。在这种情况下，

要暗杀他是很困难的。因此，万墨林立刻关照那位张姓保镖策动朱升源暗杀傅筱庵，并说：“事情办好，问我拿钱。”

一九四一年十月九日晚，傅筱庵坐装甲汽车去参加日本人举行的宴会，喝得酩酊大醉，至凌晨三时左右方回到家里。进屋之后，房门也未曾关好，便倒在床上呼呼睡去。

接受了暗杀任务的朱升源候到这一良机，当然不肯放过，将预先准备好的菜刀藏在短袄衣襟里，蹑手蹑脚地掩进傅筱庵房间。见傅正仰面朝天地打鼾，便抡起菜刀，对准傅筱庵的脖子猛砍下去，污血顿时象泉水般喷涌而出，傅筱庵哼都未哼一声，就一命呜呼了。朱升源砍死傅筱庵后，骑上一辆自行车，逃至杜月笙的老窝法租界躲藏起来。到了这年十二月份，军统局沪二区负责人陈恭澍投降日伪，当了汉奸，军统局恐朱升源被日伪搜出，电令军统局沪一区安排朱升源经浙江金华逃往重庆。朱升源到重庆后，与杜月笙接上了关系，由杜月笙告知戴笠，发了五万元奖金给他。以后，朱升源便依靠这笔奖金，在重庆张家花园开了一家小型手工卷烟厂谋生。

枪击张啸林

八一三战争之际，和杜月笙、黄金荣一起号称上海三大亨的

张啸林，躲到了莫干山避暑。上海将近沦陷时，日本特务潜往莫干山，高官厚禄劝诱张啸林下山与日方“合作”。利欲薰心的张啸林得意洋洋地下山返沪。

当时，杜月笙尚未离沪，张啸林与杜月笙曾反复讨论留沪和去港的利害得失。杜月笙名气渐响后，加紧了与国民党上层的勾结，感到到了香港可以再“做世面”。而张啸林主要还是在烟赌业上做文章，此类生意，离开特定条件就难作了，因此他担心“物离乡贵，人离乡贱”，而且他与亲日的皖系军阀有历史关系。所以，权衡之下，杜月笙认为去香港有利，而张啸林却感到留沪有利。两人主意各定。张啸林皮笑肉不笑地问杜月笙：“月笙，你几时荣行？让我为你饯行吧！”工于心计的杜月笙搪塞道：“八字没有一撇呢，还早！”不久，杜便瞒着张啸林，离沪去港了。

上海沦陷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通过曾任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下财政总长的李思浩与张啸林正式洽谈“合作”条件。张啸林提出要当伪“上海市长”或伪“浙江省主席”。土肥原为诱张啸林早日上钩，要李思浩转告张啸林：“没有问题。”张啸林闻言后，喜上眉梢，心痒难熬地要李思浩安排他和土肥原正式见上一面，以把事情“敲定”。张啸林本意要让土肥原亲自到他家里请他出山，但土肥原没有赏他这个脸，而约他至位于虹口区的东湖旅社见面。这对张啸林来说，未免煞风景。但张啸林做官心切，只好在礼数上受些委屈，答应按时前往。

到了约定时间，张啸林由他的儿女亲家俞叶封陪同，带八名保镖，分乘三辆汽车向虹口开去。车到外白渡桥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哨卡以未奉到命令为理由加以阻止，迫使张啸林的车队在外白渡桥停了半天。因此，张啸林去日租界的事，很快就在上海纷纷扬扬地传开了。这是土肥原特意导演的一个插曲，目的是以非正式方式将张啸林准备当汉奸的事公开化，以影响上海其他“大亨”。张啸林好处尚未到手，卖身投靠的企图却已暴露，心里好不懊丧。见到土肥原后，懊丧之意更增。原来，日方这时已加紧了与汪精卫集团

的勾结。与汪精卫者流相比，张啸林等人的利用价值当然小得多。所以，土肥原对原来答应给张啸林的官衔一字不提，而改口要张啸林回杭州去，组织“维持会”，帮助占领杭州的日军恢复“秩序”。张啸林大为恼火，但在主子面前不敢撒野，只得答应先派一名亲信去杭州帮忙。

张啸林回家后，正准备关上房门出出日本主子给他受的那口腌臢气，未曾想到他那与杜月笙儿子一块上学的孩子当面问他：“爸爸，杜维翰说外面人都在讲二伯伯要当汉奸了。”这一来，好比火上加油，张啸林一蹦八丈高，腾腾地冲到与他隔墙相联的杜月笙家中，抬头向楼上喊叫：“二楼！二楼！”他叫的是住在二楼的杜月笙的第二房姨太太、杜维翰的生母。她闻声探身问道：“二伯伯，有啥事体？”张啸林问：“二囡在？”杜维翰跑出来：“在、在、在。”张啸林喝道：“二囡，阿是侬在讲我当了汉奸？”杜维翰支吾道：“我不过是听到人家在讲。”张啸林不肯罢休，追问：“讲！是啥人讲的？”杜维翰被逼不过，向万墨林身上一推说：“我听墨林哥讲的。”张啸林立时三刻把万墨林叫来，问道：“墨林，你敢说我是汉奸？”万墨林连忙摇头否认，并赌咒发誓说：“神明在上，我万墨林要是说过那句话，叫我一出大门，就被汽车轧死！”

但是张啸林当汉奸的事实，毕竟不是万墨林赌咒发誓能够改变的。不久，张啸林便与俞叶封等人一起，公开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用日本人拨给的武器，装备手下党羽，专门为日本侵略者强征粮食、棉花、煤碳等物资。他们仗着关系多、地理熟，加之在上海附近活动的忠义救国军中不少成员是他们的狐朋狗友，因而起了日本人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搜集物资的范围日益扩大，甚至从安南（今越南）采购煤炭，运到上海，再转铂华中一带。日本人因此获得不少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与此同时，大量金元、美钞滚滚流入张啸林、俞叶封等人的荷包。

张啸林、俞叶封为日本人大肆搜括战略物资的行动，给国民党政府造成一定困难，也损害了杜月笙在沪利益。因此这两方面都有心杀此两人。

俞叶封民国初年曾任嘉兴、上海水路缉私营统领，以后投靠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成为他们贩运烟土的重要助手。俞叶封当了汉奸后，专程去香港拜会过杜月笙和戴笠，得到了对他个人安全的某种担保。但当他的行动超越了许可范围，这种担保便成了一纸空文。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四日，有个叫陈默的来找万墨林。陈默，字永思，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心狠手辣，在国民党军校高级班受过专门训练，抗战前曾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组长。抗战后，戴笠要在上海组织一个“行动小组”，杜月笙将陈默推荐给他，陈因此担任了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负责人。陈默告诉万墨林：“俞叶封这票货色就要成交了。”第二天，陈默带领若干便衣人员，到更新舞台楼上第一排就座。更新舞台当时正由新艳秋挂头牌在唱“玉堂春”。俞叶封对新艳秋居心不良，几乎有戏必来，大捧其场。陈默等人侦知这一情况后，便化装成观众，声色不露地坐在他的旁边。观众听戏至入神处，全场鸦雀无声。负责执行的特务，从腋下伸出手枪，对准近在咫尺的俞叶封，一枪便结束了他的性命。戏院内顿时大乱，人们潮水般涌出太平门，只留下俞叶封的尸体歪倒在座椅上。

俞叶封被杀后，张啸林惊慌失措，除了每天晚上去大新公司五楼赌博消遣外，很少外出。如果不得不出门，总要带上十余名保镖，分乘三辆汽车，前呼后拥地疾驶而行。但他的行动规律还是被国民党军统局有关人员摸着

了。有一次，张啸林的汽车经过善钟路、霞飞路口时，红灯突然大亮，汽车被迫减速。国民党军统局人员用手提机枪对准汽车乱扫一气，张啸林的司机见状不妙，猛踩油门，汽车象发疯似地闯红灯而去。

张啸林自善钟路、霞飞路口死里逃生后，几乎足不出户。有一次张啸林的徒弟、时任伪杭州锡箔税局局长的吴金桂来找他，两人躲在华格桌路张啸林住宅三楼密谈，忽然窗外传来一片叫骂声，张啸林探头朝外一望，见是他雇佣的一批保镖在吵闹，他立时破口大骂：“吃饱饭没事体做，吵什么！老子去叫点东洋宪兵看门，用不着你们了。把枪放下，统统滚蛋！”他不知，这场吵闹正是要引他出头。保镖中有个叫林怀部的，乘他骂得起劲，抬手就是一枪，正巧打中张啸林咽喉，张那颗刚才还凶相毕露的脑袋，顿时象淋淋漓漓的破夜壶垂吊在窗台前摇晃，吴金桂见状，拿起电话想叫日本宪兵救命，被林怀都冲上楼，一枪击中后脑。打死两人之后，林怀部立在门口大声叫嚷：“我杀了大汉奸！我杀了大汉奸！”张啸林的其他保镖无一人上前，只在一旁说：“老林，好汉做事好汉当！”法租界安南巡捕来后，林怀部爽爽快快地随同他们去了巡捕房。

杜月笙与张啸林被杀到底有怎样的具体关系？因为碍于“江湖义气”，杜月笙一向讳莫如深。知道内情的万墨林等人见其师忌讳，也不敢多加吹嘘。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做过一些微妙的表露，杜月笙曾说：“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陈默他们交待林怀部干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的老把兄，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万墨林则透露，抗战以后，林怀部由法租界巡捕房安然无事地被释放出来，曾要求他代向国民党中央请功。

营救万墨林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管家，又是杜月笙在上海的重要代表，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日伪为了争取杜月笙，很长时间内未动他一根毫毛。汪精卫集团组织伪南京国民政府后，蒋汪矛盾更趋尖锐，在他们的激烈争斗中，万墨林秉承杜月笙的意旨，协助军统等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作了一些事情，损害了汪精卫集团的利益，日汪决定给他点颜色瞧瞧。一九四一年底，汪精卫集团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发表一份通缉名单，其中就有万墨林。

风声一紧，万墨林未免惊惶，躲在华格桌路杜公馆，足不出户，还通过法租界巡捕房的老关系要了四名安南巡捕，带一部铁甲车，一挺机关枪，日以继夜地守卫在门口。

汪伪特务要闯入法租界，从戒备森严的杜公馆抓走万墨林，是不容易的。他们便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叛变人员，安排了一个钓鱼之计。国民党“上海市统一工作委员会”成员之一吴绍澍手下有个情报员叫朱文龙，被汪伪收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利用手中的秘密电话号码，接连给万墨林打了三次电话，谎称有重要情报面交。万墨林的神经当时已很紧张，轻易不敢出门，一连推托了两次，但朱文龙仍坚持要见，万墨林吃不透到底是怎样的情报，只好答应了。将到约定时间，万墨林戴一副茶色墨镜，坐一辆黄包车，在车上拚命低着头，恨不能把脖子伸进胸腔里去，偷偷摸摸到了金门饭店（今华侨饭店）门口，四处一寻，见朱文龙正站在国际饭店对面向远处眺望。万墨林悄悄跑到朱文龙身边，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自以为接头成功。岂料，就在这时，来了四名彪形大汉，一把揪住万墨林，将他反剪双手，结结实实捆

成一只大肉粽，塞进汽车，辗转送到位于虹口的日本宪兵队。初审之后，又送到极司斐尔路 76 号汪伪特工总部。

在汪伪特工总部，万里浪、吴四宝、余爱珍等人对万墨林进行了审问。

万里浪原来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上海沦陷后任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副队长，一九三九年秋投降了汪伪，任汪伪敌工总部第一处处长。吴四宝早年是杜月笙手下“小八股党”骨干之一高鑫宝的汽车伙，后来投靠李士群，担任汪伪特工总部警卫总队长，是 76 号时著名打手。余爱珍毕业于上海启秀女中，年青时被人以酒灌醉破了身。后来认清帮“通”字辈季云卿为干爹，混迹于黑社会之中。她为人泼辣狡诈，被吴四宝看中，两人臭味相投，结为夫妻。

这些人与万墨林原来都在一条船上，彼此都熟透的。余爱珍见到万墨林，便带着讥讽的笑容嘲弄道：“万先生，侬也来啦！”吴四宝则不无威胁地说：“万先生，你是高来高去的人物，我吴某人不过烂泥里面的小水蛇，不过今朝委屈你万先生到了这里，烂泥蛇也布下了天罗地网，就怕你进来容易出去难，插上翅膀也飞不动！万先生，我劝你遇事将就，不必太认真！”

其实，万墨林对杜月笙与日汪的关系相当清楚，他明白日汪目前还不至于置他于死地。只要包住杜月笙关照他不要讲出去的事情，杜一定有办法救他。因此，几次问下来，万墨林提供的情况没能满足汪伪特工总部的需要。于是，吴四宝命令：“喊四个人上来，把万墨林先生请下去，关照他们好好地做！弗要辜负万先生的好身胚。”万墨林知道所谓“做”，就是上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肥胖的身体本能地缩成一团。在刑房里，万墨林被剥光衣服，吊了起来。见桶冷水浇下去，万墨林浑身布满鸡皮疙瘩，上下牙齿哪儿——哪儿直打架。以后，他们还请万墨林伏过老虎凳滋味。万墨林开始还硬撑，但几块砖头加上，他吃不消了，正巧看见原先在“忠义救国军”当过什么“司令”、后来投降日本人在“76号”任行动总队长的林之江走进刑房，立刻大呼小叫道：“哎哟，林司令，帮帮忙！”这位林司令果然帮忙，立刻命令行刑者从老虎凳上解下万墨林，还找了两个人扶着他在花园里转了几个圈子，让万墨林活络活络筋骨，免留残疾。对犯人如此“仁慈”，在以杀人为儿戏的“76号”内，恐怕是破天荒第一次。不久，万墨林连这点皮肉之苦也免去了。他老婆在外面给汪伪特工总部“老板”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送了十万块钱，叶因此吩咐下面：“关照 76 号，万墨林块头太大，只能问，不能打。打了他或许会中风的。”

杜月笙在香港很快得知万墨林在上海被捕的消息。万肚子里装了杜许多机密，如果嘴巴被撬开，对杜是很不利的。杜月笙急如星火地命令留在上海的门徒营救万墨林。但当时李士群借故避到了广东，“76号”内与杜月笙有关系的汪伪特务只能设法照应万墨林，却不敢担肩胛予以释放。杜月笙因此决定直接找汪伪南京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

抗战以前，周佛海在国民党政府当官，迷恋上海的花花世界，经常到这十里洋场鬼混，少不了与杜月笙打交道。抗战以后，周佛海当了大汉奸，但是与杜月笙的关系并没有中断。

杜月笙请来周作民的下属李北涛，要他去找周佛海。周作民留在沦陷后的上海，一方面与重庆保持联系，并让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表之一徐采丞在他位于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住宅设立与重庆联系的秘密电台；另一方面，与日汪也有联系，特别与周佛海往来密切，有时一个月内两人面谈竟达十二、

三次之多。李北涛跟随周作民多年，与周佛海私交也不错。他接受杜月笙委托后，专程去南京见了周佛海，两人密谈一通后，周佛海当即命令给上海汪伪特工总部拍去一封电报，电文为：“万墨林性命保全，并予优待。”三天之后，万墨林即被移送到四马路（今福州路）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关押。在那里，万墨林住特别囚室，亲戚朋友不拘何时都可以前来探望，吃的、用的、穿的，成批送进来。万墨林名为坐牢，实际等于住疗养院。

不久，周佛海设法将万墨林提到南京，亲自接见了，对他说：“万墨林，你自家做的事情，自家晓得。‘76号’那两扇门，向来是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要释放你，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过，杜先生的面子我总归要买。这么样，从现在起，你先在南京关一阵，我再把你送到上海关一阵，只要关节打通，我自会放你。”

还需要打通什么关节呢？原来傅筱庵的小辈风闻万墨林与乃父被杀有关。因此，万墨林被捕，他们非常高兴，一直把状告到日本最高当局，要求严办万墨林，以报杀父之仇。所以，当汪伪方面与日本军方开会商议如何处理万墨林时，日本军方坚持不同意将万交保释放。

杜月笙得知这一消息后，叫徐采丞等人找北洋政府时期的东北籍国会议员金鼎勋设法。金鼎勋是著名的“日本通”，与日本“兴亚院”的坂田、冈田往来密切，金鼎勋对他的日本朋友说：“中国有杜月笙，正如日本有头山满。杜月笙和头山满都是大亨，将来中日战争和平解决，势必要借重头山满和杜月笙的力量。这个万墨林是杜月笙的至戚、总管、驻上海的代表，你们杀了他，并无多大意思。何不放掉他，借此在杜月笙面前留个交情，将来接触起来，不是好说话得多吗？”这番话与日本侵略者打算继续争取杜月笙的想法不谋而合，用万墨林的话来说是：“日本军阀政阀对杜先生还存有双方合作的痴心妄想。”所以，日本军方最后同意了释放万墨林。

万墨林又被押回上海，关在虹口日本宪兵司令部。通过各种秘密途径，他得知了自己将被释放的消息，悬在半空的心，总算回到胸腔里，每天吃困困，笃定得很。与他同室的几名难友，曾在天花板上挖了一洞，邀他一起越狱，他不以为然地说：“我劝诸位不必冒这个险。就算登上了屋面，外头还有围墙、电网、警犬、哨兵，我们很难逃出去，这是其一。第二呢，我有把握，我这个官司顶多不过一年半载，等我放出去以后，我会想办法来救你们。”不久，万墨林毫毛未损地离开了日本宪兵队，而那些难友万墨林却一个也未去救。

万墨林出狱之后，蒋介石、朱家骅分别送了他五千元、二千元的“慰问金”。杜月笙心头一块石头总算落地，接连给万墨林去了三封信，对他说：“你对得起我”，还煞有介事地称赞他“劳苦功高”。

“中储券”引出的血案

“中储券”又称“宁钞”，是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发行的货币。

汪伪政权成立之前，沦陷区市制基本未变，继续沿用国民党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农民银行）和小四行，即中南、通商、浙兴、四明等银行发行的钞票。以梁鸿志为头子的伪“维新政府”，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六日在南京成立“华兴商业银行”，作为伪国家银行，并发行“华兴券”。“华兴券”虽在市面通行，但只能按票面八折或九折计

算，不久即告停用。以王克敏为头子的伪“临时政府”，通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主要在华北沦陷区流通。此后，日本占领军在中国沦陷区发行一种“军用手票”，规定与日元等值使用，但不能在日本国内流通。

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出任伪财政部长。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汪伪政权颁布《中央储备银行筹备委员会章程》，以周佛海为筹委会主席，积极筹设中央储备银行，作为汪伪政权的“中家银行”。十二月八日，周佛海和日本大使馆的参事官日高秘密签订《关于设立中央银行之覚书》。一九四一年一月，“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正式成立，周佛海兼任总裁，并开始发行“中储券”。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中储行”在上海外滩前华俄道胜银行旧址设立了上海分行。为扩大影响，汪伪派人到处贴标语、撒传单，大吹大擂。但上海市民报之以藐视，将标语、传单扯掷于地，以脚践踏。上海银行钱业公会一致决议，坚决不与“中储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拒绝使用“中储券”。为此，周佛海密令汪伪警政部长兼特工部主任李士群，派出大批特务，手持“中储券”，往各大公司、商店购物，如对方拒绝接受，便拔枪相对。这些公司、商店忍气吞声，被迫收下。汪伪特工总部还给规模较大的银行、钱庄投寄恐吓信，说如不接受“中储券”，就要给以最严厉的报复。依靠这些特务流氓手段，“中储券”在上海市面渐渐流通。

“中储券”的发行和流通，危及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地位。因此，重庆方面密令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打击“中储行”。阻止“中储券”发行和流通。根据这一密令，军统特务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针对“中储行”的暗杀行动。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军统特务首先杀掉了“中储行”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接着，军统特务又在二月二十日袭击了“中储行”上海分行。

这天上午十时十五分，三名军统特务身着便衣，相继进入“中储行”上海分行。其中一人迅速掏出两枚手榴弹，用力投向屋内。另一人直奔二楼，也投出两枚手榴弹，但急忙中药线门子未拉开，手榴弹没有爆炸。这人返身下楼，正撞上银行的一个保镖，他即拔出手枪，将保镖打得从楼上翻滚下去。三名军统特务得手后，趁着混乱，逃之夭夭。当大批日本宪兵和租界警务处派出的中西探捕赶到时，等着他们的只有狼藉不堪的现场，鲜血淋漓的尸体和呛鼻的火药味。

一个月后，“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设计科长楼侗，又被军统特务暗杀。之后，“中储行”上海分行的庶务科长潘旭东、帮办总会计卢杰、财政部科员冯德培、稽核科主任万鼎模等，也先后在军统特务的枪口下丧命。

经这一系列暗杀行动，本已业务不佳的伪中储行上海分行，更是门可罗雀，行内职员吓得宁可敲掉饭碗，也不敢去上班。“中储行”上海分行濒于关门打烊。

周佛海得此消息后，气得七窍生烟，立刻以汪伪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命令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报复。

于是，就在楼侗被杀的当天晚上和次日凌晨，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制造了两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三月二十一日深夜十一时五十分，汪伪特工总部的大批特务带着手提机

枪和短枪，分乘两辆汽车，疾驶至霞飞路 1411 弄。下车后，特务们冲到该弄 10 号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门前，狂按电铃。茶房以为是租界的巡捕，便拉开铁门。特务们急涌而入，将正在熟睡的十一名银行职员厉声唤醒，拉出房门，强迫他们排队站好，由三名特务用快慢机对准他们猛扫。顿时，血溅四壁，这十一名银行职员相继踣倒在楼板上。特务们将浸在血泊里的尸体翻来滚去地狠踢了几脚，认为没有幸存者后，才爬上汽车，扬长而去。

次日凌晨，汪伪特工总部的大批特务，又全副武装，乘坐两辆汽车，驶至极司非尔路 96 号（今万航渡路 455 号）中国银行的职员宿舍，抓走了一百七、八十名银行职员。后来，中国银行化了很多金钱，托了很多人情，费了不少周折，汪伪特工总部才同意将被捕人员具结连保释放。

制造了这两起大案后，汪伪特工总部仍不肯罢休，又于三月二十四日袭击了中央银行留沪机构。上海沦陷后，中央银行分两处设立了办事处，一处 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逸园跑狗场，另一处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一家汽车行里。汪伪特工总部化验室主任，根据李士群的命令，特制了两颗定时炸弹，由特务偷偷送进这两个办事处。到了预定时间，两颗炸弹同时炸响，结果炸死炸伤十六人。周佛海得报，洋洋得意，命发给伪特工总部赏银三万元。李士群嫌少，不无牢骚地说：“这次赏了三万元，算是他有生以来最大一笔赏金了，其实还不够我两个炸弹的成本费哩！”

面对汪伪特工总部的频繁进攻，军统特务决定“以牙还牙”，他们派出三名特务，携带利斧，混入大华医院，将正在那里养伤的伪中储行上海分行业务科长活活劈死。

汪伪特工总部闻讯后，再次闯入中国银行职员宿舍，抓走了中国银行的一些高级职员，并从中挑出三人枪毙，实行“以三抵一”的报复。

蒋、汪特务围绕“中储券”展开的这一场混成，杀得难解难分。汪伪政权固然有损失，但由于当时的上海是沦陷区，汪伪特工以日本侵略者为靠山，可以明火执仗地干，而蒋方特工则处于地下状态，不易采取大规模行动，因此蒋方损失更大。军统局感到再斗下去，对己不利，于是戴笠要杜月笙出面斡旋，设法停止这场以银行职员为对象的屠杀。

杜月笙为此拍了个电报到上海，召来绰号“花会大王”的门徒高兰生，要他通过吴四宝向李士群传递戴笠的意图。吴四宝当年在上海滩曾拚命巴结杜月笙，但那时他是个小角色，杜公馆大门都难以进去。虽然如此，吴四宝一直把杜月笙当作他崇拜的偶像，希望有朝一日能象杜月笙那样从泥淖里窜进“龙门”。抗战以后，他依靠日本侵略者和汪伪特工总部的势力混阔了，与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有矛盾和争斗，但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仍然不敢做得太绝。杜月笙托人要他传话，他当然照办。李士群早就与杜月笙有联系，这时看到日汪的命运并不如自己希望的那样美妙，狡兔三窟，也愿意和重庆方面“旧情重好”，即顺水推舟接受了杜月笙的“调停”。于是，吴四宝让人给杜月笙传去一个充满流氓腔调的口信：“吴四宝对杜先生的吩咐焉敢不遵！结果如何，敬请拭目以待。”不久，军统局上海的特务得到戴笠的命令，停止攻击汪伪银行职员。

蒋汪双方特务的一场恶斗，就这样由杜月笙“摆平”。

搭救吴开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活动据点，因而受到威胁。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利用突然袭击，取得了暂时胜利，借助这种声势，采取了逼迫蒋介石集团屈服的强硬政策，拟定了进攻重庆的计划，并命令日军从宜昌向西进攻。与此同时，下手破坏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特务机关。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晚间，国民党“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吴开先在上海被日军逮捕。

吴开先当时在上海，名曰做“地下工作”，实际上经常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每天十六圈麻将是雷打不掉的，经常伴赌的有万墨林、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冯有真、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驻沪代表陆鸿勋等人，有时蒋伯诚夫妇也参加。一九四二年春节，吴开先为了收买人心，给他手下的几个亲信干部各发一笔赌本，邀集他们携带全家老小开庄掷骰，狂斗滥赌。抗战前曾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作过门卫的沈守良，当时在替吴开先管理杂务，为了使他分得一些油水，便大量抽头，一连数日，沈守良发了一笔意外横财。手中有钱了，沈守良不再守良，时常寻机到外面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当时日军已进占租界，汪伪特务的活动范围扩大，很快发现了沈守良，不久便将他逮捕，通过沈守良，找到了吴开先的秘密住处，逮捕了吴开先。

继逮捕吴开先之后，日本特务机关又对蒋伯诚采取了行动。蒋伯诚当时住在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的曲园，很少外出，由专人定期与他联络，蒋伯诚妻子杜丽云陪同在上海。杜丽云曾是平剧演员，好出风头，爱凑热闹，长期蛰居在家，未免气闷。不久，她便开始每天出门，望朋友，买东西，甚至听戏看电影。日汪特务很快发现了她的行踪，立刻派人盯梢，找到了蒋伯诚的住所，对他加以监视。日汪特务逮捕了吴开先后，蒋伯诚突然中风，半身不遂，躺在床上不能动。一次，日汪特务乘有人去蒋伯诚处联络，冲进去逮捕了联络人员，因蒋伯诚正中风，便将他软禁在住处内。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地下工作”，从此近于瘫痪。

杜月笙能够出任国民党“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开先是帮了大忙的。吴开先每次回重庆“述职”，都经由香港返沪，向杜月笙作汇报。一九四一年秋，吴开先被捕之前，还曾去过香港杜月笙处。当时日汪已在香港设立特务机关，专门监视国民党政府及其他方面来往于沪港的人。吴开先只得绕道菲律宾，乘船抵沪。为此，杜月笙特给时在菲律宾交通银行任职的王正廷、国民党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牲、副总领事朱少屏打了电报，要他们接送吴开先。临行时，杜月笙根据他收集到的“情报”，对吴开先说：“我兄此去，风险更大，而敌人亦多。但愿吉人天相，如有缓急，当尽力帮助。赴沪请与徐采丞先生多多接洽。”表示支持吴开先。

吴开先被捕，杜月笙正在重庆，他担心自己在上海的势力削弱，四出活动，极力营救。吴开先在重庆牛角沱的住宅内设有与上海联系的秘密电台，吴被捕后，上海方面与这一电台的联系中断了两天，之后又重新向这一电台发出呼号。按秘密工作规定，这一电台显然已不宜使用。杜月笙却置之不顾，继续利用它和上海联系。直到当时也在重庆的吴绍澍发现与这一电台联系的上海电台确已发生变故，杜月笙才被迫停止通报，转军用军统局电台联系。

万墨林在吴开先被捕的当天，就接到了杜月笙给他的电报：

“不借一切代价，务尽全力营救。”万墨林立刻带着这封电报去找徐采丞，交谈之下，知道徐采丞也收到了同样的电报。万墨林心急慌忙地询问徐采丞：“怎么办？”与日本侵略者广有联系的徐采丞胸有成竹地回答：“就照杜先生的嘱咐办，不惜一切代价，务尽全力营救。敌伪那边，我要上上下下的打点，从牢头禁卒以至审案法官，再往上去一直到可能相关的军政大员，我要用钞票贯倒他们。第一不能让吴先生吃苦头，第二要保全他的性命，然后再徐图营救出狱之计。”两人商定之后，便开始分头行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一九四二年五月上旬，日军集中大量兵力进攻中途岛，遭到美军的坚决反击，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和大批作战人员。以此为转折点，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由攻势转为守势。八月上旬，美军在瓜达耳卡纳耳岛登陆展开反攻，几经激烈争夺，瓜岛被美军占领。在瓜岛争夺战中，日本损失了几乎所有能够调去的陆海空军兵力，从此丧失了作战主动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重新提出“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再次加强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诱和活动，企图以国民党政府断绝与英美关系为条件，与其达成所谓“全面和平”。

由于日本改变了他们对重庆方面一度采取的强硬政策，使杜月笙营救吴开先等人的活动大为便利。吴开先以后在《抗战期中我所见的杜月笙先生》一文中对杜月笙营救他的活动作了如下回忆：“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晚间，予突被捕，直至十月十一日经徐采丞先生之多方设法，始得恢复自由。徐采丞先生处已电积尺余，均为月笙先生探询情形，拨款营救，并嘱接济家属之电。采丞先生奉命唯唯，为予奔走，达数月之久。一面请颜惠庆先生出面说情，一面向日方军政人员致送厚礼，并对看守狱卒以至承审人员，予以厚赂，闻月笙先生个人耗费至百万元以上。”文中提及的颜惠庆，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后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任清政府驻美使馆参赞、外务股长，以及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等职。一九二六年曾以国务总理身份代行总统职权。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英、驻苏大使和出席国际联盟大会首席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交游广阔，与日本许多重要官员有联系。

在此期间，日本有关方面曾派出代表去江苏宜兴张诸镇附近会见“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另一负责人、时任国民党江苏区监察使的吴绍澍，告知了徐采丞几个月来与上海日本军部联系营救吴开先等人的情况，并以反共与和谈等问题对国民党方面进行试探。由此可知，如何处置吴开先等人，实际上成为日本诱蒋介石集团和谈的一张很重要的牌。

经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交易，吴开先、蒋伯诚等人终于从日本人手中获释。一九四三年三月，吴开先由上海日本军部派飞机送至广西，然后大摇大摆地返回重庆。杜月笙亲迎吴开先于重庆郊外，意味深长地对吴说：“今日我始放心矣！”之后，杜月笙还与陈立夫、戴笠等人先后设宴，为吴开先“压惊”。

因为吴开先被释放得蹊跷，所以他回重庆不久，许多爱国民士和国民党内的抗战派纷纷提出质问。国民党政府却置若罔闻。吴开先有恃无恐，竟然继续利用他家中的电台与上海已被日汪控制的原国民党地下电台联系，上海因而传出吴开先正受重庆委托与日方和谈的消息。有人为此要陶百川劝阻，但得到的答复却是：“该事业经陈立夫、戴笠、杜月笙批准”。以后，事情被捅了出去，舆论哗然，参政会中有人要求审讯吴开先。在这种情况下，

蒋介石才被迫命令吴开先停止与上海通报。吴开先为避风头，悄然移居重庆郊外化龙桥。据他以后说：“予静居重庆凡三年，一无工作。月笙先生知予素无积蓄，时予资助，每一晤及，辄询问起居，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内，吴开先是由杜月笙养活的。

十 避难重庆

撤离香港

杜月笙迁居香港后，曾数次去重庆，与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张群、戴笠等人会见，或参与策划，或负责执行国民党方面一些不便公开的事宜。但他抗战期间定居于重庆，则是一九四一年底之后的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与此同时，马尼刺、香港、新加坡等地也遭到日军的袭击；泰国宣告投降；北平、上海、天津的英美驻军被日军解除武装。

那天，杜月笙正在重庆和戴笠密谈，突然接到有关上述事变的电报，大惊失色。他知道，以英国在香港的驻军是无法抵抗日军进攻的，他曾对人说：“果真要打起来，香港是守不住的，香港守军只有英军两三个营，再么就是九个营的红头阿三（印度兵），统统是些坐享清福的少爷兵，打仗的时候，根本就派不上用场。”担心自己在香港苦心经营起来的据点，再度丧失。戴笠也不无烦恼，有许多重要人物，例如从汪精卫集团分裂出来、重新投靠蒋介石集团的陶希圣等人还留在香港，这些人如果落到日军手里，将给蒋介石增添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杜月笙、戴笠两人当晚通宵不眠，拟定了一张所谓营救名单，准备利用日军尚未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救出一些他们需要救出的人来。

名单虽然拟定，但当时日本飞机正在轰炸香港，一时找不到愿意去香港的民航机驾驶员，戴、杜两人不禁为之搔头。就在这时，有一位时在重庆的港商，来找戴笠。此人在香港有百万家财，大部分存在银行，担心香港一旦陷落，他的财产将全部化为乌有。因此依仗自己早年学过飞机驾驶，要求戴笠拨一架飞机给他，让他赶去香港抢救自己的财产。戴笠灵机一动，认为可以利用此人救财心切，使他为自己卖命，便对他说：“好的，我设法替你弄一架飞机，由你自己开去香港。抵达之后，你把飞机交给中国航空公司，我会让他们派驾驶员飞回重庆。不过，飞机回来时，我要用它接运在香港的紧要人士。”这位港商因挂念自己的财产，顾不上能否回来，答应了戴笠的要求。

一架飞机，运载人数有限。而杜月笙、戴笠拟定的名单中，除陶希圣等特殊人物外，还包括杜月笙的不少亲属、党羽，与可运人数相比，未免过于庞大。杜月笙对名单中与他有关的人虽然一个也不愿少，但他知道，他的那些走卒在蒋介石的天平上是无法与陶希圣等人相衡的，他宁可丢了老婆和党羽，也不能得罪蒋介石。因此，当戴笠堆着一脸笑，一再催请他提出对名单的最后看法时，他咬了几次牙，脸色苍白地一挥手说：“凡是我的人，暂不考虑。”戴笠等的正是这句话，立刻决定先行救出陶希圣、颜惠庆，以及军统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等人。

由于日本侵略军在香港的迅速推进，十二月十一日，香港的英国驻军全部撤退；次日，香港便落于日军之手。杜月笙、戴笠原定想救的人，一个也未救出，只得另外动脑筋。

他们首先利用“人民行动委员会”的关系，设法营救。所谓“民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是国民党支持下的各帮会组织的联合机构。抗日战争之后，戴笠见各阶层群众抗日要求高涨，便想以抗日为招牌，加强对国内外帮会力

量的控制。于是，和杜月笙商量，准备成立一个包括清帮、洪门、四川袍哥等在内的联合机构，统一指挥各帮会组织。杜月笙感到这样可以乘机扩大他的影响和力量，表示支持。经戴笠和杜月笙活动，首先取得了正在香港和重庆的部分帮会首脑的同意。一九三九年冬天，戴笠特将杜月笙由香港邀到重庆。两人设宴招待全国各地流亡到重庆的清、洪帮头子及四川袍哥首领，正式决定了成立“人民行动委员会”之事。本来，杜月笙有意担任“人民行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过一过帮会“总舵把”的瘾。但帮会组织向来是以结帮拉派为特点的，四分五裂，各成体系。杜月笙虽在官场和黑社会都有很多关系，但要想让所有帮会奉其为老大，却也是白日的梦幻。恒社在重庆曾为欢送青年军举行过一次演出，结果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打散。从现场情况分析，十有八、九是四川袍哥对恒社在重庆招兵买马、过于招摇不满，而以这种方式对杜月笙略示警告。由于有这些明争暗斗，“人民行动委员会”最终只能采取所谓“集体领导制”，由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张树声、向海潜、韦以黻、田得胜等人共同担任常务委员。其中张树声是华北地区的洪门大爷；韦以黻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向有“不倒翁”之称，交通界中关系不少；田得胜是四川袍哥首领之一。“人民行动委员会”设秘书长，由军统特务、重庆卫戍司令部稽察长赵世瑞担任。此外，戴笠还派军统特务徐为彬、金坡，杜月笙派他的“学生”于松乔担任所谓联络。

经杜月笙、戴笠等人授意，“人民行动委员会”利用和各地帮会的关系，从重庆经贵阳、桂林、韶关、龙川、沙鱼涌、大埔，安排了一条至香港的交通线，准备营救杜月笙、戴笠拟定要营救的人员。但这条交通线至多起个在外面接应的作用，如果杜月笙、戴笠拟定要营救的人员，在香港被日本人扣留，那么这条交通线仍然形同虚设。杜月笙因此与戴笠商议，利用他和日本人一直保持联系的条件，让他在上海的代表徐采丞与日本有关方面接洽，要求日本有关方面同意让徐采丞代他在上海租一艘轮船去香港接出他的“朋友”。戴笠同意了这一办法，杜月笙即刻给徐采丞拍了一份电报，要他见机行事。

徐采丞接到电报后，便在日汪间展开了频繁的活动。日本侵略者为了利用杜月笙，对他早有网开一面的安排。因此，徐采丞很顺利地上海租到了一艘轮船，并借到一架日本军用飞机。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徐采丞乘坐日本军用飞机，飞去沦陷的香港，在那里堂而皇之地分访杜月笙的亲友，通知他们乘坐他从上海包租来的轮船离开香港。结果，一船足足载了三百人，离开了日军戒备森严的香港。顾嘉棠、芮庆荣等人在香港刚沦陷时，吓得东躲西藏，最后，毫毛未损地回到了重庆。杜月笙的姨太太姚玉兰因故未能搭上轮船，和杨虎的妻子化装成难民“逃离”香港。这些人离开香港后，或出深圳进广东，或循东江抵韶关，沿途在帮会组织护送下，先后安抵重庆。

广开财路

杜月笙将其基本队伍由香港接至重庆后，便着手在重庆扩展事业，广开财路。

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杜月笙等人就筹划在重庆办一家中华贸易信托公司。一九四二年三月底，该公司正式开张。杜月笙任董事长，钱新之、刘航琛、陆京士等人为常务董事，董事有顾嘉棠、边定远、唐缙之等人，总

经理为杨管北。

杜月笙在该公司的投资为法币一百五十万元。这一百五十万元来自刘航琛。刘航琛，四川泸州人，出身于富商家庭，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成为四川军阀刘湘在财政方面的重要助手，在四川和其他地方拥有不少银行和工厂。一九三八年底刘湘病死，由王缙绪代理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缙绪与刘航琛为争夺四川盐税，结怨多年。刘湘死后，刘航琛失去靠山，怕王缙绪找岔报复，一度经昆明跑到河内，预备作南洋之行。杜月笙当时正在香港，他知道刘航琛与孔祥熙关系不错，而且在四川金融工商界有相当大的影响，考虑自己将来一旦到重庆，需要一些当地人支持，决定乘此机会笼络刘航琛。为此，杜月笙特派顾嘉棠专程去河内邀刘航琛到香港住。在香港，杜月笙对刘航琛大献殷勤，安排他住在圣斯酒店，让顾嘉棠形影不离地充任保镖；并指定几家餐馆，每天送一桌上等鱼翅全席到刘航琛住处，供刘航琛宴客或自用。以后，经孔祥熙调解，刘航琛与王缙绪的紧张关系松弛下来，杜月笙特派顾嘉棠护送刘航琛回川。刘航琛因此对杜月笙感恩戴德。杜月笙由香港到重庆不久，刘航琛便送上一本川康银行的空白支票，答应在法币一百五十万元的数额内，由杜月笙自由支取。杜月笙因而从川康银行取了一百五十万元，作为他在中华贸易信托公司的投资，取得了对该公司的控制权。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设在当时的重庆林森路 49 号。它的主要业务是从衡阳等地，抢购从沦陷区运出的物资。当时，由于车辆紧缺，加上法币不断贬值，衡阳与重庆间的物价差别很大，货物只要运到重庆，就可发财。重庆的对外交通，主要掌握在军统局的手里，戴笠一身兼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等数职。杜月笙凭借他和戴笠的特殊关系，以及他在军统内许多徒弟的帮助，很容易便给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搞到了运输车辆，这些车辆不管运什么货，都无人敢查。因此，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成立不久，杜月笙的经济周转便大大灵活起来。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之外，杜月笙还在重庆设立了中国通商银行分行，自兼总经理，以骆清华为协理，庞安民任襄理，顾嘉棠为监察。通过杜月笙与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农民银行）银行，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及刘航琛的川盐、川康银行的关系，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的业务很快得到发展，吸收了不少存款。利用这些钱，杜月笙与国民党花纱布管制局勾结，在重庆开设了纺织公司，由杜月笙担任董事长。此外，还在重庆设立了面粉厂，在昆明设立了造纸厂，在西安投资于西北毛纺厂。杜月笙在西北金融工商界，也开始成为一个显赫的人物。

杜月笙凭借他的特殊地位和和金融工商界的实力，大作投机买卖。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国民党政府为了紧缩通货，限制法币恶性膨胀，在美国政府支持下，采取过发行黄金储蓄券、美金储蓄券等办法。一些大投机商便利用黑市市场上法币与黄金储蓄券、美金储蓄券比值的变化的变化，或以法币换取黄金储蓄券、美金储蓄券，或抛出黄金储蓄券、美金储蓄券换回法币，从中渔利。杜月笙便热衷此道。有一度，重庆美金储蓄券的黑市价格看跌，长时间滞留在法币三十元相当美金一元的比值上不动，使不少握有美金储蓄券的人感到不如将其抛出，换回法币存入银行获取利息更为有利。杜月笙利用他在重庆、上海间设立的秘密电台，密切注视着上海市场的情况，发现这时上海美金储蓄券的黑市价格却在看涨，他便在重庆购进大批美金储蓄券，派人带去上海推销，一进一出之间，他手中的货币便成倍地膨胀起来。杜月

笙不但本人经营这项一本万利的投机生意，还帮助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及其亲属从中渔利。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的妹妹由上海经西安至重庆，杜月笙便与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一起借了巨额法币给她，让她在重庆购进大批美金储蓄券，带回上海推销。

除了利用美金储蓄券在不同地区的黑市价格差额，进行投机活动外，杜月笙还通过从国民党有关方面获取的经济情报，在黄金市场上翻云覆雨，掀风作浪。黄金储蓄券与法币的比值，照例是由国民党财政部在当天收市以后、第二天开市以前，通知中央银行。一九四五年三月，国民党财政部预定在当月二十九日，将黄金储蓄券与法币的比值由每两二万元提高到三万五千元。杜月笙的学生、国民党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将这一绝密经济情报“泄露”给了杜月笙。杜月笙得知此消息后、除令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出面大量买进黄金储蓄券外，又拨出一笔巨款让大业钞票印刷公司老板李祖永及杨管北等狠狠买进一票。此外，杜月笙的佣人、汽车司机也有不少人买进。他们凭空增添了大量财富。

但能够得知这一绝密经济情报的不只杜月笙一人。不少国民党要员、巨商大贾都在同一天前去争购黄金储蓄券，以至这项本来认购并不踊跃的有价证券，销数突然反常地剧增。这不能不引起正直之士，及国民党内想要分肥而未曾分到者的关注，一时街谈巷议，满城风雨，舆论为之哗然。国民党政府被迫进行调查，在其监察院根据各方检举而排出的可疑者名单中便有杜月笙，国民党法院并曾装腔作势地对杜月笙提起“公诉”。但这些作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最后只将王绍斋判了几年刑，以搪塞舆论，杜月笙及其他主要得益者都安然无事。

无怪一些国民党政要曾吹捧杜月笙：抗战初期，“身居上海而上海重；战事中期，身居香港而香港重；战事末期，身居重庆而重庆重。”

通济公司的棉纱生意

通济公司筹设于一九四三年。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腾，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规定在重庆实施限价政策，企图相对稳定物价。但就在这限价政策之下，自米每石也要卖到法币五百二十元，猪肉每斤为法币十四元；棉纱更贵，一匹阴丹士林布为法币五、六百元。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表徐采丞看到重庆棉纱昂贵，建议杜月笙在上海等沦陷区低价收进棉纱，运进重庆等地高价卖出，从中获利。杜月笙知道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因牵涉面广，他一个人包揽不下，便找戴笠商议。结果决定筹组通济公司，由杜月笙和钱新之分任正副筹备主任，常务委员有朱惠清、杨管北等人。朱惠清为戴笠的代表。经过一番紧张筹备，一九四三年春节前后，通济公司的招牌正式在重庆林森路 49 弄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楼上挂出。杜月笙任通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为杨管北，副总经理为徐子为，郭兰馨为总务秘书。并决定在上海、淳安、重庆三处设分公司。通济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又称民华公司，由徐采丞负责，淳安分公司由王良仲负责，重庆分公司由骆清华负责。资金则由国民党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农民银

拾遗（胡叙五）著：《杜月笙外传》，香港春秋杂志社 1965 年版第 94—97 页。

于右任，孔祥熙等：《杜月笙先生六十寿言》，载 1947 年 8 月 30 日《立报》。

行) 四家银行负责。

通济公司成立后，徐采丞根据杜月笙旨意，多次与上海的日本占领军和特务机关密商，表示只要他们向意让通济公司运出棉纱，通济公司将为他们在中国内地运回日本所需要的战略物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急于与蒋介石集团谈和，另一方面因战时延长，战略物资确已濒临匮乏的困境，所以一拍即合，非但答应通济公司在上海采购棉纱，而且愿意提供车辆和军队，将其护送出沦陷区。徐采丞立刻将这一消息电告杜月笙。杜闻讯之后，眉飞色舞，连声赞叹说“采丞兄真了不起！”有日本人合作，杜月笙胆气更壮，当即决定首批便由沦陷区运出三千件棉纱。

要将这三千件棉纱安全运抵目的地，并非易事。上海到重庆绵延数千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其中既有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侵略军的对峙，又有地方实力派盘踞一方，还有土匪强盗出没，哪一方面见了这三千件棉纱也会眼红，不捞点好处，绝不会轻易放其过关的。杜月笙与戴笠反复研究，决定由戴笠向国民党军队打招呼，杜月笙负责疏通运输途中的土匪强盗，徐采丞则专管与日汪方面联系，并选择界首集作为护送日军向通济公司交货的地点。界首集位于安徽、河南两省交界处，西北是“国统区”，东南是沦陷区。

计划确定后，杨志雄及杜月笙在上海的账房先生王国生等人，便在日本军队保护下，由上海向界首集押运出三千件棉纱。杜月笙则派出杨管北、徐子为、朱惠清三人去接货。这三人预备将送至界首集的三千件棉纱，经洛阳、西安运回重庆。当时的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祝绍周、陇海铁路局副局长周啸潮、界首集所在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蒋鼎文，以及驻界首集附近的国民党军，经戴笠及杜月笙等人打点，同意给予协助，提供方便。但护送棉纱的日本军队，只同意将棉纱送至界首集附近的亳州，便不肯向前了。由界首集到亳州正南的十尖河，是一片绵延百里的三不管地区，散落着不少散兵游勇、土匪强盗，亳州一带还盘踞有伪军郝鹏举部，护送日军走后，他们难保不会乘机捞一票。为了不使到口的肥肉落入他人之嘴，杜月笙利用他和帮会组织的关系，找到一个在豫皖鄂三省的黑社会中有一定影响的洪门大爷明德明，请他出面帮忙。为此，杨管北曾特意去许昌拜访明德明。明德明得到好处后，便让他的老婆带了几十名喽罗，跟着杨管北去亳州护送。此外，杜月笙知道郝鹏举与国民党部队有联系，又让国民党部队替他与郝鹏举通关节，取得了同意放行的允诺。就这样，三千件棉纱在日伪顽和黑社会的“通力共济”之下，安全运抵西安。

尝到了甜头，杜月笙立刻命令再办三千件棉纱。但这时，洛阳也陷入日本侵略者手中，由上海至界首集，再经洛阳到西安、重庆的路线上，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杜月笙决定改经浙江淳安，将棉纱运至内地。因此，派他的徒弟徐品仙协助通济公司副经理徐子为去上海接货。临行时，杜月笙告诉徐子为和朱品三：淳安位于国民党第三战区内，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是他的朋友；淳安一带的国民党驻军长官如二十三集团军司令唐式遵、补给司令戴戟，都是他所熟悉的；军统局在淳安还建有重要特务据点。因此，这条路线容易通过，不会遇上什么风险。

徐子为、朱品三闻言之后，有恃无恐地去了上海。但未曾想到，就在杜月笙这些所谓老朋友的防区内，徐子为、朱品三却一再碰上强行分肥之事。

由上海运出的棉纱，溯富春江而上，途经大源时，便被国民党军设在当地的一哨卡阻挡不许通行，朱品三一看不妙，忙我到哨所所长，死皮赖脸地

塞上六千元“步哨费”，才被放行。

船行到洋浦口时，又碰上了风波。当地一位货运管理局的周所长，几天来虽然已经由朱品三请过多次客，酒醉饭饱之后，常与朱品三称兄道弟，但内心始终认为朱品三等人给他的好处太少。这时，眼看船将出洋浦口，离开他的管辖范围，以后再想敲竹杠，也鞭长莫及了。因此，这位周所长突然翻脸，命令部下登船检查。朱品三不料有此一招，未免有些惊慌，但自恃有杜月笙等人为后台，便带三分威胁的口气说：“哨长阿哥，船里袋的是什么，兄弟早向你报告过了嘛，何必还要费事检查呢？！”但那位所长却面孔铁板地回答：“不检查？可以。这许多船不许移动一步！”朱品三见对方不肯让步，决定硬来。于是，他换上一脸笑容，拉着那位所长的手说：“哨长阿哥，大家都是自家人，有啥事体不好商量？来来来，请到船舱里一面吃酒，一面商量。”连请带拉地将那位所长拖上了船，上了船，朱品三对躲在船舱里的几名武装护送人员使个眼色，那些人立刻拔出枪逼住了周所长，解除了他的武装，命令他将头伸出舱口，叫岸边的哨卡放船队通过。事到这般地步，那位周所长只得乖乖从命。

船队好不容易开到淳安附近的场口镇，国民党当地的驻军头脑俞主任又伸出了手。他对徐子为和朱品三说：“上峰派我守场口，命令我们就地筹饷，否则弟兄们就没有饭吃。我看这样吧，照老规矩办，值十抽二，二位交百分之二十的钱或棉纱，我立刻放行。”徐子为、朱品三知道杜月笙决不会同意出这样高的“买路钱”，便一口回绝。这位俞主任手段却比先前那位周所长辣得多，他见徐子为、朱品三不让他分肥，立刻下令：“连船带货，全部扣留！”他的部下全副武装地登上了各艘运送棉纱的船只。徐子为，朱品三见状不好，只得急电杜月笙求救。后来由杨志雄从上海赶到场口慎，多方周旋，给了国民党在当地驻军一些好处，船只才被放行。

经过这些风波，棉纱终于运到了淳安。徐子为、朱品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回去向杜月笙交差了。但这批棉纱最后还是没能运到重庆，而被杜月笙的老朋友、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扣下来派了别的用处。为此，戴笠专门到蒋介石那里告了顾祝同，但也不了了之。不仅如此，徐子为后来还在富春江边被番号不明的国民党杂牌部队绑架到山里，逼通济公司拿出法币七万元，才将他放了出来。一辈子敲惯别人竹杠的杜月笙，在这次棉纱生意中却让别人狠敲了一记竹杠。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杜月笙避难重庆，离开十里洋场的上海、灯红酒绿的香港，照样花天酒地，穷奢极侈。

杜月笙刚到重庆时，住在汪山一幢别墅中。四川军阀范绍曾一再对杜月笙说：“重庆城里我的好房子多得很，杜先生，我陪你去看看，你欢喜哪幢便住那幢。”

范绍曾对杜月笙为何格外关照？原来他们是早已相熟的酒肉朋友。范绍曾，字海亭，四川渠县人，本来是杨森的部下，后来改投刘湘门庭。范绍曾在杨森部下当师长时，因需要在上海出售鸦片和采办军火，已和杜月笙搭上关系。一九二八年前后，范绍曾在刘湘部下任川军第四师师长时，杜月笙介绍上海的咖啡大王陈坤元到范防区邻水县开设了一座咖啡工厂，由范给以保

护。一九二九年，范绍曾第一次到上海，杜月笙盛情款待，并与范换了写有生庚年月的帖子，结拜为兄弟。为了感谢杜月笙的款待，一九三一年范绍曾曾送两百担鸦片烟土给杜月笙。一九三三年，范绍曾奉蒋介石之命率领部队至洪湖地区“围剿”红军，被红军打伤，杜月笙闻讯后，派他的徒弟张松涛赶到汉口，专程接范到上海治伤。范绍曾十分留恋上海的花花世界，得到杜月笙邀请，乐不可支，便以治伤为名，向刘湘请准一个月假，赶去上海。在那里，杜月笙专门派顾嘉棠陪送他去自渡桥公济医院，找了一个英国医生代为诊治，使范绍曾保住了负伤的右臂。治伤期间，范绍曾仍不忘寻欢作乐。临走时，杜月笙盛宴饯行，并特地问一声：“范师长，你这一次到上海，玩得痛快不痛快？”范绍曾在连称痛快之余，不无遗憾地对杜月笙流露了一件心事。原来，当年上海有位名舞女叫黄白瑛。范绍曾到上海不久便看上了她，大献殷勤，并几次向她表示了非份之想，但都被拒绝。杜月笙知道范绍曾这一心事后，笑着点了点头。送走范绍曾后，他便派人去找黄白瑛，威胁利诱，逼她就范。以伴舞为生的黄白瑛，当然知道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威势，如果她敢说半个不字，杜手下的流氓恶棍就会象碾死一只蚂蚁般弄死她，因而只得答应了。范绍曾返回重庆后不到三天，便接到了黄白瑛的电话，原来黄紧随他之后也到了重庆，并在重庆租了旅馆，特邀他去玩。范绍曾与杜月笙因此当然更加“情深意切”了。

由于范绍曾一再邀请，位于重庆来龙巷的范公馆就成了杜月笙每天必到之处。此外，刘航琛也将他在汪山的一幢豪华别墅借给杜月笙使用。加上杜月笙原来的住宅，这三处地方成了杜月笙在重庆宴客、聚赌的场所。

到上述地方去的，不是国民党政要，就是腰缠万贯的老板，或帮会组织的大头目。他们每次聚赌，各自至少带法币五万元。当时国民党军的上将，名义上月薪只有八百五十元，二等兵为二十二元四角。杜月笙者流每人每天的赌资超过六十个国民党上将月薪的总合，或二千二百三十余名二等兵月薪的总合。这些人赌起来，通宵达旦，厨子流水不断地送上各式精美糕点和丰盛肴馐，供他们边赌边吃。赌桌旁还请来不少打扮入时的交际花。当时的重庆，曾有不少关于这些赌窟的传言，例如说：某阔佬钱输多了，懒得开支票，抓张纸条写个数目，第二天赢家便可持此纸条去银行兑现，十万、百万，决无差误。纸条找不到，拿支香烟写上钱数，一样等于现钱。有人一时疏忽，点燃一支写有钱数的香烟，就此烧掉一百万。又例如说：美丰银行股东康心如、康心之两兄弟有一次和杜月笙以扑克牌相赌，结果将一家美丰银行全输给了杜月笙，正当康氏兄弟懊悔不已时，杜月笙却对他们说：“这是逢场作戏，认不得真”，随手将康氏兄弟付给他的巨额支票扯成碎片。这些传言当然不无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杜月笙在重庆生活糜烂的程度。

就是这种生活，仍不能使杜月笙满足。一九四二年十月，他以“考察”为名，离开重庆，作川陕之游。一路上歌台舞榭、钟鸣鼎食，更是穷享其乐。

到成都时，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张群特派其副官长至城外二十里处的龙泉驿相迎。国民党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川陕鄂边区总司令潘文华、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等人则至城门外迎接。一排锃亮的汽车，直把杜月笙送到成都城内的金城银行招待所。

杜月笙在成都住了三天，天天赴宴，夜夜看戏。当晚便是张群主持的所谓“联合公宴”，几十桌酒席，整整摆满一间大厅。操勺者是成都烹调业的第一把手，川菜精品，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并请有成都著名演员在一旁唱

戏助兴。

之后，张群又设“家宴”款待。为了准备这次“家宴”，张群把成都城里著名的小吃师傅，几乎全叫到了家里。成都的风味小吃如龙抄手、赖抄手、麻婆豆腐、怪味鸡等等，流水不断地端上席来。其中不少是杜月笙这些生在江南、长在江南的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品尝之下，一个个舔嘴咂舌，连声叫绝。

再后，刘文辉在修竹摇曳、古柏掩映的浣花溪宴请杜月笙。刘文辉搞到了四川罕见的二十年绍兴陈酿。酒坛去盖，香气四溢，配上窗外瀑瀑流水，飒飒秋风，使这些一身铜臭的人物，居然也生出几分飘然欲仙的感觉。

离开成都，杜月笙经梓潼等地，到了南郑。在南郑，国民党川陕鄂边区警备副总司令祝绍周也设所谓“联合公宴”为杜月笙接风。一九二七年，祝绍周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参谋长时，在上海参与了四一二反共事变。在那时，他结识了杜月笙，他的妻子是杜月笙和俞叶封牵线介绍的，因而祝绍周对杜月笙格外表示亲热。他所设的“联合公宴”，花样翻新，宴席排成“U”字形，他和杜月笙居“U”字形的底端而坐。两队戎装笔挺、面目清秀的士兵捧着托盘，依次上菜。每上一道菜，恭立一旁的军乐队便奏一次乐，使杜月笙在大饱口福的同时，得以耀武扬威。晚间，祝绍周又设“家宴”款待，南郑的土产名菜，几乎全搬到了宴席之上。

南郑享乐一通之后，杜月笙经褒城、留坝、凤县到达宝鸡。在那里，国民党宝鸡警备司令、陕西省政府建设厅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的代表，特率一批“民众”代表，恭候车站迎接。杜月笙的汽车到达之时，这些“民众”代表齐集车门，欲表“欢迎之忱”。杜月笙很少愿意放过这种出风头机会，但这次因途经秦岭时，气候寒冷，空气稀薄，气喘病发作了，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脸色憋成铁青，只好派随员出面“答谢”，他本人缩在车内，直驰住处。即使这样，杜月笙仍然不忘口腹之乐、声色之娱，休息一两天后，又强作精神赴宴，宴后观看宝鸡当局专为他请来的豫剧名角演唱，听到得意之处，嘶哑着喉咙，拍案叫好。

宝鸡逗留了两天，时任国民党陇海铁路局副局长的周啸潮，因曾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与杜月笙有过“交情”，亲率一列花车，到宝鸡接杜月笙去西安。这列花车到达西安时，胡宗南派了军乐队在车站吹吹打打，锣鼓喧天地表示欢迎。国民党西北公路局局长何竟武特地让出他的官舍“四皓庄”供杜月笙居住。在西安，杜月笙一住两个月，从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熊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到帮会组织的大小头目，相继宴请。为投杜月笙所好，宴会菜肴一次比一次精，宴会方式一天比一天奇。例如，杜月笙爱吃活鲫鱼，但西北素来缺少鲜鱼，据说甘肃省有时举行宴会，实在找不到鲜鱼，只得以木雕鱼，放在席上，让赴宴者望鱼止馋。为了宴请杜月笙，权贵们不惜动用各种交通工具，到远处捕抓活鲫鱼，抓到后养在清水之中，小心翼翼地运抵西安，遇到宴请杜月笙时，席上必会出现两种烧法不同的鲫鱼。西安人因此称这种酒宴为“双鱼席”。再如，曾任国民党河南省主席的张钫，在西安聚集了湖北、河南、陕西三省清洪帮大小头目一千余人，仿罗汉请观音方式，开出一千多客西餐，请杜月笙赴宴。那天，这些帮会头目们，特在杜月笙所坐的首位上，披上虎皮座褥，两旁各放一只炭火通红的大火炉，

上海称之为馄饨、广州称之为云吞。

本意是想用黑社会方式为杜月笙捧场。但杜月笙瘦如枯柴，坐在那张牙舞爪的虎皮之上，只能让人感到滑稽。

西安之后，杜月笙本来还想东下洛阳，西上兰州。但这时有个号称“半仙”的算命先生为他起了一课，煞有介事地对他说：“这一卦，明明白白，出行利南方面大不利西北。杜先生，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执意往西北走，可能有性命之忧。”旅游之乐，对杜月笙虽有莫大吸引力，但毕竟抵不住“性命之忧”的威胁，他只得收拾行李，转身返回重庆。仅此半途而废的“考察”，就不知挥霍了多少民脂民膏。无怪当时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中国士兵无比愤怒地说：“前线吃紧，后方紧吃！”

十一 重返沪上

秘密使命

抗战将近胜利时，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准备抢夺胜利果实。

这时，由杜月笙协助戴笠组建的别动队，已改名为忠义救国军，成为军统特务武装的基本队伍。美国海军特务头子梅乐斯与戴笠合作，在安徽歙县雄村开办了一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聘请美国教官，使用美国教材，对忠义救国军进行美式武器及特工技术的训练。每期三个月，毕业后，按成绩分别发给火箭炮或汤姆生、卡宾、左轮等枪械。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有一千多人受过这种训练。忠义救国军的公开任务是“策应盟军登陆”，实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打击坚持抗日的新四军，防止东南地区及上海落入人民之手。一九四四年冬天，当新四军进驻浙江安吉、孝丰山区时，忠义救国军就使用美式汤姆生枪、卡宾枪，对新四军进行过袭击。

但这一切并未能阻挡新四军和人民抗日力量蓬勃发展。美国特务机关和蒋介石因此决定动用杜月笙的力量予以配合。一九四四年秋天，老罗斯福的孙子、时在美国国防部 G2 部门任职的奎恩了·罗斯福来华，策划美军在西太平洋的行动，专门去拜访了杜月笙，要求他对美国的情报工作给以协助。杜月笙表示：“只要事体对于双方有利，随时随地彼此密切合作，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一九四五年四月蒋介石召见杜月笙，“面谕驰赴东南”。其后，杜月笙的党羽纷纷打听蒋介石给他布置了一些什么任务，杜故作神秘地笑而不答。但在梅乐斯以后发表的回忆录《另一种战争》中，对此却披露得一清二楚。梅乐斯说：“对日战争胜利以前，我们获得情报，日人拟在撤退前破坏上海，于是戴笠将军和我赶往上海附近，设法保卫上海的公共设施，戴笠将军请能力卓越的杜月笙，协助此一工作。”又说：“我们计划在浙江省西部淳安以北的安徽屯溪雄村，开设一个训练班，训练上海各业重要分子一百五十名，我们的总部设立在淳安西庙，在戴笠将军和我还不曾到达淳安之前，已有一部分杜月笙的部下自上海抵达。”还说：“胜利前夕，共党准备夺取重要城市，我们则计划保卫京沪。我们虽然缺乏时间训练必需的干部和人员，但是忠义救国军、海盗、杜月笙的部下，仍能保护上海的一切公共设施，诸如电厂、码头、自来水及道路桥梁、邮电交通等等。”

杜月笙接受了蒋介石交给的这些秘密任务之后，六月二十五日，率领他的党羽顾嘉棠、叶焯山，以及私人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等人离开重庆，乘自备轿车驰抵贵阳。在贵阳，与戴笠及其随行人员会齐后，选择了一个深夜，去机场搭乘美军 c—46 型运输机飞往湖南芷江。就在这架飞机上，杜月笙与美国特务梅乐斯相遇，经戴笠介绍，这两个早已在从事共同使命的人，开始了进一步勾结。飞机到芷江后，为了掩盖行踪，只有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别动军副司令兼华中总指挥的陶一珊至机场迎候。杜月笙、戴笠、梅乐斯等人在芷江深居简出，躲了三天，继续乘飞机飞向福建长汀。至长汀要经过衡阳。衡阳当时尚在日本人占领之下，梅乐斯关照驾驶员在衡阳上空盘旋三圈，摄取衡阳的地面照片。杜月笙闻讯，唯恐当了日本高射炮的活靶子，吓得脸色发白，但又不敢违拗美国人，只得连声叨念：“阿弥陀佛，菩萨帮忙”。可是三圈转过，日本人的高射炮却令人费解地一声不吭，客客气气地放这架

飞机穿越他们的阵地。到长汀后，其时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委会少将工运特派员的陆京士已带着张晓岩、龚夏、赵云昭等十八人先行到达，并在当地恭候。杜月笙等人会同这伙人，在交通银行驻长汀办事处稍事歇息，又坐上长途汽车直奔永安。永安是国民党战时福建省政府所在地。在那里，杜月笙拜会了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刘建绪。之后，驱车经建阳，抵达铅山。在铅山，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别出心裁地在凉风习习、风景优美的山野间设宴款待杜月笙等人。杜月笙在铅山住了三天，与顾祝同密谈了两个晚上。离开铅山后，杜月笙直赴淳安，戴笠、梅乐斯则绕道上饶、玉山一带向淳安进发。七月十五日，两行人又在淳安会合。淳安当时设有国民党军统局 55 号站，负责人是林基，又名俞祥琴，原是上海一个第三流的律师，已为杜月笙、戴笠、梅乐斯等人预先作了安排，他们抵达后，便一起住在西庙。

杜月笙如此急似星火地由重庆长途跋涉至浙江淳安，除因为此行是蒋介石面谕之外，内心深处尚有另外的考虑。他感到自从一九三七年他潜离上海避居香港后，与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联系虽然始终没有中断，但毕竟不如他身居上海时那样密切。同时，几经动乱，他原来那班人马中，改换门庭者有之，出走他方者有之，成为死鬼者有之，力量已大不如昔。例如淞沪别动队成立之初，从总司令到各级干部，不是他的把兄弟、老朋友，便是他的门人学生，而历经八年，改组为忠义救国军后，其中有的人甚至连杜月笙是何许人都不知道。杜月笙因此产生一种危机感，担心失去往日“闲话一句”的威势。他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知道他的心事后，为了宽他的心，对他说：“月笙哥，你用不着操这许多心，上海人终归少不了你月笙哥的。”但杜月笙却摇头苦笑说：“依我看来，事体未必乐观，我现在最担忧的就是力不从心，把握不住目前的局面了。”正因如此，他急于在抗战胜利前，赶到上海附近，一方面设法收拢旧班底，另一方面也想在“配合”盟军登陆和反共上为国民党政府出把力，捞点资本，以稳定自己的地位。

杜月笙在西庙住下不久，便开始和上海联系。当时，他设想的行动方案，一是利用大、小八股党留在上海的人物，如马祥生、杨顺铨、朱景芳等人，在清帮力量的支持下，拉起一支队伍，以在盟军登陆时有所动作；二是利用他两个当了伪军头目的门徒，即马柏生、徐朴诚所指挥的伪军部队，帮助国民党在上海抢地盘。

正当杜月笙急欲有所“建树”时，日本侵略者在八月宣布无条件投降。浴血奋战八年的中国人民，对此无不欢欣鼓舞。杜月笙却罔然若有所失。《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透露了他的真实思想：“以事出仓猝，一切未及准备为虑”，也就是说怨恨抗战胜利来得太快，担心无力抢夺胜利果实。

其实，有这种忧虑的何止杜月笙一人？蒋介石同样如此。八年抗战时，他躲在大后方，为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命令他的主要部队远离抗日战场。因此，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上海等大城市便处在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包围之中。蒋介石为了独占人民抗日胜利果实，把上海抢夺到手，不惜与汉奸勾结。日本刚一宣布投降，便明令发表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别动队上海行动总队指挥”，命他率领伪军和汉奸特务部队负责维持上海治安，并联络日本军队，阻止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进入上海。

与蒋介石同病相怜的杜月笙，为了自己，也为了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费尽心机，积极协助蒋介石争夺抗战胜利果实。他“苦心策划，对于中央军政力量未抵达前之种种问题：“如伪军警之处置，伪币之流通，以及严防奸

充乘机骚动，均周密策划，电陈主席（指蒋介石），而以宽大和平为吁求，又与顾墨三（顾祝同）将军函电往回，商讨治安全融粮食接收等问题”。

正是在日伪及杜月笙势力的协助下，蒋介石政权使脱离了日伪魔爪的上海，重新落入它的统治之下，并得以将日伪巧取豪夺到的五十万二千三百一十两黄金、七百六十三万九千四百四十五两白银、三十三万银元、五百五十万美金、九百二十三万日元等大量金钱物资占为己有，增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力量。

争霸上海

日本投降，杜月笙在淳安坐不住了，急于赶回大上海。但又怕去得早了，秩序尚未稳定，生命有虞。因而在得知他的“学生”陆京士、吴绍澍先后安抵上海后，才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带着随行人员，乘坐一艘名为“健飞十七号”的轮船，取道杭州返回上海。

九月一日，杜月笙抵达杭州，三日，乘沪杭甬铁路专车由杭州开往上海。他的徒子徒孙们预先和杜月笙商定，在上海北站举行盛大欢迎仪式，迎接杜“凯旋”归来。此刻，杜月笙大有春风得意之感，在火车上兴冲冲、喜洋洋地想象着回到阔别八年的上海后，众人向他欢呼的场面。不料，专车驰抵梅陇镇，急急跑来两个神色慌张的人，登车向杜月笙报告了一个令他大为扫兴的消息。原来北站附近贴出不少匿名传单和大字标语，上面赫然写着：“打倒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口号。这些传单标语有来头、有背景。密告者将其背景告知了杜月笙，杜不便发作，只好堆出满脸苦笑，佯作镇静地决定不去北站，改在上海西站下车。杜月笙的徒子徒孙在那里组织了欢迎。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凌云培还带了队伍到场戒备。但欢迎仪式的规模和气氛比原定在北站举行的要小而冷清得多了。杜月笙下了火车，没有去华格臬路杜公馆，也没有去杜美路金廷荪为他购置的精美住宅，而驱车直奔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顾嘉棠的家中，与顾嘉棠商议应付这“不测之变”的办法。

这“不测之变”的背景是谁呢？——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的吴绍澍。吴绍澍原来是杜月笙的“学生”，两人此时反目是有原因的。

抗战前，国民党上海党务一直在吴开先的把持下，因此吴素有上海“党皇帝”之称。吴开先是杜月笙的密友。吴开先与吴绍澍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同是上海市松江县人，同是CY的叛徒。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吴绍澍与吴开先来往密切。抗战前，吴绍澍在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民训处长时，每来上海，吴开先和陆京士总要到他下榻的一品香旅社一起寻欢作乐。以后，吴绍澍由CC系陈立夫转而投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及复兴社头子康泽，与陈立夫系统的吴开先关系渐趋疏远。抗战期间，日本人在上海捕获吴开先，要他携带条件去诱蒋介石谈和，日军并安排飞机将他送去广西柳州，再转道去重庆。此事激起舆论谴责，蒋介石不得不解除了吴开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让其闲居重庆市郊。吴绍澍乘此机会，公开抨击吴开先，并逐渐将自己的人马输送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取吴开先

《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地位而代之。在两吴争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权力的斗争中，杜月笙偏袒吴开先，引起吴绍澍不满。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杜月笙的得力门徒陆京士希望上海推选他为代表，从重庆打电报给吴绍澍，要求吴绍澍帮忙。吴绍澍却以名额已满为理由，不允所请。

日本投降前夕，吴绍澍虽曾带一批人马专程去淳安拜访杜月笙，但仅是表面文章而已，已失去了早年那股亲热劲。日本一投降，吴绍澍便率大批人马，雇了两艘大船，星夜由安徽屯溪赶往上海“劫收”。在他到达以前，他的一些潜伏在上海的骨干如庄鹤初、费树声、蒋起麟、凌泽夫等已开始动手，将爱棠路（今余庆路）80号汪伪苏浙皖三省税务局长邵式军新建的一幢豪华住宅接收下来，作为国民党市党部办公大楼；将富民路43号作为三青团支团部；将陕西北路128号日本驻沪领事馆作为分团部，接收汪伪的《平报》与《国民新闻》，分别改名为《正言报》和《青年报》。吴绍澍抵达上海后，将富民路43号拨归两个三青团分团部使用，他又接收了中正南二路（今瑞金二路）114号日本三井洋行大班的一座私人花园住宅，将三青团支团部迁入。他手下的骨干在这场“劫收”中，大都成为暴发户，住进洋房，出入汽车，风头一时。吴绍澍本人更是身兼六职，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和三青团上海市支团部主任外，还兼任上海市军事特派员、上海市政治特派员和上海市副市长兼社会局长。成为上海新贵的吴绍澍，不希望在上海拥有相当势力的杜月笙返回上海并恢复昔日的威势，因为这会危及他的利益和地位。因而他回上海不久，便一方面在报纸上宣传“建设正义的新上海”，另一方面以打击流氓势力为号召，给杜月笙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但吴绍澍这些行动，没有也不可能阻止杜月笙参与“劫收”。杜月笙返沪前后，他的徒子徒孙已放出空气，说蒋介石将派杜月笙做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并假托舆论宣传：“有以为先生协助抗战，功勋灿然，今建国方始，如先生者，不当仍为在野之身”，赤裸裸地为杜月笙争官要权。日本投降，在上海“劫”得最早，“收”得最快的所谓“地下先遣军”、“挺进队”、“别动队”，几乎无一不是杜月笙与戴笠联合经营的所谓“地下部队”或“行动部队”。而且如杜月笙徒众所说：“迨中央接收大员，纷沓而来，几无役不就商于先生，而得其助勤焉”。杜月笙心腹管家万墨林根据杜的授意，在杜美路26号杜月笙一幢住宅内设立总部，专门指挥杜的徒子徒孙进行“劫收”，仅“劫收”得中央商场一个仓库的无账物资，价值便在六百亿元以上。杜月笙很多亲朋好友，如叶焯山、万墨林、杜维藩等人的汽车、房子都经“劫收”而来。杜月笙的徒弟、大贩毒贩罗洪义，被列为汉奸通缉，他的全部不动产，便由杜月笙交徐采丞支配。范绍曾那时也在上海，他听说国民党政府在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就能发横财。他找到杜月笙设法，杜叫他请国民党政府敌伪物资管理局局长刘攻芸吃饭，由杜当面说情。于是范绍曾便按杜的主意，在家里设宴招待刘攻芸，杜到场作陪。酒醉饭饱之余，范便向刘提出要顶座仓库，刘还未答话，杜便在旁说：“这些东西都是抓在他手上，有什么话好说。”刘见状，只得答应让范顶一座仓库。杜月笙一句话，范连现款都未付，只由他开的福华银行出了一张期票，便到手了一座仓库。仓库内所藏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物

《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

《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

资数量之多，连范看后都感到吃惊。通过买卖这一仓库年的物资，范净赚黄金三千多两。

杜月笙积极插手“劫收”活动，大肆搜刮财富，进一步激起吴绍澍侧目，更加处心积虑地要排挤杜月笙势力。十月，吴绍澍改组了国民党市党部和三青团支团部，在重要岗位上，统统安排了他的亲信。接着又对社会局人事进行变动。社会局是国民党政府用以控制和镇压群众运动的机关，抗战以前，社会局的不少成员都给杜月笙递过门生帖子。杜月笙担心丧失对这一部门的影响，向吴绍澍推荐陆京士担任社会局副局长。吴绍澍明白，如让陆京士担任副局长，他这个局长就会大权旁落，因此很不客气地将杜月笙的推荐顶了回去，而派原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与他私交较厚的葛克信担任社会局副局长。以后，又派周英才、孙以蓁、陈培德为国民党市党部工人运动指导委员会常委，增派国民党市党部组织科长应仲杰、妇运会干事凌其慎等亲信为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与杜月笙、陆京士争夺对黄色工会的控制权。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吴绍澍还积极邀好于国民党上海市长钱大钧、警察局长宣铁吾。钱大钧原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一九四五年九月到上海就任市长。吴绍澍对钱大钧表示热烈欢迎，在海格路（今华山路）范园将国民党上海市党团干部一一介绍给钱大钧。平时，吴绍澍从不以副市长身份干预全市性的行政事务，让钱大钧决定和安排，努力与钱大钧保持和睦相处的关系。

除钱大钧、宣铁吾外，吴绍澍更千方百计博取蒋介石的信任。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第一次到上海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米左右。吴绍澍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指定专人驻守在江宁路新仙林舞厅内，积极准备蒋介石来临。蒋介石抵沪后，吴绍澍除和钱大钧、宣铁吾等人陪同蒋介石在上海跑马厅参加“庆祝大会”外，还把中正南二路114号三青团支团部的花园洋房整饰一新，房屋内外贴满“拥护”、“万岁”一类标语，作为蒋介石“对内训话”的场所。蒋介石来训话时，吴绍澍命三青团干部一律穿上团服，肃立“听训”，他本人则一直站在蒋介石身边，凝神谛听。蒋介石“训话”完毕，吴绍澍毕恭毕敬地领着蒋介石走向边门，抢先开门，恭送如仪。同年底，蒋经国来上海，吴绍澍把五层楼酒家（今中百一店五楼）全部包下来，大张筵席，为蒋经国接风。

吴绍澍经过多方活动，在上海滩一度占了上风，气焰赫赫，咄咄逼人。处于被动地位的杜月笙一伙，称王称霸惯了，怎受得了这个气。顾嘉棠大呼小叫地给杜月笙出主意：“吴绍澍这个赤佬是给月笙哥磕过头拜先生的，欺师灭祖，照江湖规矩就该处死！月笙哥，你把他的拜师帖子寻出来，让我拿去跟他算账。”工于心计的杜月笙早就想到用帮会义气和封建道德来打击吴绍澍，顾嘉棠的主意正合他的心思，当下便命人打开存放拜师帖的保险箱，拿出一包包大红帖子翻来覆去地寻找，谁知上千份拜师帖子中偏偏少了吴绍澍的那一张。顾嘉棠认为：一定是吴绍澍买通内线，将拜师帖偷了出去。杜月笙闻言，气得脸孔发青，手脚冰凉。顾嘉棠见状，咬牙切齿地声称：“三天之内，我非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内贼不可。”但三天过去了，三十天过去了，这个“内贼”始终未曾找到，杜月笙只好不了了之。拜师帖失踪，无法当面我吴绍澍寻衅，杜月笙便通过喽罗门徒广为散布当年他如何扶持吴，现

上海方言，这个家伙的意思。

在吴又如何翻脸不认人等等，极力将吴丑化成一个忘恩负义、欺师灭祖的小人，以激起舆论对吴绍澍的忿懑和蔑视。同时，还指说吴绍澍在接收敌伪产业时中饱惊人、贪污无数，并通过戴笠多次向蒋介石控告，使国民党中央内支持吴绍澍的人也难以在蒋面前为吴绍澍说话。军统还派毛森拘留了吴绍澍两名参与接收邵式军房产的亲信，企图查出证据，用以打击吴绍澍。陆京士则以社会部沪宁特派员的身份，仿照军统忠义救国军的名称，吸收大量工特骨干，拉起一支“工人忠义救国军”，以后又搞了个护工队，遍布各厂。在陆京士等人活动下，吴绍澍派去担任市总工会筹备委员的几个人，手脚如同被缚，难以施展。陆京士还利用大批失业工人要求寻找工作和在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愿望，组织他们川流不息地到国民党市党部和社会局请愿，给吴绍澍制造麻烦，施加压力。上海工商金融界的许多老板，也在杜月笙及其门徒授意下，不跟吴绍澍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吴绍澍的困难和阻力一无比一天大，他的情绪也由亢进转为低落。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吴绍澍就很少到社会局去，而让副局长葛克信勉为应付。为了摆脱困境，吴绍澍曾去重庆向朱家骅和蒋经国求助，并求见蒋介石进行申辩。但吴绍澍此行并未争得满意结果。不久，国民党政府由宋子文出面，下令免去吴绍澍的上海市副市长和社会局长职务，改派吴开先接任上海社会局长。以后，又相继免去了吴绍澍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和三青团上海支团部主任等职务。这个当年曾要铲除恶势力的人，最后却被恶势力连根扳倒。吴绍澍下台后，陆京士主办的《立报》，便连篇累牍地揭发和攻击吴，趁机大打落水狗。即使如此，杜月笙等人仍不解恨，还想索了他的命去。一九四六年四月的一天上午，吴绍澍外出后返回他在安福路“鹤园”的寓所时，预先埋伏在周围的枪手，连珠般地对准汽车扫射，将吴绍澍的防弹汽车打穿了七个洞。吴绍澍虽未被击中，但这场虚惊也够他受的。吴遇刺的消息传出后，接替钱大钧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和警察局长宣铁吾赶去“慰问”。对此案的背景，众人心里有数，”嘴上却都不说。吴绍澍见状，只好自认晦气，叫大家不要把他遇刺的消息传开，也不要登报。以后，杜月笙还指使他的门徒王兆槐派人去暗杀吴绍澍。这件事被毛人凤知道了，曾派保密局处长沈醉赶到上海，不允许王为杜去充当打手，事情才算作罢。

经过这场角逐，吴绍澍称霸上海的勃勃雄心，冰消瓦解，而杜月笙却变得更加跋扈、骄横。

为汉奸缓颊

八年抗战期间，杜月笙的很多亲朋好友投敌当了汉奸，其中不少人始终与杜月笙保持联系。抗战胜利，这些变色龙为了逃脱民族和人民的惩罚，纷纷寻求杜月笙庇护。

早在杜月笙由淳安返回上海途经杭州时，大汉奸丁默邨便特地在杭州设宴为杜月笙接风。了默邨，湖南常德县人，早年曾混入革命队伍，后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一九三四年，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地位一度与戴笠、徐恩曾相差无几。抗日战争开始后，丁默邨投降

日本侵略者，坐上了上海极司非尔路 76 号汪伪特工总部的第一把交椅，后又先后任伪社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抗战后期，他眼见日本主子寿数有限，便与戴笠、顾祝同拉上关系，通过戴笠和顾祝同向蒋介石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所以，日本一投降，他便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军事专员”。但他自感作恶多端，唯恐不为国人所容，还想要杜月笙多加美言，因而特地设宴款待杜月笙。席间，欢声笑语，打得火热，席后，丁默邨当然更有“孝敬”。杜月笙接受了丁默邨给的好处，自然极力为他开脱。

汪伪政权大汉奸头子之一周佛海，也曾要求杜月笙帮忙。周佛海，湖南阮陵县人，一八九七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实现后，他与国民党右派沆瀣一气，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参加何公敢为首的“孤军社”，表示信奉国家主义。一九二七年，周佛海秘密向蒋介石献反共之策，得到蒋的赏识，被派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少将秘书兼政治部主任。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周佛海先后担任过南京中央军事学校政治总教官、政训处少将处长、国民党军委会总政治训练部兼蒋介石行营总政治训练部中将主任等职。一九三一年，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任国民党大本营第二部副部长、代理宣传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以后，投降日本，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

抗日战争后期，周佛海通过军统恢复了与蒋介石的关系，接受了蒋介石交给的秘密任务。蒋介石为此亲笔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内称：“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在这封信上未署名，而只落下了“知名不具”的字样。日本投降后，周佛海被蒋介石明令发表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照样前呼后拥，招摇过市。结果，招致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国际上有人提出：“南京伪府曾向英美宣战，其首脑人物应属于战争罪犯”。这使周佛海极为恐慌，特地找到杜月笙，通过杜月笙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求情，希望王在国际上帮助他说些好话。周佛海虽然拼命活动，蒋介石也愿意保护，但其罪孽深重，名声太臭，国民党政府很难公开庇护，为了搪塞舆论，不得不派专机将他送到重庆软禁，后又解到南京交法院判决。在审讯期间，周佛海妻子杨淑慧为保全周佛海生命，特给周佛海请了三位律师，即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为之辩护。此外，还多方搜罗对周佛海有利的证据。给周佛海提供证据的人有：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蒋伯诚、杜月笙、吴绍澍、吴开先、马元放等。陈果夫、陈立夫为周佛海写给蒋介石的信说：“周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按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例如派罗君强为上海市秘书长，了默邨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事颇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竟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如蒙钧座开恩免其死，拟请于日内，飭司法行政部长设法准予缓刑或减等处罪。”杜月笙也写了大致相同的证明。经此活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令将周佛海由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在此之前，杜月笙长子杜维藩便知道了这

周之友（幼海）：《周佛海之死》，载《周末》。

周之友（幼海）：《周佛海之死》。

一消息，并于三月十五日禀告杜月笙：“周佛海两次控告被驳，现由居院长签呈主席，批准改无期徒刑，手谕交洪兰公（洪兰友）密藏。”得此消息，杜月笙方安下心来。

杜月笙的徒弟罗洪义，在上海沦陷后，首则置身于官僚买办盛宣怀的姪子盛文颐主办的贩毒机构“宏济善堂”，继而在汪伪政权禁烟总监部担任要职，大肆贩卖鸦片，帮助日本侵略者推行以鸦片摧毁中国人抗战意志的阴谋。通过这种罪恶贸易，罗洪义到手的金钱，要以天文数字计。为了给日后留一条路，罗洪义当时就从他的巨额收入中拨出一部分，源源不断地送交住在重庆的杜月笙，一方面供杜月笙挥霍，另一方面请杜月笙代他买进黄金、美钞，以备不时之需。抗战胜利后，上海人民强烈要求法办罗洪义。罗洪义四面楚歌，将杜月笙奉为救星。杜月笙一到上海，他立刻搬进杜月笙住处，跟在杜月笙屁股后边，寸步不离，白天黑夜，足不出户。杜月笙对外扬言：“我收留罗洪义，一来是顾念师生之情；二来当年的地下工作，只要我有事情交代他，他从不推辞，多少也有些微劳。”千方百计为罗洪义开脱罪名。但杜月笙指鹿为马、化黑成白的手段再高，也难以掩尽天下人耳目。罗洪义抗战期间，到底是为虎作伥，还是干“地下工作”，上海人民清清楚楚。因此，杜月笙越是庇护罗洪义，上海人民追究罗洪义的呼声越是高涨。国民党政府被迫将罗洪义列为汉奸通缉。但罗洪义躲在杜月笙住处，军统特务不便去抓。戴笠找了个与杜月笙相熟的人对他说：“你去告诉杜先生，他究竟要我戴某人这个朋友呢？还是非保牢罗洪义不可？如果他要顾全和我的交情，那么就交出罗洪义，否则的话，我为顾全友谊，可以放他一码，只是从今以后，我和杜先生不再有友情份。”此话传到后，杜月笙才把罗洪义叫出，交给戴笠派来的人带走。其后，国民党政府象征性地判了罗洪义几年刑。罗洪义坐了几年牢，在全国解放时，便追随杜月笙逃到香港去了。

此外，一些与日本侵略者有过经济来往的资本家，也接二连三地找到杜月笙。有的送以干股，有的送上金钞，以求庇护。如糖业巨头黄增诗一次便送杜月笙重四百两的一块美国大金砖。杜月笙的门生徐懋棠以买房相赠的方式，变相送给杜月笙的姨太太姚玉兰黄金大条一百根。哈同的儿子乔奇·哈同，则送杜月笙以干股。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在杜月笙的卵翼下，不少汉奸重罪变轻、轻罪化无，而杜月笙则乘机捞进大笔钱财，并招降纳叛，扩充了势力。

兔死狐悲

正当杜月笙在上海纵横捭阖，力图恢复并扩大自己威势的时候，他的有力支持者与合作者戴笠突然死于非命。

戴笠来往各地，经常由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给他调拨专机使用。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他拟从青岛乘一架D·C47型222号专机飞上海，第二天再转飞重庆。他如此紧张地行动，是为了揽权。抗战胜利后，戴笠向蒋介石递交过一个全国建警计划，请求成立全国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总监。然而，多年来一直与戴笠争夺警察领导权的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这时也拟了一份战后建警计划，并通过他的靠山、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请求蒋介石将建警任务交给他。戴笠得知此事后，急于赶去重庆，向蒋介石面争警权。十七日当天，戴笠虽然接到上海方面气候不好的通知，但仍决定照常起飞。上午

十一时四十五分，飞机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到上海时正值大雨滂沱，机场不同意降落，改飞南京。南京也正下大雨，机场勉强同意降落，但由于云层很厚，又有雷雨，飞机与地面联络有困难，在穿云下降时，误越机场，飞到江阴县去了。在大雨中，飞机飞得很低，先撞到一棵大树上，接着冲到江阴板桥镇南面一座不到二百公尺高的岱山上，轰然炸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个个烧得焦黑。军统局派人去收尸时，无法辨认哪一具尸体是戴笠，后由他的亲信副官根据戴笠左边臼齿上下镶有六颗金牙的特征，才算认出。

杜月笙得知戴笠机毁人亡的消息，如中雷殛，呆若木鸡，不哭、不说话，连眼睛几乎都不眨，回过神来之后，才呼天抢地，嚎陶大哭。他如此伤心，是有原因的。

戴笠是杜月笙的把兄弟。长期以来，杜月笙利用他在黑社会的关系，为戴笠的特务活动提供了便利和情报；而戴笠凭借他在蒋介石身边的特殊地位，对杜月笙邀宠于蒋介石起了重要作用。两人各有所求，互相利用，虽有争斗，但在更多情况下互相勾结、依靠和维护。

抗战胜利后，上海租界不复存在，杜月笙失去了过去赖以活动的特殊背景，因而更加注意与戴笠拉拢关系。他自淳安返回上海不久，戴笠的部下、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新衡接踵而至。王新衡去拜望杜月笙时，杜做出一副体贴入微的姿态问王新衡：“新衡兄，你准备住在哪里？”王新衡回答：“我刚到，先来拜望杜先生，住的地方还不曾安排好。”杜月笙立刻表示可以将他在杜美路26号那幢华丽住宅借给王新衡作为军统局上海区办事处。以后，戴笠来到上海，又在这幢房子内成立了军统局上海办事处。杜月笙特派他的心腹管家万墨林和既是他的门徒又是军统特务的陈默住进杜美路26号，帮助戴笠处理总务。

而戴笠在上海也为杜月笙捧了不少场，帮了不少忙。一九四五年十月，戴笠在杜美路26号军统局上海办事处内摆下三十桌丰盛酒席，请了军统局大特务、忠义救国军的重要干部、以及上海帮会组织的头头脑脑，大张旗鼓地庆祝胜利。宴会上，戴笠让杜月笙坐在首席。举筷之前，戴笠致词，他吹嘘了一通军统局和忠义救国军在抗战期间的“功劳”之后，突然伸手挽起杜月笙一条胳膊，将嗓门提高一个音阶，大声嚷道：“我们都知道杜先生对于本军的重大贡献，所以我要说，‘没有杜先生，就没有忠义救国军，没有忠义救国军，就没有今天的胜利庆祝’”。把杜月笙吹捧成抗战胜利的元勋。戴笠带头捧场，下面的大小党徒难恐落后，纷纷拿着酒杯，涌向杜月笙敬酒。抗战胜利后，杜月笙一直处心积虑要把自己美化成“抗日功臣”，因而对戴笠导演的这幕闹剧特别称心，以至于眼眶里掉出几滴混浊的泪水。

杜月笙、吴开先等人与吴绍澍争权夺利时，戴笠是站在杜月笙这边的。为了打击吴绍澍，戴笠借口汪伪苏浙皖三省税务局局长邵式军在爱棠路80号的豪华住宅是被吴绍澍手下人员接收的。因此放风说：邵式军的亿万家产不可能随身携带，现在失踪了，肯定是接收人员搞了鬼。戴笠设法找到了邵式军的妻子，让她提供证据。邵式军妻子说：邵式军的住宅内原有四只装满金银财宝和大量钞票的巨型保险箱。其中第一只放的是金条，第二只放的是美钞，第三只装满钻石珠宝，第四只则装满日元和日本国家债券。取得邵式军妻子的这一口供后，戴笠派出忠义救国军和军统特务，连夜封锁了爱棠路80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办事处，由军统特务毛森负责搜查。事后，据毛森汇报，在该处搜出有四只巨型保险箱，其中三只的箱门已遭破坏，里面空无所

有；另一只则完好无损，设法打开箱门后，发现里面确如邵式军妻子所说装满日元和日本国家债券。戴笠以此为根据，推论三只已遭破坏的巨型保险箱内原来存放的肯定是黄金、钻石珠宝和美钞，以后被吴绍澍都下接管时毁门取走。戴笠将这缺少直接证据的结论，向蒋介石作了报告，使吴绍澍在上海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更加陷于被动。吴绍澍不得不去找戴笠求情，被戴笠拒绝。为给自己辩解，吴绍澍决定飞去重庆面见蒋介石。戴笠知道这一消息后，吩咐手下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机票给吴绍澍。”吴绍澍几经设法，方去了重庆，但自重庆返回后，仍被国民党政府免去了职务。

杜月笙和戴笠互相勾结、互相依靠，形成一种我少不了你，你也少不了我的关系。所以，杜月笙经常对外扬言：戴笠是他生平唯一知己。戴笠机毁人亡，杜月笙当然抑制不住兔死狐悲之感。他嚎啕大哭一场后，哮喘发作，上气不接下气，脸孔青紫，项粗如斗，只得倒下养病。养病期间，有人去看他，杜月笙还呜呜咽咽地对来者说：“我哭雨农兄，不但是为我个人失去了平生知己，我也为国家民族在这种时候，竟失去了雨农兄而伤心难过！雨农兄一死，共产党又不知要闹到什么田地了啊！”

杜月笙话中的所谓“国家民族”，实际上指的是国民党蒋介石。戴笠一死，对国民党蒋介石来说，确丧失了一条镇压革命的凶恶鹰犬。蒋介石因此伤心不已，亲自去南京灵谷寺后山踏看风水，为戴笠选择墓地，并关照军统局大特务毛人凤说：“安葬时，要取子午向。”此言此行，与杜月笙如丧妣妣般的嚎哭，倒是相映成趣。

杜月笙病愈后，与吴国桢、钱大钧、潘公展、吴开先、杨虎宣铁吾等人发起，于五月二十六日在浦东同乡会大厦举行所谓“戴笠将军追悼会”，并在报上大登启事，哭叫：“懍国步之犹艰，痛哲人之遽萎”。举行“追悼会”那天，杜月笙亲自主祭。“追悼会”后，为使参加者都能象杜月笙那样对戴笠“永志不忘”，还给每人发了刻有戴笠遗像的“纪念章”一枚，和“纪念册”一集。

经这番追悼，杜月笙犹觉“哀情”未尽，又请了一批和尚尼姑，在淡水庙，击鼓敲磬，诵经拜忏，为戴笠超度亡魂。

戴笠有个儿子，名叫戴藏宜，高中毕业后，没有再升学，在老家办了所小学，自任校长。戴藏宜仗其老子权势，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尤好玩弄女性，兽性发作时，连一些女性亲戚也不能幸免。戴笠死时，戴藏宜已三十多岁，杜月笙却以抚恤“遗孤”为名，广为募捐，帮戴藏宜大大捞进一票。

十二 再展“宏图”

出任纺织公会联合会理事长

戴笠的死，对杜月笙虽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并没有使他放弃在上海滩再展“宏图”的野心。他把手伸得更长，极力将自己的势力向各行各业渗透。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在工商界捞得的第一个新头衔是纺织公会联合会理事长。

一九四六年秋，所谓“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该会之所以称之为“公会联合会”，是因为当时的纺织业按地域划分为区，上海是第六区，各区纺织业有区公会，各区公会合成一全国性统一机构，便成“公会联合会”。纺织行业中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的激烈争斗，反映到“公会联合会”之中，双方竭力推选己方代表担任“公会联合会”理事长，以加强对“公会联合会”的控制。官僚资本控制的厂家多，在“公会联合会”中占据优势，因而理事长的职位很可能落到他们之手。民族资本的代表不甘示弱，便由荣家纺织业主持人荣尔仁、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股东袁国樑、纺织业六区公会秘书长奚玉书等四出活动，力图阻止官僚资本代表当选为理事长。

杜月笙涉足于纺织业是在抗战时期。当时，有一家颇具规模的“沙市纱厂”由湖北沙市迁至重庆，由于股东内部争权夺利，发生纠纷，厂子几乎维持不下去。杜月笙见经营纺织业赢利很厚，乘机插手其间，购得“沙市纱厂”的股权，将该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后杜月笙又与孔祥熙和花纱布管制局勾结，担任了官僚资本性质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此外，他还在西北投资设立西北毛纺厂。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在纺织业的势力进一步扩展。一九四六年，长期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樑，在江阴投资兴建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此事引起当地“大亨”黄善青、祝林等人觊觎，他们力图分润，甚至想攫取董事长职务。袁国樑强龙难压地头蛇，便和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王先青至上海走杜月笙门路。他们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加入恒社，然后请杜月笙担任福澄公司董事长。杜月笙问：“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份呢？”袁国樑立刻会意地答道：“老夫子加五千万元的股份可以了，这笔钱由我替老夫子垫。”之后，福澄公司股东在丽都花园（现上海市政协处）召开会议，正式推举杜月笙为董事长。江阴的几位“大亨”，自忖斗不过杜月笙，只得知难而退。福澄公司就此落入杜月笙控制之中。以后，杜月笙又投资于各有千余名工人的荣丰一厂、二厂，和有七百余名工人的恒大纱厂，还担任了设在西安的利泰纺织厂董事长。这样，杜月笙在纺织业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不但拥有大量产业，而且既和官僚资本有密切勾结，又成为一些民族资本家的靠山，因而两面兜得转。

但杜月笙对此并不满足，他得知纺织公会联合会内两种势力的代表在争夺理事长职务后，认为这是扩展自己势力的大好机会，便将他新收的“学生”袁国樑召来，对他表示自己愿意出任理事长，但又唯恐落选。他对袁国樑说：“这个理事长，我做不做倒无所谓，就怕万一选不上，坍不起这个台。你去替我各方面摸摸看，早些给我回音。”袁国樑奉命外出调查。一些民族资本的代表虽感杜月笙与官方勾结过于密切，但又认为他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直接控制的官僚资本还是有区别的；而且杜月笙手里掌握着一股恶势

力，得罪不起，为了不让官僚资本独霸“公会联合会”，也为了通过杜月笙缓冲与官僚资本的矛盾，他们同意推选杜月笙为理事长。而官僚资本代表攫取理事长的图谋，在遭到民族资本代表的激烈反对以后，碍于舆论，不得不有所收敛；同时，鉴于杜月笙和蒋介石政权的特殊关系，他们也愿意支持杜月笙出任理事长。袁国樑摸准这些情况后，立刻向杜月笙报告说：“我四处摸过一遍，大约有六七分苗头”。杜月笙因此决定参加竞选。选举会场设在上海总商会。届时，杜月笙亲自到会，堆着满脸微笑和来自各地的代表频频握手，不厌其烦地嘘寒问暖，做最后的拉票努力。选举结果，杜月笙名下票数最多，他如愿以偿地谋得了“中华民国纺织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的位置。

这一成功，促使杜月笙更加野心勃勃地大肆活动，他除了派人将自己昔日控制的产业如中汇银行、华丰面粉厂、沙市纱厂、大达轮船公司等整理复业外，又接连担任了《申报》董事长、《新闻报》常务董事、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和华商电气公司、浦东商业银行、恒大纱厂、华安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务，在金融工商界取得更加惹人注目的地位。

苏北遭灾上海选美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苏北地区遭受一场大水灾，大批难民涌入京沪杭沿线城市，特别是南京、杭州、上海等地。杜月笙为了博取声誉，捞得油水，历来热心于所谓救灾之类的“赈济”事务。面对这次水灾，他感到又遇上一个名利双收的好机会，决定出面募捐。

主意打定，杜月笙放出风说：如果让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汪宝瑄亲自我他，他愿意出面为苏北募捐救灾。杜月笙知道汪宝瑄与国民党CC系头子陈立夫关系密切，想借此机会加强与陈立夫的联系。国民党政府当时正因大批难民流落于南京、杭州、上海等各大城市，感到有失体面而大光其火，见杜月笙愿意出面募捐救灾，自然乐意。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等人找到汪宝瑄，请他专程去上海一趟。汪宝瑄知道募捐救灾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当然愿意染指。但按照惯例，募捐救灾不属省党部工作范围，唯恐手伸得太长，被人攻击。于是跑去南京，向陈立夫请示。陈立夫回答说：“很好，既然杜先生对你重视，你便去做好了。其他问题不必考虑”。汪宝瑄得此指示，有恃无恐，立刻跑去上海，找到杜月笙，请杜出面募捐“救灾”。杜月笙、汪宝瑄商定，此举要设法搞到法币二十亿元。不久，杜月笙等人借上海银行公会召集会议，将上海各业公会、各银行负责人一律请到，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财政厅长董轍、省党部主任委员汪宝瑄、省临时省议会议长冷瑄均列席。会议由杜月笙主持。在这次会上，杜月笙宣布了募款二十亿元的数额，并使会议按照他与汪宝瑄等人预先的策划，通过成立“苏北难民救济协会”，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钱新之、徐寄成为副主任委员，汪宝瑄为总干事，另设副总干事三人，分驻上海、镇江、南京等地。会址设在上海浦东同乡会。

“苏北难民救济协会”的募捐重点在上海。杜月笙亲自出面，挽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军统局长郑介民作陪，在顾嘉棠家中摆酒宴请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全部头面人物。这些人知道赴宴就要掏钱，但杜月笙设宴是“霸王请客”，不能不去。宴席上杯觥交错之间，潘公展等人口若悬河劝捐于前，顾嘉棠之流挺胸凸肚虎视于后，处这种场面之中，谁敢

不捐。一顿饭吃下来，杜月笙等人便“募”得了大笔款子。

这种募捐方式之外，杜月笙还派恒社成员四出活动，在上海各报、各电台上大肆宣传，号召捐款。并举行所谓“义演”、“义卖”，捞取钱钞。尤其别出心裁的是以女色刺激捐款，组织所谓“选美”活动，公开选举“上海小姐”，凡参加者，要高价购买选票，出售选票的收入转为捐款。不少名门淑女、著名交际花，为了取得“上海小姐”的头衔，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并抬高身价，纷纷前来竞美。选美场内，花团锦簇，千娇百媚。不少市民被吸引前来看热闹或参加选举，更有不少军阀、巨贾来为他们的恋人、姘妇捧场助威。角逐到后来，还剩下王韵梅、谢家骅、刘德明三人。这三个人各有后台支持，王韵梅是四川军阀范绍曾的“女朋友”。为了将王韵梅捧为头号“上海小姐”，范绍曾拿出大笔钱款购买选票。谢家骅、刘德明的后台不甘示弱，自然也解囊相助。于是选美场上，王、谢、刘三人的票数此起彼落，相持不下。在这三位“美人”的争斗中，大量金钱涌进杜月笙等人主持的“难民救济协会”。杜月笙还以支持范绍曾为名，邀人聚赌，每夜抽头，抽头所得，用来购买选票投给王韵梅。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晚间，这场选美闹剧终于在上海新仙林舞厅宣告结束，王韵梅居首，谢家骅、刘德明分列二、三。事后，范绍曾算了一下，仅他一人为王韵梅捧场，便用去法币四千万。通过评选“上海小姐”，杜月笙等人募集款项之巨，可想而知。

“选美”之后，杜月笙等人在歌坛、平剧界和跳舞厅，如法炮制，分别评选所谓“平剧皇后”、“歌后”、“舞后”，接连捞进大笔款项。

通过上述种种办法，二十亿法币很快到手。为了感谢汪宝瑄在这一事情上的配合，不久，当汪宝瑄因病住进国民党南京中央医院时，杜月笙特派徐子为前去探望，送上一张二千万的支票。参与这次募捐活动的还有其他许多重要人物需要摆平，如以每人到手二千万计，募捐总数二十多亿元，不过仅够百来人之分。如此一算，那些辗转街头、饥寒交迫的难民，究能分享几多，便可想而知了。

重整恒社又组“新建会”

抗战胜利后，散处各地的“恒社”成员，大多重返上海。杜月笙为了团聚和扩展势力，决定重整“恒社”。

一九四五年十月，杜月笙在浦东同乡会召开第一次座谈会，商量恢复恒社和社员重新登记问题。有个大发国难财的恒社社员徐大统，表示愿意将他接收的江西路“伦社”房屋拿出一层，给恒社做为临时社址。这样，恒社活动便开始恢复。恒社社员都被通知返社，连汉奸汪曼云、张克昌等人也在受请之列。为掩人耳目，杜月笙等人搬出“江湖义气”，声称：“帮会是讲道义的，他们做了汉奸，国家有法律制裁，但我们兄弟之谊还是有的。”

一九四六年，恒社借丽都舞厅召开了战后第一次社员大会。杜月笙穿一领长衫，在其亲信党羽的簇拥下，春风满面地接受众社员的参拜和恭维。应邀参加的还有所谓“恒社之友”，如顾嘉棠、杨管北、徐采丞、范绍曾、吴开先、陶百川、程沧波、钱新之、章士钊、徐为彬等。大会由陆京士主持。当时，陆京士已成为恒社中除杜月笙外最有势力的人物。杜月笙曾公开夸奖陆京士是恒社的“模范社员”，他说：“我们社里象陆京士同志，他对于社

会对于国家努力贡献外，在本社也是非常负责的一人，希望每个社员都能象陆京士同志一样努力负责，本社发扬光大，前程无量”。实际上把陆京士作为他在恒社的继承人。这次大会讨论了恒社的正式社址问题，决定由众社员认捐，在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中南新村对面的一块空地上新造一幢大楼。会后并请专人进行了设计，新建恒社社址预定包括大会场、舞台、餐厅、图书馆、宾馆、办公室等。后来，顾嘉棠得知汉奸陶雪生在福履理路有一幢住宅，为了逃避没收，愿以低价卖出。顾嘉棠认为这幢住宅做为恒社社址很适宜，征得杜月笙同意后，由杜月笙向恒社社员募得七十二根金条，将这一汉奸财产盘下。因此，抗战后，恒社的正式社址便设到了福履理路。恒社搬到福履理路之后，还向国民党政府有关机构申请立案，使恒社成为所谓“法定团体”。为了与所谓“法定团体”的名称相符，恒社在组织形式和产生领导机构的方式上做了某些变动，例如通过社员大会选举理监事会，理监事会下分设各组，办理恒社事务等。抗战胜利后，产生出的最后一届理监事名单如下：

常务理事：陆京士、唐缙之、杜维藩、王兆槐、郭兰馨。

理事：王先青、水祥云、殷新甫、王润生、吴颖荪、黄炳权、陆增福、姚君喻、陈觉民、周祥生、王震欧、汪其俊、高尚德、朱亚杰。

候补理事：王得民、罗松云、钱培荣、陆庆黻、朱化农。

常务监事：唐世昌。

监事：于松乔、张廷灏、彭尧亭、王叔和、张受百。

候补监事：周星北、沈莱舟、邵予英。

总干事：陈士皋。副总干事：吴颖荪、陆庆黻。

经过整顿和扩展，恒社人数由抗战前的五百二十人增加到九百十人。这九百十人是正式列入《恒社社员通讯录》的，如果加上实际在社、但由于某种原因联系中断而未列上名单的，以及恒社社员的徒子徒孙，人数更多。《杜月笙先生六十年大事记》中曾吹嘘说：“如恒社，则昞于民国二十一年”，“八千弟子，患难相从，声应气求，遍于寰内。今亦于沪市复员，恢复总社”。在这支号称八千人的庞杂队伍中，有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司长，省、市党部委员，厅长、局长、县长、区长，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警察局长，师长、参谋长、高级参谋、队长，“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以及工商企业中的董事长、理事长、厂长、经理、协理、襄理和学校校长、报社社长、编辑、记者、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等。包括了许多政治派系，如军统、中统、孔祥熙派、太子派、青年党等等，其中军统人员尤多。《恒社社员通讯录》中，没有杜月笙的姓名和地址，这是因为“老夫子”不便与门生弟子同列。杜月笙对恒社采取的始终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整顿和扩展后的恒社，极力把它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在不少地方设了分社，原准备在香港和北平也设分社，后因蒋介石政权迅速崩溃而作罢。但恒社社员实际已遍布全国，甚至及于海外。从《恒社社员通讯录》及杜月笙六十岁作寿时各地发来的贺电看，当时分布有恒社社员的地区包括南京、杭州、北平、天津、武汉、重庆、沈阳、青岛、西安、兰州、宝鸡、成都、昆明、桂林、南宁、福州、南昌、苏州、无锡、南通、屯溪、金华、绍兴、台湾、香港，以及缅甸、菲律宾等地。

在恢复恒社的前后，杜月笙还与继戴笠之后担任国民党军统局负责人的郑介民勾结，将原来的所谓“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成“中国新社会事业建

设协会”。

那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郑介民指派“人民行动委员会”秘书、军统骨干徐亮专程到上海找杜月笙，希望杜月笙协助，将“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目的“是为了配合政府对共产党所下的讨伐令的执行，团结全国帮会势力，作为军统局的外围组织，协助政府反共，深入各阶层，各职业界做情报工作”。杜月笙认为这是他邀好于蒋介石及军统局新负责人，并扩展自己势力的大好机会，于是一口应承。

“人民行动委员会”在抗战胜利后，已迁到上海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40号，其头子们对该组织今后的发展方向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改成政党，有的主张组为协会。杜月笙与郑介民达成协议后，便设法勾结上海洪帮头子向海潜、四川袍哥首领田得胜、河南闻人张钊、西北帮魁樊崧甫、“东北大侠”杜仙五，以及许崇智、杨虎、范绍曾、莫德惠等人，并与红枪会、大刀会、白莲教等帮会首脑取得联系，促使他们接受了军统关于将“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会”）的主张。经过一通紧锣密鼓的筹备，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新建会”在上海丽都花园召开了成立大会，全国各地赶来参加会议的帮会首领、军阀政客、闯人名流达千人之多。蒋介石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通过一个章程，虚伪地宣称：“新建会”“秉承孙中山先生遗教，以求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秉承事业以人民为本之原则，以努力新社会事业之建设；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达成复兴民族，安定世界之目的”。会议选出了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向海潜、范绍曾、张子廉、徐亮、田得胜、张钊等九人为“新建会”理事；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五人为“新建会”监事；以军统特务徐亮为书记长，程克祥为副书记长。杜月笙、杨虎、向海潜为常务理事，黄金荣为常务监察；王铁民为总干事。

之后，“新建会”又在上海、南京、江苏、徐州、福建、台湾、贵州、江西、云南、山西、陕西、河南、浙江、重庆、安徽、山东、河北、天津、沈阳、长春、察哈尔、绥远、热河、香港、青岛、广东、湖南、甘肃、新疆等省、市、地区设立了二十八个分会，并在这些省、市、地区的下属县设县支分会四百六十八个，会员总数号称五十六万。

“新建会”成立后，积极指挥各地帮会组织，配合国民党特务机构，搜集共产党、解放军的活动情报，打击进步力量；并以侦缉走私为名，大肆敲诈勒索，鱼肉百姓，无恶不作。

通过恒社的整顿扩展，及组成“新建会”，杜月笙的势力又见增长。以此为依托，他的手伸向了更多方面。于是各种各样的职衔接二连三地落到杜月笙头上，加上原有的，共达七十个左右：国民党“国大”代表、上海市参议员、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南区救火联合会理事长、上海市工业会筹备主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正始中学创办人、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复旦大学校董、上海法学院校董、申报董事长、商报董事长、新闻报常务董事、中央日报常务董事、世界书局代董事长、大东书局主席董事、东方经济研究所理事长、中华书局董事、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汇银行董事长、浦东银行董事长、

国信银行董事长、亚东银行董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上海市轮船公会理事长、招商局理事、民生实业公司董事、上海市轮渡公司董事长、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大通轮船公司董事长、裕中轮船公司董事长、复兴轮船公司董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荣丰纱厂董事长、大丰纱厂董事长、恒大纱厂董事长、沙市纱厂董事长、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华丰织布厂董事长、利秦纺织公司董事长、西北毛纺织厂董事长、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第四区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华丰面粉厂董事长、华丰造纸厂董事长、民丰造纸厂董事长、云丰造纸厂董事、上海渔市场理事长、中华水产公司副主任委员、洽茂冷气公司董事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中华贸易公司董事长、通济贸易公司董事长、扬子贸易公司董事长、嘉陵贸易公司董事长、华商电气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大中华橡胶厂董事长、新华玻璃厂董事长、永兴化学工业社董事长、亚浦耳电气厂常务董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董事、香港中国国货公司董事、中国茶业董事长、上海水果业公会理事长等等。

以上七十个职衔，其中计董事长三十四，理事长十，常务董事三，董事九，会长二，副会长一，校董二，常务理事一，理事二，代表、参议员、常务监察、筹备主任、创办人、副主任委员各一。这些职衔，除所谓公职外，涉及到文化、教育、金融、交通、纺织、面粉、造纸、证券、贸易、电气、橡胶、化学、烟草、茶叶、水果、渔业等各行各业。杜月笙以一个流氓出身的闻人，竟拥有如此众多的职衔，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风头十足的六十岁生日

经过竭力活动，杜月笙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重新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是他六十岁生日。此时，杜月笙虽然气喘病不断发作，但仍想大规模举行“花甲之庆”，以炫耀他的权势。

为了奉承和讨好杜月笙，恒社门生，加上其他一些好事之徒，组织了一个“庆祝杜公寿诞筹备委员会”，推举出二十三人担任筹备委员，其中有恒社常务理事陆京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海员总工会理事长杨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王先青，中汇银行副总经理徐懋棠，金廷荪的大儿子、上海黄金大戏院所谓“五虎将”之一金元声，上海红十字会总干事殷新甫，恒社理事、通商银行文书课课长陈士皋，恒社会计组长王润生，恒社平剧组长汪其俊，恒社调解组长于松乔，恒社事务组长吴颖荪等人。

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杜月笙正式做寿以前，“筹备委员会”先在顾嘉棠家里设宴为杜月笙“暖寿”。参加者二百余人，其中有许世英、黄金荣、杨虎、王晓籁、章士钊、钱新之、徐寄庠、范绍曾、刘航琛、洪兰友、郑介民、潘公展等闻人名流、军阀政客和国民党要员。杜月笙本人因气喘病发作，只能当个缺席“寿星”。暖寿宴会由时任国民党“国民大会”秘书长的洪兰友致“祝寿辞”，他华词美藻、谀语谄声，着实将杜月笙吹捧一番。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受杜月笙之托，致谢词。一祝一谢后，便是觥筹交错，大嚼一通。

次日，杜月笙的“花甲之庆”正式开场。位于泰兴路的丽都花园舞厅停业一天，专门用作为杜月笙祝寿的场所。舞厅正中悬挂着蒋介石送的寿匾，上书“嘉乐延年”。左右两边挂着包括国民党中央各院部头脑在内的各式人物书写的寿联寿幛，以及祝颂寿屏。在这些寿联寿幛、祝颂寿屏的前面，摆

着一连串茶几，茶几上放满祝寿礼品，大多为金盾银鼎、玉石古玩。其中有三件别出心裁之物，一件是陆京士等人控制的上海邮务工会送来的百寿图，此图用各种邮票剪贴而成，花花绿绿、斑斓夺目。另一件是上海美一绣业公司绣的杜月笙巨幅肖像，这幅像以百余种彩色毛线精心绣成，色泽均匀，不露一丝造作痕迹，据说是该公司继给杜鲁门、麦克阿瑟绣像后的第三幅作品。再一件是一幅国画八仙图，铁拐李、何仙姑、张果老、吕洞宾、汉钟离、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聚集在古松苍柏之下，周围白云缭绕，仙鹤齐翔。初看，不知此画与杜月笙做寿有何关系；再看，不禁令人哑然失笑，原来画中的吕洞宾改画成了穿着道家服装的杜月笙。画者为了拍马屁，连得罪神仙都不顾了。茶几上除摆设上述礼品字画外，还点燃了胳膊粗的红蜡烛，和一排排线香。四周则布满各式花篮。厅堂里五光十色，炫目耀眼，花香汗臭，冲鼻晕脑。

杜月笙虽心痒难熬地想到场受贺，但因气喘病日见加剧，略动一动，便气憋难忍，只得命长子杜维藩率领其他子女到场代为应酬。杜月笙回上海后，因原在华格桌路的旧宅与张啸林被杀身死时的住宅仅一墙之隔，杜月笙因而视旧宅为“凶宅”，怕张啸林索命，一直不敢重新搬回去居住，大部分时间住在十八层楼公寓姨太太姚玉兰处。这时，他便躺在十八层楼公寓，通过电话，了解为他祝寿的情况。

那天，最早前来祝寿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接踵而来的是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夫妇、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其后，国民党政府要员吴铁城、王宠惠、宋子文、莫德惠、张道藩、董显光，以及孙科、白崇禧的代表也相继由南京来贺。此外，国民党江苏省主席王懋功、杭州市长周象贤，特地由镇江和杭州赶来上海为杜月笙捧场。一天之内，三教九流，各式来客达五千六百多人。丽都花园内，摆下流水席，一桌之上坐满十人便上菜，吃了散，散了吃，摩肩接踵，熙来攘往，热闹非凡。

之后，又连唱十天堂会。“筹备委员会”委员汪其俊和其结拜兄弟孙兰亭早已在为此事奔忙。他们专门去北平将一些名角拉来；又请了正在南方的一些著名演员，搭起了一个阵容极为壮观的班子。杜月笙作寿，许多名演员不得不过来逢场作戏，主要是惧怕杜的淫威，顺从他可以保住饭碗，否则轻则卷铺盖离开上海，重则招来毁容甚至杀身之祸。如一次张君秋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时，戏院老板沈兰庭两个月不给他包银，还要他继续演出。张君秋不得不托范绍曾向杜月笙说情，杜拿起电话，问了沈几句，沈马上付钱。抗战胜利后，程砚秋来上海演出，范绍曾接到南京许多朋友的电话，让他代买戏票，但范一直未买到好票子，恼羞成怒，便找杜月笙商量，想在程砚秋演出时捣乱。杜月笙说了一句：“程是有些不识相”，范绍曾即派了一名打手在程砚秋演出的戏院丢了一枚手榴弹，迫使程砚秋中止在上海的演出，转回北平。

因为演员大多是红极一时的名角，而且又十分难得地凑在一起演，不少人都想一睹为快。杜月笙见状，于是以救灾为名，搞出一个“祝寿义演”的名堂，票价分别定为法币三万、十万、二十万、二十五万、四十万、五十万元六种，黑市最高价甚至卖到一百万元一张。十天唱下来，杜月笙整整等到一百亿元左右的巨款。

做寿之后，由陆京士主编，专门出版了一本《杜月笙先生六秩华诞纪念

集》，其中收入了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写的《杜月笙小传》，以及其他达官贵人、亲朋好友的贺诗祝词。这些贺诗祝词多为歌功颂德之语，唯有常给杜月笙治病的医生庞京周，不知是看出杜月笙赫赫气焰背后隐藏着某种危机，还是在奉劝杜月笙“急流勇退”，他写的诗中有这样一句：“元龙豪气随年敛”。据说，杜月笙认为此诗道出了他的实情。这说明，杜月笙在风头十足地度过他的“花甲之庆”时，内心深处并非没有烦恼。

十三 不尽如意

“米蛀虫”被捉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以为凭借他给蒋介石政权立下的“汗马功劳”，满可以当个方面大员。但他的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形势的变化，蒋介石政权对杜月笙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抗战后，上海的租界宣布“收回”了，国中之国取消，国民党势力可以到处公开活动，对以租界为老窝的杜月笙等人不再有特殊需要；加之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反动统治，急于利用抗战胜利的机会，将他的独裁政权裱糊装新一番，以骗取舆论的信任。所以对杜月笙这类由“白相人”而发家的“闻人”也不想过多地“借重”，以免有碍观瞻。因而，当时蒋介石政权表面上虽然对杜月笙仍很近乎，但骨子里已不无冷淡之心，有时甚至还给杜月笙一点难堪，以限制他和他的党羽的“越轨”行为。抗战胜利不久，杜月笙的心腹管家万墨林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宣铁吾抓进监狱，便是一例。

万墨林在上海开有一片“万昌米号”，依靠杜月笙的势力，很快发展成为上海规模最大的一片米店。抗战结束后，万墨林在杜月笙、吴开先等人支持下，又当上了上海市农会理事长、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生意作得更大。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巧取豪夺，上海物价腾涨，米价更是扶摇直上。上海人民陷于饥馑威胁之中，街头时见饿殍，路边常有饥骨。但万墨林却视此为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发横财，激起上海人民无比愤慨。当时，上海有位唱滑稽戏的演员名叫筱快乐，给万墨林取了个绰号叫“米蛀虫”，编了不少滑稽戏词，抨击万墨林为富不仁。一时，电台播，剧场演，闻者无不拍手叫好，感到骂得痛快，“米蛀虫”一语，由此传遍上海。万墨林为千夫所指，坐卧不宁，他的狐朋狗友想代万墨林封住筱快乐的嘴，便给筱快乐寄去匿名信，威胁说：要请他“吃生活”！岂知筱快乐毫不示弱，在电台演播节目时，公布了匿名信的内容，从而激起上海人民更大愤怒。万墨林的狐朋狗友冒天下之不韪，纠集了一伙流氓打手，在电台公布他们匿名信的当天晚上，突然冲进筱快乐家中，见人就打，见物就砸。筱快乐本人那晚不在家，得以幸免，他的妻子被打成重伤，家具摆设也被砸得稀烂。人民群众本已对物价腾贵极为愤怒，万墨林又生出这一事端，恰如火上浇油，舆论大哗。国民党政府担心激起民变，决心抛出万墨林，以缓和人民群众的愤懑。于是宣铁吾签发拘票，以“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米价高涨”的罪名，准备将万墨林抓进监狱。

杜月笙闻讯之后，极为恼火。从他攀援上黄金荣开始，除抗战期间，三十多年，不论是巡捕房，还是什么警察局、司令部，向来只有他往外保人，从未听说谁敢抓杜月笙的人，这次非但要抓，而且抓的还是他的心腹管家，怎能不使杜月笙感到大坍其台。他背地里大发牢骚，声称：“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为了保住脸面，杜月笙除托蒋伯诚向宣铁吾疏通外，还派人去找筱快乐，表示愿意承担医药费，赔偿损失，企图以此软化筱快乐。此计不成，又指使万墨林的狐朋狗友去找警察局，声称他们捣毁筱快乐家是出于自发，与万墨林无关。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极力为万墨林分辩，说他经手的生意有账可查，并未犯法。但这些都未能使宣铁吾改变决

定。杜月笙无奈，为了避免和宣铁吾公开闹翻，便把万墨林找来，要他在宣铁吾未下手捉他之前，去“自动投案”，以留回旋余地。万墨林未曾想到神通广大的杜月笙也保不住他了，不禁瘖然若失，只得收拾铺盖行李，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投案。而宣铁吾也一副“公事公办”面孔，将他收了进去。

以后，直到杜月笙拿出“确实证据”，说明囤积粮食最多的是孔祥熙属下的长江公司，声称要办应该一起办。宣铁吾担心搞到蒋介石连襟头上，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场，才下令将万墨林交保释放。

为了平息杜月笙因万墨林事件引起的不快，宣铁吾面孔一变，转而夸赞杜月笙动员万墨林“自动投案”，是“奉公守法”，是对他本人的“竭诚拥戴”。并将自己一张标准照放大，亲笔题款，加盖官印，赠送给杜月笙。老于世故的杜月笙当然知道宣铁吾在惺惺作态。于是也装成恭而敬之，接受了照片，并配上精美镜框，悬挂在家里引人注目之处。但玻璃镜框毕竟掩盖不住杜月笙与蒋介石政权的微妙裂痕，以后又发生了一连串耐人寻味的事情。

争当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政权为了作进一步的政治欺骗，以巩固其独裁统治，决定将原来的上海市临时参议会，改成所谓“民选”参议会。

杜月笙把这看作显示其实力和扩大影响的好机会，因而让他周围的人物和众多党羽积极参加“竞选”，争当参议员。国民党上海市参议员人选是由各区及所谓社会团体推选出来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将上海市划分为三十一个行政区，三十一个区长中有不少是杜月笙系统的人，例如杜月笙的第三个儿子杜维垣便是当时的嵩山区区长。在所谓社会团体中，杜月笙拥有更大势力，他本身就兼了不少会长。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争斗，市参议员“竞选”闹剧终于结束。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立报》在评论这场竞选时，曾发表过这样的文字：“就昨天选举的情形看来，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在昨日整天中，捣毁投票场所者有之，以金钱运动者亦有之……。鉴于昨天选举种种纷扰的情形，实在使我们痛心极了”。由此可窥国民党市参议员竞选活动内幕之一斑。选举结果，杜月笙系统的人当选为参议员的达三十多人。

杜月笙本来即有心当上海市参议会议长，议员竞选的初步胜利，使他感到胜券在握，更为跃跃欲试。但就在这时传出消息，蒋介石明白表示希望潘公展当选议长。此外，还有人向蒋介石推荐曾任国民党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的徐寄庐为候选人。这对杜月笙来说，无异于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本人虽不便公开骂娘，但他的党羽却在杜所控制的报纸上，一再为杜月笙叫屈，声称：“杜先生众望所归，是议长最适当的人选”。但这些舆论并未能影响蒋介石。杜月笙计穷之余，决定退而求其次，即动员一切他可以动员的力量为他拉票，以保证他在市参议会议长选举时，获得全票，然后以身体欠佳为理由，宣布“让贤”，将议长位置让给潘公展，这样既可避免拂逆蒋介石的意旨，又可保全他自己的面子。

杜月笙这一打算被吴绍澍得知，吴为报当年杜月笙等人将他从上海市副市长位置上拉下来的一箭之仇，立刻召集曹俊、范锡品、姜梦麟、陈汝惠、傅晓峰等属于他这一系统的市参议会参议员，商量对策。他们估计，以他们的力量很难阻挡杜月笙取得最高票数，因而决定在第一轮选举中全部“交白

卷”，即投空白选票，以破坏杜月笙想全票当选的愿望；而在杜月笙宣布“让贤”后，在第二轮选举中，再把票投给潘公展，做个顺水人情，以保持与潘公展的关系。

杜月笙事先估计到吴绍澍可能与他作对，曾让他的学生子、与吴绍澍关系密切的王先青去找吴绍澍打招呼。王先青找到吴绍澍，先试探道：“现在市参议会就要选议长了，你有何打算？可否见告”。吴绍澍不露声色地把问题挡了回去：“先青兄，你的意见如何？”王先青只得摊牌：“议长应该选杜先生。但是，杜先生身体不好，他不会做议长的，大家一道选他一票，让他得到满票，然后再让给别人。这样，也好向外面有个交代。”吴绍澍含糊其词地应道：“好呀！”王先青不放心，又追问道：“你那方面的人，愿意一致投杜先生的票吗？”吴绍澍又含糊其词地应道：“好呀！”王先青以为目的达到，兴冲冲返回去向杜月笙报功。杜月笙闻讯后，虽不敢完全相信吴绍澍如此轻易地答应给他捧场，但事到如今，也只能抱着到时再看的态度了。

上海市参议员虽然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就“选举”出来，但由于各种矛盾，一直拖到十月，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才颁发了“当选证书”。十二月的某天，在正始中学大礼堂召开了上海市参议会成立大会，参加议员为一百八十人。大会首先举行所谓当选市议员宣誓就职典礼；接着由上海市长吴国桢报告市参议会成立经过；

其后，便由议投票选举正副议长。这第三个节目，才是杜月笙最关心的，他渴望他的名字在唱票时能从开始报到终止，但未曾想到一上来便是接二连三的空白选票，这使杜月笙大为尴尬，他手下那些负责安排选举的党羽们，唯恐杜月笙见怪，更是急得坐立不安。好不容易挨到唱票结束，一百八十张选票，其中空白的多达四十余张，几乎占了四分之一，杜月笙虽然以最高票数当选，但所得票数与满票却差得很远。杜月笙原来设想先造成议员们对他一致拥戴的局面，然后再“让贤”于潘公展的计划被打破了。当吴国桢宣布杜月笙当选议长后，杜强作镇静地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站了起来。本来，杜月笙的秘书已给他准备好一个长篇发言稿，引经据典地吹嘘所谓“让贤”之意，但这时，杜月笙已没有兴趣使用这个稿子了，只有气无力地说明自己健康情况欠佳，行政经验不足，要求准其“辞职”，另选贤能。接着，杜月笙的表弟、市参议员朱文德便将杜月笙预先拟好的辞职呈文，递交吴国桢，由吴当众宣读。吴国桢读完杜月笙“辞呈”后，杜月笙在市参议会内的徒众党羽们，纷纷起立挽留，作出坚持要杜出任议长的姿态。其他议员则主张“顾及事实”，听从杜月笙辞职。会场内因此展开激烈争论，有人要求就此进行表决。吴国桢知道杜月笙在市参议会内有相当势力，如果表决下来不同意杜辞职的占多数，这台戏便很难按照蒋介石的意旨唱下去，因而出面宣布：“杜先生众望所归，今坚诚请辞，非表决所能勉强，故依法令听从杜先生所请，另行重选。”国民党市参议会因此又发一次票，做第二轮选举。最后，总算选出潘公展、徐寄庠分别担任上海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结束后，潘公展、徐寄庠为抚慰杜月笙，特拉他一起合影。潘公展并对杜月笙说：“请多多指教。”杜月笙则回答：“别客气，我们三位一体”。表面似乎表示与潘、徐同舟共济，骨子里是在提醒潘、徐二人：我在市参议会的地位，并不亚于你们两位议长。

事实确也如此。在市参议会议员中，杜月笙除了原来能直接控制的三十多人以外，以后又继续收买拉拢了一批本来不属于他势力范围内的议员。例如，将费树声介绍到大东书局当挂名专员，将汪志奎介绍到浦东银行当挂名稽核，让他们每月拿一笔津贴，使这两名议员转而以他之命是从。上海市政府民政局长张晓松为了保证民政局一些议案能在市参议会顺利通过，也拜到杜月笙门下。这样，杜月笙在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内始终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不少议案，要由吴国桢、潘公展事先征得杜月笙同意，方才能够通过。一九四八年，市财政局企图增加房租水电费，这一提案如获通过，不但要增加一般百姓的负担，而且也会损害那些阔佬的利益。因而上海市参议会的不少议员起而反对，参议会中为此发生激烈争吵。杜月笙当时正发病，不能到会。吴国桢和潘公展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好亲自找到杜公馆，请杜月笙帮忙。于是在下次开会时，杜月笙便由人用藤椅抬到会场，充当房租水电费加价的提案人，鼓吹“大家要顾全大局，体谅政府困难，协助政府共度时艰”，使提案得以通过。

杜维屏入狱

继万墨林入狱，议长位置被迫让出后，一九四八年，杜月笙碰上一件更令他伤心的事，这就是蒋经国至上海“打老虎”时，把他的第三个儿子杜维屏送进了班房。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后，蒋介石政权在战场上节节失利，财政经济方面的危机也更加严重。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党政府的“国务会议”通过一个“救济特捐办法”，强行征得法币十万亿元，想以此补救濒临崩溃的经济局面。但由于通货无限膨胀，法币发行达到天文数字，甚至出现了五百万元的票面。物价暴涨七百万倍。区区十万亿元，不够国民党政府一个月的开支。因此，八月十九日，蒋介石又以总统名义颁布了一个《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决定发行金元券。该“处分令”规定，金元券一元合法币三百万元，金元券四元合美金一元。法币自八月二十日停止发行，民间持有的所有法币、外币及金银，一律在限期内兑换成金元券，同时实行强制限价，冻结工资。其目的很明显，是想以改革币制为理由，公开掠夺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这一强盗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抵制。为了强行实施《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八月二十一日，国民党政府规定，在各重要地区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上海区是俞鸿钧，天津区是张厉生，广州区是宋子文。不久，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区督导副专员，以“太子”身份亲来上海督战。蒋经国是蒋介石的“王储”，为了给他登基创造条件，自蒋经国从苏联返回后，蒋介石让他先后担任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兼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与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事长、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国民党中央银行副总裁、国民党青年远征军政工班主任、国民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并举办所谓“赣南新政”，极力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与国民党腐败现象迥异的少年有为形象。

因此，蒋经国上任不久，便一本正经地扬言：“此次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实行币制改革，已具最大决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实行，不打折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法令”。还让人编了所谓“打虎歌”，进行宣传，歌曰：“督导大员蒋经国，

不拍苍蝇老虎捉，捉罢大虎捉小奸，誓将奸商一网缚！笑尔奸商擅作福，而今但闻一家哭，安分百姓拍手道，国泰民安天下乐”。实际上，真正的“老虎”是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那些不大不小的奸商充其量是“狐狸”，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相比，更不过是“猫咪”而已，蒋经国所谓“打虎”，恰恰是老虎吃“狐狸”和“猫咪”。

饱经世故的杜月笙从蒋经国的言行中，嗅到几丝于己不利的异样气味，便耍了一个滑头，故作拥护《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姿态，让长子杜维藩当着许多人的面打开了他放在华格臬路杜公馆的一个巨型保险箱。人们原以为这只巨型保险箱里会有大量金银珠宝，但打开一看，里面只有银元三百七十二块，明眼人很清楚，杜月笙手中的金银外币，远远不只这些。但杜月笙却扬言，他的所有金银都存放在这只保险箱中，让杜维藩拿了这些银元去银行调换金元券，并装模作样地对他周围的人说：“你们有多少黄金、美钞、银洋钿，我不晓得，我也不问你们，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声，这次中央颁布的是‘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中央一定会雷厉风行。你们所有的金银美钞，务必要遵照规矩，在限期以内全部兑换金元券，否则的话，我今日有言在先，不论哪个出了事情，我绝对不管。”杜月笙周围的人当然能听出他此话的弦外之音，而且杜已给他们作出了如何应付的榜样，于是各显神通藏匿金银外币，有的还勾结官僚集团的某些要人，进行投机倒把。

由于广大群众和民族资本家的抵制，加上各类奸商纷纷以滑头态度对付《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蒋介石政权在实行币制改革的初期并未捞到多大好处。情急之下，决定“杀鸡儆猴”，蒋介石政府以泄露重要机密、非法投机牟利为理由，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抓了起来。监察院并因此“纠举”财政部长王云五。在上海，蒋经国则于九月三日，下令逮捕了申新纺织总公司总经理、政府“国大”代表荣鸿元，上海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上海永泰和烟行经理黄以职，上海吴锡记棉布号经理吴锡麟，上海黑市金钞掮客韦伯祥，股票商林乐畊，以及杜月笙的三儿杜维屏等人。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依仗杜月笙的势力，经常搞投机倒把。这次他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二千八百多股，在他看来，实在是小事一桩，未料蒋经国会在这桩“小事”上作大文章，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的罪名，把他逮捕入狱。此外，蒋经国还将永安纱厂副经理郭棣活、时任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和油墨公会理事长张超传去训话。万墨林走进蒋经国办公处时，蒋经国连坐都不让他坐，厉声喝道：“你过去出事案甚多，尤其粮贷案的事情，历历在人耳目，今后上海米的供应要你负责，上海有一无缺米，你的生命就会结束。”万墨林惊慌失措，肚子里虽不服，嘴上却连连称是。

蒋经国抓杜维屏，训万墨林，无异是公开掴杜月笙的耳光，几乎把杜气死过去。他接连几天起不了床，以后便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出门，也不见客。有一天，范绍曾去看杜月笙，杜对这位把兄弟恨气难消地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气喘了一阵之后，杜又酸楚凄凉地连叹几声说：“现在租界没有了，该是我们要我下

《蒋经国在上海》，中华印刷出版公司 1948 年 10 月版，第 29 页。

《蒋经国在上海》，第 29 页。

台的时候了。”当时一部分和杜月笙关系密切的报纸，不知如何处理这一新闻，《申报》、《时事新报》为此分别举行了编辑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决定把宣传重心放在同时被捕的其他人身上，对杜维屏则略带一笔，在标题上不着一字。蒋经国曾将杜维屏被捕照片送交《申报》和《时事新报》，要他们制版登出。两报故意把版面弄得模糊不清，且未将照片全部登出。蒋经国派人查问时，两报推说是印刷时间紧凑，技术不精所致。

老谋深算的杜月笙，沉默了一阵后，决定采取公开拥护，暗中抵制的方法加以反击。一方面，在公开场合他口口声声说：“我的孩子破坏了交易所的规章，应当办。我决不去保他。”同时在他所控制的报纸上，登出一篇“辟谣谈话”，大意是：他看到香港有报纸说杜月笙因儿子被捕，曾三次晋谒蒋经国，均被挡驾，因此颇为怨恨云云，十分诧异，曾去信要求更正，并说：“此次小儿维屏，以经营场外交易，违反交易所法，适逢抛纱案发，致被牵涉解送法院。自始至终，镛即认为依法检举，依法办理，实为天经地义。其间绝无请托，绝未说情，港报所载三度请谒均被挡驾之说，全是向壁虚构，毫无故实。二十年来，镛之爱护领袖，服从政府，众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镛心所企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枉不纵，深致敬佩，何致以事涉私情，有所非议，而港报遽以暴力、革命等字句相加，当不值识者一笑也。”另一方面，杜月笙派许多人秘密调查了孔祥熙长子孔令侃独资经营的扬子公司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情况，掌握了不少确凿证据。然后当面对蒋经国说：“我的儿子触犯法纪，罪有应得，我管教不严，也甘领应得之处分，但请一秉至公，平等办理。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纱布等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泄露经济机密的情状，也远为严重，请专员立即派员去查看，万勿听其逍遥法外，如此，则万众都心服口服了。”此这一新闻，《申报》、《时事新报》为此分别举行了编辑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决定把宣传重心放在同时被捕的其他人身上，对杜维屏则略带一笔，在标题上不着一字。蒋经国曾将杜维屏被捕照片送交《申报》和《时事新报》，要他们制版登出。两报故意把版面弄得模糊不清，且未将照片全部登出。蒋经国派人查问时，两报推说是印刷时间紧凑，技术不精所致。

老谋深算的杜月笙，沉默了一阵后，决定采取公开拥护，暗中抵制的方法加以反击。一方面，在公开场合他口口声声说：“我的孩子破坏了交易所的规章，应当办。我决不去保他。”同时在他所控制的报纸上，登出一篇“辟谣谈话”，大意是：他看到香港有报纸说杜月笙因儿子被捕，曾三次晋谒蒋经国，均被挡驾，因此颇为怨恨云云，十分诧异，曾去信要求更正，并说：“此次小儿维屏，以经营场外交易，违反交易所法，适逢抛纱案发，致被牵涉解送法院。自始至终，镛即认为依法检举，依法办理，实为天经地义。其间绝无请托，绝未说情，港报所载三度请谒均被挡驾之说，全是向壁虚构，毫无故实。二十年来，镛之爱护领袖，服从政府，众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镛心所企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枉不纵，深致敬佩，何致以事涉私情，有所非议，而港报遽以暴力、革命等字句相加，当不值识者一笑也。”另一方面，杜月笙派许多人秘密调查了孔祥熙长子孔令侃独资经营的扬子公司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情况，掌握了不少确凿证据。然后当面对蒋经国说：“我的儿子触犯法纪，罪有应得，我管教不严，也甘

领应得之处分，但请一秉至公，平等办理。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纱布等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泄露经济机密的情状，也远为严重，请专员立即派员去查看，万勿听其逍遥法外，如此，则万众都心服口服了。”此话一出，蒋经国骑虎难下，只得派员去扬子公司搜查，结果确与杜月笙揭发的情况相符，当场把该公司主事人扣留起来。孔令侃闻讯，连夜打电话给他母亲宋蔼龄告急，宋蔼龄随即找其妹宋美龄说情，不到两天，蒋经国便接到蒋介石“严谕”的把柄，但凭这一条罪名，也判不了重刑，况且当时问题比杜严重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多得很，因而只好将杜送到法院，判了八个月徒刑。杜维屏见事不过如此，立刻声明不服，延聘几个律师上诉，拖到十一月间，法院改判为六个月，随即被潘公展保释出来。蒋经国原以为抓几个人就可以把操纵市场的投机商人吓倒，结果却失败得更快，他在上海搞了不到三个月，便偃旗息鼓，灰溜溜的跑回南京。这时杜月笙才再度在公开场合露面。

策划上海“国际化”

杜月笙虽然与蒋介石集团产生了一些颇为不快的矛盾，但是，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彼此互有所求，所以这种矛盾并没有演化到公开破裂的程度。

一九四八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胜利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意识到单纯使用军事斗争手段，已无法阻止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便转而乞灵于政治和外交斗争的方法。为了保住上海这个对他们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他们抛出一个上海“国际化”的方案，《大美晚报》鼓吹说：“最好由一些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士，个别或集团的，官方或私人的，在局势危急时出来表示愿与我国合作，伸能在紊乱中保持上海传统之天堂地位。……因为这样始可避免侵犯主权之嫌。”长期以来，杜月笙把宝主要押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身上，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害怕旧统治秩序的改变，因而积极参与这项阴谋活动。

十一月中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上海，与杜月笙、潘公展等人会面，企图建立一个类似当年租界中万国商团那样的组织。与司徒雷登面谈之后，杜月笙、潘公展等人便以上海市参议会的名义，发起所谓“自救救国”运动，想使上海在“自救”的名义之下，转入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不久，美帝国主义分子蒲立德又来到上海，杜月笙、潘公展等人应蒲立德之约，前去和蒲立德交换“关于美国加强援华如何能更有效之意见”，据《申报》报道，会谈气氛“坦白真诚”，谈了两个多小时，言犹未尽，还“相约订期再谈”。

杜月笙等人的上述活动，是在蒋介石的密切关注之下进行的。所谓“自救救国”运动还在筹备时，蒋介石便曾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市长吴国桢，询问详情。不久，又召潘公展去南京，向他当面汇报。潘公展去南京见了蒋介石后，再次与司徒雷登会面，返沪后，曾得意洋洋地向新闻界透露：司徒雷登

1948年11月7日《大美晚报》。

1948年11月25日《申报》。

对“自救救国”运动，“颇为首肯”，并向他表示“外商决不随便撤退”。以为上海留住了帝国主义势力，他们便可有恃无恐。潘公展从南京回上海那天，蒋介石又电召杜月笙去南京，并在杜赶上南京的当天晚上，就在官邸召见。之后，又邀杜月笙共进晚餐。

经蒋介石面授机宜，杜月笙返回上海后，更加起劲地进行活动。十二月八日，杜月笙与潘公展一起假中汇大楼，宴请在上海的英、美商人和所谓“各界领袖”，将建立类似万国商团组织的方案进一步具体化，扬言要拉起一支拥众十万的武装“地方自卫队”，实现上海所谓“地方化”。十二月十日。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来到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说：“美军海军陆战队已决定开一部分来上海，必要时负保侨的责任。”

美国舰队司令的讲话，使杜月笙等人感到有恃无恐，便在十二月十二日召开了“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拼凑了一个包括一百七十人的行动委员会，推举杜月笙、徐寄庠、钱永铭、潘公展、王晓籁、杨虎、方治、王先青、水祥云、陆京士、杨管北等六十九人担任常委，以杜月笙为总主席。成立大会上，杜月笙以总主席名义致词，反复强调上海对“中国”和“世界”如何重要，实际是要求帝国主义对上海不能撒手不管；并号召他的党羽徒众们“在国家元首领导下，展开救上海救国家之工作”。成立大会上，还宣布组成“地方自卫保安团”，征集“自卫特捐”，声称“要保卫地方，须加强地方武力，要建树地方武力，地方人士有钱者当出钱，有力者出力，俟地方安定后，才能繁荣上海，若现在不愿出钱，将来想求人保护，自然亦不可能，故希望各界人士合力协助，完成此举。”想借机再捞一把。

“自救救国联合会”成立当天，杜月笙单独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在对共作战中，立即需要更多之美援，此举对中美两国均属有利。如美国国防计划能与中国政府之剿共配合，则美国海军当局决定保护上海区美侨生命财产之决定，将更能有效地进行”，并奴颜婢膝地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麦克阿瑟或魏德迈来华担任军事顾问，声称：如能这样，“则中国之民气将大受激励”，否则“如中国不幸沦入共产主义，日本、亚洲及其他国家，将陷入同样的命运。事实上美国及世界其他各地均受其威胁。”

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步力量和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强大，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敢以公开方式直接派兵进驻上海，杜月笙等人以“自救”相标榜的“国际化”阴谋，终于夭折。

1948年12月4日《申报》。

1948年12月17日《新闻报》。

1948年9月12日《中央日报》。

十四 末路之日

仓惶出逃

一九四九年初，继辽沈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又相继取得了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已指日可待。在内外交困下，蒋介石于一月二十一日发表文告，第三次宣告“下野”，李宗仁就任国民党政权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已处于树倒猢狲散的局面。杜月笙对国民党政权感到绝望，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起来了。

这年一月，杜月笙看形势越来越不妙，就离开上海去香港“养病”，并把他在杜美路26号那幢豪华的住宅，以四十五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驻沪领事馆。杜月笙此行是为了对蒋介石集团曾给予他的排挤表示某种程度的不满，同时也是为自己准备后路。从一九四八年秋天开始，上海就流传黄炎培、陈铭枢等人动员杜月笙投向民主阵营的说法，这次杜到香港不到一星期，上海一家与国民党市党部有关系的小报，便说他与杨虎两人“在港欢迎会上，忽发‘怪论’，对于国内政治经济之措置失当，诿为官僚主义之结果，并公然主张停止内战，实行民主，闻者出乎意外，为之咋舌。犹忆去年政协闭幕后，国共失欢，内战掀起，上海市商会曾电请政府，明令戡乱，时杜氏为该会常务委员，实主其事。……在吾人理想中，斯二人者，纵非官家之‘自己人’，与民主阵营总觉格格不入，不谓一登香岛，居然作风大变。”三月八日，杜月笙在香港为其次子杜维垣完婚，众多的来宾中除了杨虎、王正廷、许世英、洪兰友外，还有当时已经公开反蒋的民主人士李济深、蔡廷锴等人，说明杜月笙这次去香港，和民主人士是有过接触的。当时上海小报因此传出流言，有的说杜月笙已从香港奔赴延安；有的则说杜月笙在香港买了房子，准备在那里长做寓公。国民党当局对这个上海滩上的“闻人”是极力要争取的，因此蒋介石派了不少说客去香港劝杜月笙早日返回上海，还令杜的儿子亲往迎接。于是，三月二十三日杜月笙也就“病愈”回到了上海。

杜月笙回到上海之后，国民党政权已面临覆灭。四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二十三日解放了南京，几十万大军向上海逼近。杜月笙眼看大势已去，便作了离开上海的准备。他关照自己周围的亲信说：“行李收拾好，说声走就动身。”但表面上他还故作镇静。此时，关于杜月笙的动向，上海社会上仍然有各种流言，包括说有民主人士去杜家，动员他弃暗投明。杜月笙是一个社会交游极广的人，和一些民主人士也有某些联系，不能说他这时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作过多种设想。但从结果看，杜月笙始终没有下决心和蒋介石集团决裂。由于传说纷坛，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又屡屡前来“探望”，杜月笙知道蒋介石对他放心不下，害怕“弄不好，会起绝大的风波”，蜷缩于十八层楼寓所，声言：“除非国民党军政要人、至亲好友及亲信学生，外人概不见面”，以避嫌疑。这时国民党军正叫嚷“保卫大上海”，蒋介石还亲自从浙江奉化溪口老家秘密飞到上海布置防务。国民党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要杜月笙出任“上海市城防工事建筑委员会”主席。杜月笙感到南京龙蟠虎踞，长江号称天堑，尚且守不住，上海是一片平阳，连座城墙也没有，怎能抵挡得住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但杜月笙认为

“外间谣诼正多”，空气对他不利，为了“止谤避嫌”，藉以明哲保身，他虽然病魔缠身，还是强打起精神，出任“上海市城防建筑委员会”主席，负责筹款购料，为蒋介石集团效劳。

四月十日，蒋介石在上海召见了杜月笙。蒋先是对杜前阶段在上海出面“领导”上海绅商各界搞“国际化”、“自救救国运动”表示称赞，并为此举没能得到国际上的支持而失败感到惋惜。接着，蒋又亲自动员杜月笙“在适当时机到台湾去”，并有意提醒杜说：“民国十六年四一二清党，你在上海是出了大力的，你的中华共进会是立了大功的。还有，处决了汪寿华这个赤色分子。所以你不能留下，你必须走呀！”其实，在此之前，吴开先等人已奉令劝过杜月笙出走。有一次，吴开先不无威胁地对杜说：“杜先生，‘血债血还’是共产党一直在喊的口号，你不要忘记民国十六年清党的时候那一幕，你杀过什么人，共产党清楚得很。”这些话确有些使杜月笙心惊肉跳，他对吴开先说：“这些我都晓得。开先兄，你放心，我决不会让我的头颅跟心肝，给共产党去祭他们的烈士！”现在蒋介石又亲自对他说这番话，更令杜月笙心悸，他不由得对蒋表示说：“是。”蒋见杜同意出走，就以亲切的口吻说：“还有一件事，我要向你解释。去年八月，经国在上海扣了你孩子的事，事先我确实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嗯，否则，我不会让他们那样胡闹！谁没有亲戚朋友呀，叫至亲好友丢脸的事，我能干吗？”杜月笙虽然知道蒋介石在演戏，但听了这些话后毕竟消了点心里的闷气，也缓和了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与蒋介石谈话之后，杜月笙终于下定了出走的决心。

微妙的是，杜月笙虽然决定出走，但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去台湾，而是决定去香港，公开的理由是：台湾天气比较热，比较潮湿，对气喘病，不大相宜。暗中是否有对蒋介石集团保持一定距离，以求在人民政权方面留有回旋余地的意思，就不得而知了。当时，陆泉根为了感谢杜月笙给他揽到的包建上海城防工事的美差，已搬到十八层楼公寓，靠近杜月笙而居，以随时听从杜的差遣。他得知杜月笙决定去香港后，便对杜拍胸脯说：“香港方面我有不少做房地产的朋友，杜先生去香港住的房子，由我负责我。”几天之后，陆泉根向杜报告：他以六万港币的顶费，在香港为杜月笙租了一幢房子，位于坚尼台路18号。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杜月笙的出走便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在人民解放军围攻上海前夕，杜月笙带着姚玉兰、孟小冬，以及一批亲朋、好友、随从、保镖，登上了荷兰渣华公司的万吨级客轮“宝树云”号，仓惶逃去香港。

在轮船上，杜月笙望着船尾那蛟龙般摆动的浦江激浪和渐渐远去的上海，心头上涌上一股难以言状的凄凉。他预感到他在上海多年经营的“安乐窝”，他的显赫威势，将永远失去了。想到这里，他的精神和那瘦骨鳞峋的身子再也无力支撑，一齐垮了下去。这可忙坏了姚玉兰和孟小冬，在整个航行途中，她们两人一起挤在杜月笙住的头等客舱内，轮流伺候这个落魄的闻人，好不容易熬到了香港。

中国共产党解放上海后，为了团结各方人士，稳定上海的社会秩序，不计前恶，曾由章士钊去香港规劝杜月笙返回上海。当时已弃暗投明的杨虎，也曾对杜月笙派回上海探问情况的黄振世说：“我在民国十六年干的坏事不比杜（月笙）老少，只要改过从善，人家也宽容了我，叫杜老回大陆来，保他无事。”但杜月笙在有生之年，始终未能接受我党和人民给他指出的光明

之路，顽固地避居香港，最后落得个异常困窘的下场。

寓公不好当

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杜月笙避居香港，还可以“坚持抗战”相标榜；那么，这次杜月笙则是在蒋介石集团作鸟兽散的情况下无可奈何逃去的，因而他在香港的境遇也大非昔比。住下不久，他周围的亲朋好友，便接二连三遇到麻烦。

首先是朱如山。这个阔佬好色如命，妻妾成群。家里养着一大窝姨太太，他一人照顾不过来，免不了发生见不得人的丑事。当年在上海滩时，朱如山有财有势，无人敢说三道四。到了香港，当地人不买账，有家报纸便以“朱门丑史”为题，辟出专栏，连日登载披露朱家“风流艳事”的报道，搞得朱如山拿起报纸就感到心惊肉跳，不知又将有什么对他不利的新闻出现。

接着是李祖永。此人嗜赌，时常到香港中环一家俱乐部赌钱，其间结识了一位“赌友”。这位“赌友”告诉他，有个“华侨”准备从美国到香港投资，劝李祖永和他合作。于是，某天这位“赌友”陪着李祖永去启德机场接那位“华侨”。机场上，李祖永目睹那位“华侨”从由美国飞来的班机上步下，衣着考究、派头十足，因而相信他确有来头，急于和他结识。不久，李祖永的赌友告诉李祖永，那位“华侨”已在香港买下一幢别墅，请李祖永去玩。李祖永欣然前往，那位“华侨”豪爽地表示愿与李祖永共同经营企业，这使李祖永进一步解除了戒心。玩乐之间，有人提出“猜角子”。所谓“猜角子”，实际是一种简便赌博方法，庄家将十几枚角子放在口袋里，每次掏出几枚，由对手猜，对手猜不着，所押之钱归庄家，猜着了由庄家赔上若干倍。李祖永眼见那位“华侨”玩“猜角子”时，每次所押赌注竟达港币一、二万元而且不善赌，转眼便输了好几万元港币，但他却满不在乎。这不禁使李祖永产生了侥幸心理。因此，当有人邀李祖永作庄，与那“华侨”对赌时，李祖永毫不踌躇地坐了下来，几次一猜，便赢了那“华侨”一、二万元港币。那“华侨”似乎冒火了，一下押上了五万元港币，李祖永望着这笔为数不小的款子，心中暗喜，他口袋里当时装了十二枚角子，伸手进去掏出几枚，又暗自数了一下口袋里所剩角子数为五枚，十二去五，手里肯定是七枚，那位“华侨”猜是八枚，李祖永认为必赢无疑，得意洋洋地张开了手，一看，却惊呆了，他手里的角子数不是七枚，而是八枚。李祖永大惑不解地重新核对了一下口袋里的角子数，确是五枚，五加八为十三，比他原来放在口袋里的角子总数多出一枚。李祖永这才悟出，有人乘他不备，悄悄在他口袋里加进了一枚角子，作好了圈套让他钻，李祖永虽气，但因没有当场抓住向他口袋里放角子的人，只得自认晦气，签了一张二十万元港币的支票，交给了那位“华侨”。

朱如山、李祖永等人碰到的这些麻烦事，以后虽然都由杜月笙托人找到香港新闻界和黑社会中人，帮助他们保住面子，挽回了损失。但这却在杜月笙心头增加了不快。在他看来，区区一张小报、几名黑社会的“老千”，居然敢公然欺侮他的朋友，这在当年的上海滩是难以想象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只得不惜钱财，拉拢香港黑社会中的头头脑脑。当时势力已有进一步发展的李裁法，想在九龙青山开设一家最高级别的酒店，以招徕由大陆涌向香港的豪绅巨贾、达官贵人。为此需要港币三十万元，他想自任一半，另一

半招股，因而找到杜月笙。杜月笙立刻对李裁法说：“裁法，你的心意，我懂。你把这稳赚钱的生意要我代为邀股，无非是为捧捧你的场。既然是捧场的事体，又何妨捧足输赢，这里是香港，不是上海，干脆我当董事，你当董事长。”就这样，他出力出钱，帮助李裁法创办了青山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这个一生最喜欢出风头的人，这次自己却只能屈居董事，而尊当年芮庆荣的手下人李裁法为董事长。杜月笙在香港不仅有身价日落的烦恼，还有财源紧缩的忧虑。他一家在香港每月日常开销需要港币六万元以上，加上应酬、捧场之类，开支更大，杜月笙虽然吮足民脂民膏，但他在香港的根基，毕竟无法和在上海时相比，烟赌两业难以包揽，其他生意要插手也非易事，因而时时担心“坐吃山空”。为了尽可能多捞些钱，杜月笙到处设法。他担任过中国航联香港分公司的董事长，做过各种投机生意。有一次，他发现恒社社员袁国楔在买卖股票，立刻两眼发红地问道：“赚铜钿吗？”袁国楔回答，“香港不比上海，眼光不大容易轧得准。”但杜月笙仍然急切地关照袁国楔有机会就帮他做两票。那时，有些逃亡香港的公子哥儿，听信国民党的宣传，认为用不了多久，美国人就会帮助他们重返昔日的乐园，因而在香港花天酒地、大肆挥霍。但未曾想到新生的人民政权一天比一天稳固，他们带去香港的黄金、美钞都用得差不多了，于是从大酒店搬进亭子间，以至租铺位、睡地板的也不乏其人，到穷极潦倒时，甚至想借几角钱港币到饭摊上混顿饭吃都不可得。杜月笙周围也有落到这种地步的人。有个早年在重庆屈指可数的富翁，房屋、田产不可胜数，逃亡香港后，很快破落下去，连一张由香港去台湾的船票都买不起，只得伸手向杜月笙借贷。这些情况，使杜月笙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前程。这个过惯寄生生活的闻人，因此不寒而栗，一再发出“香港居，大不易”的叹息。

对前途的极度悲观，使杜月笙不得不求助于问巫占卜，借江湖骗子的信口雌黄，维持心理上的平衡。于是，当时香港的一些著名相士，如袁树珊、李栩庵、吴师青，还有什么紫虚上人、赵神仙、一成仙等等，纷纷成为杜公馆的座上客。这些相士们，为讨杜月笙欢心，专拣好听的说，袁树珊和李栩庵甚至推算出杜月笙还要交十年好运，活到七十三岁后，方“福寿全归”。依靠这些奉承话，杜月笙绷紧的神经才多少得到松弛。象吸吗啡上了瘾，少了相士的安慰，杜月笙就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无法支持下去。但时间长了，同样的奉承话听多了，杜月笙又担心别人在骗他，为了解除这种忧虑，证明自己没有上当，杜月笙改名换姓，悄悄写了一封信，附上自己的生辰八字，寄给台湾一个号称“六月息馆主”的算命先生，求他为自己算命。隔不了多久，那位“六月息馆主”复了一封信，上面批了两句话：“六十四岁在辛卯，天剋地冲绝难度过。”这对杜月笙来说无异是晴空霹雳，以相士的谎话作为精神支柱的杜月笙，同样被相士的胡言抽掉了脊梁骨。从此后，他完全瘫倒，气喘病也日复一日地加剧。

最后一次婚礼

杜月笙一生举行过多次婚礼，最后一次是和孟小冬。

孟小冬是当年京剧著名须生余叔岩的传人，很多内行都认为真正继承余叔岩的艺术而得其精华的，孟小冬应是第一人。孟小冬生性高傲，但在那暗无天日的世道里，一个唱戏的女子是很难有好归宿的。一九二六年，孟小冬

与梅兰芳相恋时，当时北平市市长的儿子扬言梅兰芳夺了他的“未婚妻”，怀里揣着手枪闯进梅兰芳家中。梅兰芳的一位朋友见状不好，出面劝阻，梅才乘机逃出。这位少爷兽性大发，开枪将梅兰芳的那位朋友打死。这事发生后，孟小冬被迫离开梅兰芳。以后，便被杜月笙霸占。

孟小冬是个热爱艺术的女子，进了杜月笙家门，却成为被关进笼子的金丝鸟。尤其是到了香港以后，每天的任务便是给比死人多口气的杜月笙送茶端饭、煎药侍疾，时常还要受到杜月笙其他老婆的冷嘲热讽，她心境之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当着杜月笙的面，孟小冬不得不强颜欢笑，独自一人时，却时常眉宇紧锁，愁云布面。尤其想起杜月笙把她弄进家门，虽已生了女儿杜美娟，却始终没有正式和她举行过婚礼，和她的关系至今不明不白，心中更是郁闷。有一天，孟小冬终于发作了。那是一九五五年的某天，有人劝杜月笙离开香港去法国，杜月笙当着家人的面，捏指计算如果去法国，需要多少张护照。这时，孟小冬冷冷地插嘴问了一句：“我跟着去，算丫头呢，还是算女朋友呀？”杜月笙一愣，很快明白了孟小冬是在争取明媒正娶的身份。对杜月笙来说，女人不过是玩物，不喜欢了，怎么处理都可以。他有一个老婆，与表兄有来往，被杜月笙发现，便命令手下的打手，将那男的绑架到郊外，生生打断两条腿，还用石灰把接送他们相会的汽车司机弄瞎了双眼。那位姨太太则被关进杜公馆顶楼的一间小屋里，一关十几年，直到她所生的儿子结婚时，才被放出来。青春少妇，已成白发之人。但杜月笙这时对孟小冬尚未产生厌弃之心，而且他身患重病，离不开手脚麻利的孟小冬服侍；同时，杜月笙也想借此机会“冲冲喜”，以去掉一点“晦气”。所以，他决定顺从孟小冬，再作一次新郎。

当新郎对杜月笙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因为这已经是第七次了。

杜月笙第一个妻子叫沈月英，苏州南桥人。幼时，曾和母亲一起，跟随父亲到东北哈尔滨做生意。后来，她父亲的生意失败，贫困交加，病死在外乡。沈月英随同母亲辗转来到上海。杜月笙那时还在黄金荣家当下人，但已得到黄金荣老婆林桂生的欢心，有些人为了讨好杜月笙，便把沈月英介绍给他。杜月笙见沈月英长得面目清秀、身材苗条，一心想占有她，经常朝她家里跑。沈月英母亲客居上海，无以为生，把女儿当成唯一资本，想找个有钱有势的女婿，使她老有所养。杜月笙摸透沈月英母亲的心思后，向林桂生哀求一番，林桂生这时已决心提拔杜月笙做她的心腹爪牙，因而一口答应帮忙，借了一笔钱给杜月笙。杜月笙在同孚里租了一幢房子，置办各式家具，请黄金荣做媒，用一顶宁波式龙凤花轿，将沈月英抬进家门。喜酒摆得是流水席，来人则开，吃完就走，整整闹了十天，结婚后，沈月英给杜月笙生了个儿子，就是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为使杜月笙能死心塌地为己所用，黄金荣、林桂生要杜月笙把这头生儿子过继给他们。杜月笙认为攀上了高亲，喜得心花怒放，当然一口答应。从这以后，杜月笙改口称黄金荣为“金荣哥”，林桂生为“桂生姐”。以后，沈月英又生了个女儿，但不久就夭折了。

杜月笙与沈月英结婚后，依仗黄金荣的势力，世面越做越大，家里的金银元宝、珍珠玛瑙，要用保险柜装。他在上海滩也成了一个受人恭维的角色。而沈月英在连生两个孩子后，未免见老，加上幼年营养不良，身体亏，以后又抽上鸦片烟，精神日益萎靡。这使杜月笙越来越看不上眼，于是他借口沈月英无力帮他料理家事，公开对沈月英提出：“我要去讨两房小，专为帮你的忙。”知夫莫如妻，深知杜月笙为人的沈月英怎敢阻止，她头也不抬地说：

“有本事你去讨嘛！”于是，杜月笙一年之内，接连纳了两房妾。这两人也是苏州人，都才十五岁，一个姓陈，一个姓孙。纳这两房妾时，杜月笙同样大张筵席，宴宾款客。陈氏给杜月笙生了二儿杜维恒、五儿杜维翰、六儿杜维宁。孙氏给杜月笙生了三儿杜维屏、四儿杜维新。

一九二九年，黄金荣开设的黄金大戏院，请来了三位红极一时的京剧演员。三人是母女关系，母亲小兰英唱老旦，大女儿姚玉兰唱老生，二女儿姚玉英唱武生。三人唱做俱佳，而且母女合唱，配合更为默契，因此轰动了上海滩。杜月笙爱看京戏，有时还滥竽充数，上台客串。他看了母女三人一场戏，便被年轻美貌的姚玉兰吸引住了。从此以后，他每天都赶去黄金大戏院，声嘶力竭地为姚玉兰捧场。戏一唱完，便钻进后台，想方设法向姚玉兰身边靠。姚玉兰的母亲是久走江湖之人，一眼就看穿了杜月笙的用意，她形影不离地护着姚玉兰，杜月笙不管问什么话，姚玉兰都笑而不答，一律由她母亲应付。杜月笙虽急得抓耳挠腮，也未能和姚玉兰搭上一句腔。他想发作，但这母女三人是黄老板请来的演员，他又不敢造次。后来终于被他打听到，小兰英因业务上的需要，与黄金荣那个地位特殊的长媳李志清来往较为密切。于是，杜月笙驱车去黄公馆，见了李志清，便故作亲热地问：“妹妹，听说小兰英和你蛮要好？”李点头，杜月笙便将他想占有姚玉兰的心思告诉了李志清。李一口答应帮忙。不久，便代杜月笙向姚玉兰提婚。小兰英和姚玉兰虽然觉察到杜月笙不怀好意，但事到临头他们仍感意外，杜月笙已四十二岁，而且有妻妾三房。姚玉兰还是个少女，有哪个正派母亲愿意让自己含苞待放的女儿去给人做小。但她们也知道，一个“不”字如果从她们嘴里吐出来，不要说她们不能再在上海滩唱戏，能否平安离开上海都成问题。母女三人左思右想，百般无奈之下，只得答应杜月笙，但提出两个条件：一，公开宴客成亲；二，和杜月笙原来的三房妻妾分开居住。杜月笙有的是钱，这两项条件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于是，杜月笙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租下一层豪华的西式楼房，大宴宾客，将姚玉兰讨来做了第四房姨太太。姚玉兰过门后给杜月笙生了两个女儿：杜美如、杜美霞。为了答谢李志清从中牵线，杜月笙送了李志清一只金表。

姚玉兰之后，杜月笙又讨了两房小，也都摆过喜宴，并又得二男，即七子杜维善、八子杜维嵩。沈月英、陈氏、孙氏、及后来讨的这两房小，都先后失宠。沈月英有一度干脆搬到金廷苏家和金廷荪母亲作伴，抗战时期，愁病交加，死了。孙氏则带着已出的两个儿子长期住在英国伦敦。陈氏也整日里闭户不出。只有姚玉兰还比较得杜月笙欢心，因而时常将她带在身边。杜月笙霸占了姚玉兰后，喜新厌旧，性情别移，又喜欢上了孟小冬。

为了满足孟小冬举行婚礼的要求，杜月笙命万墨林渡海去九龙饭店，定了九百元港币一桌的最好酒席，并将九龙饭店的厨师统统请到家中帮忙，将他与孟小冬的结婚喜宴准备得丰盛至极。那天，杜月笙不顾重病缠身，每日靠接氧气度日，由人搀扶着骨瘦形枯的身子，充当新郎，站在喜宴厅中会客。其后，杜月笙又命在港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向孟小冬行跪拜之礼，称孟小冬“妈咪”。

但喜宴上“笑逐颜开”的气氛，并没有冲去杜月笙的“晦气”，经这一场不胜其烦的劳顿，反而使杜月笙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羸弱程度，他预感到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婚礼，也是他最后的一次大宴宾客，他今后的日子不多了。

希望埋骨干桑梓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恒社成员袁国樑来看望杜月笙。到吃晚饭时，杜月笙为示亲热，特地将袁留下，陪他吃煨面。吃到一半，杜月笙突然感到不舒服，袁国樑想搀扶他去卧室休息，杜月笙憋足劲，用了几次力，却无论如何站不起身，双腿软得象棉花。袁国樑见状，只好半抱半扶，将杜月笙送进卧室。这从未出现过的症状，使杜月笙意识到：他是病入膏肓的人了。他连连自语道：“不对了！不对了！这次不对了！”杜公馆上下为此忙成一团，到处打电话请医生来诊治。迷信的杜月笙，暗暗祈求上天保佑，为了使上天的“反应”变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以慰藉自己空虚而绝望的心灵，七月二十九日，杜月笙命人给在台湾的陆京士打了一个电报，内容为“病危速来！”并对周围的人说：“如果陆京士八月一日赶到，我的病就有救。否则，一定凶多吉少。”但到八月一日这天，偏偏遇上台风，狂风怒号，浊浪排空，陆京士打来电话，说他八月二日方能启程。杜月笙一度抱有的几丝希望，被这场台风刮得踪影全无。当天晚上，他神情沮丧、面容灰败地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对围着他的亲友说：“我今天许了愿，京士如能飞到香港，我的病或许能够得救，但是我今天偏偏接到电话，说他今天不能来了。我晓得，我的病决不会好了。”杜月笙实在怕死，为了欺骗自己，他又在心里暗暗许愿：八月二日，陆京士如果能到香港，我的病还有救。

八月二日，陆京士终于出现在望眼欲穿的杜月笙面前。杜象溺水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伸出那双干瘪枯瘦的手，紧紧拉住陆京士的手不放。

但是迷信毕竟只能起一种暂时的慰藉作用，陆京士的到来，并没有使杜月笙的身体好起来。因而，杜的心情很快又转向低落。一天，杜月笙留陆京士在家吃饭，在场的还有吴开先、杜维藩等人。一个佣人盛了碗饭，双手端给杜月笙，杜手簌簌地抖着去接，一不留神，“当啷”一声，将碗掉到地上，跌成两片。这本是寻常小事，杜月笙的脸却刷地变白了。周围的人见状，急忙排解，有的说：“再添一碗来！”有的说：“没关系，碎碎（岁岁）平安！”但杜月笙却再也无心吃饭，周围的人只得将他扶上轮椅，推回卧室。从这天以后，杜月笙再没有离开病床。香港的若干名医，如吴子深、梁宝鉴、丁济万、吴必彰、朱鹤皋等都先后来给杜月笙诊过病，他们的诊断结果大致相同：“杜先生精、气、神三者无一不缺，恐怕不是药石所可以奏效。”

过了几天，可能是回光返照，杜月笙感到精神好了一点。事到这一步田地，虽然怕死，也不得不安排后事了。他把陆京士等人召到床前，吩咐说：他死后，一定要给他买口好棺材，入殓时要给他穿长袍马褂。他顶顶关心的还是尸骨落葬地点。此时此刻，他似乎更感到漂落异乡的凄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的尸骨运回上海，落葬故乡高桥。

安排丧事之后，杜月笙又昏昏沉沉地睡死过去。这以后，他醒过来便说几句话，除令人拍电报至美国要回存在宋子良处的十万美金外，还给他的各房妻妾及子女规定了遗产分配比例，并写下三份遗嘱。在遗嘱上签名的除杜月笙外，还有证人钱新之、吴开先、顾嘉棠、陆京士、徐采丞等。有一次，他眼瞪瞪地望着站在床旁的朱如山，忽然冒出一句话：“如山兄那里，我还有十万……”。朱如山未想到进入了弥留状态的杜月笙对金钱账目还如此清楚，连忙接上去说：“杜先生：你交给我的是十万港币，不是美金啊！”杜

月笙见朱如山如此情急，似有用意地狠狠盯了他一眼，才吐口说：“是港纸，当然是港纸了。”恒社成员们一直标榜“义气”，但碰到金钱，这“义气”二字便不知到何处去了。

八月十六日，国民党所谓“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由台湾赶到香港杜公馆，代表蒋介石“慰问”杜月笙。此时的杜月笙已不省人事，洪兰友对着他耳边大呼小叫地说：“杜先生，总统对你的病十分关怀，希望你早日康复。”这时，有个无意中摸到杜月笙脚的人，突然象触电般跳了起来：“哎！脚冰凉了！”“慰问”代表洪兰友，没有使杜月笙康复，却变成了他的勾命无常。此时，是下午四时五十分。杜月笙死讯传出，杜公馆早就准备好的嚎丧，顿时喷发，里里外外，一片捶胸顿足、嚎啕大哭的声音。

杜月笙死后，尸体停放在香港万国殡仪馆。他的亲朋好友、党羽徒众按照他生前想睡好棺材的愿望，给他寻觅了一口价值一万五千元港币的楠木棺材。此外，特请阴阳先生择定入殓日期。那位阴阳先生根据杜月笙遗属生肖与杜月笙的冲剋，捏指算了一番，声称：一定要在八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入殓，否则便生者不吉，死者不安。

入殓前，逃亡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大小官员，纷纷给杜月笙拍来信电，送挽额、挽幛、挽联。

八月十九日入殓之时，杜月笙的“治丧委员会”主任钱新之忽然拿出一本圣经，要放进并非基督徒的杜月笙棺材内，众人感到奇怪。钱新之于是打开圣经扉页，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月笙老哥灵鉴：

这本圣经是我们的好友吴德生兄译成中文，是中文圣经中最好的一本书，我与你都非基督教友，可是在你临终时，赵牧师为你祷告的时候，你说了好几遍：“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因此我把这本圣经送给你，在你进入天国的路途上可以诵读。

耶稣降世 1951年8月19日

弟钱永铭敬献

杜月笙拿着钱新之送的圣经是否就能进入天国，人们不得而知。但钱新之写的这段话，却颇为生动地反映了杜月笙死前的空虚、绝望之情。

入殓之后是出殡。出殡队伍的最前面是两个纸扎的高达一丈七尺的“开道神”，据说是用来给杜月笙在阴间道上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其后，便是根据蒋介石口述写成的挽额：“义节聿昭”。再后则是仪仗队，中西乐队，以及由尼姑、和尚伴送的装运杜月笙棺材的汽车。这支不中不西、亦土亦洋，光怪陆离、呜呜咽咽的队伍，将杜月笙的棺材送进香港东华医院义庄，暂时停放。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蒋介石集团成立了包括王宠惠、陈诚、何应钦、吴开先、郑介民、毛人凤等人在内的“杜月笙灵柩安厝委员会”，将杜月笙的棺材从东华医院义庄搬去台湾基隆，厝在台北县汐止镇大尖山麓之西。

